

## 目 录

前言	( 4 )
反击右派——“反其道而行之”! (1957年9月21日郭沫若院長在中国科学院 北京区青年大会上發言的記錄)	( 5 )
建立工人階級的科学队伍 (張勁夫副院長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区青年大会 上的講話)	( 14 )
清算資產階級个人主义 (1957年9月21日杜潤生副秘書長在中国科学 院北京区青年大会上的發言記錄)	( 42 )
科学事業必須由共产党領導……田靜华、叶佩弦、 王啓明、譚良平、賈寿泉、戚德余、許振嘉、林振金	( 58 )
何榮是怎样成为右派分子的? ……章 琮、孟宪振、許振嘉、庄蔚华、徐秀英	( 70 )
撕开項志遴的“理論家”外衣看看他卖的是什么貨色 ……	陆祖蔭( 75 )
揭露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項志遴	……孙亲仁( 83 )
駁斥右派分子徐芻对形势的“估計”及对反右派斗争 的誣蔑	……潘一民( 92 )
駁斥右派分子夏永年反对馬列主义的論調	……張宗誠( 98 )
夏永年“独立思考”些什么?	……郭 銓( 104 )
揭發和批駁右派分子夏永年的資產階級人生觀	……張鴻芝( 108 )
刻骨的仇恨、狂妄的野心 澈底揭露徐志国的反党面目	……吳明瑜( 113 )
揭穿徐志国的兩面派	……于家珊( 120 )

談談右派分子徐志国的反动思想本質·····	譚北生( 127 )
从徐志国的日記中来看他的反动本質·····	蕭光先( 129 )
几个右派分子的特点·····	尙山羽( 133 )
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科学才能在中国生根, 开花, 結 果·····	陆学善( 137 )
只有党才能领导社会主义科学事業·····	彭桓武( 140 )
駁“党与科学家背道而馳”的謬論·····	郑国章( 145 )
沒有党的领导就沒有社会主义的科学事業·····	王傳善( 147 )
反击右派分子何瑩对党团结科学家为人民服务的政 策的攻击·····	孟宪振( 154 )
党是科学事業的领导者·····	林啓欣( 160 )
必須坚持以馬列主义作为科学的指导思想·····	唐稚松( 166 )
永远做党的忠誠的兒女! ·····	刘玉芬( 173 )
駁斥右派分子对積極分子的攻击·····	曾威夷( 178 )
必須用工人階級思想武装自己·····	刘后貽( 183 )
党对知識分子的政策不容歪曲·····	王礼立( 186 )
駁斥右派分子的“先專后紅”和“政治即業務”的反 动观点·····	陈能寬( 191 )
駁斥右派的“不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 主張先專 后紅”的謬論·····	譚学奇( 196 )
不要上右派分子叫囂“独立思考”的当·····	利广安( 201 )
駁斥所謂“階級是人为”的謬論·····	申昌淳( 206 )
駁斥右派分子夏永年“党不是代表人民的利益”的謬 論·····	廖集仁( 210 )
斥右派分子夏永年否認“党和人民利益一致”的荒謬 言論·····	張彭熹( 214 )
絕不允許右派分子离間藏汉民族的团结·····	安世兴( 218 )
党是代表各族人民利益的·····	古力米尔( 221 )
回答右派分子在民主問題上的挑战·····	刘大年( 226 )
駁斥右派的“反对社会主义民主, 要求資产階級民主	

自由”的謬論	林蘭英	( 229 )
駁斥右派對社会主义民主的攻击	巢紀平	( 232 )
批判右派分子夏永年、徐芻的新聞自由观点	徐崇温	( 237 )
駁斥右派分子何肇攻击人事工作的謬論	尙明軒	( 245 )
全面駁斥項、夏、徐等右派分子对肃反运动的惡毒誣 蔑和猖狂进攻	范繼淹、陈章太	( 249 )
对肃反运动的一些看法	蔣 錚	( 258 )
駁斥右派分子項志遴的反苏謬論	錢皋韻	( 261 )

## 附 录

何肇的右派言論	( 270 )
項志遴的右派言行	( 278 )
徐芻的右派言行	( 284 )
夏永年的右派言論	( 292 )
徐志国的右派言行	( 296 )

## 前 言

在反右派斗争中，为了对我院全体青年进行一次生动的、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缩小和清除右派言论在中国科学院青年中的影响，並全面检阅我院青年的政治思想水平，於九月十八日起，至九月二十一日止，集合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区近四千名青年，举行了連續四天的辯論大会，揭露和批判何肇、項志遴、徐芻、夏永年、徐志国等五个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目前反右派斗争已告一段落，但是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仍然是我們長期的思想斗争，为了有助於今后批判青年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我們將中国科学院北京区青年反右派斗争大会材料选編出版了。

这本材料选編共計四十三篇，它包括了院負責同志、科学家、少数民族青年、华侨青年以及青年科学工作者和科学行政工作者的發言，这些文章都未經過反复推敲，难免有缺点和錯誤。

另外，为了便於讀者对照右派分子的論点去閱讀正面批判文章起見，將何肇等五个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言行附录在批判文章的后面。

最后希望讀者將对此書的意見和建議告訴我們，以便更正和改进。

中国科学院团委会 11月13日



## 反击右派——“反其道而行之”！

——1957年9月21日郭沫若院長在中国科学院  
北京区青年大会上發言的記錄——

各位同志：中国科学院召开的青年同志們反击右派斗争大会，到今天已經开了四天，批判了五位年輕的右派分子，获得了很显著的战斗果。在这个大会上，青年同志們的發言很为踴躍，講道理講得很透澈，把当前的大是大非辨明得也很清楚。毫無疑問，这對於我們今后科学事業的發展，對於我們每一位同志今后在工作作風上的改进，對於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設的科学研究工作能够进一步发展，都提供了很好的保証。

應該說，我們这次大会所获得的战斗果是值得庆賀的。

### 坚决的跟着党走，我們一定胜利

各位已經很清楚，当前的反击右派的斗争是政治战線和思想战線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場激烈的階級斗争，是很严肃的兩条路綫的斗争。究竟應該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反对共产党、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資本主义的道路，这就是当前的、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大是大非的問題。我們一定要把道理說清楚。本来呢，这两条路綫的問題，在历史上已經解决了的。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受到外来的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逐步陷入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为了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枷鎖中解脫出来，我們先輩，百年来曾不断努力，想出各种方法来求得民族解放，謀取国家的独立富强。但是，尽管走了不少的路，也流了不少次数的血，其結果，最后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領導之下，終於找到了正确的路綫，这就是走苏联的道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把全国的人民团結起来，向三大敌人作斗争，使全国人民获得了解放。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到今天才仅仅八年，可是，就在这短短的八

年里，我們在黨的領導下，各方面的建設都得到了驚人的輝煌的成就。只不過是八年，無論在工業、農業、文教事業以及其它各方面，我們的收穫，一點也不算夸大，真抵得上過去的八百年。我們的成就，不止是我們全中國人民所親身感覺得到的，就是國外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這些事實。我們的長江大橋，已提前兩年完成，這是前人所不曾夢想到的事，而諸如此類的輝煌成就，真是舉不勝舉。所有這些成就，都是在黨的領導下獲得的。所以，我們要在黨的領導下走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是一個鐵定不移的方向，而且在政治上已經是很明顯的替我們解決了的問題。

堅決的跟着黨走，堅決的跟着黨來建設社會主義，不僅使我們全中國人民由被奴役被壓迫的悲慘的命運中解放了出來，挺起胸膛站了起來，而在短短期間就取得了這樣大的成就；並且，我們可以保證，在以往的八年能夠獲得如此巨大的成績，今後再來幾個八年，我們中國的建設事業一定更有可觀。就拿我們的科學事業來說，今後再繼續努力下去，對於我們去年所制訂的12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在黨的領導下，也一定能夠逐步實現，在12年內使得我們科學里面的一些空白點和薄弱的環節，能夠補充起來和加強起來，確確實實地趕上國際的先進水平。我們相信這是一定有保障的，我們有這樣堅強的信心。

### 右派分子是反動階級利益的代表者

究竟走社會主義的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的道路，這明明已經是在歷史上被明確地解決了的問題，而且，眼前的許多鐵的事實也完全證明這已經不再成為問題。可是，右派分子們的看法偏偏和我們不同，他們硬把已經解決了的問題拖出來，淆亂是非，挑撥矛盾，處處點火，目的是搞得天下大亂，推翻黨的領導，重新回到資本主義的道路，把解放了的新中國，倒退到解放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慘境遇里去。右派分子為什麼要這樣猖狂進攻？當然，他們是有他們的理由的，這就是他們的階級利益要求他們這樣作。右派分子是代表了一種階級的典型，是代表了一定的階級。無論黨

內或黨外，也無論是中央或地方，無論是科學界或其它各界，右派分子的面貌儘管不同，但是他們基本上是一個類型，在思想、言論、行動上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右派分子毫不例外地都是否定成績，把解放後在黨的領導下全國所獲得的輝煌成就，一概加以抹殺，對於工作方面的缺點又極力加以誇大。自然，我們中國有這麼大，應作的事又是那麼多，解放以來的時間又是那麼短，我們每一個人受到黨的教育也還有限，很難保證每一項工作都不發生缺點，很難保證每一個人都不會犯錯誤，就是黨員同志也還是有很大的可能要犯錯誤。缺點是難免的，但是黨就要鼓勵大家來改正缺點，有錯必糾。黨為什麼要整風？也就是因為有缺點，有缺點就將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上發生障礙。為了更好更快地建設社會主義，黨要求每一個黨員，同時也要求黨外人士，能夠作到有缺點就立即改正。缺點不能否認，是有的；但是，右派分子卻是抓住了缺點，把例外說成一般，以“片”來看“全”，把某些黨員或者某些單位不夠健全的地方，拚命加以誇大，說成是黨的整個的錯誤，用這樣的方法來挑撥離間，挑撥黨和羣眾的關係，挑撥各界內部的關係，就是這樣的到處點火，想使天下大亂。

否定成績，誇大缺點，挑撥矛盾，這就是所有右派分子的一個共同的手法。

### 對右派的鬥爭，絕不能有溫情主義

右派分子們除掉這種手法以外，還有一種共同的行動綱領，就是“團結右派，爭取中間，打擊左派”。正像我們大家所看到的，無論是那一界，也無論是京內或京外，右派分子都是採取這樣的行動。他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一些集團。就是一些少數的單幹戶，其實他們也不是完全孤立的。所謂“團結右派”，右派畢竟是少數，光靠少數的團結，不能奪取天下，所以想爭取中間層，同時更進一步打擊左派，反對黨，打擊黨員同志，打擊跟着黨走的左派同志。他們仇恨黨，仇恨願意跟着黨走的人，

而仇恨之深，真是令我們想像不到。很多右派分子明目張胆地公開講要殺人，要放火。長沙有一個右派分子名叫陳裕新，他是民革的成員，他對黨的仇恨，可以說是典型。他說：“我一肚子氣已經由氣體變成了液體，現在又由液體變成了固體，我要爆炸，我要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我要殺人”。從這些瘋狂的叫囂裡面，我們可以更深地体会到和右派的鬥爭，的確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是一場嚴肅的階級鬥爭。右派分子和我們之間的階級仇恨很深，文藝界有個右派分子叫李又然，他也說過這樣的話：他說他到現在才体会到打漁殺家裏一句台詞裏的情緒，就是蕭恩在殺家裏說的“要殺盡他的全家，方消我心头之恨”。同志們都知道：蕭恩所反對的是地主階級，他要殺的是惡霸地主的全家，現在李又然重唱的這句台詞，他是反對黨，他所說的“要殺盡他的全家”，就是殺盡黨員，殺盡左派。我們說右派分子是瘋狂進攻，從這些事實看，說他們瘋狂，一點也不誇大。所以我們對右派分子的鬥爭，絲毫也不能允許有溫情主義。你溫情嗎，他不和你溫情。如果讓右派分子猖狂下去，假如他們得到了政權，他要成為蔣介石第二，他要投靠帝國主義，這是必然的。不把右派分子打倒，右派分子如不澈底投降，俯首向人民認罪，我們決不能罷休。

右派分子們一致反對黨的領導。他們說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科學界說黨不懂科學，不能領導；文藝界說黨對文藝是外行，不能領導；教育界說黨不懂教育，要撤消學校黨委制；甚至於工商界，都有這樣的叫囂，說公方代表不懂業務，應該退出來。即如政客們像章伯鈞、羅隆基之流，他們也是這樣講，要搞一個“政治設計院”，這就是說共產黨連政治也是外行了。右派分子說共產黨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是說黨不能領導一切，只有換別的領導，只有恢復資本主義的道路。

### 我們要下決心進行思想改造

右派分子又反對思想改造，說思想已經改造好了，連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也沒有了，只有進步的一面了，甚至於比無產階級還要進

步。他們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無产階級的世界觀，叫喊要更多的民主，他們反对集中。大家都知道，右派分子的所謂民主，就是英美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也就是章伯鈞要搞的“兩院制”。这种資產階級的民主，是少数有錢的人的民主。我們的民主，是工农联盟絕大多數人的民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农成了国家的主人，我們的民主范围是更寬更广的。但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却認為我們的民主不够。是的，我們的民主是有不够的地方，那就是剝奪了資產階級騎到工农头上作威作福的特权，这正是資產階級所最不高兴的事。右派分子又叫喊要更多的自由，反对紀律。例如：去年科学界集中几百位优秀的科学家，在兄弟国家專家的帮助下，制訂了12年的科学技术發展远景规划。誰都知道，这个规划是我国今天科学發展的藍圖。但是，竟还有人反对它，認為这是束縛了个人的兴趣，束縛了个人研究的自由。他們一心想恢复資本主义下的那种分散主义的作法，要求更多的个人利益和个人享受，不喜欢組織紀律，不願意有一个共同的統一意志。同志們！这种个人主义的思想，不仅在右派分子中發展到个人政治野心，即是在中間分子里面，这种个人的名利思想也有相当的市場。在文艺界里面右派分子有这样一种口号，叫作“为爭取人民幣而斗争”，他們赤裸裸地要錢。在我們科学院，同样也可以看到，名位思想也很严重，有些朋友並不是在工作成績上和对人民的貢獻上进行比賽，而是斤斤計較於地位和待遇。他們嚷国家对自己不重視，沒有專車坐，房子住得不好，諸如此类。崇尚浮华，追求享受，患得患失，都是个人主义的表现，不仅容易为右派分子所利用，甚至於会墮入右派的泥坑。我們應該有所警惕。因为右派分子的思想根源，主要就是个人主义和封建地主思想殘余在作怪。虽然經過了三大改造，我們已經把私人所有制改为公有制，在改变生产手段所有制上进行了偉大的革命，但是，随着經濟基础的改变，还必須努力进行上層建筑的建設；而且已經进入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础，也还要花很大的力量来加以巩固。同志們！旧社会的思想殘余，虽然是“殘余”，但是仍然不可輕視。我們这些上了年紀的人，从前受的是封建主义的教育，稍

大，又受了資本主義的教育。這些舊教育的影響，在我們身上可以說是根深蒂固。八年來，經過歷次運動，我們受到了社會主義的教育，但是我們遠遠不能說，我們的教育已經受夠了。社會主義的教育在我們的頭腦里是很不充分的，事實也是如此。當這次右派分子向黨、向人民、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的時候，那時，烏雲滿天飛，不是就有許多知識分子發生了動搖，甚至於隨聲附和？這就證明了我們這些從舊社會來的人，所背的包袱太重，個人主義的、封建主義殘餘的思想，可以說在我們的靈魂深处是根深蒂固的。像我們這樣的人，如果不嚴格地進行思想改造，那就很難擔負起建設社會主義這樣一種神聖任務的。

新中國成立以來，才僅僅八年，生產資料所有制雖然已經由私有制改變成公有制，但是我們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還沒有那麼鞏固，舊時代留下來風俗習慣很深。因此，在這次反右派鬥爭當中，有好些年青的人也成為右派，在這裡就可以得到說明。在這次大會上，我們批判的五位右派分子，年紀頂大的一位只有 27 歲，頂年輕的只有 21 歲。21 歲就年輕得很嘛。解放以來八年，解放的時候，他才不過十三歲的小孩囉。為甚麼那麼年紀輕輕就成為右派，看來令人費解。其實，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還是舊的社會同一些風俗習慣還不能徹底地很快的在短短八年之中就把它完全改變過來。在這樣的情況下，再加上年青人自己思想上的毛病，因此，就有人會墮落到反動的泥坑裡面去。二十來歲的青年就成為右派，應該說是件痛心的事。在我們老一輩的人就背的包袱更重囉，我們受舊社會的教育更深，壞思想更是根深蒂固，假使不痛下決心來進行改造，掉下泥坑的危險更大，更值得警惕。歷史是無情的，不跟着歷史發展，不堅決跟着黨走，不堅決地把立場站穩來走社會主義道路，稍微有些搖擺猶豫，很容易把自己毀滅。各位都了解，章羅聯盟很重視我們科學界，把科學界作為他們進攻的重點。其所以這樣，大概總是右派分子看到我們科學界存在有一定的弱點：比如有些人思想未經改造，個人主義突出；有的只重視業務忽視政治等等，這就給予章羅聯盟以可乘之機。科學界裡面出現了曾昭

掄、錢偉長等右派分子，他們提出了一個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章羅聯盟本來有他們一整套綱領的；不過還沒有把它書面化，使他們的綱領一部分書面化了的是關於科學方面。由此可以看出，科學界是章羅聯盟首先进攻的一個對象。因此，我們科學界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應該更加警惕。我們對於右派應當更堅決地起來鬥爭，這樣來純潔我們科學家的隊伍，使得我們科學家能夠更好地團結，團結在黨的周圍；更好地來進行科學研究工作，來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所以我們科學界反右派的鬥爭，在我看來，尤其是不能容許有絲毫的溫情主義。

### 要善於從反面來吸取教訓

當然，我們反擊右派，並不是說要把右派分子的身体的存在加以消滅。右派毫無問題是毒草，我們要剷除毒草。所謂剷除毒草，是要擺事實，講道理，揭露右派丑惡面目，徹底駁倒他們的反動論點，並要進一步挖掉右派思想的根源，要去掉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思想，要剷除封建地主階級的殘余思想。我們反擊右派實際上是挽救右派，不僅不殺他，而且要救活他。特別是年紀輕輕的就成了右派，老實說是可憐的，要把他們救轉來。只要他們幡然悔悟，接受社會主義改造，還可以重新作人，還可以回到人民的隊伍里面來。可是，假如說頑梗不化，頑固地不肯改造自己，那也沒有辦法，是他們自絕於人民。

不過，我們懇切地希望，我們所以批判他們還是為了治他們的病，因為他們身上長了毒瘤。我們作為一個外科醫生就要開刀，割去他的毒瘤。這就是我們治病救人的態度。

同時更重要的，我們是通過反擊右派，批判右派來教育我們自己，教育我們大家，教育我們更後更後的世代，教育我們全體人民。正如毛主席所講的，右派分子同時可以作為我們的教員，要從他們那里，從反面來吸取教訓。我們在反擊右派過程當中，我們進行大是大非的大辯論，來進行我們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我們要把每一個人徹底改造成為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成為社會主義的建設

者。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我們必須要自己鞭策自己，不断努力，建立無产階級世界觀。同时要相互鞭策，互相帮助，互相督促，澈底地把我們資產階級个人主义的那种病根，封建地主階級的思想殘余肃清。

凡是右派分子要的东西，我們就不要，右派分子所不要的东西，我們偏偏要。这是最好的办法。右派分子不要集中而要更多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我們就要更强的集中，集中在党的周圍，接受党的領導，巩固我們社会主义的民主。右派分子不要紀律，要更多的自由，更多的个人主义的那种自由，我們呢，就要更强的紀律，坚决地拋棄个人主义的那种自由。右派分子要个人名位，反对有統一意志，我們呢，就要更坚强的統一意志来尽量減少和消灭个人主义的名位思想。所以右派分子要的，我們坚决反对，右派分子不要的，我們坚决来爭取。这可以说，是我們能够成为無产階級知識分子的很好的办法。这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反右派分子之道而行之。

### 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我們應該共同努力，相互鞭策，来求得共同进步。不过个人主观努力究竟是容易懈怠的，我們还一定要要求有党的領導。我們看法是：黨員不用說，非黨員也應該一样地受党的領導、受党的監督、而且應該受党的教育。不論党内党外，我們一律請求党給我們以严格的鍛鍊。現在我們国家基本上已經成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今天的統一战線，新的統一战線，它的政治基础是社会主义。党外的科学家，應該有这样的認識，恳求党严格地監督我們，严格的教育我們，鍛鍊我們，我們自己絕對不要姑息我們自己，一个人是很容易姑息自己的，同时也恳求党的組織不要姑息我們，要我們大家經得起严格的鍛鍊。一方面把我們的队伍純潔起来，同时也把自己純潔起来。把要不得的坏思想消除干淨，把包袱丢掉。这样我們才能过好社会主义的这一关，这样我們才能够担負得起建設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个崇高的任务。



同志們！大家努力吧！而且要不斷的努力。我們要相互鞭策，共同努力，並誠心誠意接受黨的領導、監督、教育。我們一點兒也不要懈怠，要同在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上的任何困難和阻礙進行毫不留情的鬥爭，來爭取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徹底的、全面的、偉大的勝利。

## 建立工人階級的科學隊伍

——張勁夫副院長在中國科學院北京區青年大會上的講話——

我們科學工作者這一時期和全國人民一起，熱烈地投入反右派鬥爭。從科學界揭露的右派分子情況來看，我國絕大多數的科學工作者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和可以接受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是極少數。但從右派在科學界的政治陰謀活動和影響來看，性質是很嚴重的。章羅聯盟曾提出一個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企圖篡奪對我國科學事業的領導權，不僅要把我國科學事業引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並想把從事科學工作的一些高級知識分子俘虜過去，作為他們要和共產黨“平分秋色”、進一步“取而代之”的造反政治資本。科學界的一些著名右派分子如曾昭掄、錢偉長等，竊據着科學研究及高等教育的領導地位，曾給予我國科學事業發展以極其有害的影響。

在揭露出的右派分子中，不僅有過去一貫思想反動的右派，並有過去表現較好而在社會主義革命高潮中墮落成為右派分子；不僅有年紀較大的人，並有年紀較輕的人，如我們這次科學院北京地區青年大會上所批判的五個青年右派分子，最大的二十七歲，最小的二十一歲，平均年齡二十五歲，有八年時間是在全國解放以後受到培養的，其中有的人曾派去蘇聯學習，也竟然成為右派分子。

從上述情況中，引起我們許多值得深刻思索的問題，並使我們清醒地認識到：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階級科學隊伍，是迫不容緩的歷史任務。這次青年大會，到會的大多是青年科學工作者，我想就建立工人階級的科學隊伍問題，來談一點個人意見和工作中的某些體會。

### 一、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迫切需要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階級科學隊伍

我們國家要經過十年到十五年的努力，來使社會生產力獲得

充分的發展，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和現代化的農業基礎。我們國家目前的物質基礎還是很不充分的，只有我們獲得了充分的物質基礎，我們的國家才算充分鞏固，社會主義社會才算從根本上建成了。為了建成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如果沒有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如果沒有自己的科學家、工程師行不行呢？那是不行的。工人階級必須要有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要有自己的科學技術幹部隊伍，並且要有一個宏大的隊伍，人少了是不成的。這是歷史向我們提出的偉大任務，在這個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宏大的新隊伍沒有造成以前，工人階級的革命事業是不會充分鞏固的。

蘇聯在進行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斯大林同志曾提出“幹部決定一切”的口號，主要就是指科學技術幹部講的。我們經過反右派鬥爭後，對於工人階級要有自己的科學技術幹部隊伍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體會是極其深刻的。

### 兩類知識分子

科學工作者，他是掌握一定科學技術的人，是掌握一定科學知識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本身不是一個階級，他是要依附一定的階級並為其服務的。科學知識只是一種工具，要為經濟基礎、政治目的服務，要為掌握生產資料所有制的階級服務。在目前情況下，我國知識分子主要是兩種人，一種是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一種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在思想上的主要區別是：工人階級知識分子是忠心於社會主義事業，以知識工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則是維護資產階級私有制度、剝削制度，並以知識工具來達到個人的自私自利的目的。這兩種知識分子是屬於兩種階級類型，存在着根本性質不同的區別。

### 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

工人階級過去處在被壓迫被剝削的慘境時，日子都難以過下去，那里還能談到受系統的教育。那時的工人階級是做人牛馬的

工錢勞動者、體力勞動者，多數人難以成為掌握系統科學知識的知識分子，只有少數人可以，如德國的倍倍爾這樣著名的工人出身的理論家，究竟是不多的。但是工人階級在過去革命鬥爭中需要知識分子來為它服務，沒有知識分子參加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工人階級要取得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而在過去歷史上就有過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轉到工人階級方面來，這便是卓然覺悟地認識了全部歷史運動進程的那一部分資產階級思想家，而馬克思、恩格斯是這類知識分子最早和最傑出的代表。隨着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這類知識分子，日益增多起來。在我們中國，也有不少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由摸索救國救民革命真理而找到了馬列主義，由愛國思想進而信仰共產主義，叛變自己原來的階級，轉而站到工人階級立場，獻身於工人階級事業，“俯首甘為孺子牛”，魯迅先生就是這類知識分子最著名的代表。

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他把自己的所有聰明智慧、知識才能，無限忠誠地獻給工人階級，忠心於社會主義事業。所謂忠誠，按中國說法：不二謂之忠。也就是對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事業要一條心，不能有兩條心。所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也就是說要沒有折扣，沒有保留，不能有半條心。工人階級的客觀階級地位決定它要解放自己，必須要同時解放全人類。所以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不光是為工人階級一個階級服務，它同時要為全人類的解放和進步事業服務。這是一種最崇高偉大的事業，也是最艱巨困難的事業。獻身於這一事業的人，必須具有工人階級革命世界觀和人生觀，要有不怕犧牲的英勇奮鬥精神和不怕困難的艱苦奮鬥精神。在為這一事業的奮鬥中，要能經受得起種種挫折磨難，要經歷各種各樣的鍛鍊，因此要有堅決不移、百折不回的決心和毅力，要有無限忠誠。這是人類歷史上一種新型的知識分子，它把歷史上那些優秀知識分子的美德不僅繼承吸收而且大大發揚了。

### 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

中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民主革命時期，不少人在一定時期

一定程度上参加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斗争,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不少人过去和工人阶级有过统一战线关系,做过工人阶级的朋友。但是在过去中国旧民主革命和新民主革命的不同时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有过许多变化分野,也曾有人时而站在进步方面赞成革命,时而动摇投到反动方面,阻碍社会前进,成为时代的绊脚石。正如周恩来同志在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所说:“我国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在过去虽然受了帝国主义和反动阶级的种种影响,但是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同时也受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因而一部分参加了革命,一部分同情于革命,多数对于革命抱着中立观望的态度,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但是我们要认识到,作为资产阶级类型的知识分子,即使能够参加新民主革命,做了工人阶级的朋友,也和民族资产阶级一样是有两面性的。他们也需要和资产阶级分子一样,要进行认真地思想改造,抛弃资产阶级思想,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才能和工人阶级一道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党对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为了这个目的,党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动员和组织知识分子参加土改、抗美援朝等运动,在他们中间进行思想改造运动,因而在八年来已使我国旧时代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在政治上的进步较快,而在思想本质上的改造还是有限度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同他们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变化并不是完全相适合的。许多进步分子也还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更不要说中间分子了。

保留有资产阶级思想仍然在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类型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是有根本区别的,他们要维护资产阶级私有制度、剥削制度,他们对社会主义不仅感到有些不习惯不舒服,而且是有反感和不满,有的人甚至发展到要抗拒破坏社会主义的。同时他们把自己的才能智慧、科学技术作为实现他个人的自私自利目的的工具。如果说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还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朋友,但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若是仍然

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就不仅不能和革命需要相适应，和时代一同前进，而且發展下去就会和工人階級完全分裂站到敌对方面去，成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右派分子。当然，这种右派分子只佔極少数，但目前左派也只佔少数，多数是中間派，因此要和右派严格划清界限，是很重要的。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兩条道路的斗争，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资本主义立場必須改变，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必須轉到工人階級立場上来，才能和工人階級一道前进。

### 政治和業務

有的人說，他不大关心政治，他所关心的是自己的業務，是追求業務知識，好像並不發生屬於那一階級类型的問題，似乎他可以超然於政治之外，也同样可以为社会主义事業服务。实际上，这种說法是虛假的而且也是做不到的，他要追求業務知識为的是什么呢？人是有思想的，总有他的目的性，而在有階級的社会里，人的思想目的总帶有階級的烙印。有的人可能在表面上对社会政治問題不大关心，他关心的是自己的事。可是自己的事能和社会政治不發生关系嗎？不行！一定要和社会政治發生关系。还有的人說，目前在建設社会主义，政治問題已不用操心，要努力的是業務問題，因为据說他的業務总是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这种說法是不对的，这是对目前国家政治情况和知識分子队伍的政治思想情况缺乏正确了解或者是另有用意。經過反右派斗争，我們的眼睛不是更为雪亮了嗎，政治战線和思想战線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兩条道路斗争不是沒有問題，而是大有問題，我們必須要取得这一斗争的胜利。具有自私自利思想的人，他的态度往往是：适合於他的自私自利的社会政治情况他就贊成支持拥护，不适合於發展他的自私自利目的的社会政治情况，他就不滿，以至抗拒破坏。因此具有自私自利思想的知識分子，實質上是和資產階級“唯利是圖”一个类型的，屬於資產階級范疇。这种知識分子，不是拿知識工具来为社会主义事業服务，不是为工人階級服务，为人类进步事業服务，而是

为资产阶级服务,同时追求个人自私自利的目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不能起好的积极作用,而要起消极的以至发展下去要起破坏的作用。

### 如何建立工人阶级的科学队伍

我们如何来建立工人阶级的宏大科学队伍呢?我们要经过怎样的努力来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呢?毛主席教导我们,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十年到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要建立和扩大这支队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全体人民,人人都要懂得这个任务,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习技术、学业务、学理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队伍(这个新队伍,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工人阶级的这支知识分子的队伍,一方面要把现有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转变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另一方面要大力培养新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因为现有的队伍很小,不大力培养新生力量就建立不起一支宏大的队伍;所以我们要从两方面努力来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任务。

可是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全国解放后培养的青年中,会出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右派分子呢?今后在社会主义社会培养出来的青年,会不会再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会不会再有右派分子?有的人过去还表现相当好,为什么这次成了右派分子?今后还会不会有人再堕落成为右派分子?我看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右派知识分子今后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有,这是有各方面的原因的。我们工作做得好,可以减少到最小限度,有了右派分子也可以很快反掉,可以在和他们作斗争中,使绝大多数人更快地进步成长。但是要完全没有是不可能的。那末,原因究竟何在呢?我们今后究竟要怎样来培养青年科学工作者,使他们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呢?这是我们在反右派斗争中必须要注意研究的问题,我们要研究以

往的經驗教訓，找出工作中的缺點，力求改進，以便更好更快地來完成建立工人階級科學隊伍的任務。

## 二、我們應如何從反右派鬥爭中吸取教訓

有的人說：有些青年人之所以成為右派分子，主要是我們未有教育領導好，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共產黨對右派是沒有領導權的，因為他們是社會主義的敵人。黨的領導權是對中間派講的，是對羣眾講的。對敵人不能用馬列主義教育來解決問題，因為他根本反對馬列主義。對羣眾是教育問題，對敵人是鬥爭問題：或者他投降，或者戰勝他。所以對右派分子，共產黨、馬列主義不能負責，要他自己負責。我想起了我以前在部隊工作時候，有一位工人出身的老同志，他對於有些老黨員、老幹部墮落蛻化，有一個很憤慨的指責，給我的印象很深。他說：“人是從猴子變來的，你這個傢伙，由人變到猴子去了！”這樣的指責雖嫌偏激，但還是有一定道理的。我看右派分子是“非我族類”，我們的教育超過我們的“族類”以外，是不能起作用的。所以右派要他自己負責，我們不能負責。但是，我們是否應該研究發生這一問題的經驗教訓，來努力減少呢？那是很應該的，因為如果我們工作做得好，是可以減少到最小限度，發生了也可以較快的戰勝他，改造他。從這一意義上講，我們也是有一定責任的，因此我們要重視研究這一問題。在這次青年大會上，我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為什麼我們所培養的青年竟有的變成為右派分子呢？像項志澗，他家庭的多數成員是革命者，還曾派他到蘇聯去學習，結果他成了右派分子。何榮是一九四九年入團的，至今已有了七八年了；徐志國才二十一歲，夏永年、徐芻也是很年輕，有八年時間是在解放後受到教育的，為什麼成為右派？都很值得我們深思。原因何在？我想從三方面來研究：

### 從階級鬥爭來研究

第一、要從階級鬥爭來研究，這是最基本的。關於這方面的問題，許多同志發表了很好的意見，我不擬多講，只簡單的補充幾句，



我們今天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還存在有階級鬥爭。右派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和我們反右派鬥爭，是一場尖銳的階級鬥爭，是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在解決政權問題和所有制問題后必不可少的補充和必不可免的繼續。徐志國的的家庭是資產階級家庭，解放后總是感到今不如昔。夏永年在肅反運動中被審查，一直感到不滿和仇視。儘管他們是這樣的年青，但是他們的階級仇恨一直保留着而且在發展，社會主義越勝利，他們越是感到絕望。因此，他們要改變現狀，要破壞現狀，要求資本主義復辟，反映了沒落死亡階級的最后掙扎。科學院北京地區的青年右派分子中，有不少人就是由於家庭是剝削階級或是本人在過去歷次運動中被審查鬥爭，而要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 從社會主義生活資料分配問題來研究

第二、要從我們的社會主義本身來研究，也有它的客觀的物質基礎。社會主義社會，是什麼樣的一個社會呢？是到共產主義去的一個過渡社會，也就是初級的共產主義社會。在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里，我們把生產資料全民所有、集體所有了，這是一個最大的平等。有些右派分子說，舊社會似乎還平等些，新社會反而不大公平，這是胡說。可不可以這樣設想，在舊的剝削制度的情況下，一方面是百萬富翁，富連阡陌，另一方面是貧無立錐，家徒四壁，在一起談平等，這有什麼平等可言？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一面是奴主，一面是奴才，談不到平等。而我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初期，對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已經獲得解決，就是我們取得了一個最大的平等，最大的公平，也是最大的合理，因為沒有人可以掌握生產手段來進行剝削了。但是我們在社會主義這個時期，對生活資料的分配採取“按勞取酬”的原則，這是既平等又包含着不平等，比之以往平等得多，但是比之共產主義還存在不大平等，有的人得的多，有的得的少。對待這一問題，我們採取什麼看法？我們說，這是不可避免的，是歷史的必由之路，一定要這樣做。同時，我們也知道這種情況並不合乎我們最高的理想。這樣做，是有其缺點的

地方，但是我們只好默認他的缺点的存在，我們要努力逐步改变这个缺点。

### 馬克思論公平的分配

在这里我想稍为引一点馬克思在哥达綱領批判上的几段話，他說：“在基於生产手段公有之上的合作的社会里，生产者並不交換他們的生產物；在这里变成生產物的劳动也同樣不表現為这些生產物的价值，不表現為它們所具有的物件的特性，因为現在和資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劳动已不是在一个間接的方式上，而是直接当作总劳动底一个構成部分存在着”。按照共产主义來講的話，劳动不表現為价值，他和資本主义不同了。可是馬克思接着下去又說：“此地我們所要討論的不是在自己的基础上發展起来的这种共产主义社会，相反地而是这样一种共产主义社会，它剛从資本主义社会里生長起来，从而它在一切方面，經濟上、風俗上以及精神上，还保存着旧社会——它是从它的胎盤里生長出来的——底殘疾（母斑）。适合这个情形，个別的生产者給与社会什么——在各项被扣除之后——精确地收获回来。他所給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因为这是共产主义的初級阶段，还留着旧社会的殘疾，所以“關於消費手段在个别生产者之間的分配，就通行着如像在商品等价物底交換里通行的同一原則：某一个形态的同量劳动可以与另一个形态里的同量劳动交換。”按照共产主义來講，不应当这样的。但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只有用这个办法，只好默認其中的缺点。馬克思对这一种情况叫做“这个平等的权利，是一个對於不平等的劳动的不平等的权利。”因为它默認不平等的各人的天赋及工作能力为自然的特权，要默認这一条。

我們看一看，現在人們的劳动情况，有所謂复杂劳动，有所謂簡單劳动，有所謂熟練劳动，有所謂不熟練劳动等等。劳动情况既有这許多不同，按劳动所取的报酬就有所不同，即有多有少。而且各人家里情况又不一样，有的家里人口少，有的家里人口多，孩子多的人比那孩子少的或沒有孩子的生活就要差得好远。此外，

还有生病的影响,农村还有天灾的影响。所以按劳取酬,在平等权利下包含着分配的不平等,每个人的分量最后是不一样的。

### 绝对平均主义是反动的

有些右派分子在向我們工資制度进行攻击时,曾假意地说:工資分等級是不合理的,要实行绝对平均主义。而有些具有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对于右派分子这一攻击不仅不能識破它的惡毒,有时甚至是有同情的。那末,我們問:在社会主义时期,实行绝对平均主义行不行呢?那是不对的。绝对平均主义是小生产的空想,是反动的。因为我們今天有一个最基本的情况,叫做物質不充分,这是我們的弱点;同时,旧社会遗留的影响很深,而劳动条件还不够好,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还有差别,如果实行绝对平均主义,那么懶汉、二流子沾光了,生产將不能迅速发展,社会將不是前进,而是后退,所以說是反动的。我們不能那样做,而要采取按劳取酬的原則,按劳动量給予报酬。

### “资产階級法权”对分配还起着作用

所以馬克思指出:“资产階級式的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局部取消,即只是在对于生产資料的关系上取消,而在生活資料分配上,却依然存在”。“这是一个缺点,但这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社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經過長期的誕生的痛苦之后才产生出来。权利决不能高过於社会的經濟的状态,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文化發展。”

在目前社会主义阶段,既然生活資料的分配方面还有不平等,还有差别,资产階級式的法权起着作用,这就是产生资产階級思想的物質基础。現在有些知識分子觉得自己很神气,觉得知識还可以作为追逐个人目的的工具,觉得自己有本事,收入多,又有名气,还惹引有些人的羡慕,尾巴翘得很高,这不仅有其历史影响,而且目前我們的客观条件,有給他一种神气的可能性。

由此可見,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們的經濟基础,有这么一个特

点,在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有最大的平等,在生活資料分配方面比之以往已平等得多,但比之共产主义社会还有不平等的地方,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活資料分配的上述缺点才能改变。我們国家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时间,根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的任务,則是进一步發展生产力,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到十个五年計劃,在經濟上赶上並超过美国,我們每个中国人民都要有这样的志气,作几十年打算,来为这一偉大的目标而奋斗。

馬克思說：“共产主义底更高阶段上,在个人之奴役的从屬於分工以及因此而生的精神劳动和肉体劳动底对立消灭之后,在劳动本身变成不單是生活底手段,而且是第一个生活需要之后,在生产力跟着人們一切方面的發展也增强起来,並且在合作的財富底源泉更丰富地湧流出来之后——然后能够完全超过那些狹隘的資产者的权利底眼界,这个社会在它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到了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的根本差別消失,人类对待劳动已慣於自动实现社会的义务,而無須任何强制,不付工錢的劳动,已变成普遍的现象,到了这个时候,所謂有本事很神气,追逐个人名利等等就沒有市場了。到了共产主义,在那个时候,人們的精神面貌要有根本改变,你想产生个人主义,沒有客观的基础,你神气不起来了,也沒有一个人羡慕你这一条,但这是要經過相当長期的努力和奋斗的。在若干年内,資产階級法权对生活資料分配的影响还会存在,这一情况还会对人們的思想發生一定的作用。由此可見对知識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和資产階級个人主义思想作斗争,在若干年内都是極重要的任务。

### 从思想方面来研究

第三、要从思想方面来研究。上面所講的是客观的东西,客观的存在只是說明有产生資产階級思想以至發展成为右派分子的可能,要使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还要有思想方面的环境,有一定的土壤和气候,並通过人自己主观的思想活动。为什么这个人成为右

派，那个人不是，为什么有的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另外一个人成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有各人自己主观的思想的原因。

### 思想落后於实际

从一般情况来看，人们的思想发展往往要落后於客观实际的发展。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有些知识分子的思想仍然徘徊在民主革命阶段，这当然就不能与革命形势适应。中国民主革命经过很长时期，全国性的大辩论有好多次，人们的思想准备一般说是比较充分的。社会主义革命，从全国解放算起，只有八年，从宣布总路线算起，只有四年，不少人的思想准备并不够充分，感到突然，跟不上客观形势发展。有些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未能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就使思想认识远远落后於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因此，对大是大非一时辨别不清，就给右派分子猖狂进攻以一定的市场，使他们便于进行活动，这是我们在反右派斗争中许多人都深引为警惕的。

### 右派分子是政治问题，但也有思想根源

右派分子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政治问题不是思想问题，但右派分子之成为右派，也是有其思想原因的，这些思想根源对我们知识分子来说，是一面极具有教育意义的镜子，因此作为吸取教训，很值得我们加以分析。关于这一问题，大会上有许多同志讲了很好的意见，我不拟重复，只是再作一点补充。许多右派分子，思想上有若干共同特点，就是个人主义、骄傲自大，修正主义观点比较突出，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大家注意警惕的。

### 个人主义问题

关于个人主义问题。差不多所有右派分子思想上的特点，都离不开个人主义，有的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端了就成为个人野心。个人主义思想从社会历史来看，由来已久。我们过去的社会叫做

私有制的社会，封建社会是私有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也是私有制社会，它們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私有”，所以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對於我們來說影响是很深的，我們从旧社会来的人，許多人身上差不多都有一个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包袱，問題是有的人能够把包袱逐漸去掉，有的人包袱不能去掉，一直揹着走，甚至越揹越重，沿途还在揀东西加重这个包袱。过去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个皇帝遊江南，到了鎮江金山寺，看見長江来往船只很多，問一个和尚，長江来往的有多少只船？这个和尚回答他說：有兩只船，一条叫做“名”，一条叫做“利”。是呀，过去佛家認為世人忙忙碌碌，不过都是为了个人名利奔波而已。在旧社会时，这句话概括了很多情况，但並不全面；即使在旧社会，也有一些並不为个人名利奔波，而为人民事業为国家前途而奔波忙碌的人，不仅奔波忙碌，而且有时还付出自己的生命来牺牲奋斗，这一方面也不要抹煞。我們中国历史上舍己为公的志士仁人是历代数見不鮮的，不能用两个字就把所有人都概括完了。對於过去我們祖先中那些不为个人名利，而为人民福利，为国家前途而奔波以至牺牲奋斗的成仁取义的人，是不能抹煞的。但是不能否認，在旧社会私有制的情况下，讀書人为个人名利而奔波忙碌的，不能不說是很多的。在一个人的童年时代，就在培养这些思想，亲友家庭見面多是恭維“升官發財”，小孩子頸上掛的那个“金鎖”就写着“長命富貴”四个字。过年貼的門对子，常見的是“多福多寿多男子，日富日貴日康宁”以及“三元及第”、“三星高照”等等。小孩子讀書，“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以及“十年寒窗，为的一举成名”等等，不是陈陈相因教育着人們嗎？过去做八股文，謂之“敲門磚”，門敲开了，磚就要丟掉的。所以旧社会在这方面給予所謂“讀書人”即今之知識分子的影响是很深厚的。

历史上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到了資產階級，表現在形式上好像要文明得多，但在實質上是發展到高峯。資產階級个人主义的表现形态有各种各样，但其实質是四个字：“唯利是圖”。知識分子有一个特点，就是掌握了一定知識，和剝削階級完全不劳而获不

同，历史上自私自利的奴才和自私自利的奴主，在表现形态上也是有不同的，但实质还是一样。我想着重讲一讲知识分子在目前时期的个人主义问题。

### “给”与“取”的关系

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表现形态也是有多种多样的，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问题，而其表现形式之一则是“给与取”、尽责和享受、劳动与报酬的矛盾统一的关系问题，从人们对待这一问题不同态度，可以看出各种各样的人生观。

### 剥削阶级的态度

一种是剥削阶级的态度，它的特点是不给只取，不尽责任，光讲享受，不劳而获，剥削别人，他对社会人羣没有尽任何责任，没有丝毫贡献，但却得到了许多东西。他不仅只是吃饭、拉屎、睡觉、不做有益事，他还要喝血、昧天良做坏事。过去的历史，鲁迅先生说，就是这样摆着人肉的筵宴到现在。损人利己，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使别人受痛苦的基础上，是一切剥削者的共同特点，到了资产阶级是把这一特点发展到高峰了。而在旧社会剥削阶级为了要驯御读书人成为剥削者的帮闲、帮忙、帮兇，就用剥削阶级的腐朽人生观培养读书人，使人认为这样是有福气，是交了好运，要人去羡慕追逐。实际上过去也有不少有正义感和有骨头的士人是看不起的，不是在古书上就说过：“肉食者鄙”吗，陶行知先生过去曾写了二只小歌骂这个现象，他说：“不做事，只吃饭，什么人，是混蛋。不做事，吃好饭，什么人，王八蛋”。陶先生反对剥削的人生观的精神是好的，认为不劳而获是很卑鄙的。

### 工人阶级的态度

另外一种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的态度。他要讲求尽最大的责任，做最多的劳动，而不讲求和计较个人的享受、报酬，多“给”少“取”，多劳少得。我们中国过去是有这方面很好的传统

的，強調個人對集體、國家負責，強調獻身精神。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都是很好的傳統。而共產主義者不僅繼承了這些美德而且是舍己為羣那種高尚精神的集大成的代表。共產主義者為了能夠很好盡責，當然也向社會取東西，但是不貪圖享受。他只要得一個公共的、集體的、一般的生活條件，他要這些東西是為了取得一個再生產的可能；不吃飯明天不能幹活，所以要得到吃喝穿等生活條件，其目的是為了再去做工作，再進行戰鬥。講求盡責任，而不追逐享受；講求勞動，而不計較報酬，講求“給”而不貪圖“取”，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使別人同享幸福的基礎上，並能犧牲自己來求得共同的幸福，這就是工人階級的共產主義者的態度。

### 小資產階級的態度

還有一種小資產階級的態度：給予人們的，要同樣取回來；盡自己的責任，求自己的享受；按自己的勞動，要得到應有的報酬。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滿合理，“我也不想沾光，我也不願吃虧”。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與人無爭，對人無礙，憑本事混飯吃，不失光明磊落。今天不是也有：“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想法嗎？老子有一身本事，就不愁沒有飯吃，而我並不多要，是憑本事混飯吃的。表面上好像是“公平交易”，按照有多少勞動得多少報酬，盡多少責任要多少享受的，實質上是不然的。在私有制的剝削社會里，這種想法是空想，做不到的。而且這種想法，仍屬“私有”範疇。這種狀況只是一種中間狀況，要過渡的、要變化的，不能作為定型。在舊社會是不可能把你所出力貢獻的剛剛恰如其分的給你待遇報酬。事實上是或者少勞多獲，或者是多勞少得，甚至勞而不可得。就像農村的中農，是要向兩極分化的，一方面分化向富農地主去，剝削人；另一方面就下降為貧農、雇農，被人剝削；他怎能穩定呢？這一種態度基本上是默認那個私有剝削。有這種思想是暫時的，他要往上爬，對同輩要擠、要踢、要撞，對主子要仰望欣羨，他或者成為剝削階級的工具——奴才，或者自己也變成剝削



者，也就是屬剝削階級那一類的。小資產階級從思想類型來看，也是屬於資產階級範疇的。所謂憑本事混飯吃，你的本事獻給誰，向誰要飯吃？而且既然贊成“私有”，並有個人貪求，實際上並不以此為止，人一自私，其貪心往往是無止境的，由少勞而多得，最後的目標是不勞而得，所以上述這種態度，仍然是自私自利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仍是一個範疇。但是這樣的表現形態，很容易迷惑人。曾見有人以為憑本事混飯吃，很傲氣。有什麼傲氣呀？實際上是自己的主觀幼稚，沒看通，沒看全，沒看穿！可是這一種思想類型在目前的社會主義時期，還值得我們大加警惕，它對我們的某些知識分子還有影響。

要檢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个人主義問題，要注意他的特點，因為他有一定知識，有一定本事，是精神勞動者，和完全像死豬那樣只吃不幹活的剝削者是有不同的。在目前時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个人主義的突出問題，主要是對個人與集体的關係沒有處理好。對於個人給予社會做的事情，也就是說盡的責任和付出的勞動，和他從社會得來的報酬、享受二者的關係如何看法，如何處理，成為知識分子个人主義的最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對知識分子影響很大，如果對待這個問題能有正確的看法並採取了正確的態度，把個人利益服從於集体利益，許多由於個人打算而帶來的問題都可迎刃而解。

### 有的人做工作要記賬

有些知識分子總想給予社會的少，從社會上要拿來的多。往往講究這一條：勞動要講究記賬的，不記賬他是不高興的。現在我們科學隊伍裡面也有這樣的人，願意作那些好記賬的工作，不願意作那些不好記賬的工作。就是願意開花不願做泥土。記賬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便於表現自己，容易出名，好要報酬，可以討價還價。記上賬就成為他個人的資本，他就似乎成為資產一方，而社會對他似乎變成負債一方；他似乎成為債權戶，社會則似乎成為債務戶。“你欠了我的債”，他就要經常伸手，要還他的賬。几千年的農民給

我們吃了多少糧食，不知有誰記了賬！工人創造了多少財富，也不知記了誰的賬！千千万萬革命戰士流了多少的血，又有多少人記了賬呢！有些知識分子做工作要強調記賬，以此來講求報酬。這與工人、農民和革命戰士來比，不顯得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思想的丑惡卑下嗎？有的人正因為存有這樣的個人打算，時常覺得自己受到束縛限制，不大舒暢。實際上，你只要能講求為社會盡責，為社會主義事業做工作，為工人農民服務，道路寬闊無邊，到處都可以發揮所長。有些人卻感到常常受到限制，感到別別扭扭、不大舒服，感到不如意的事很多，這往往就是存有個人主義的反映，而又不願坦率暴露，總是隱隱約約、曲曲折折來表現，這種人的風格往往是不明朗的，心情是陰暗的，總覺得到處碰釘子。這究竟是社會集體對你不好呢？還是你個人主義思想和社會集體不合拍呢？為人民服務當然也有時候碰釘子，但不會有“不如意事常八九”之感，而且為了革命工作碰釘子是很光榮的。

### 驕傲自滿、狂妄自大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驕傲自滿、狂妄自大的問題。科學界的右派分子還有一個特點，差不多都是驕傲放肆，狂妄自大，目中無人。這對我們知識分子來說，大大值得警惕。有些知識分子受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毒是相當深的，所謂士為萬民之首，看不起勞動人民，輕視體力勞動工作，常把勞動人民估得低。實際上知識分子不僅吃的穿的靠勞動人民，他的知識根源也是來自勞動人民，勞動人民是他的土壤，他在勞動人民頭上開花，卻忘記了勞動人民，還鄙視勞動人民，這是不老實的，也是不公平的。隨便舉幾個例說：中國過去傳說文字是倉頡造的，實際上是千千万萬人民創造出原始的素材，先有巫后有史官記載下來，而後逐漸整理創造出來的。神農嘗百草也只是一種傳說。李時珍整理的本草綱目，是多少年千萬人民積累下來的經驗，有不少藥草是開始亂吃死了人，用生命的代價換來的經驗，然後才逐漸弄清楚的，經驗要人整理研究，才能系統化，才能提高成為科學，上升為理論，甚至有新的發現，成為公

众的遗产，因此整理研究的人是有贡献的，决不能轻视。但他只是若干分之一的贡献，不是全部，如把那些整理研究的人的功劳估得过高，也是不合实际、不公平的。中国的食品好，菜作得好，所有有名的好菜，都是劳动人民这个地方、那个地方、这个县城、那个集镇一个个创造出来的，中国的手工业食品，是世界上著名的。许多文化成果都是由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有的是素材，有的是成品。当然，知识分子整理研究工作也很重要。但你不要忘记劳动人民，他们不仅是衣食父母，而且是知识根源。所以有些知识分子喜欢把自己抬高，吹得很大，贪天之功以为己有，这是很不老实的。历史上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来比，知识分子从来容易被估高，而劳动人民容易被估低。

### 有利於自己的比法

有些知识分子在互相间作比较时，往往易犯“文人相轻”的毛病，他那比法常常是用取巧的办法。在和别人比时，他欢喜和别人的短处比，不喜欢和别人的长处比。对党员，他可以說你不是专家；对党外，他可以說我和共产党有关系或我是党员。对老干部，他可以說有专门知识，对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他可以說我曾到过解放区。他不是反过来和别人的长处比，这个人鼻子比我好，那个人眼睛比我好，那个人耳朵比我好，不是这样的比法。他的比法叫做是有利於他自己的比法，越比越高，因此就腦子越發脹，“家有敝帚，享之千金”，自己的东西，就是一把破扫帚也要值千金。还有一种人，簡直以己之短来轻人之短，甚至来压人之长，簡直是有点霸道了，更恶劣的是凡打击别人来抬高自己，那就比上述那样人还要低几等。

有些知识分子为了窃取名位，不惜“連儉帶搶”；为了卖弄表现自己，不惜嘩众取寵。“拍馬屁”这东西也有各式各样的，对上拍，对下也有拍馬屁的。嘩众取寵是給羣众拍馬屁。要羣众把他抬高，他坐轎子，要羣众抬轎子。有这样毛病的人，真正是“文人無行”了。

曾見過有些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同志，包括我自己以內，也是名過於實的。因為知識分子在參加革命後一個時期可能佔了個“便宜”。工農同志文化水平一下子提不了那麼快，知識分子有些文化，往往被估得過高，名不實實。結果是頭重腳輕根底淺，經不起考驗，最後還得要在實際鬥爭中鍛鍊充實，才站得住腳。

### 要能過批評關

知識分子的改造，克服驕傲自滿，態度老老實實，是極其重要的問題。為了要克服驕傲自滿，使自己腦子真正清醒起來，要經常有批評和自我批評思想檢查的機會，特別是要有否定自己的機會。有時驕傲自滿的毛病過重，發展到狂妄的程度。否定的越徹底就越有幫助，因為可以真正幫助自己清醒起來。腦子發熱到發昏程度，不吃一付重的清涼劑，是難以退燒的。當然，這並不是說要否定得一錢不值，批評和自我批評也是要實事求是的，只有徹底否定自己毛病的決心，才可以真正認識到自己的長處，把自己要保留和發揚的優點，真正肯定下來。這樣肯定下來的，就越扎實。知識分子沒有經過嚴格思想檢查，對錯誤和虛假的东西，不加以徹底否定，發展下去十分危險，十有八九要摔筋斗的。所以驕傲自滿不經過好幾次徹底的否定，你要腦子清醒過來很不容易。

### 屁股坐在普通人位置上

與克服驕傲自滿有聯系的還有一個體會：要把自己站在普通人的最低的位置上，思想境界可以提到很高的位置上來看問題。這是矛盾的統一，屁股坐得低，可以使思想超出考慮個人問題引起的種種矛盾之外，換得了腦子的真正的清醒，能夠洞察事物，對四面八方易於看清楚、想得通，因之反而換來一個思想境界站得高，看得更遠些，更全面些。把自己身份位置擺得高，以為是了不起的人物，就會先以一個主觀框框要求客觀情況符合自己願望，而往往是主客觀不能一致，使腦子容易糊塗苦惱甚至發昏發熱，所謂利令智昏，反使思想境界降低了。

## 架 子 問 題

还有一个架子問題。知識分子有了榮譽，做了負責工作，長袍馬褂一穿，就有了架子問題。这个架子不好放，馬褂一穿不好脫，怕丟臉。因为已把自己看得比普通人特殊，高貴得很，成为“精神貴族”。架子再拉下来，就認為丟臉，有說不出的虛榮心。有时並疑神疑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受了旧社会势利眼的影响，覺得有名譽、有地位，人家对我是敬慕的。如把架子拉下来，人家就会看不起我，狗看到穿破衣服的不是要咬你几口嗎？旧社会确有过这样的情况，我們不能說今天沒有这种殘余，但基本上是他自己的心病，有心賊。有个人主义的人思想上的心賊有时很厉害，可以把人的精神状态搞得不正常。一个舍己为公的工人階級革命知識分子，他把这些心賊都赶掉，精神状态是爽朗安宁的，根本不想这些事，不計較这些事。如果有时遇到人們所謂观感問題，应该怎样看，我看宁可讓人家把自己估計很低，等到人家了解到估計錯了，人家会給你意外的尊重。千万不要讓人看作了不起，結果是中国的繡花枕头，里面是一包稻草，令人得个意外的失望。

知識分子遇到批評关很难过，和架子放不下很有关系。有时在精神上确实感受到有些痛苦，甚至好几天睡不着覺。但是只要下决心把架子放下来，过了批評关，反而輕松愉快，自己思想境界大为提高。中国話叫“痛快”，“痛快”者，“痛”而后“快”也。

## 修 正 主 义 問 題

再一个問題，就是許多右派分子都有修正主义的錯誤观点。現在好像在青年右派分子中对修正主义常常給他戴上一頂很冠冕堂皇的帽子，叫做这个人善於“独立思考”，“有才华”等等。反过來說共产党是愚民政策，有些黨員唯唯諾諾，缺乏独立思考，是庸才，跟着走，好像是木头人。

孰不知共产党人搞革命思想上就是要有最大的主动性。搞革命是怎么回事，是要牺牲的，要抛头颅洒鮮血的。世界上有最大

思想主动性的什么人，是革命家，是共产党人。搞革命，而且是搞共产主义革命，这种人往往是有最活跃的生命力，没有最活跃的生命力，他不敢、不可能决心地牺牲自己去从事那样的危险艰难的事业。不要把党员看得他很傻，不是这回事。在过去那么危险的情况下，为什么干革命，革命要杀头，没有满腔的热忱、火热的生命力，是不会干革命的。往往是沉静下来心都咬碎，无法沉静下去了，非革命不可。革命家是生命力最活跃的人，而且是最有主动性的人。他的思想力一般是比较丰富的。共产党人一般是生命力比较活跃，思想力比较丰富的人，怎么没有独立思考呢？没有独立思考就能下决心革命吗？

### 独立思考是共产党提倡的

我们党历来提倡：党员要开动“机器”，不要成为思想懒汉，思想懒汉这种人是\*\*不好的。独立思考是共产党提倡的，而且是一再强调的。右派分子说：共产党人调子差不多，没有多少不同意见，是党的“愚民政策”。党员阶级立场相同，政治目标相同，调子当然基本上相同。什么叫独立思考呢？难道说标新立异、任意放肆叫做独立思考吗？独立思考要有两个东西：一个叫立场；有些同志讲得很好，思想是阶级的反映，站在什么立场去思考，思考什么，为了什么去思考，谁也不能离开阶级立场的。还有是你用什么思想武器，思想总不能离开立场与方法。来自非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立场站得不对，思考的问题一定也不会对，一定把问题看错了。站稳立场，思想方法的武器不够，也不易把问题看清楚。马列主义与我们的关系，列宁说过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结晶，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是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是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我们这些非工人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马列主义哪里会是原来自有的，这是外来的东西，需要很好学习才能掌握的。我们学马列主义谈何容易，不在长期实际斗争中锻炼，是不易学好的。立场没有站稳，武器没有抓住，却来抽象强调独立思考，这样是否在强调知识分子自发性呢？难道发展知识分子的狂妄无知，乱想一

通，胡話連篇，以感想代替政策，任性放肆，就叫做獨立思考嗎？我們在初參加革命時候，大都有那股子勁，叫做“初生之犢不怕虎”，“學藝三天，天下可行”，半瓶醋，到處幌。等碰了許多釘子，才覺得不簡單，慢慢懂得深思熟慮，比較深沉，逐漸成長，許多人又有“學藝三年，寸步難行”的體會。立場方法說起來很簡單，實際上要做到可不容易，有的人一輩子也不見得解決了這個問題。右派分子把新腔怪調叫做獨立思考。對那些和黨的調子不同，另外唱一個腔調的人，他就說：你這個人會獨立思考，有才華；對那些黨性好、遇事深沉思考的人，却說是愚蠢。這是惡意的曲解和污蔑。古書上說：“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有些人歡喜賣弄自己的聰明才華，賣弄小聰明，結果常常聰明反被聰明誤。右派分子常常用善於獨立思考的幌子來掩蓋他的修正主義，這是一個重要特點。

### 懷疑態度和自由思想

關於懷疑態度，我們一向也是提倡的，也就是說對不懂的問題不清楚的事情，不要裝懂，要問清楚，追究明白，研究透徹，馬克思在答復他的女兒所提的問題時，記得就講過這一句話：遇事要有懷疑態度。不懂的事抱着懷疑態度，打個問號，把它搞清楚。但這種懷疑態度並不是懷疑主義，這是有原則區別的，當着把問題搞清楚了，就要堅信篤行。自由思想要不要？這也是我們一向提倡的。但這又和自由主義有原則區別，對自由主義我們是反對的。黨從來提倡獨立思考，自由思想，懷疑態度，不然怎能把握馬列主義的真理掌握得住，這是不可能的。反革命分子胡風，就曾強調過“主觀戰鬥精神”、“自我擴張”，強調知識分子的自發性，立場沒有站好，思想沒有武器，強調自發，請問自發什麼東西？當然就自發資本主義甚至封建主義一套東西啦。站在資產階級的反動立場，拿着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武器，大喊要“獨立思考”，“自我擴張”，結果是什麼呢？一派的修正主義，猖狂地向黨和人民進攻，反對社會主義，這不是很明白的嗎。

### 三、要認真进行思想改造，站稳工人階級立場

在目前这样情况下，我們必須要建立一支工人階級的科學隊伍，為工人階級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我們從舊的營壘來的人，要向舊的營壘叛變，向新的營壘投降，而且要真誠。工人階級新培養出來的青年，他們更要站稳立場，不能迷失方向。所以我們這支科學隊伍，老的要改造，新的要培養。目前科學隊伍的情況和全國整個知識分子隊伍的情況是相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是少數，而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左派也是少數，多數是可以接受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間派。對現在絕大多數的科學工作者來說，目前最重要的關鍵問題是什麼呢？是認真地進行思想改造，站稳工人階級立場。人民日報社論上講，目前知識分子中間分子數量最多，他們現在有點搖搖擺擺。因為知識要為經濟基礎服務，舊的小生產經濟基礎沒有了，資本主義經濟基礎沒有了，新的經濟基礎是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知識分子的毛，老皮已不存在，要附到工人階級新的皮上，不附到新皮上會是什麼情況呢？那就是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樑上君子”，“樑上君子”是個什麼問題呢？叫做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就會搖搖幌幌，苦悶恐慌。有的人感覺到在這新社會里日子不大好過。這是什麼原因？就是因為處在“樑上君子”的情況，上不沾天，下不着地，沒有掌握自己的命運。舊的經濟基礎既然都改變了，知識分子、科學工作者，不把你的毛附在工人階級的皮上的話，你就不能和新社會適應。你的科學知識就不能適應社會主義需要，你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不能適應新的社會的情況，就會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精神狀態不安寧。必須要定下來，烏乎定？定於“一”，“一”是工人階級。

從這次反右派鬥爭中，可以看出：許多過去進行過一定程度的思想改造的知識分子，就比沒有進行過思想改造的知識分子有不同程度的進步，這說明思想改造是重要的也是正確的。但是前一次的思想改造運動，主要是解決對美蔣要劃清敵我界限問題；而對於解決改變資產階級立場，站稳工人階級立場問題，一般還未有來得



及解决。到现在,这一问题非解决不可了。我们科学工作者一定要认清目前这个形势,把自己的命运和工人阶级社会主义事业结合在一起。

### 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

我们人的性质、生命有两种,一是自然性,生物学的人,自然人;但还有一种性质更重要。人之所以为人决不仅仅是前面那一条,否则人和禽兽又有什么区别呢?人之所以和其他生物不同,更重要的就在于他有社会性,能制造工具进行社会生产,有思想,是政治的动物,社会有阶级,人的社会性就必然反映一定的阶级性,社会性的人,必然是属一定阶级的阶级人。所以我们有两个生命,一个是自然生命,一个是政治生命。政治生命对一个人来讲更重要,是他的灵魂;人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观点,人就沒有灵魂了,行尸走肉而已。不是有人对人生曾发生过苦闷吗,说什么人生无常,生命有限得很。有些哲学家又说生命是无限,是可以不朽的。有限、无限,朽和不朽,总是搞不清楚。实际上作为生物学的人,生命当然是有限的,要朽的;人生七十古来稀,活到七十岁的老人就算不容易了。但是人是可以无限的,可以不朽的,那是指政治生命讲的,你的政治生命可以是无限的,你是可以不朽的。就看你把自己的命运和社会上什么一个阶级和势力结合在一起,如能和那进步的阶级,进步的社会力量结合在一起,你就是无限的,不朽的,你的政治生命是和人民永远存在的。如你个人生命和那个没落的反动的阶级和势力结合在一起,那么你的生命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有罪的,成为人类盗贼,后世罪人。

### 能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是光荣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科学工作者把自己的毛能够附在工人阶级皮上,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是个极大的光荣。只有工人阶级是最有前途的,其他的阶级都是过渡阶级,都要过渡成为工人阶级。如果我们这一生,最后还要找个安慰的话,我看能成为工人阶级的

好兒女、好戰士、好的科學工作者，這就是無上光榮，死無遺憾，世界上還有比這更光榮的嗎？個人的生命和這最前進的最革命的階級結合在一起了，永遠有它的存在。今天有最迫切的需要，最好的條件，最大的可能，讓我們改造成為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凡是從舊社會來的，包括在今天立場觀點問題還沒解決的青年在內，我們都應該認真地進行思想改造，真正站穩工人階級立場，改造成為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只要肯努力、有決心，是一定可以做到的。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沒有這樣一個工人階級科學大軍是很困難的，對知識分子自己來說，也是需要明確決定自己的前進方向，要過好社會主義關，走社會主義道路。對一個人來說，政治生命比之自然生命更重要，是第一位，第二位才是自然生命。所以一定要下這個決心。

#### 四、培養青年科學工作者的方向是“又紅又專”

我們剛剛才走過青年這一段，所以還比較熟悉。青年有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年青，有前途，有未來，但是現在並沒有多少本錢。記得在抗戰初期郭老寫過一篇文章：青年是人类的春天。這說明青年人是初出山的太陽，來日方長。青年人的這一特點，說明他可以造就，可以塑造，按教育學來說是叫做可塑性，但現在還未塑造成功，成功的日子在後頭。他有這個特點，可以填充很多東西進去，來發展他，來得到生長。但是現在的情況，或者是一張空白，正需要畫畫，正需要以後來畫，現在還未畫好，或者正是在打草稿，還未畫出成品。所以這一個特點是他優點的地方，也是他弱點的地方。

#### 青年人要有政治方向

我們都是從青年時代過來的，我們的同輩，以後接觸過的朋友、同志也是應當多的，一批批的，由青年到壯年在逐步成長，但在走向前去的路，是有各種各樣的變化和不同結果：許多走向革命道路了，有不少在為個人職業奔波，甚至有的一時“得意”而終究潦

倒,也有少数是走向反动的而結果是沒落的道路上去。至於徬徨歧路,动搖猶豫,以至随波逐流成为政治上庸人和社会渣滓的当然也有人在。在参加革命的同志中,除了牺牲的同志外,留存下来的,多数人成長了,逐漸走向成熟成为革命骨幹,有少数人掉队了,落后了;还有个别的墮落了甚至叛变革命了。我們回想一下,过去的路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真是回头一看,教訓不少。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定要有明确坚定的正确政治方向。許多青年同志都是很有志向的,而且是有远大的志向,这好不好呢?是好的,但必需明确要有为谁去服务的志向,也就是必須要有正确政治方向的志向才是好的,如果政治方向不对,那是很危险的,要跌大孩子的。青年人努力方向如何定,就联系到我們科学院对青年的培养目标問題。(关于今后培养幹部的成分来源及培养途徑等問題,这里暂时不談。)我深深感到現在有些青年同志,有了業務方向,却没有政治方向的向,或者政治方向不大明确坚定,这是很危险的。要把我業務水平提高,这好不好呢?当然是好,因为这是我們需要的。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政治方向必須作为前提,你要成为什么样的科学工作者?成为什么样的“家”呀?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还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因此只注意業務方向,不注意政治方面,叫做前途危险,不堪設想。所以我們不管对决定一生的奋斗目标也好,和一段时間的奋斗目标也好,总是要把政治方向作为前提。因为人,我前面說的,第一位的生命是政治生命,所以你首先要确定的是政治方向,为谁服务,向什么方向去。知識只是一个工具,工具为谁所用要有方向。一把刀子可以救人也可以杀人,鴉片烟可以做藥救人,也可以害人,你掌握了業務工具,你必須要有政治方向,才算有了目标和归宿。

### “又紅又專”

我想應該明确肯定的政治方向是什么呢?應該堅定不动搖的成为工人阶级的忠心於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者,而且要成为一个很有成就的科学家。也就是要又“紅”又“專”,把个人利益放在集

体利益之中,而不放在集体利益之上,成为紅色專家。現在不是有所謂“先專后紅”的說法嗎?这当然是不对的。先專后紅实际上是先白后紅,結果是先白后黑。因为所說后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現在不要紅,那你是什么顏色呢?不是紅色就是要成为白色。我們要的是又專又紅。有了政治方向,業務方向才有了从屬,才有了灵魂。

青年同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热情高,有朝气,有进取精神,这是好的,但是也帶來一个弱点,就是經驗不够,判断力較差。接受新事物快,敏感,但选择鑑別力較差,容易被別人俘虏,容易受人影响,先入为主。胃口虽好,容易乱吃东西,容易上当。中国有句俗話:“跟好人学好人;跟貓狼子学咬人。”用文縷縷的話說,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們在青年时期,好有一比,有点“姓碰”,我們乡下那个地方,从前女孩子是从小就要定婆家的,有时也有个别的沒有定婆家的,媽媽大娘們見面談話的时候,如問你的孩子婆家姓什么,就会得到回答說:他的婆家“姓碰”。这个意思就是還沒定,究竟婆家是誰,要“碰”。我对青年时期的許多事也就好有这样一比,沒有把握定准,往往在乱撞乱摸乱碰。我过去就是这样的,那时条件比今天差了,在那个黑暗社会里我們年紀青青地要去找真理,真是在黑夜里摸索乱碰,碰得好苦,才找到共产党,信仰了共产主义,作为一生的奋斗方向。

我們开始由家庭走入社会,很多是为了找个人職業,遇到国家国难临头,才有心救国,然后进一步遇到什么才是救国救民真理,这才逐渐走到信仰共产主义。有好多革命知識分子都是走的这条路,但这是一条曲折艰苦的路。在探索寻找中,經常遇到各种各样人在向你兜售“真理”,乍听起来都說“真理”在他那里。可是究竟什么是真理,真理究竟在那里,一时不易弄清楚,是經過好久才逐渐弄清楚的,而且是付了不少的苦痛代价。过去社会上有好多骗人的东西,各式各样的道理,究竟如何選擇判断,在青年时往往沒有把握,很容易上当。可是今天条件不同了,有了党在全国的領導,生在毛澤东时代的青年,在这一点上真是無比的幸福。因为摸索、

“姓碰”，碰对常常是偶然的，碰錯常常是必然的，危險性大得很。我有一个体会，青年时代要有正确的領導很重要，有了正确的領導可以减少和避免我們犯不必要的錯誤和走弯路，否則的話，很容易犯錯誤，走弯路，迷失了方向。沒有正确的領導，个人在旧社会里混，的确有点像迷途的羔羊，有时成为孤兒，亲友也靠不住，政治上沒有依靠，十分苦痛。找到党之后，感到無限的幸福。

### 要在党领导下前进

社会总是在向前發展进步的，前人教育后人，后人胜过前人。后人为什么能胜过前人？就是因为能够接受前人的經驗，可以少走弯路，能走近路。單靠自己摸索前进，不但不易走近路，而且常常走弯路。而有了正确領導的时候，就可以少走弯路多走近路。所以社会是發展的，后人要超过前人的，就在於后人要善於向前人學習，善於走近路，后来居上。要指導我們走近路（包括政治方向，包括我們各方面），正确的領導就很重要，而今天正确的領導是党。所以相信党、依靠党对青年人來講，真是太重要了。生在这么一个幸福的时代，你不运用这个条件，自己还在“姓碰”，不惜要走弯路，这不是既危險，又冤枉糊塗嗎？！沒見到有些人在乱碰当中得到过許多慘痛的教訓嗎？有的竟成为一生憾事。古話說：一失足成千古恨。当然从馬列主义来看問題，眼睛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就是犯过錯誤，失过足，掉下水的人，也不要絕望，还是可以希望的，只要你痛下决心改正，从新做人，在新的基础上还是有前途的。我們今天对右派分子也还是这样望他們真誠悔悟，从新做人。但是失过足的人，作为一生的教訓來講，究竟是終身难忘的憾事，能避免还是努力避免的好。为什么把自己的命运交給“碰”之神去呢？不放在可靠的基础上前进呢？所以，我是誠懇地向青年同志們建議：必須要有明确坚定的政治方向，坚决地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做一个工人階級的有很高成就的又紅又專的科学家。

（這是根据講話記錄加以整理的）

## 清算資產階級個人主義

——1957年9月21日杜潤生副秘書長在中國科學院  
北京區青年大會上的發言記錄——

三天的會議上，開展了兩條道路問題的大辯論。進行得很好。

現在我只是想提出一個問題來談談，就是大會上受到批判的這幾個青年右派分子，他們的思想基礎是什麼，我們應當從中吸取那些教訓。

他們這幾個人，平素自稱：討厭政治，專攻業務，但是今天恰恰在政治上犯了嚴重錯誤。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幾個人的年紀都不大，平均年齡才廿五歲。如果減掉八歲以前的混沌時期，剩下的只有十七歲。而在十七歲中，又有八年，即一半時間是在新社會環境中長大的。這八年正是他確定人生觀和長知識的時期。可惜，他們所生長起來的知識，竟然是右派知識。人們要問：究竟是什麼力量支配他們對資本主義有那么大的興趣，而對於社會主義有這樣大的反感？主要的原因，可以概括為三條：一是剝削階級出身。一是修正主義。還有一條是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而在這三者之中，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又是佔主要地位。因此，我專就克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問題，談一些感想。

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是一種思想意識，可以說是頭腦里邊的私有制度，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頭腦里边保存得特別多。這種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曾經對建立與鞏固資本主義私有制起過一定的作用，而在今天的中國情況下，它已成為反對社會主義制度，鼓勵資本主義勢力復辟的思想工具了。

作為今天的知識分子，有了個人主義，就不可能全心全意地為

人民服务。他們把知識技能、業務本領，当作爭取个人名利的工具，成为驕傲的資本。例如，錢偉長就曾經要求青年在取得副博士以前不學習馬列主义，不要过問政治。項志遴也說：“政治即業務，工作好即思想好”。这也就是在科学界青年中一度流行的“先專后紅”的路線。所謂“先專后紅”，实际上表現了資產階級个人主义的本質。應該說：这不是“后紅”，而是“后黑”。他們有一种想法：業務是自己的，政治是別人的。如果能够“專”了，就是佔有了私有財產。就像右派分子何榮所說：“我不相信，人会不为自己着想，会为人民服务”。徐芻更清楚地說：“社会主义根本不能实现，因为个人主义就很难克服”。他們就是这样把个人主义看成万万岁，永垂不朽。其实这种想法，早就有胡風表示过了。胡風的“自我擴張”，不正是登峯造極的个人主义嗎？不正是一切为我、自我至上、自我中心主义嗎？如何“自我擴張”呢？有丁玲作了答复：要实行“一本書主义”。並且說，只要写出一本書，就誰也打你不倒。这位老作家就是如此指示青年努力的方向。我們科学院、科学界，特別是青年当中，有沒有不顧一切，只为博士論文奋斗的、所謂“一篇論文主义”的人呢？我想不会沒有。有这种思想的人，以为只要有了一篇論文、一本書，金錢、地位、名譽等等全都来了。据說还会有人給你一張党証。这就是“先專”而“后紅”。博士头衔加上党籍，一塊敲門磚变成了兩塊，大大的有資本繼續“自我擴張”了。而一旦有所擴張，就更加目空一切，唯我独尊起来。共产党算什么？沒有知識文化，那能領導建設，非要我們知識分子領導不可。於是划地为界，說这块地盤是我的，因为这是大学校；那塊地盤是他的，因为那是科学院；这块地盤是他的，因为这是技术界；另一塊地盤也是他的，因为那是司法界。凡此种种，一句話，共产党都得退出去。一面叫嚷共产党退出去，一面又向党要地位，要名譽。威胁說：你不給，你就不懂業務，叫做不懂科学的特点。好罢，承認不懂，滿足他們的要求吧。希望老老实实地工作。但是个人主义者的慾望，永远是無法滿足的。这些人永远是想对社会少做点工作，多撈点報酬。他們永远以債主自居，要人民还債，还一种永远还不清的債。由此看来，單純的迁就是不成的。个

人主义者既然把業務知識当作个人获取名利的工具,也就必然反轉来,把自己的某种成績当作偶像,提倡对他个人的崇拜,处处以羣众中的精神貴族自居。他們用一种老爷态度对待人民,对待羣众,对待党。要羣众圍繞着他服务,可是他还嫌服务者無知無能。这样就使他离开了羣众的斗争,得不到精神营养,失去了和羣众共同的語言,思想感情日趋消沉。对沒落事物,無限同情,对新生事業,無限抵触。社会主义事業的大成就他看不見,有个別缺点他就誣染夸大。他个人作的事,只准說好,不准說坏。羣众作的事,只能說坏,不能說好。特别是环境当中对自己有某种不方便的地方,他就提到原則高度,渲染成天大的灾难,大嚷大叫“解放个性”,要“改变制度”,如果你不贊成,就是压制民主。尽管他們根本不了解美国真象,他却硬說無产阶级的民主是假的,美国那里的民主才是真的。有人才从美国回来,說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对人民是假的,他又說这些人是“共产党的应声虫”。他們就是这样固执地对新兴的、新生的事物抱着成見,吹毛求疵,挑剔备至。如同一个仇視人类新生命的人,对一个初生嬰兒,因为走起路来不稳,就痛斥他無能一样。抱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場和感情的人,对于正在成長中的社会主义事業的責备,也必然是十分違反常情的。

右派分子为了把国家培养和任用幹部的方向引向适合於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發展要求,还不約而同地集中力量攻击我們党的幹部政策。我們国家的幹部政策,是德才兼备的政策。既要才又要德。只強調專業能力,反对政治鍛鍊,就是只要才不要德。他們早已把自己抬到了精神貴族的地位,反轉来还进一步要求修改我們的政策,承認他們的地位合法合理。在我們科学院,还存在另一种輿論,叫作“反对以長为貴”,宣揚“万般皆下品,唯有研究高”的思想。研究工作应当重視,这是对的,“唯我独尊”就錯了。有些好心的同志,也曾被这种口号迷惑一时,殊不知这是一种“暗渡陈倉”的手法,目的就是通过这些口号的实践进一步取消党的領導。“吃一塹,長一智”,今后我們應該有所警惕:凡是宣傳这个或那个業務高於一切,如文学高於一切,科学高於一切,技术高於一切的言論,其



中必有毒素。事实也是这样：他們所主張的所謂“專家政治”，實質上，就是要資產階級領導國家。

我們的國家，今天的确缺乏知識分子，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因此，我們從多方面來鼓勵人民都變成知識分子，還鼓勵已經是知識分子的，勤勉努力掌握業務知識。我們和個人主義的原則區別是：我們所鼓勵和提倡的都是從全體人民的利益出發。只要是人民的需要，我們所歡迎的就不止是一篇論文，而是千篇萬篇論文；不是一本書，而是千本萬本書。對於知識分子，黨的政策歷來是關懷和尊重他們的，只要他們是為人民服務。但是作為知識分子，在受到這種尊重時，應該了解：所謂知識，乃是社會的財產，“非一人所得而私也”。社會科學是長期階級鬥爭的結果，自然科學是人們長期和自然作鬥爭的結果，知識分子把它變成一種科學形態，根據它特有的規律，把它保留和發展起來。在這方面雖有功勞，但是只能是一份，不是全份，而對於青年人講來，還處在接受前人知識的時期，還不是創造知識的時期，知識好比一個大海，我們所掌握的只是大海里的一滴。況且，按今天的情況說，任何一個知識分子都是千百個工农拿他們的勞動的果實供養起來的，飲水應當思源。過去“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是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在舊社會分裂對立的結果，將來要實現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相結合。現在，在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上，給腦力勞動者多得一些，只不過是為了照顧過去傳統，並不表明體力勞動不如腦力勞動高貴。何況按勞取酬制度將來還會在生產發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將為各取所需的制度所代替。如果你今天還自以為有腦力勞動就高於體力勞動，這是違反歷史法則的想法。

魯迅先生在对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上的講話里就說過：“以為詩人或文學家，現在為勞動大眾革命，將來革命成功，勞動階級一定從豐報酬，特別優待，請他坐特等車，吃特等飯，或者勞動者捧着牛油麵包來獻他，說：‘我們的詩人，請用吧！’”如果有這一種想法，“現在是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魯迅先生的話是對文學家講的，無疑問也適用於科學家。“萬般皆下品，唯有我

科学高”的观念，鄙视其他劳动者，这就是一种右翼思想。只有那种老老实实的人，把个人的知识贡献于社会，成为社会财产，贡献给人民，为人民服务，并且和人民精神上处于平等地位，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最后得到可靠的牢靠的荣誉。

## 二

抗拒和反对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的准则，不愿意服从社会统一意志，乃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今天的另一突出表现。

鸣放时期流行于右派分子嘴上边的口号，叫做扩大民主，扩大自由。民主自由当然应该不断扩大。我们党这次发动的整风运动，号召全国人民批评党。坚决相信群众的多数，放手发扬民主。这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历朝历代那个政府敢于这样做？右派分子还有什么不满足，还要“扩大”什么东西呢？谁都清楚：在我们国家，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全国意志统一和个人的心情舒畅、生动活泼，是相辅而行的，是国家政治生活中大家乐意共同执行的准则。人民群众，推翻了资本家地主阶级的统治，自己要管理国家就必须很好的组织起来。“一盘散沙”和“组织起来”，是新旧两个中国的基本特点，也是两个不同的社会物质基础的反映。因此，以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原则，是绝对正确和必要的。为要正确地实现这些原则，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否则，国家就将陷于无政府状态，只能有利于资本家和地主的复辟。问题就在于：右派分子却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他们要反对这种生活，就不能不集中地反对党的领导地位。

他们嚷不民主，要什么民主社会主义，“两院制”，“两党制”等等，就是要从“分庭抗礼”，“平分秋色”，进而完全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使劳动人民失去领袖，使剥削阶级为所欲为，使国家变质。如果把他们的迂迴曲折的议论用朴素的语言说：就是这一条——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就叫作民主。或者反过来说，要民主就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很清楚，取消了党，也就取消了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统一的社会意志。这是极其恶毒的。

右派分子要自由，我們也一定要追問他們，他們到底要什么样的自由？凡屬可享的自由，都在憲法上有了規定；凡是在憲法上規定了的，大家都享受到了，難道还有什么不自由？從右派分子他們的言論看來不外是：思想改造不自由，馬列主義者批評反馬列主義不自由。據何肇說，共產黨過多干擾科學家生活，時常是“叫他們辦這，不辦那”。所以感到不自由。所謂“這”究竟是些啥呢？是指這幾年來的運動，共產黨動員科學家參加土改；參加抗美援朝；參加肅反；參加思想改造；參加反右派鬥爭。所謂“那”，又是些啥呢？就是不要親美，崇美，媚美；不要貪污，浪費，官僚主義；不要脫離實際，不要脫離政治。所有這些，在他們看來都是屬於硬性干涉，都是不自由。這裡，完全可以看出，他們對於新社會的生活抱有很大的對抗情緒。

在這個社會里，人和人的關係變了，變成一種互助合作的同志關係，共同事業共同經營，共同發展。都是事業的主人，彼此自覺地結合為同志關係，為了做好主人，鞏固這種同志關係，必須實行互助，發現了誰有缺點和錯誤，要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鞏固的團結。個人對社會負責，社會也對每個人負責，這才是真正的恢復了人格平等。而右派分子卻說這是“束縛個性”，“缺乏人情味”，並且說你們“把人与人之间關係破壞了”。對呀，“關係”是被我們破壞了，但是，被我們破壞的不是隨便的一種關係，而是破壞了他們所念念不忘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人與人的關係。這種關係是以金錢為媒介的僱傭關係。資本家是主人是僱主，知識分子和工人都是僱工。我有錢，你沒有錢，你就得給我幹，你做不好，就少給你錢或者解僱你。你有來不來的自由，我有雇不雇的自由。這是一種什麼自由呢？這是剝削者剝削勞動者的和勞動者受剝削的自由。這種自由，從人民看來是非取消不可的，而右派分子卻要以此來代替現在的真正自由結合的同志關係。他們憎恨這種關係。他們發現了這種關係是來源於社會主義制度，因此就借整風機會大嚷大叫“除三害”必須改變社會主義制度。把一切罪惡歸之於建立和領導這個制度的共產黨，起而反對共產黨。

反党，有的是从外部反对。有的从内部篡夺。后者是更危险的，是纳吉类型的手法。这就是参加共产党又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需要来改造党。像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那样，他们的党龄很长，却是屡犯错误，屡受批评，不知改悔，个人主义的包袱越包越紧，搞独立王国、搞小集团，“得意时在党之上，失意时在党之外”。“在上”是为了利用党，为个人服务。“在外”是为了组织力量反对党。他们总觉得有党在，自己准吃亏，觉得党妨碍自己发展，使个性无从解放。因此，散佈修正主义，从思想上腐蚀党。骂党是宗派主义集团，另搞一个宗派来反对，从组织上瓦解党。而这一切又是和他们所提倡的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的口号联在一起的。

这里有深刻的教训：一个知识分子愿意在这社会主义制度底下生活，必须改造自己以适应社会，绝不可妄想改造社会主义社会来适应自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想用抽象的民主自由和为社会主义利益服务的人民的民主自由对立，就是想改造社会主义社会适应自己。这样，他们就变成了右派。这样来提问题许多右派分子还是不服气，说“我心里着实是拥护社会主义呀”。问题在于拥护社会主义不能只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来拥护。要作为中国的现代的具体的斗争任务来拥护。社会主义决不是一个人坐在房子里画出来的，是从火热的斗争中得来的。要和帝国主义和残余反革命势力斗争；要和剥削阶级中反抗分子斗争；要和其他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以及留在头脑里边的资本主义思想：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斗争。要和日常工作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作斗争。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还需要经常有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计划，鉴于这一切，就需要有统一的斗争意志。如果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民主来反对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相结合的原则、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一致的原则，那就破坏了统一的斗争意志，也就破坏了社会主义。任凭你怎么说衷心拥护，也是假的。

### 三

以上谈的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人生观和政治观点方面

的表現，以下想談談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對各項專門業務的影響。

右派在鳴放時期，強調了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如果讓他們這些內行領導又是什麼樣的結果呢？很簡單，就是在各種事業上奉行資產階級路線。就科學界來說，那個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已經被人們揭穿了。現在看來，一些青年中的右派分子言論似乎比綱領的文字還更露骨些。像右派分子何羣所說“要用自由競爭和淘汰的資本主義方式發揮每個人的積極性，要用一切是為了名譽地位來鼓勵個人上進”。這是公開地完全適應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主張。如果真照這個主張做去，事情就必然發展到這種地步：科學研究和實際結合原則、科學家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的原則、必要的計劃性和集中使用力量的原則將要遭到嚴重的破壞。國家在最短時間接近或趕上世界水平這一個奮鬥目標也將成為空談。科學界要出現一種無政府狀態。這種狀態正是培育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所需要的好土壤。時間不用很久，一切壞風氣就會在我們科學界出現。許多人急於功利，可以不顧國家需要；可以逃避那種費時長，成功晚的工作；放棄需要埋頭苦幹的工作；拒絕那種依靠集體力量才能完成的工作；而這些工作正好又是國家建設所需要的。這還不算，某些不道德的，如剽竊、抄襲、掠人之美、貪天之功等等壞事都會發展起來。使科學界成為一個資本主義的商品市場。把我們一代青年都帶壞。

右派分子高唱共產黨不如他們內行就是指他們搞資本主義比黨確實內行。科學界各科各類的研究業務，本來是各攻一門，各有長短的。日常業務，向來依靠各類科學家去分頭進行或合作進行。右派分子並不能指出黨對在這種具體業務方面有過什麼硬性干涉。但是，科學事業的發展方向，這卻純粹是社會問題，是政策問題，其中存在着的兩條道路的鬥爭，也可以說是兩“行”之爭，一行是社會主義，一行是資本主義。右派分子是爭資本主義的道路。黨是爭社會主義的道路。想用“外行”這頂帽子來吓退共產黨，讓它自動退出領導地位，這是不能容忍的。在領導權這一問題上之所以絕不能讓步，是由於社會主義路線非黨領導不能實現，並不是由於共

产党万能，它可以不走羣众路綫，在那里發号施令，独断專行，在自己所不懂的事情上，自以为是。在我們的国家，任何事業都要党来領導，而党在任何事業中也必須依靠羣众，向羣众学习，这就是为什么党能領導一切，而且無往而不胜。

#### 四

从以上三个方面簡單地說明了資产階級个人主义的表現。这就可以看出：資产階級的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存在着絕对的矛盾。如果說，在五四以前，在“个性解放”这个口号下所表現的个人主义思想还有它的进步一面，那么到了五四以后，無产階級登台領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候，它已經成为进步的障碍物；再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成为完全反动的，像水火一样的不能相容了。人，也是这样：有些人过去是左派，今天也能变成右派。相反的情形也有。随着社会历史的發展，政治力量的重新組合乃是不可避免的。倒車是开不过去的。有沒有勇气拋棄个人主义立場，这是知識分子在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兩条道路中选择的一个关键問題。

克服資产階級个人主义，是不很容易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已經消灭了生产資料的私有制，但在某些方面也还保留有資本主义社会的遺跡。如按劳取酬还是帶有資产階級法权性質的平等。体力劳动和腦力劳动的分裂現象还未完全消除。反映着社会的旧思想还要長期保持影响。这些都是产生資产階級个人主义客观因素，改变这些，还需要作相当長期的艰苦的工作。但是，作为一个政治思想領域的問題，却是需要每个知識分子加紧进行的也是最迫切的任务。因为知識分子是人民的教員，教育者必先受教育。我們應該爭取自覺进行思想改造，掌握社会規律，为社会主义基础服务。思想改造的过程也就是全面地确立与加深馬列主义認識的过程，但主要的和先决的問題应当是能轉变立場。

过去曾經流行一种說法：說掌握業務和政治修养有矛盾，顧了業務，就顧不了政治，二者不可得兼。所謂“先專后紅”的說法，

也就是建立在这种观点上的。现在又提倡解决立场问题了，这当然是个政治问题，这和取得一种专门知识还有什么矛盾没有？如果有，“先专后红”口号，就成为正确的了。我们认为没有的。难道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一定是不问政治不讲立场的人吗？一个青年想做个好党员就不可能作科学家吗？共产党员里有好多有专长的人，既是好党员又是好的军事专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些党的领导人本人，就是政治家，学者，兼而有之的人物。就自然科学说，苏联今天还不是有许许多多既是共产党员又是科学家的人？法国，约里奥·居里不也是既是共产党员同时又是很好的科学家吗？所有这些事例，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政治和业务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不正是证明正确的政治方向可以促使专业知识收得更好的服务效果吗？不幸，强调政治和业务有矛盾的人们是故意不理睬这些事实的。他们脑子里所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们看到：（一）某些抱有正确立场的青年，原来也想当科学家的。但是，大学毕业以后，遵从祖国的需要，服从祖国的分配，到了部队、工厂、机关了，却几年不见写文章，级别未见上升。就说：这些人比起入研究所，写论文的同龄同学来是大大的逊色了。你看，政治好有什么用啊！这些人是傻子，不如不服从组织分配的人聪明。由此便得出了一条“聪明”的结论：政治好和业务好有矛盾——政治和业务矛盾。要业务出头，就要政治落后。（二）是有一些青年，参加历次政治运动，成为积极分子，在运动中费了一些时间，耽误了点业务。这也被“聪明人”说成是政治与业务的矛盾现象。实际上，这两种事实，能证明什么呢？证明的并不是业务与政治的矛盾，证明的恰恰是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前一个事实，表现了个人主义者的功利观点，把服从组织分配的人，为人民尽忠尽责的、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大智大勇的人民战士称之为“傻子”。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如果没有这些“傻子”，就没有革命与建设的胜利，也就没有你们这种所谓聪明人的业务成绩。我们的党所以受人尊敬，也就因为有许许多多的“傻子”，这些“傻子”为人民尽了责任，自己是心情愉快，安于岗位，并不觉得吃亏，

業務与政治的矛盾是不存在的。这就是同一現象，兩種立場，兩種結論。个人主义者喜欢講个人得失，就从个人利益来計較吧：如后一种情况的積極分子参加了斗争，少做了若干次試驗，少翻了若干資料，可是，保护了革命和建設的胜利，給整个事業鋪平道路，完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抱負，此外自己在政治斗争上得到許多收获，必將會在今后一生工作中發揮有益的持久的作用。他們的專業不但會學得好，而且學出來的東西也用得好，用於最有用的地方，他們也是一點也不會吃虧的。从反面估量問題的人，正是那些資產階級个人主义者，这种人不改造，倒是注定要受历史的懲处，吃大虧的。

政治是每一个青年前进的基础，是幹部必需具备的品格，也就是所謂“德”的这一基本条件。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設时期，当資產階級思想影响在知識界仍然保持作用的时候，在培养青年幹部方面，德，也就是政治条件，这是必需大大強調的。

現在，我們还是回过头来談談思想改造問題。前面說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首先要解决立場問題。和這個問題有关的我想重复地說明以下兩点，作为講話的結束：

第一，要堅定地为人民服务。今天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問題的中心，是如何安排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具体地說，就是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於社会主义的总利益。这一句話包括很多的具体的內容。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基本上是和諧一致的。但有时会出现暫时的局部的不一致。每一次的不一致，对我们來說，都是一个关口，要通过关口时，作为人民中的先进分子，要求你暫時牺牲个人利益保全公共利益，以集体主义战胜个人主义。例如，最高的是生死关，在严重的对敌斗争中，有时需要为人民而死，牺牲自己，保全国家民族。生死問題解决了，还有一个出头关，当你作出成績，得到荣誉，提高了負責地位，也就是俗話所說“出了头”了，羣众仰慕你，愛戴你，你應該怎么样呢？應該選擇的态度是，受之有愧，更加勤勉起来；决不可胜利冲昏头腦，驕傲起来，忘了成功的来源，把一切成就統統記在自己賬上，目中



無人，放胆去做坏事情，走上絕路。犯錯誤受批評也是一关，人們常常把它叫做“倒了糶”。其实，犯錯誤也有兩重性。改正錯誤，接受教訓，明确經驗，这样就变成了好事，这是應該爭取的。反之，撕不下面皮，不敢公开揭露錯誤，拒絕、甚至敵視組織或同志們对自己的批評，怀恨在心，念念不忘，以怨报德。这就真正成为“倒糶”的事情了。这是錯上加錯，絕對要不得。还有一种关，姑名之为“被屈关”，一个人受点委屈，如肃反时你不是个反革命分子，但有可疑之点，因而被审查了被斗争了。这时，要懂得为了国家和一定的組織利益，有必要对一切有疑点的幹部进行审查，查是为了“信”，是为了除疑深信。三国演义里的古城会，就是張飞对曹营归来的关羽加以审查，查清無事，还是恢复了結义亲緣。这有什么不得了？我們为了人民，可以牺牲一切，当然可以忍受这样一点曲折，人的一生，小小受屈的事是免不了的。一时的任用不当，或無端的受点指責，这都有可能。有意見尽可以提，領導上因故不能接受，不要自由主义，不要關对立。要顧全大局。至於自己本来有问题有錯誤，組織上做得对，那就不能叫受屈，應該保持愉快，接受处理。有些右派分子就是把这类事夸大起来，企圖煽动不滿，万不可上当。

还有一种形式的考驗，例如当我们国家政治上有逆流的时候，我們必須坚持前进的立場。今年就有个不平常的春天，吹来一股邪風。右派分子号召青年們“独立思考”，“个性解放”，“不要作党的乖孩子”等等。坚决相信党，坚信社会主义事業，坚信人民羣众的人，能在逆流中挺起胸膛来拥护和捍衛真理，但是另有一些人却經不起風波，被这股資本主义的邪風吹倒，其中还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員。这些人之所以經不起考驗，就是个人主义的包袱太重，看不见真理，更談不上为人民服务的真誠。此外，在建設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还有一些生活里的小困难，这种小困难，也在不断地考驗着每个人。例如：由於生产的發展赶不上人們的需要的增長，为了积累資金，必須适当調节消費。买菜买肉要排队，工农大众过去根本吃不起肉，用不着排队，今天吃得起肉了，排排队还是滿意。但

是，一般高級知識分子的情況就兩樣了，過去是吃得起肉又不排隊，今天仍然吃肉，但須排隊，就表示不高興。於是又慨乎言之的說“今不如昔”。如果，我們能暫時放下一點個人的和眼前的利益，為全體人民和長遠的社會主義的利益想一想，就不會說這種話了。再舉一個例子，這次會議上，大家列舉事實，說明科學事業的發展，用以批駁右派分子“今不如昔”的謬論，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是優越的。大家都承認有理有據。但是如果換一種情況，假如國家面臨突然事變，帝國主義來打我們，我們的主要任務變成保衛人民民主專政政權，那時，財政緊張，科學研究工作可能部分或大部分停辦，一切為了前線，要後方吃點苦，就像蘇聯衛國戰爭頭幾年那樣，只要保持住蘇維埃政權，一切都有希望，否則一切失敗。在這種特殊情況下，我們是否還相信社會主義優越性堅決擁護它呢？如果真正解決了立場問題，當然會相信，並且為它奮鬥到底。否則就會懷疑革命，甚至反對革命。這種鬥爭中的大波折，今天並沒有發生，為了解決認識問題，不妨想到，想到就叫有思想準備，便主動了。大波折以外，還有小曲折，例如遭受較大的水旱天災，等等。都要大家忍受一些困難和不便的。對於工农羣眾講，只要地主資本家不能復辟，都是會今勝於昔的。知識分子平素能接近工农，共過甘苦，能為他們着想，把他們的憂樂當自己的憂樂，而不要斤斤計較個人身邊利害，也就不會發生動搖。如果堅持個人主義，那就生活不下去，就要作現狀的反對派——右派。因此，為人民服務，即使作不到完全忘我，至少也須把為人和為己統一起來。要做到把“我”置於集體之中，而不要放在集體之上或集體之外。這並不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許多共產黨員是普通人，都做到了，證明認真的鍛鍊是會有效果的。

為人民服務，要看得起人民，不是在口頭上，是真正在思想上認識人民在歷史中的地位，深切了解他們創造能力，到人民中去，接近工农生活，向他們學習。要學習就要從虛心開始。自滿是學習的敵人。要永遠保持謙虛態度。萬不可強不知以為知，不要裝，不要吹。像這一次的好多右派分子，就犯了這個毛病，本來還沒有

讀过馬克思的几本書，就立志反对馬克思主义。北大右派分子譚天荣竟然說，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毛澤东的学說都被历史否定了，新时代从我譚天荣开始。本院的徐志国也效法他乱吹一气。並且公开提倡对他們自己的个人崇拜。这样的人，眼里那里还有人民，那能为人民服务！大家一定要把这些人当作鏡子，經常照照自己，引为警戒。毛主席說：“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权”。这是医治不虛心，狂妄自大的一句格言。對於做人、治学都是很有用处的，值得青年同志們特別注意。

其次，一个人要在很短的时期牢靠地掌握馬列主义，做到虛心向善，确实是不容易的。在努力學習和鍛鍊的过程中，怎样才能避免在政治上犯重大錯誤呢？一个最有力的保証是靠近党，接受党的領導。有什么問題弄不清，沒有把握，內心有矛盾解决不了，找党来帮助。共产党，並不是一羣个人的总和，而是有組織的集体。如果只看到它里面每一个具体的人，都不免有缺点，作为一个組織，它是完全可以信賴的。因为它是按無产階級建党原則建立起来的。一直到它自行消失为政党的一天，它永远是在进步当中，永不停滯。党有沒有缺点，有，甚至比大家所看到的还要多。但是所有这些缺点都不是产生於党的性質，都不是本性所固有的东西，相反，乃是产生於旧社会地主資产階級思想影响，是敌对階級的滲透物。这些缺点是將要消灭的現象，不是發展着的事物。比如說，社会上有右派，我們党内也有，但事情的过程是由馬列主义者战胜右派，而不是右派战胜馬列主义。資产階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無政府主义、絕對平均主义样样都有，也一定是一样一样地被馬列主义所克服。决定党的性質的是工人階級和馬列主义，是进步光荣正确的一面，而不是它的缺点的一面。今年的整風运动，就是在更大的規模上加强馬列主义，克服非馬列主义傾向。因此，必須反对右派分子言論：他們把共产党的缺点当成不可克服的东西，說整風無济於事，有党就有宗派主义，有党的領導就有官僚主义，以馬列主义做指导思想就必定有教条主义。要曉得，共产党本身公开承認缺点，要求羣众揭露批評，正表示党

的兴旺和力量的强固，而不是右派分子所說的停滯与腐化的表现，誰能坚信这一点，誰就能自觉地靠近党並接受党的領導。

除了正确地估量党在工作中缺点的性質外，还有一点是如何理解“独立思考”这句话。今春有不少青年就由於弄不清这四个字，一度对党疏远起来。有些右派分子，看了几本书，或者連書也沒有看，只看了几篇外国通訊社的报导，抓住几个現成口号，就大嚷大叫地要修正馬列主义。这些人是大錯特錯了。他們應該想一想：中国共产党三十多年的斗争，經過多少曲折，支付了多少代价，来解决結合中国实际运用馬列主义这个根本問題。这些人的輕浮狂妄的态度是很明显的，可是竟然有些幼稚的青年由於向往他們“独立思考”精神，因而相信或附和了他們。可見“独立思考”这句话，不能任它模糊傳播。應該說明，从馬列主义观点来看，思想准是离不开社会物質基础的，更明白地說，是离不开階級斗争的。一种政治思潮，准帶着当时階級斗争的烙印。純粹独立思想是不存在的。因此，馬列主义者总是公开承認自己的階級性党派性。“独立思考”也是有立場的，这立場就是工人階級立場。具体衡量立場，有毛主席所講过的六条标准。独立思考是要人們在党的领导下結合实际學習理論研究理論，避免解决革命和建設問題时出現經驗主义和教条主义。如果不是这样地理解並实行“独立思考”，就等於將自己的思想陣地讓給資產階級思想来佔領，自然而然地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成为資產階級的后备軍。

党的領導是通过党的整体貫徹在国家事業的各方面。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巩固的無产階級專政，才利於祖國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的进展，因此，在接受党的領導时，不能只接受中央而拒絕基層的領導，也不能以党是否熟悉某种事業作为接受或拒絕的条件。提出一定条件，討价还价，所謂拥护党是假的不是真的。某些右派分子硬說他們無意反党，可是事实上他們从各个角落各个方面来反党。拥护党成了空幌子，誰能相信他們呢？

如果一个人入了党，成为党的成員，那么党对他的要求就要更高一些，要按党章办事。个人必須無条件地服从組織。不同意

見可以保留，但決議必須服從，保持黨的行動一致。對黨的服從，不能有條件，不能自搞一套。置個人於黨之上或黨之外。

我們這個會開完了。這場鬥爭，是事業大發展中的一個前進步驟。經過鬥爭，大家更要學會從發展的观点看事物。要向前看，不要向後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那一個在前呢？社會主義在前，要看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那一個是前進的階級呢？是無產階級。我們的事業是前所未有的偉大事業，必須要依靠無產階級的領導。我們現在有許多的困難，許多的問題，也有許多的缺點，但是我們相信一切都不能妨害我們前進，因為我們有六億人民結成的戰鬥隊伍，領導這個隊伍的，有勇敢善戰、經過無數次驚濤駭浪的，掌握科學武器的，戰無不勝的黨；有有利於我們鬥爭的國際條件。有這一切，我們一定會勝利。隨着祖國的勝利，大家都是前途的，就是今天的右派分子，只要同樣向前看，努力改悔、改造，也還是有前途的。

以上意見只供各位同志參考，並希指正。

## 科学事業必須由共产党領導

田靜華、叶佩弦、王啓明、譚良平、賈壽泉、戚德余、許振嘉、林振金

右派分子何榮，在党整風的時候，向党所領導的科学事業，展開了猖狂的進攻，他的主要論點有下面幾個：

(I)他抹殺解放八年來科学研究工作的成績，他說：“要保護科学工作不受到各種摧殘，來保證科学工作所必須的空氣陽光。”他還說：“現在有了危機，沒有積極鑽研研究工作積極性的危機。”他說：“科学家自由程度很小，只能坐以待斃。”

(II)何榮在他的文章中說党之所以能領導科学，主要是由於党有一條法寶——羣眾路線，但何榮又在他文章中，從各方面說明了党不能走羣眾路線，他說：“党有本能的宗派主義”“党脫離基本羣眾科学家”“党不願聽羣眾的心裏話”“党与科学家背道而馳”“党不信任科学家”“党不給科学家以權力”“科学的自由程度太小”。這裡他好像說党你就不能在科学事業中走羣眾路線，那只有請出科学院。在小組會他說：“可以取消高等学校党委領導制，在科学院也不必有党的領導。”

(III)何榮丑化党的幹部，罵党的幹部不懂業務，罵党的幹部老一套，他說你們這些党的幹部都是有德無才，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學術空氣，也不願去體會什麼叫學術空氣，他說党的幹部很頑固、保守、不開明，他說你們對人對事，有其固有的政治家尺度，這一套對於科学工作，是對不上口徑的，最後，他還狂妄的說：“党的幹部，要悔過，洗心革面，對你們舊的一切去進行批判，不然羣眾會把你們請出去的。”

何榮用以上三個論點，來攻擊我們党，說我們党摧殘了科学，說我們党不會走羣眾路線，說我們党的幹部不能領導科学，就是說党領導科学是摧殘了科学，又不會走羣眾路線，又派來了不懂業務

的幹部，所以只有把黨請出科學院。

我們就打算就這三個問題來談談：

第一個問題我們要談：什麼是科學事業所必須的空氣陽光？解放以來，科學事業有沒有必須的空氣陽光。

第二個問題是黨領導科學事業的方法——羣眾路線，其中包括“黨信不信任科學家”，“黨給不給科學家權力”，“科學家的自由”即科學家的“權力、自由和信任”。

第三個問題：黨的幹部能否領導科學。

先談第一個問題，科學事業所必須的空氣和陽光是什麼？有四個：

(1)黨的領導以及黨和人民的支援和關懷。

(2)生產的發展推動了科學事業的發展。

(3)有馬列主義思想的指導。

(4)科學隊伍迅速的擴大。

這四點是科學事業所必須的空氣陽光。

我們分別來談一下這四點：(1)沒有黨的領導，就不能保證科學事業為勞動人民服務，為建設社會主義服務。在解放前中國的科學是反動政府的裝飾品，根本談不到為人民服務，反動政府為了打內戰，為了壓迫剝削人民，經費都用到戰爭上去了，對科學事業一點都不關心，絕大多數科學家要做研究工作，物質條件都是很困難的，經費、圖書、儀器、助手常常沒有，有些科學家的研究常常是在國外做出來的，科學家工作即使有了些成就，也是為反動派用於戰爭，或者為少數剝削者所享用，是很少有機會為勞動人民服務，只有在今天，在解放以後，科學事業才有了廣闊為人民服務的道路，科學家們的研究成果，可以用於為祖國的繁榮富強，用於為人民的幸福生活，這對於一個真誠的社會主義的科學家難道還有比這個更大的愉快嗎？這就是絕大多數科學家所須要的空氣陽光，當然何榮是怕見這種空氣陽光的，在解放以前人民生活很苦，吃不飽穿不暖，就沒有力量沒有心情來關心科學事業，但在解放以後，在工農業生產戰線上的工人農民都盡力的來幫助科學家們的研究工作，

而經費、圖書、儀器、幹部，不都是來自黨和人民的支援及關懷嗎？何榮也是怕見這種空氣陽光的。

(2)生產的發展，推動了科學事業的發展，首先解放後，工農業生產一發展，就給科學事業提出了許多新的要求，例如十二年規劃中的五十七項任務，就是從我們國家的國防需要和工農業生產建設的需要提出來的，這就給了科學家們有充分的机会來發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工農業生產的發展也給科學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物質條件，譬如做實驗就需要機器儀器，今天做實驗用的機器儀器有一部分已經自己能製造，這些都是在解放前所夢想不到的，這些空氣陽光右派分子們不要，右派分子要的是什麼樣的空氣陽光呢？

(3)有馬列主義思想的指導，一個真誠的社會主義的科學家所關心的，不僅是他的研究工作做出有成績來，而且他更關心的是他的研究工作在社會上起什麼作用，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呢？還是破壞生產，毀滅人類呢？為少數剝削者服務呢？還是為大多數勞動人民服務？對戰爭有利？還是對和平有利？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家們，絕大部分是沒有很好的机会來學習馬列主義，因此大多數的科學家是“為科學而科學”，“為金錢而科學”，他們辛苦研究出來的東西被用在戰爭上，像原子武器，在資本主義國家有不少的科學家，當他了解了他的研究用在毀滅人類的時候，感到“內疚”和痛苦，但一個社會主義的科學家，有充分的机会來學習馬列主義，懂得社會發展規律，自覺的為人民為社會建設服務，這難道不是我國絕大多數科學家們所須要的空氣和陽光嗎？但這也是右派分子們所害怕的，因為科學家們學了馬列主義就不會被右派分子所利用。

另外科學研究本身也是要受馬列主義思想的指導，社會科學有強烈的階級性，必須受到馬列主義思想指導，自然科學本身雖沒有階級性，但是我們研究科學是要有正確的方法和態度，那就是唯物主義實事求是的態度，那就是辯證的思想方法，不然在觀察研究和分析自然現象時，也往住會走彎路，社會主義的科學家是很幸福的，能有充分的机会學習馬列主義，自覺的去掌握馬列主義避免研究工作中的彎路。這難道不是科學研究所必須的空氣陽光嗎？



(4) 科学队伍的扩大,在解放以后絕大多数科学家們經過了思想改造及其它各項运动,特别是这次經過了反右派斗争,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絕大多数的科学家發揮了研究工作上的積極性,在解放以前由於反动政府对科学的摧殘,絕大多数科学家对研究工作是沒有積極性的,我还記得在学校里的导师王福山先生(現在是复旦大学物理系系主任)对我们学生說:“学物理是最倒霉的。”其实那时不仅学物理倒霉,学什么不都是倒霉?而現在絕大多数科学家對於科学研究的積極性提高了,业务水平也提高了,高等学校畢業生也大大地增加了,物理系过去一班人数只有二、三个到十几个,現在有一百人到几百人,科学队伍的扩大是很快的,这也就是科学工作必須的空气陽光。

在解放以后,科学事業有着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充分的空气陽光,解放八年科学事業發展得很快,从規模上看,从水平上看,都發展得很快,我們隨便举几个例子來說:拿我們物理这門学科來說,我們应用物理所所長施汝为先生說,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时候实际上沒有做多少研究工作,只有个别的科学家做了些研究工作,也沒有什么全面的長远的計劃,一个人考虑一下,根本談不到理論联系实际,为發展生产服务,而現在我們的科学研究和經濟建設国防建設有着比較密切的关系,錢临照先生說,他办了很長时期的物理学报,解放前研究工作最多的时候,是一年出四期,三个月出一次,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时候就只出一期到二期,而現在是一年出六期,並且質量是大大提高了,在解放以前稿子很缺,来了稿子后就登,現在稿子很多,就每篇論文都要經過审查,从所做出来的研究工作和題目来看是和过去大不相同了,过去全国只有一种物理学报,而現在还有金屬物理,力学,地球物理及各种通报。

这次日本物理代表团到中国来,很羨慕中国,對於中国發展的迅速感到很惊訝,他們說中国在原子物理的實驗方面很快会赶上日本,在原子核物理中聚焦的技术就比他們聚得要好,已經赶上了世界水平,比上了英国最好的聚焦。他們說日本在补缺門,在培养

幹部上，就沒有我們那麼有辦法，考慮得那麼週到，當他們在參觀我們應用物理研究所的時候，他們很羨慕中國有那樣一個包括許多部門的物理研究所，他們說他們已經夢想了好多年了。他們是今年才在開始籌備。他們對於我們研究所中有那麼大的金工廠感到驚訝。

中國科學事業迅速的發展，是使其他國家的人民都感到驚訝和羨慕，這樣的發展，只有在解放以後，有了社會主義制度充分的空氣和陽光，才蓬勃發展起來的，而何榮却無恥的抹殺事實說什麼要保護科學工作不受到各種摧殘，要保證科學工作必須的空氣陽光，說有危機，說坐以待斃，這無非是何榮為了怕見我們社會主義的空氣陽光，而向黨所進行的瘋狂進攻。

第二個問題，我們要談一談黨領導科學事業的方法——羣眾路線，駁斥何榮所認為黨在科學事業中不會走羣眾路線的謬論。

什麼是黨的工作中的羣眾路線，根據鄧小平同志在八大報告中所說有兩方面的意義。第一點認為人民羣眾必須自己解放自己，黨的領導作用就是正確地為人民指出鬥爭方向。第二點是“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的領導方法。所以(1)在科學事業中黨必須給科學家們指出鬥爭的方向，動員科學家們自覺地積極地為社會主義建設而鬥爭。因為科學家的無產階級的覺悟愈提高，積極性愈發揚，那麼科學事業也就愈發展，所以黨為了啓發和動員科學家們對社會主義事業、共產主義事業的覺悟，黨就需要對科學家們進行政治思想工作，需要開些會議，在當右派分子向黨進行瘋狂進攻和引導科學家走向錯誤道路的時候，為了保護科學家，為了擊退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必然也需要用些時間去和右派分子論戰，這正是黨信任科學家，黨走了羣眾路線，但何榮却想用這點來說明黨不走羣眾路線，他說：“科學家要作科學工作，需要有時，但黨的幹部却認為發展科學需要開會，表報，使科學家忙些！更忙些！”原來何榮所指的徹底的羣眾路線，就是要黨不給羣眾指出鬥爭方向，不要黨領導科學事業，不要黨對科學家進行政治思想工作。

(2)黨在科學事業的領導上也是實行了“從羣眾中來，到羣眾

中去”的領導方法的，党對於科學事業的領導是“從科學家中來，到科學家中去”例如十二年遠景規劃，就是黨集中了科學家們的智慧制訂出來的，制訂十二年遠景規劃是經過科學家們反復的討論，分析和比較，制訂出來，黨領導了十二年遠景規劃的制訂，但黨並沒有包辦，也不可能包辦，黨經常虛心的听取科學家們的意見和建議，因為我們認為黨集中了羣眾的智慧和經驗，只能使黨領導得更正確，使黨的領導更加鞏固，何榮說：“黨脫離了基本羣眾——科學家，黨的意見和科學家背道而馳。”這完全是胡說，黨是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意見是背道而馳，因為黨和絕大多數科學家都要走社會主義，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却要走資本主義。

何榮說我們黨不信任科學家，是企圖說明黨不會走羣眾路線。

科學家是知識分子中的一部分，科學家在對待黨對待社會主義的政治態度上是不同的，絕大多數的科學家是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然而也確實有一些像錢偉長、曾昭掄之流的科學家，他們企圖篡奪黨的領導權。對於這些右派分子是根本談不上所謂信任的問題，信任了他們，就上當了。過去不是黨不信任他們，而是他們利用了黨的信任，耍着兩面手法向黨進攻，難道是黨不信任錢偉長，不信任曾昭掄呢？還是這些右派分子為了挑撥黨與科學家的關係，在大喊“黨不信任科學家”呢！

黨對於右派分子是不能信任的，黨對於絕大多數全心全意為社會主義辛勤勞動的科學家是信任的，許多科學家參加了我們黨的隊伍，這不正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嗎？

黨愛科學家以德，黨對科學家的信任，表現在黨對於科學家的團結教育改造政策，黨領導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運動。黨領導知識分子反右派的鬥爭。黨引導科學家們走社會主義道路，這都表現了黨對科學家的信任，黨相信絕大多數的科學家，即使過去出身在剝削階級，受資產階級教育，但是能通過思想改造而成為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黨相信絕大多數科學家能全心全意為社會主義服務，而只有何榮卻主張科學家即使貪污也沒有關係，這才真的害

了科学家，污蔑了科学家，这那里是什么信任科学家。另一个右派分子徐芻污蔑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是利用、限制、拉攏、收买，党从不这样对知识分子的，而右派分子何肇倒是主張用这个政策。

何肇說党只給科学家小范围内的权力，說知识分子的自由度太小，从这点他企圖說明党不走羣众路綫，使科学家有能力使不出来，科学事業只能坐以待斃。

党給不給科学家自由和权力呢？科学家又需要什么样的自由和权力呢？一个真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科学家，他要求的首先是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的自由和权力，是把自己的科学成果能服务於祖国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生活的自由和权力。是为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給的任务所必須的职权。對於这样的自由和权力，党是充分的給予了科学家的。难道不是解放才給了科学家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服务充分的自由和权力嗎？十二年远景规划，不正是党領導了科学家們集体制訂出来的嗎？十二年远景规划是国家的一件大事情，党如果不信任科学家，怎么能將这样重大的国家大事交給科学家們去討論制訂呢？在科学机构中，很多科学家們担任了領導职务，像我們所里，所長、業務組長，都是科学家，有关所里的一切重大事情，常常是要在所务會議上决定的，而所务會議的成員大部分是科学家，在業務組里，有关組里的問題也都是由業務組長和科学家們商量决定的，誰說科学家沒有权呢？在我們所里，培养幹部、提級、升級、評獎、幹部調动、出国留学，科学家权力是很大的，很多事情是科学家提了意見，科学家們在所务會議上討論决定的，党是尊重科学家的意見的，党从来沒有包办过一切工作，党也从来不干涉純学术性的問題，党是通过党的方針、政策，通过政治思想工作通过百家爭鳴的方針来进行領導。当然一个真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科学家，他也必然会自觉的接受党的領導，因为他認識到沒有党的領導，就会使科学工作迷失了方向，右派分子們像何肇之流，是不要党的領導的，他說：“学校里的党委会可以取消，科学院的党組也可以不要”。他企圖煽动科学家向党要三权，要人事权，要肃反領導权，还要政治思想領導权，他还企圖煽动科

学家要“蔡元培”式的绝对的权力。

何肇一方面喊着不要开会，說科学家做研究工作需要有時間，而另一方面却又說科学家要这个权，那个权。科学家又要管人事，又要领导肃反，又要管政治思想领导，換一句話說党所领导，党所召开的會議，他叫科学家都不要参加，他企圖反对党的工作，而另一方面他又表面上打着为科学家向党要权的旗帜，實質上在挑撥党和科学家的关系，企圖篡夺党的领导权。我們要責問何肇，要人事权，要领导肃反权，要政治思想领导权，居心何在？科学家何尝又要过这些权力呢？只有曾昭掄、錢偉長要过这些权力，何肇还打着替科学家向党要“蔡元培”式绝对的权力的旗帜，說“解放前科学家只要有能力就可以有所作为，要人要仪器都有办法，可以按自己意圖办事可以搞出点名堂来，如蔡元培办北大，因为他有名望、有办法，好教授都請得来，真是‘百家爭鳴，百花齐放’的学术繁荣时代，现在的科学家那有这样大的权力，幹部要不来（統一分配），仪器买不来（外匯太紧），現在一个科学家是起不了什么作用，是無所作为的”。在解放以前那里是要人要仪器都有办法，这是胡說，在解放以前的科学家並不是沒有能力的，他們也抱着热情和希望为祖国做出一番貢獻，但是不能实现，在解放后虽然我們的国家由於旧底子穷，优秀的科学幹部还不太多，外匯还比較紧，不能要什么就有什么，但是我們党，政府和人民是竭尽可能来满足科学的要求，何肇所謂的“蔡元培”式的绝对的权力，实际上是沒有的，解放前那里有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物質条件，可以按自己意圖办事的条件，那时科学是可憐得很。

何肇所指的“蔡元培”式的绝对的权力，在實質上就是党什么都不能管，一个科学家个人有着绝对的权力，要搞什么就搞什么，这那里是一个真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科学家所要的权，这是資产階級右派政治野心家們所要的权，何肇特別欣賞他所說的蔡元培时代的百家爭鳴百花齐放，說那时是学术繁荣时代，似乎今天大大不如从前，但是我們不能忘記李大釗同志就是牺牲在何肇所歌頌的那个时代，百家爭鳴只有兩家，一家是馬列主义，一家是非馬列

主义,何肇歌頌的是只准非馬列主义一切反动的沒落的毒草开放的时代,当时香花是被摧殘的,当时有多少宣傳馬列主义的战士牺牲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那里有人民的自由?人民的权力?只有帝国主义,反动派的自由和权力。

何肇这样歌頌沒有人民的自由和权力的时代,那么他所要的权利和自由是什么?何肇,你为什么向反动派去要自由和权力呢?而在今天人民当家作主的时候,却来向人民向党要权力要自由,当然,人民是决不会給你造反的自由和权力的。

今天的时代,是科学家施展自己的才能去为人民服务,有着最大的权利和自由的时代,今天的科学家是不必發愁有了才無处用,而是愁自己赶不上国家需要,誰能說今天科学家起不了作用,只能坐以待斃呢?这只能是別有用心的右派分子的污蔑,是为了挑撥关系,是为了否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是为了証明党不能領導科学。

第三个問題,党的幹部能否領導科学。

何肇說我們党的幹部有德無才,說党的幹部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学术空气,也不願意去体会什么叫做学术空气。何肇还說我們的幹部很頑固对人对事有其固有的政治家的尺度,是对不上科学工作的口径的,何肇企圖从这里來說明我們党的幹部不能領導科学,因此最后他瘋狂的叫囂“党的幹部要悔悔过洗心革面,要对旧的一切进行批判,不然羣众是会把你們請出去的”。

总的說何肇說我們党的幹部的罪名(一)不懂業務,不能領導科学事業;(二)是說我們党的幹部的老一套,在科学上行不通吃不开。我們就来談談这两个問題:

(一)党的幹部是否不懂業務,不能領導科学事業。

(1)在党的政治路綫决定以后,幹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政治路綫需要大批的忠实於革命事業的骨幹去执行,否則政治路綫就会落空,在科学院也是一样,党制訂了党在科学事業中的方針政策以后,就要有忠实於党的政治路綫的坚决貫徹党的政治路綫的幹部来实行,党的幹部能不能領導科学,这是一个重要的問題,我們首先要看在科学事業的領導上什么是內行,我們所要求領導

幹部是怎樣的一種內行，現代科學很發達，分工很細，當然不可能有一個精通各門科學的幹部來領導科學，關於這一點很多人都知道，我不準備詳細多談，我們對於一個領導幹部的要求，主要是要求他是能貫徹黨對科學事業的領導，是走社會主義科學的“內行”這樣的內行所需要具備的條件是什麼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以前我們首先要談談黨是怎樣領導科學的，黨領導科學首先是提出發展科學的方針、政策，擬定國家發展科學計劃和各種有關科學的制度。

(2) 團結教育組織改造科學家，幫助科學家學習馬列主義，組織和動員科學家自覺的積極的為社會主義服務，使科學家能夠成為工人階級的科學家。

(3) 動員和組織各方面的力量去支援科學工作，保證科學工作順利的進行，推動各个方面來充分利用科學的成果。

要貫徹以上三點黨對科學事業的領導，對於一個領導幹部的要求是有無產階級的立場，馬列主義的政治思想水平，因為黨的對於科學事業的方針、政策、計劃是首先通過領導幹部來貫徹，而要幫助科學家學習馬列主義，幫助大多數的科學家改造成為一個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這些都需要領導幹部具有很高的政治思想水平，具有領導方面豐富的經驗。

在這些方面黨的幹部是內行；黨的幹部一般來說是对黨對人民無限忠誠，具有豐富的鬥爭經驗，善於理解和貫徹黨的政治路線。

而右派分子在這方面是十足的外行，像右派分子何榮他所提出的科學路線是和黨的科學路線根本相反，何榮主張回到蔡元培時代去，何榮主張科學工作要為個人名譽、地位服務，主張要拿個人的學位、金錢、名譽、自由競爭來鼓勵青年的積極性，何榮主張不要計劃說計劃是形式主義，何榮說看不到十二年遠景規劃的指導作用，何榮主張知識分子不要思想改造，說什麼政治在研究工作，主張送留學生不問德，說德才兼備的政策是自殺策政，何榮這些所主張的道路是引導我們走到殖民地的道路去的，是很危險的，像曾昭掄、錢偉長之流他們的反社會主義科學路線不也是引導我們走殖民地道路去嗎？讓這些右派分子來擔任領導職位那是很危

險的，是與我們黨的科學路線根本背道而馳。

科學事業的領導幹部，所具備的條件應該是毛主席所提出的“是以能否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和羣眾有密切聯繫，有獨立工作能力，積極肯幹，不謀私利為標準”黨的幹部是否適合這些條件，我們黨的老的幹部，在貫徹黨的政治路線上起着決定性的作用，他們是有德有才，是我們黨和人民的一筆巨大的財富，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骨幹，這也就是右派分子所仇視和不安的，也就是右派分子極力加以攻擊的原因。

(二)黨的幹部的老一套看法是否在科學事業中行不通，吃不開。

黨經常號召黨的幹部在新的崗位上要不斷的努力學習，不斷的努力提高，在擔任領導科學工作的时候要努力虛心學習業務知識和科學知識，要努力掌握科學工作的特點，但何榮所提出的問題却並不是這個問題，並不是黨的幹部在領導科學的崗位上沒有努力學習的問題，何榮所提出的所謂黨的幹部的固有的老一套，是指黨的工作者對人對事的看法具有固有的一套政治家尺度的問題，所謂政治家尺度，翻譯一下也就是鮮明的無產階級立場，和馬列主義的觀點，這也就是右派分子所最仇視最害怕的，在分辨什麼是無產階級觀點，什麼是資產階級觀點，在分辨誰是敵人，誰是朋友，在分辨什麼是社會主義道路，什麼是資本主義道路上這個固有的政治家的尺度，就像一面照妖鏡，將右派分子的兇惡面目完全暴露出來了，能識破右派分子一切陰謀詭計，在發展科學事業上有兩條根本不同的路線和方面，一條是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科學路線，一條是資本主義的科學路線，這固有的政治家的尺度對於辨別這兩條不同的科學路線是完全對得上口徑的，是完全用得上的，右派分子何榮就為了怕識破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勾當，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科學路線，他們大肆攻擊我們馬列主義的武器，說黨的幹部很頑固，有固有的政治家的尺度，企圖要我們放下馬列主義武器，脫離無產階級立場，但是我們是永遠不會放下馬列主義武器，永遠也不會脫離無產階級的立場，這老一套是永遠不會也不能改變的，變了



社会主义的科学路线就会成为资本主义科学路线，变了，社会就会倒退，科学事业也会倒退，何肇丑化我们党的干部，目的就是在於取消党的领导，取消贯彻党的社会主义科学路线的骨干力量，因为他也知道，没有忠实於党的路线的干部，党的政治路线就不能实行，也就是从根本上取消了党的领导，党的政治领导。何肇放肆的叫我们党的干部要悔过，要洗心革面，不然群众会把你们请出去的，我们要把这句话说还给何肇自己，你假如不悔过，不洗心革面，我们是要把你请出去的。

除了以上二点我们本来还打算谈一谈何肇竭力反对党的社会主义路线问题，现在不打算多谈了。只简单的谈一下，何肇反对我们社会主义科学路线中的几个主要的特征：他反对领导，主张取消党委会、党组的领导；他反对科学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主张自由竞争，主张为个人名誉、学位、金钱服务；他反对党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工作，主张知识分子不需要思想改造；他反对科学事业要有计划、有组织，他主张科学家没有计划，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说计划是形式主义，规划看不到指导作用；何肇就从以上几个根本方面否定了我们党的社会主义科学方向，而要把我们引向资本主义，我们是决不能允许的。

何肇在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上，他是企图全面的、系统的否认和反对党的领导，他企图从科学事业社会主义方向上，从党的干部上，从党的领导方法——群众路线上，从党八年来对科学事业领导的成績上来攻击党和反对党的领导，根本否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要对何肇这样的猖狂进攻进行坚决的回击，我们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是不能动摇的，我们党的干部能领导科学，党有群众——科学家们和青年（右派分子除外），并且党用群众路线在科学事业上正确的领导了群众前进，八年来科学事业辉煌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右派分子何肇在这些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完全破产。

## 何肇是怎样成为右派分子的？

章 琮、孟憲振、許振嘉、莊蔚華、徐秀英

何肇过去向来是以“积极分子”自居的；同时也确实有不少人曾经把他看成是一个“积极分子”。因此，有必要着重地讲一讲，何肇是不是真的积极分子，他是怎样成为今天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右派分子的。

### 反党的根源何在？

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他的历史和阶级根源的。何肇的父亲是教授，母亲过去则是个地主。何肇自小在家庭里，就培养了以个人为中心的狂妄和专横的态度。由于他常常跟着爸爸到国民党的一些官僚和士绅的家里去，他对于旧社会里面的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任所欲为的统治者是非常欣赏和羡慕的。何肇自己也承认，在旧社会里，他是可以有許多特权的。

从中学开始，何肇对资产阶级的一套所谓“处世哲学”又苦心钻研了一番。那时他的个人主义就已经发展到了十分惊人的地步。还是用何肇自己用来描述他当时的个人主义的话来讲一讲。他说：“我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六亲不认的地步了。”他又说：“由于个人主义，我没有正义感和爱国心，因而对美国一点坏的感觉也没有。”他还说：“凡是不符合我的思想和利益的，就恨。”很明显，他早在解放以前就是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他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可以恨一切，可以六亲不认，也可以不要祖国。

### 伪装积极分子、拒绝思想改造

解放以后，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不愿接受改造。

在历次运动中，他是一貫心怀鬼胎，对运动不满，而用伪装积极的两面派手法混过关去的。在三反运动中，实际上他对我们的做法是不同意的，他认为没有老虎，对看老虎觉得“很残忍”；可是在表面上却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打虎队的队员。对于思改，他则与蒋介石集团对我们的看法一样，认为思改是“洗脑筋”，根本不是自觉自愿的。

反胡风学习，开始他就很抵触。他为什么会反胡风这样反感和不满呢？原来他自己就有许多地方和胡风、路翎等的思想是一样的。何肇自己就曾说过，他认为胡风是个大勇者。他和胡风等一样，觉得解放后的文艺作品是千篇一律、简单枯燥、无血无肉的；同时他也认为这是机械观点和教条公式主义在作怪，是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结果。对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和“到处是生活”等等的说法，他非常欣赏。由此可见，何肇的思想是很反动的。可是在当时他并没有把它暴露出来，进行一次彻底地清算；反而把这些反动思想紧紧地包起来，假惺惺地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积极分子”的模样。在当时的小组会上，他还夸夸其谈地讲一些批判胡风的话，假如光从他说的话来看，到真有点像一个左派，可是现在一想起他当时那付神气的时候，简直令人痛恨。为什么呢？原来被何肇嘴里滔滔不绝所批判的东西正是他自己非常欣赏而死抱住不肯放的东西。在运动中，这种阴险的两面派手法正是他常常用来欺騙组织和同志的。

肃反斗争中，他仍然是阳奉阴违的。骨子里，他是觉得肃反根本不必要的，按他的说法是：“肃反时全所忙了半年，结果一无所获”。可是表面上他又勉强着自己参加了斗争。

### 仇视党、仇视新社会

何肇对党的看法是怎样呢？何肇把解放中国人民、并给人民带来千万幸福的共产党认为是“严密的和专横的统治者”。他说：“党是通过组织、政策和运动把群众统治起来的”；“党的群众路线则是用压力”。他对党的干部也是仇视的。他有一个亲戚是老干

部，那个老幹部到苏联去治病，他甚至就希望他在苏联死掉。由此可見，何榮今天要把党請出去，确实也不是件偶然的事。事实上，何榮不要党的領導早在整風以前就向許多同志說过。譬如，很早以前他就曾对一个同志說：“党不懂科学，根本不能領導”；可是表面上他又要假積極一番。他曾露骨地說：“我自己不暴露思想，想混，但又覺得对統治者要乖乖的，要接近党，取得党的信任。因此，我不得不假積極一番，提提意見，彙報一下情况”等。請注意，他不是說得很清楚么，对統治者要乖乖的，不得不假積極一番。他又說：“積極分子有兩类：一类是虛偽的、假的、向党献殷勤的，我自己就是屬这类的；另一类是头腦簡單、跟着党喊的人”。这不是他自己招承是一个虛偽的、假的、向党献殷勤的積極分子么？何榮还說过，“为了追求名誉地位，我又得表現好，因此不得不很不自然地与同志們相处”。这不是又清楚地告訴我們，原来何榮之所以要假裝表現得好，假裝和同志們相处得好，不过是为了追求名誉和地位而用来欺騙別人的一个手段么。

何榮对新社会也是格格不入的。他老早就好几次向別人說：“对新社会沒有感情”。他又說：“对新社会的各种事情都反感，陽奉陰違，愈來愈严重”。此外，在新社会里，人民的生活一天一天的改善，人們飲水思源，常常会自然地流露出来感謝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感情。可是何榮与大家的感情又是不一样的。他在1955年冬天給一个同志的信中說：“人們在調薪晉級中，首先談到共产党領導大家，生活逐漸有所改善，並且要感謝党和毛主席。我倒不以為人們是这样想的，人們對於調薪晉級的事，首先倒是想到如何給爱人添新衣，給小孩买玩具等問題”。他还說过：“民委会傳來舞蹈的音乐声音，在我听起来，就像一个有着低沉情緒的人的脚步声”。何榮对新社会中的一切就是那样感到不适应和不協調的。

### 搞研究是为了名位、提倡个人主义的自由竞争

他在經常的研究工作当中是反对訂計劃的，他好多次說过：“做研究工作根本不能訂計劃，訂了也是形式”。同时他也反对与

別人合作，否則他就認為不能發揮個人的積極性。有時他甚至這樣露骨地說：“如果要我和別人一起工作，我干脆就不幹了”。在研究工作中，他要求些什麼呢？用他自己的話說，他要求的是“在科學上面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以及用個人的名譽地位來鼓勵個人的上進心和積極性”。

事情不是已經很清楚了嗎，他追求的正是一套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科學路線。其實，這點也是很自然的，因為這正是何榮堅持資產階級的反動立場在科學上的反映。

何榮的資產階級立場反映在他的生活作風上也是很嚴重的。何榮嚴重的自由散漫和無組織無紀律的現象，早在所里就聞名了。同時他也是一直在追求資產階級的生活的。一貫地作風惡劣，道德敗壞，侮辱女性。

### 在兩條道路面前

從何榮的一貫表現來看，他今天所以會墮落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右派分子並不是偶然的。但是過去他為什麼沒有被我們覺察到呢？為什麼他還會在相當長的時期之內冒充“積極分子”呢？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首先，是由於何榮在過去用了非常隱蔽的兩面派手法來欺騙組織和同志。其次，是由於我們的一些同志過去在政治嗅覺上還不夠靈敏，沒有能及時發現他的問題。第三，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在過去的歷次運動中，如土改、抗美援朝、三反、思改……等以及社會上的社會主義改革所涉及到的問題，還沒有與何榮的根本思想發生極尖銳的矛盾。譬如，前面已經講過，何榮是死命追求資產階級的一切的。像這些東西和我們過去所進行的一系列社會主義改造以及歷次運動，雖然也是有矛盾的，可是這種矛盾還沒有達到非常尖銳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右派分子就有可能用兩面派的手法，把他們的反黨貨色隱蔽起來。但是到了今天這場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你死我活的鬥爭的時候，對於具有頑固資產階級立場的人，就

只有兩條路走：一條是徹底改造自己走社會主義的路；另一條則是堅持反動立場，反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何肇當然是走了第二條道路。

### 脫光“積極分子”外衣，猖狂向党進攻

過去黨曾經針對他的缺點，進行過一些教育，並且也給了他改造自己和努力為人民工作的各種機會，但是由於在他的靈魂深處是嚮往着資產階級的一切的，並且他也不願意放棄他的反動立場，這就必然使得他對黨的教育無法接受。因此，到了這次整風期間，他就沖昏了頭腦，錯誤的估計了形勢，以為現在時機成熟了。何肇說過：“由於自己有那么多的不滿情緒和反黨的意見。當人民內部矛盾提出來以後，覺得原來不合法的，現在合法了；從前不能發表的，現在可以發表了”。就在這種情況下何肇開始了向黨的進攻，他向党進攻的目的是很明顯的，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希望大家提出與他一樣不滿的想法，來討論，以此來改造黨”，也就是說要把黨變成資產階級的政黨。何肇在向黨進攻當中，是非常猖狂的。他在寫過兩篇反黨的文章以後，他還向一個負責黑板報的同志說“如果你要稿子，我每天可以供給你一篇”。這不就是說，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貨色是取之不盡的么。也正由於何肇的過於得意忘形，他把過去一向用來掩護自己的“積極分子”的外衣也全部脫光了。這樣一來，何肇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原形便赤裸裸地暴露在羣眾的面前了。

現在何肇的謬論在我們全所的說理鬥爭大會上已經破產了。但是，他一直是在抵抗的，直到8月15日在我們所里的一次小組會上還進行了全盤的反攻，他說，運動把他整了，“我的檢查是勉強的，情緒是對抗的”。直到今天的發言，何肇的態度還是很惡劣的。他居然還說：“我還沒有想好我的問題”，難道真是沒有時間給他想嗎？他還說：“我還沒有發展到根本上反黨反社會主義”。這就是說：他到今天還是不認識他的錯誤的。最令人氣憤的是，上午他好像還哭了一下，他這一哭馬上就使人想起他那可惡的兩面派來。

我們要問何榮，既然你根本不承認錯誤，那麼為什麼要哭呢？是不是又覺得把你整冤了？事實很清楚，何榮的反黨文章及大量的右派言論現在都在这里，難道還能說把他整冤了嗎？

從何榮的例子說明，讓他這樣一個右派分子轉變他的立場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這就需要我們把反右派鬥爭一直堅持下去。

### 必須永遠團結在黨的周圍

從何榮的例子裏，確實給了我們不少的教訓，何榮從反面教育了我們。他的例子生動地說明了，堅持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立場的人，最後必然要墮落成為一個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這種反動思想一天不得到改造，一天便要興風作浪，危害人民，它是包不住的，遲早會暴露出來。

從何榮的問題裏對我們如何正確認識德與才，正確處理政治與業務的關係也是一個教訓。它告訴我們，一個人不問政治是不可能的。何榮就是以只管業務不管政治的假面目出現的，但結果怎樣呢？他並不是不要政治，他只是不要無產階級的政治，他要的是資產階級的政治。政治就是階級鬥爭，而反映在思想戰線上，這一場鬥爭也同樣地存在着。人不可能沒有思想，因而，不管你主觀上願意不願意，却總是自然而然地要參與這場鬥爭，何榮的例子就是一個教訓！

黨教育我們要有無產階級的德，要永遠忠實於無產階級的事業；我們要有才，要學會建設和捍衛社會主義的本領。實際上，右派分子不能損傷我們那怕是一根汗毛，他們反而使我們更加懂得了必須永遠團結在黨的周圍，為社會主義而鬥爭這樣一條真理。

## 撕開項志遴的“理論家”外衣看看他 賣的是什麼貨色

陸祖蔭

右派分子項志遴出身在小公務員的家庭。他的五個哥哥、姊

姊很早都参加了革命，而他自己虽在 1950 年入团，但是却一向具有很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政治观点；並且一貫公开抗拒思想改造。在肃反初期，曾發表同情胡風的謬論說：“胡風不是反革命”，“人民日报小題大做”等等，因而受过批判。曾經兩次去苏联短期学习。

項志遴在物理所的大鳴大放时期，和另一右派分子張家琨結成联盟，进行反党的陰謀活动，气焰十分囂張，手段也極陰險。在反右派初期，物理所曾經有一整个团支部公开叛变，投降了资产阶级右派，就是以項志遴为首的几个右派分子策动的結果。

項志遴不但进行了許多反党活动，並且是物理所的右派中的“理論家”、“学者”。他曾經宣布要写一本哲学書。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論确也是全面而系統的，几乎涉及我們政治生活的所有方面；而且每一个問題都有一套的“理論根据”。

下面我就来揭露他在五个主要方面的反动言行。

### 散佈流言蜚語，大肆誣蔑苏联

項志遴在苏联回国前就曾說：“你們宣傳苏联的优点，我就要講苏联的缺点”。果然，去年 12 月，項志遴从苏联回来，就在羣众中散布反苏言論。他誣蔑苏联“政治不民主，新聞不自由，官僚主义多”。在經濟上“苏联农业接近破产，革命后还未达到革命前的水平。农民不起来反抗，是由於秘密警察鎮压”。工人的生活呢？“在苏联沒有学問的人，不管做多少工作，待遇总是很低的”。苏联的科学“受到形式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束縛”。他去苏联学习的是当时国际水平的技术，但他却口口声声說：“苏联的科学技术还不如美国”。他說苏联人的道德不好，青年乱搞男女关系，工作不积极，小偷多。他誣蔑苏联人的国际主义精神，說“中苏貿易不公平”；“在苏联学习时苏联人关心我們还不如我們关心朝鮮人”，“我在苏联什么也沒有学到”。他就是这样从政治、經濟、科学技术、人民道德面貌、国际主义精神，对苏联进行了全面的攻击。更惡毒的是他大肆宣傳“苏联人政治热情下降”，“共产主义目标，已不如以前那



样吸引人了”。为什么呢？他說：“这是轉入和平建設的必然結果”。按他說來，这原来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他說所以“共产主义还是很遙远的事，社会主义發展規律还值得研究”。言語之中表示出來，社会主义真是前途茫茫。

当时也有些同志已經覺察到他極端反苏的态度，錢三强同志就曾經批評过他。事后，他竟很不滿意地說：“錢所長連这些事都要管，其实我說的还不到十分之一呢”。我們要問項志遴，那十分之九是什么？你造謠誣蔑苏联，反对苏联，挑撥中苏关系，难道这些事情我們不应当管嗎？

### 項張联盟对肃反放出第一支毒箭

整風一开始，項張联盟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对肃反問題开火。但是，当时在各座談会上提出的意見多半是工資和培养等問題。項志遴認為时机未到，按兵不动。一直等到开始有人攻击肃反了，他們以为时机到了，才發起进攻。如果說，在整風以前，他們还是偷偷摸摸的四出慰問所內外肃反对象的話，那末，这个时候，他們就公开站出来反对肃反了。項志遴說：我們的肃反是从头錯到尾沒有一点对。方針政策錯了，不应当机械規定百分数；具体做法錯了，不应当發動羣众。肃反当中是“誰不同意就提去斗”，侵犯人权，一塌糊塗；結果 80% 斗錯了，胡風也被冤枉了，物理所更是如此。严重的后果是許多人不敢說話了；教条主义大大增長。他很气憤的說：这是历次运动最坏的一次。他說这个錯誤是有原因的：党中央犯了教条主义，錯誤地搬了斯大林的理論来作为指导思想，將实际上是日益和緩的階級斗争錯誤地估計成尖銳化了，因此肃反扩大化了。項志遴要求用整風来“抵消”肃反的后果。他就是这样从头到尾全盤否定我們的肃反运动，企圖利用这次整風翻案。實質上，項志遴就是反革命分子的代言人。

### 伪装青年的代言人，公开反对政治思想教育

項志遴从苏联回来后，極力宣傳“業務就是政治”。的确当时

迷惑了一些人。他看到青年中还有他的市場，本来他因为超齡准备退团，团也不退了，决心要在青年当中“起点作用”。

在大鳴大放期間，他以青年的代言人自居，大声疾呼来反对党的政治工作。他說：“为什么要从組織关系上来看人呢”，“对青年压力很大”，“难道青年的政治道路只有入党嗎？”他曾經更露骨地公开抗拒思想改造說：“我既然是知識分子，就不可能和工农一样，也不可能培养成他們那样的思想感情！”他說：事实上，就是由於党的政治教育的結果，青年人“一个个都变得四四方方‘循規蹈矩’謹小慎微的人”，“心灵老化了”。他說：“其实社会主义的人，自然就会有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識，根本不要进行思想改造”，並且說：这是有理論根据的：是存在决定意識而来的；另外，还有一条理論，根据列宁說“科学家要通过自己的工作来逐步接受共产主义的”。那末，“工作好就是思想好，就是进步”，不必还要什么政治教育，所以，他叫囂以后根本不要政治教育工作。他甚至还污蔑党“不能領導業務，思想工作也是白廢”。

### 積極支持所內右派分子的反动綱領

項張联盟更猖狂的进攻，还是在物理所內的右派分子鮑誠光、刘治平貼出了臭名远揚的反动綱領“一切为了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之后。他們看到刘治平被批評了，於是，就在全所的鳴放大会上公开支持刘治平的反动言論，为他們打气。

在民主自由的問題上，項志透有一套極其完整的“理論”。“理論”的第一部分是，一个国家开始时，要求权力集中，对異己就排斥，所以斯大林的專制独裁，就有这种必然性在內。各国共产党都有类似的情况，無产階級專政、民主集中制就会产生这类問題。这就开宗明义地說明無产階級專政就是專制独裁，就是不民主。而其根源，是党的权力过分集中。第二部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够民主，是制度問題，有其必然性和普遍性”。中国也不例外，因为中国也是“党政不分”，“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他在为儲安平辯护时就說过：“党天下的提法没有什么錯，过去党不是把政治、經

济、軍事权力集中於一身嗎”？因此他嘆息着：“比起波、匈来，中国是落后了，民主問題还未提上日程”，他讚美“波、匈事件”是一条新道路。

那末，中国究竟如何的缺乏民主呢？項志遴的新道路究竟是什么样的道路？請大家来看看：

一、“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到今天还很严重，不少人不敢講話”。因此，他希望“人人都敢講話”。

二、大家都“从組織关系看人”，根据档案材料看人，换言之，从政治上来看人，“便造成青年很大压力”。因此，他反对人事档案制度，他呼吁“人与人之间要完全平等”。

三、他要求“新聞自由”，“報紙雜誌独立”。而今天的“新聞不自由，是按照自己願望改造事实。例如对資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选些非常荒謬的消息，如出卖月球土地等，不能說明資本主义国家真相”。而对“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則只选好的，不說坏的”。照他看来，为什么我們的新聞如此“不客观”？是个“立場問題”。他說“無产階級立場也会妨碍到客观了解問題，作为一个科学家應該有更客观的立場”。

四、他“希望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自由”。所以，例如政治学习也要布置，是不自由。应当根本取消政治課。

五、他認為在集中領導下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他說：“羣众路綫不是最好的方法，我們的羣众运动也都是“不民主的”。因为“有領導的运动是勉强的，不自然的，像思改、肃反都是人为的”。

六、在工業方面：“企業要民主管理，自由竞争”。

七、在農業方面：“农村强迫命令更多”，“民主更少”，“農業合作化是强迫命令来的，應該慢慢搞”。

八、在文教方面：“主張学校、科学院取消党委制应当仔細討論”。

九、党团内部是由於过分集权而極不民主。例如团的选举，团三大的代表都是团幹部。刘青山、張子善变到这么坏了以后才被揭發出来。

十、政治方面：“人代会权力太小，党的权力太大”，“党的权力要逐步轉給人代会”，“中央的权力逐漸轉移給地方”，“总理人选問題要提出討論”，总之“不要有权威”，“領導要輪流作”。

十一、那末，党要輪下来，該誰上去呢？項志遴也有答案：“有能力，懂科学，內行的人”，“工农在他們領導下工作”。这些人是什么人？难道不正是罗隆基所謂的“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嗎？項志遴的企圖，难道还不清楚嗎？最后，如果党不願意按着上述要求去做，那末就来大民主，因为“大民主就是反官僚主义的有效方法”。这就是右派分子項志遴的所謂“扩大民主”的办法，也就是反对無產階級專政的資產階級的民主綱領。

### 千方百計从一切方面来瓦解党

項志遴深深感覺到，只要党一天存在，他的資產階級綱領就一天無法實現。因此他是千方百計用尽心机，想办法要搞垮党。首先，他提出了一个“党应当逐步削弱，这是符合階級消灭以后党也消灭的原理的”。如何削弱呢？一、权力逐漸交出去（例如交給人大等）。二、党的組織应当逐漸瓦解。为什么要提这两点呢？項志遴說：現在的問題在於党独攬大权，而組織紀律又那末强，中央要下面做什么就得做什么，甚至於要下面去死，这太可怕了，怎么能不出問題呢？下級必須要从这两方面来下手。

第二步，他就攻击我們党的各种政策、理論都是教条主义：“党内教条主义濃厚，把經典著作說为神聖不可侵犯，領導权威的話看作定論”；哲学更是“面临危机”。他要求反对“教条主义”。为什么呢？項志遴不仅仅是企圖从思想上来动搖我們对馬列主义、对党的忠誠，而且还为他的削弱党的組織紀律打下思想基础。他認為党的組織性強，是在於黨員思想上受到了教条主义的束縛，要瓦解党的組織性，必須先把黨員从教条主义束縛中解放出来。

第三步，攻击領導的作用。他說：“你們不要以为領導很英明，其实你們是不了解情况，領導不过是根据事物本身的發展办事，往往是事物本身迫着領導这样做，而不了解情况的羣众，就以

为他是英明的领导者”。因此，“組織性虽然重要，不免有流弊”。所以他又号召大家“可以不必执行組織决定”。

为了彻底攻垮党的組織紀律，他又找了一条理論。他說：他之所以認為組織紀律应当松懈，是根据恩格斯的“自由就是認識了必然性”而来的。對於不自覺的人，需要組織紀律；對於已經認識了必然性的人，就可以不要組織性了。这就是他为瓦解党的組織紀律的步驟而創造的一套理論。另一方面，他又从三个主义方面来向党进攻。他宣傳三害的根源就是党本身。他說：“有党就有宗派，因为有了这部分人和那部分人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就是宗派”。他誣蔑党内也就是一些个人野心家的集团，他認為貝利亞、高、饒事件就是党内領袖爭权夺利的結果。他說：从这些事情看来，“党也不过如此，工人階級思想也不过如此”。他又說：官僚主义是由於黨員文化水平低、不懂業務，而党又非要他們担任重要工作，能上不能下的結果。他說这好像“第一代皇帝英明而后代往往昏庸”，是符合历史發展的必然性的。於是，他又得出了一個結論：既然三害的根源在於党，所以，“整風起不了什么作用”；肅清“三害”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是他所謂的“扩大民主”，也就是要复辟資產階級民主，消灭共产党。

但是，这样極端仇視党的項志遴，竟然会在前几个月的時間申請入党。据他交代入党动机是由於什么“亲友的督促”，“入党可以更被信任”等等，似乎却只是一些个人考虑；揭开来，原来別有企圖，用他的話來說“百家爭鳴政策出来后，我感到党和我的距离近了”。因此，入党以后“可以拿自己的思想影响党了”。原来項志遴也是懂得堡壘是最容易从內部攻破的，所以最毒的一手，就是要鑽进党来瓦解党。

### 項志遴的鬼把戏被拆穿了

右派分子項志遴这样全面、系統的反動言論，都是用了極端隱蔽的手法表达出来的。在大鳴大放期中，他沒出过一張大、小字報，他也極少有系統的放出他的言論。他那些綱領理論，都是东一句，

西一句，化整为零，分散在許多次的發言中。光听他一次談話，很难看出問題。就是这些零零碎碎的言論，也是經過了極慎重的修飾过的，提法很有分寸，語气非常含蓄。为什么不直接提？他自己交代說：“考虑到因为党的巩固和强大，是客观存在，没有办法馬上消灭，按我意見根本不要党的”。举一个例，明明他是要取消科学院的党委，但是他却說：“科学院的党委我以为倒不是退出不退出的問題，而是如何加强它，使它多發揮些有益作用”。乍一看，似乎很贊成科学院党委，再想一想早在别处原来他說过党根本領導不了業務，只能做些思想工作。这样似乎他倒至少也还贊成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再一看，原来老早他就反对科学院工作要进行什么政治思想教育。这么一来問題才弄明白，原来是根本不要党委起什么作用，干脆是取消。

这些零碎的言論，不但是經常有所謂理論支持，还往往採用了大量的伪装。譬如，他說：“我希望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領導与被領導没有什么差别，領導不过是做特定的部分工作而已，領導工作輪流做，像值班一样，不需要威信、上下之分，只存在师徒形式之中”，“沒有神聖的东西，沒有权威，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自由，都可以独立思考，每个人都能認識客观的規律，根据客观的必然性，而自然的遵循一定的紀律和公共道德”，“人与人之间完全真誠坦率”，“劳动成为遊戲……”。好了，大家看，項志遴把他自己打扮成多么天真的一个理想主义者呀！

不仅如此，項志遴放这些言論从不冒失的打先鋒、帶头放。他仔細的判断情况，窺測时机，待机而發。他的“民主”言論一直等到刘治平放了之后，就是在这个时候，話还是用着各种商討問題的口气，什么“这一点似乎也还可以討論”，“那一点似乎也可能会吧！”非常“謙虛”，好像只是在討論別人提出的問題而已。即使是那些比較露骨的言論，他也总是打着各种招牌，用馬列主义的詞句来作掩护的。特別喜欢用的“招牌”是从事实出發，全面、客观地看問題。他还說过：“我的反面提問題，可以帮助你們提高得快些”。看上去真是一片“好心”！

項志遴這一套手法，的確曾經迷惑過不少的人。但是經過羣眾堅決的鬥爭和揭發，項志遴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貌已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項志遴現在再也無處可藏。只有徹底交代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全部罪行，特別是項張聯盟的一切活動。幡然悔悟，痛改前非，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 揭露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項志遴

孫觀仁

我繼續揭露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項志遴。這個右派分子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非常全面，在許多地方還披上馬列主義的詞句。他被我所的其他右派分子尊奉為他們的理論家。他用那些所謂理論，幹了些什么呢？他用“存在決定意識”這句話來反對我們的思想改造運動，咬定斯大林問題是制度問題。他用“自由是認識了的必然性”這句話來反對組織紀律，否認它的必要性。他用階級鬥爭緩和論來反對肅反運動，千方百計地企圖削弱黨、取消黨。他用歷史發展有其規律性這句話來否定領導的作用。這樣一套理論本來是經不起駁的，都是陳腔濫調，但是在右派分子中間，從他們的資產階級立場出發，他們喜歡的是這種理論演證的結果，可以用來挖我們的牆腳。在烏雲蓋天，右派囂張的日子里，他們確也拿來當作武器，向我們進攻，否定馬列主義，否定黨的領導，否定民主集中制，否定羣眾路線，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反對蘇聯，要求資產階級民主。因此，我所的另一右派分子，助理研究員張家琨五體投地的恭維說：“只有項志遴能提出這種獨特的、大膽的、創造性的意見，我自己是不行的。我是提不出那么多的理論。他真有兩下子，我非常佩服他”。這個右派分子是怎樣的人呢？大家都已知道，原來他與我們有殺父之仇，肅反時歷史被審查，心懷不滿的。就像張家琨這樣的人，他同一研究室的一個右派，研究實習員魯陽也十分高傲地說：“本室我別人不佩服，就是佩服張家琨”。真是衣鉢相傳。而

这个人又是怎样的呢？原来就是上海大右派分子魯莽的兒子。

項志遴这个右派分子的面貌很偽善。他平时对人和藹，說話細声細气，但是他幹得却狠毒。他和張家琨結成一个反党联盟，他拉走了我所一个团的支部向資產階級投降。他罵他的哥哥胡繩同志是“教条主义”。他說：“我这位胡老兄愈来愈不像話了，文章愈写愈長，弄得哲学家不像哲学家，什么也不像”。到了他反对反右派时，他可以对爱人来个“合則留，不合則去”。

項志遴这个右派分子的行动很隱蔽，从整風到反右派过程中，他沒有出过一張大字报，只在另一右派分子仇士华的大字报上加了一張豆腐干一样大的小条子，他發的言論都是化整为零东一句、西一句。然而右派分子終究还是右派，当羣众起来以后，就揭出了他大量的言行，就暴露了他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猙獰面目。

項志遴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一貫对党的各項政策制度抱着怀疑和不满。到了1954年肃反时，在这样一个階級斗争尖銳的时刻，他高唱起階級斗争緩和論，認為沒有必要大張旗鼓进行肃反。因而，在肃反时受到批判。肃反尙未結束，他就被派去苏联學習。在苏联时正值苏共二十次党代会、波匈事件等重大事件，这时他慨然認為他以前的看法都对了，他就徹底地向右轉了，配合着国际反共的高潮，放出一支支的毒箭，以細小的具体問題到根本的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和污蔑。

斯大林的錯誤被揭發后，当时和他在一起的一些中国留学生思想感到混乱，特地邀請当时在苏联的刘偉同志向大家講了一次話。那是一天晚上，大家圍着刘偉同志坐着。刘偉同志詳細地分析了斯大林的功过，講了我国肃反的經驗，大家都很满意，談得很高兴。会散了，項志遴坐在一張沙發上，臉色發脹难看，默不作声，突然激动地提出一个問題：“斯大林一个人怎么能杀了这么多人，法律那里去了，这簡直是恐怖”。他又說：“难道这里沒有制度問題嗎？”当时大家都很驚訝，这时一个名叫华光的留学生馬上接下去称赞他說：“非常勇敢，我憋在心里多少年不敢提的話，你都講了”。这两个人在苏联时期，思想十分相投。华光把憋在心里多年，講了



怕开除党籍的话大多对他说了。他们对苏联进行了無所不至的各个方面的惡毒攻击、造謠和污蔑。这些话和西方各造謠通訊社所叫囂的完全是同一副嘴臉，具体的話在陆祖蔭同志的揭發中、在發下的右派言行录中大致都有了，我这里不再重复。从这些言論中我們可以看到項志遴从他的資產階級立場出發是怎样地否定了苏联，怎样地否定着共产主义前途，怎样热烈地想望着資產階級民主的复辟。

他正是怀着这种心情，在 1956 年 12 月回国的。回国前在莫斯科，他对朱培基同志說：“我回去就是要宣傳苏联的缺点”；“你們講优点，我就要講缺点”。

項志遴一回国，張家琨就对他非常亲热，体貼入微。不久張家琨就搬到項志遴的房間去住了，他們兩人碰在一起真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

为什么張家琨要找項志遴，項志遴又为什么要搭上張家琨呢？

張家琨既佩服項的所謂理論，更看中項志遴的三个哥哥兩個姐姐都是老革命，組織上信任他，兩次派他去苏联。張想有这样的靠山擋在前面可以迷感人，出了問題也可以頂得住。項志遴想利用張家琨什么呢？他要进行反苏反党活动总要有市場有帮手呀！然而他离开物理所有一段时间了，情况不熟，正需要張家琨这样一个識途老馬。就这样，他們結成了以他們为首的联盟。

他們一开始就先談肃反。

張家琨对項說：“我父亲的情况我不知道，肃反中有些地方我不应当承認的，似乎乱承認把事情弄大了”。又說：“我在运动中沒有提高，只是懂得了一些，那时对你的批評是領導制造的，实际上你以前的想法都很对。”

項志遴对張說：“肃反可能是錯用了斯大林理論，按当时情况是不必大規模肃反”，並撫慰張說：“肃反时斗你是斗錯了，你現在不消極，很好。”就从这里开始，他們見解一致，張家琨提供材料，項志遴提供理論，把肃反全盤否定，誣蔑我們肃反理論上犯了錯誤，

錯用了斯大林理論，方法上犯了錯誤不該發動羣眾，結果不好，反革命搞出不多，还把許多人搞的垂头喪氣，最后还要加上一条教条主义增長了。从此以后他們形影不離，食則同桌，寢則同室，縱談國家大事，傾瀉其右派言論。

他們關心肅反被斗的人，逐個地進行撫慰。這裡我們提一個在地質部工作的錢寧，她在肅反中被審查也心懷不滿，跑到我所來和張家琨、項志遴、孫良方一起談，項志遴安慰她不要消沉，張家琨還為她去地質部呼冤。後來他們還互相串連。孫良方對錢寧更是親密。這個錢寧現在也是個右派分子。她聲言共產主義是她的絕滅人，說肅反斗了她，她就忘不了。他們至今黑線相牽。這個集團中的一個寫信說：“對於這次運動（指整風），提出意見，拿出辦法，這就需要廣泛的聯繫羣眾，收集事實，徵求意見。……要擔當起巨大的工作任務，就必須有廣泛的羣眾基礎。”他們的确都在這樣做，他們對陳志誠表示很關心，在反右派鬥爭開始以後陳志誠想在暑假回香港家裏去，沒有錢。項志遴主動提出，張家琨支持，表示願意幫助說：“真有困難我們兩個可以幫助”。項張的一些右派觀點也影響了陳志誠。他們還在羣眾中擴大他們的影響，張家琨這個吝嗇鬼，一向愛佔小便宜，到這個時候可以一次化十元錢來請客。項志遴更不消說，他有着偽裝，有着一副偽善的面孔。他在獲得了羣眾對他的好感以後，迎合一部分人的落后心理，儼然成為青年的辯護人。黨提出要重視政治學習，他就反對政治學習，並攻擊黨總支書記鄭林副所長說：“鄭林只知道叫別人不要專搞業務，但是他除了專搞政治外，他自己還搞了什麼呢？不學習業務，怎麼能領導科學。”黨提出反對“先專後紅”的思想，他就問：“何謂‘先專後紅’？何謂專又何謂紅？”。他下定義說：“紅就是努力勞動做好工作，對社會盡了自己的責任”。他說：“整天啃書的人就讓他啃好了，他對社會也有貢獻，資產階級觀點有就讓他有好了，何必去管他。工作好就是政治好。”

在團內他更散布了他的一些言論。的确他起到了他的影響。他給朱培基的信上就說：“我發現我的一些看法很容易為組內新同

志接受，我很高兴。”就这样，他本来要退团的，结果团也不退了。

整風开始了，他和張家琨在各次座談会上一唱一和，他們估計着形势。請看看他給朱培基同志的信吧。

第一封信說：“又要整風了，報紙上也挺熱鬧，所內動靜不大，學習討論也都不很熱烈。老實說，我對這種波浪式的運動是不贊成的，雖然這種發展方向我是贊成的。”

第二封信說：“整風很熱鬧。大字報、座談會等多極了。大家都講出了一些內心的話，當然不錯。看來肅反所起的壞的後果，比我所估計的還大，更不用說你們的看法了。你以前對我的一些看法覺得奇怪，現在看來都是一些很平常簡單的道理而已，更証實了世界上本來沒有什麼特殊的人，我對整風運動興趣不大，歷史發展的規律要比人為的運動威力大得多。”

他在信中強調了對整風的興趣不大，不贊成。他把右派言論看成是一些很平常而簡單的道理。他估計中國的民主問題這下子要提上日程了，這是歷史規律，波匈式的民主要重演了，這種威力大得很。

項志遴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囂張起來。他在組內對人說：“要整鄭林的話，我一點也不反對。”因為在座談會上項志遴放了几次，鄭林同志認識了他，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了他就和他打了個招呼。項志遴回來就在組內揚言說：“鄭所長怕我了，在路上碰到，故意跑來和我打招呼。”

社會上的右派陸續出現了。項志遴興高采烈，興趣百倍，天天要和張家琨討論一番。他們對儲安平的黨天下產生熱烈的共鳴。後來張家琨看到光明日報登載的復旦大學取消黨委制的謠言，他就告訴項志遴。項說：“這標誌着一個轉化。”於是他又寫信給朱培基說：“近來爭鳴得很熱鬧，無疑的這個方向是必然的，但是為什麼要這樣突然地跳躍式地大搞，我還是覺得奇怪。事實上目前的黨員（除了部隊與行政）一般就都是很好很好，甚至太好了。發生一些問題常常決定於總的方針政策氣氛，而這些決議黨員是無法更改的。”在這封信里他露骨地把矛頭指向了中央，說問題是決定在

总的方针政策。他对形势的估计和章罗大右派一模一样。信里只是说了反话，他认为除部队和行政不好外，其他都很好，都能跟右派走。右派分子项志遴你利令智昏错估了形势。党、政、军、工、农几个方面都靠得住，根本不会跟着你们右派走。学、商二界经过教育也绝大部分会跟着党走，也靠得住的。今天不就开着成千人的大会在向你说理斗争吗？你看到了没有？

他们跃跃欲试了，去北大去清华观风色、察气候。他们说林希翎大胆勇敢。张家琨看了清华罗蘭的大字报更是流露出万分迫切地希望也要这样干几下的样子，自言自叹地说：“能像这样出一张多好呀！”回来后张家琨就积极地进行活动，要组织团支部去北大打。要大家学北大的样，恁恁马明燮把一篇大字报从小楼搬到大楼，又把北大的儒林内史搬了来，还和鲁阳合出了一张留苏问题的大字报。项志遴看了不同意张的，认为没有意思，不是根本问题。张赶紧说：“我也不同意，是鲁阳写了给我看的，我就签了个名。”项志遴怎样呢？他总是要看看再讲，他虽然写了篇“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但是他不发表，他还要再看看。

接着人民日报反击右派的社论发表了。反击右派的言论句句打中他们的心坎，这使他们日夜不安。大家看张家琨是这样描写的。“那时他情绪不好，我也不好，晚上回来总要谈一下，为什么要这样搞，大家都想不通。”

项志遴就写信给他大哥胡绳同志，想摸摸底，看看中央的意思究竟如何。信中大骂“中央为什么这样糊涂”，追问是什么“动机和意图”，并气愤地写道：“我本来已经申请入党，现在要考虑取消”。这封信张家琨看了，他向项献策说：“入党还是要入的”。

这种不安情绪在6月14日项志遴带到了共青团三支部大会上。当他发现了大家的认识模糊时，就大显了一番身手。那天会开了两小时半，他一个人发了七次言。第一次他鼓励大家放右派言论。他说：“大家大胆的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这种精神非常好。”在他的鼓励下，右派言论纷纷出笼，讨论到一个阶段他做了一次小结，并给了这个支部的右派分子一个武器。他说：“有人说三

害的根源是思想意識問題，這怎么能說得通呢？以唯物的觀點看，存在決定意識，這誰都知道三害的根源顯然是制度問題，有它的物質基礎。……”接着他說：“我反對給人家扣反社會主義的帽子，如果說反社會主義的話，那麼三害本身就是反社會主義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呢？”經過項志遴這一講，這個支部的另一個右派分子葛運凌接着便說：“項志遴剛才說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這句話說得好極了。我想了很久，沒有想出一個恰當的話來。這句話正表達了我的意思。”經過這樣一煽，更是羣言紛紛，議論轉向了所內反擊右派的做法。項志遴第三次發言就當了主席，指點誰講誰不講。在意見有分歧時他作了第四次發言說：“我們不能從表面看問題，大家想想看，韓江、吳勉哉貼大字報是批評人家，他們最多是個教條主義。而劉治平呢？問題就是反社會主義了。劉治平只有一個人，他怎么能斗得過吳勉哉、韓江呢？在韓江背後還有人民日報。”其他的幾個右派也就跟着他叫囂得更厲害。會議快結束時，項志遴洋洋得意地說：“我們的會開得很好。希望何德根同志能夠把情況仔細向組織上彙報。絕對不要摻雜你自己的意思。”他對何德根同志沒有詳細記錄非常不滿，於是又諷刺他說：“我對你今天沒有作詳細記錄，感到十分遺憾。”右派分子劉鎮遠跟着就說：“我感到萬分遺憾。”

這把火點成了，他非常高興，當天晚上在回宿舍的路上，他說：“這次會開得真好，大家都說了心裏話，黃勝年這個教條主義我們得好好跟他幹一下。”項志遴回去就得意忘形地對張家琨說：“我們支部很多人能‘獨立思考’，大家看法和我們差不多，還預備出大字報。”張說：“我們房間里有不少人和我們看法也差不多。”又說：“你們不出，另外一個支部也要出了。”實際上這事就是張家琨在煽。

項志遴認為他背後有了羣眾了，以為大有可為，得意洋洋。在四室爭鳴會前揚言：“明天我們這裡沒有人敢去發言。”（指沒有人敢去反擊右派言論）。並公然對黃勝年同志說：“你是要去批判的，我是要去共鳴的。”開爭鳴會那一天，項志遴又想去參加，又不想去。三支部的大字報他原來想親自寫的。他說：“他想寫出來讓領

导看看，用羣众的压力迫使领导改变，另一方面給刘治平撑腰。”那天早上，看到葛运凌比他積極性还高，已經在写了，所以他就去开会去了。

在爭鳴会上張家琨、項志遴听到何祚麻同志报告了發言人的名單，又听說大部分人是不同意刘治平、魯陽的。張家琨就想要为刘辯护，登記了要發言，但一想抛头露面会出事，就要項志遴去講。項說：“刘治平講得很好，不需要再講了。”張說：“还是要講，而且可以把两个人的時間加起来多講一些。”於是兩人就商量起来。項說：“对刘治平的發言要完全同意。”張赶紧說：“不能完全同意，因为关于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有問題的。”項說：“我是特意要把問題提得尖銳刺激一些。”張說：“不能”。結果講的时候改成个“基本上同意”。

开会回来，項志遴修改葛运凌的稿子。

这几天是他們最愉快的几天了。

6月16日右派分子仇士华的大字报貼出了。項張二人一起观赏。項看完就拍手称絕，对張說：“这篇文章太好了。我們兩人赶快出个条子，叫大家都来讀一讀。”張家琨說：“你講我写”。於是由項口授，張执笔，写成一字小条，貼在仇的大字报旁边，表示完全贊同，号召大家来看。

这时他們認為有了羣众可以放心大搞了。於是，这两个隱蔽的狐狸又想把他們的大字报“几点分歧貼出去”。張家琨以借紙为名找右派分子仇士华言明来意。仇士华即主动提出可以叫蔡蓮珍来帮助抄。張抄好后給項看，滿心以为可以貼出了。項說要再等一等。張一听感到很突然，心里很吃惊。原来項接到了胡繩的来信，来信說明了反右意义，並为他表示不安。項志遴摸到此底赶快就縮了回去。

过不几天，所內許多同志奋起批判，項張一看势头不妙，就想赶紧撤退。他們撤退也用了許多手法，第一个手法就是揚言：“我們以后不說了、不看了、不管了。”其实他們天天晚上九点以后总偷偷地看。他們先以为这样可以頂过去，他們估計他們沒有出东西，

三支部的大字報項志遴估計不會單單搞到他頭上。但是批判愈來愈緊，後來出現了仇項張三員並提的大字報，知道要躲不了了。張家琨就放空氣說：“仇士華的大字報很多人贊成，見習員也贊成。”他們想這樣放出個空氣可以蒙混過去。項志遴悔恨地說：“二室三支部的大字報寫得不好，漏洞很多，幸而人多，否則准大受批評。”兩人相商，覺得嚴重了，實在躲不了，就想來個假檢討混過關。項對張說：“批評很厲害，不寫不成。”但怎樣寫呢？當時計上心來就決定去找胡繩，再去摸摸底。這晚上張家琨並為他準備了一夾油印材料。當天還假裝得很輕鬆，看到黃勝年同志，笑嘻嘻地說：“嚴重了，明天要去找找胡老兄去了。”

項志遴回來就把與胡繩談的情況向張家琨作了傳達。於是寫了個小字報，披着理論討論和檢討的外衣，企圖把自己的真面目蓋過去，聲言他們認識他們的錯誤是“沒有認識教條主義比修正主義好一些。”而現在認識了。

那篇假檢討的小字報前一半是項志遴寫的，後一半是張家琨寫的。據張家琨交代，本來後面還有幾句話是說鮑劉是右派。項志遴說：“言不由衷”結果就取消了。但項志遴交代說：“小字報中本來有一小段大意是鮑劉這樣提出要消滅一個制度是反社會主義的，是張不同意而刪去的。”

小字報要貼出去時，另一右派分子魯陽又來獻策，說：“你們這樣檢討不夠的，還是要挨罵的。”又說：“我就不這樣寫，現在檢討將來反教條主義又要翻過來。”

假檢討貼出後，他們就看風色。但羣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假的還是假的，混不過去。於是再來個裝死，不啃氣。

他們看到大字報貼出項張並提，並稱之為項張聯盟，着慌了。張家琨問項：“是否再寫一寫”。項說：“不要吧！”隨後張家琨幾次問項志遴“怎麼辦呢？真害怕。”項給他打氣說：“只有實事求是，是什麼就是什麼。”張家琨看看還是不行，又問項志遴：“怎樣辦？我怕當右派分子，你還不要緊，我還有歷史問題。”項說：“事實就是事實，該怎樣，怎樣吧！”張家琨沒越地又問項志遴：“我們怎麼老犯

錯誤的。”項志遴低沉地說：“我也不清楚。”張家琨又說：“我還有兩個問題沒有通，一是胡風問題，一是我父親問題，罪是不知道。”項志遴一心考慮自己了，說：“你再多想想吧！”並對張說：“以後我們兩人見面不要再講話了。”項張聯盟至此形式上是破產了，但余脈未斷。

在今天莊嚴的全院大會上，我們再一次的希望你們徹底交代。徹底轉變自己的立場，向無產階級投降。向無產階級、向人民投降是光榮的。否則你們將自絕於人民。外力的推動已經不少，自己亲身体會的時間也已很長。想想你哥哥給你的來信吧！想想你姐姐給你的來信吧！想想你媽媽給你的來信吧！他們說些什麼？想想你自己吧！你可恥不可恥？

項志遴，你的思想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來已久根深蒂固的。外力的推動並不完全代替你自我的內省，你的立場至今尚未徹底轉變，幡然悔悟與否，完全取決於你們自己了。

## 駁斥右派分子徐芻對形勢的“估計”及 對反右派鬥爭的誣蔑

潘一民

我們數學研究所的右派分子徐芻曾經講過：“共產黨想利用鬥爭來維持人民的戰鬥情緒，所以每過一個時期，就要找些人來斗一番”。“現在反右派是黨逼着所謂右派分子的朋友和親人來斗他，人人自危，不得不搞”。還說：“在報上發表的右派都沒有什麼罪証，一個人平常隨便說話，現在湊在一起就是一盤好菜”。

經歷過這幾個月的事變的人都會清楚地知道，目前的這場鬥爭是資產階級反動派發動的。他們利用共產黨整風的機會，向黨和人民進行了猖狂的攻擊，企圖搞垮黨的領導，實現資本主義——實際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復辟。由於他們站在反共反人民的立場，就必然會要違反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對形勢作出利令智昏的



估計，錯誤地把無產階級的絕對優勢看成了絕對劣勢，以為他們的一言一動就能影響天下的安危。於是他們情不自禁，藏在心里的陰謀暴露出來了，因而激起了廣大革命人民的憤怒。他們終於不能不發現，被羣眾包圍的並不是共產黨，而是他們自己。

右派分子在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中是怎樣來估計國際國內階級鬥爭的形勢，並且用這種估計來指導自己的陰謀活動呢？我們不妨以徐芻為例，看看他是怎樣估計的。

匈牙利事件加強了一切右派分子——其中也包括徐芻——的一種想像，他們認為社會主義陣營已經開始瓦解了。徐芻在一年以來，經常收聽“美國之音”，把杜勒斯之流的反共濫言當作真理。他曾經癡狂地對他的朋友說過這樣的話：“如果第三次大戰爆發，肯定社會主義陣營崩潰”。“公有制與民主是否有根本矛盾還要研究，如果有，那末社會主義陣營就會日漸萎縮”。甚至公然無恥地宣稱：“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優越”。

徐芻把黨和人民羣眾的血肉聯繫以及黨在人民羣眾中的高度威信看作兒戲，他在估計國內形勢的時候這樣狂妄地說：“黨利用抗日的民族情緒，抗美援朝也如此。現在這股情緒慢慢低落，訴苦會不靈了；另一方面，靠濫許諾言，說以後如何好。現在諾言不能兌現，農民埋怨，矛盾慢慢大了，工農建設情緒愈來愈低，中國以後的發展必然愈來愈慢了。”他又說：“共產黨過去是用信換威，現在是用威換信。因為不給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一些威，信是挽回不來了”。“知識分子以為社會主義有較大的自由，可是現在發現並不如如此，入了黨以後，這種自由更受到約制，不入黨則有些工作又不能做，所以知識分子的苦悶是很多的。”徐芻像一切仇恨人民事業的階級敵人一樣，看不見或者不願看見八年來在黨領導下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成就，而對這一切都加以謾罵和攻擊。

在鳴放初期，當黨中央採取讓牛鬼蛇神出籠的辦法，在一個時期內對資產階級反動派的猖狂進攻不予回擊的時候，徐芻的頭腦更熱了；他一方面詛咒我們的黨說：“我看1200萬黨員中可以整掉

200万。”一方面帶着反革命的妄想幸災乐禍地說：“中央恐怕在事前沒有估計到学生和知識分子中會出這樣大的亂子，現在是進退兩難，要收怕失人心，繼續放據說西安和武漢也在鬧事，如果一旦聯合起來，事情就鬧大了。”還說“鳴放，黨內高級幹部有80%不同意，有些當場退席。後來硬放了，學生大鬧，這一下是共產黨最痛心的，它想靠青年來代替老知識分子，沒想到青年問題最多。”這種估計和章伯鈞、錢偉長之流在六教授會議上的估計簡直是一模一樣。

人民日報有一篇題目叫“全國人民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團結起來”的社論，里面有一段話生動地刻劃了這種人的嘴臉。這段話是這樣的：“過去的革命經驗證明，每當歷史的車輪急劇地前進的時候，總會有些人從車廂中拋出來。他們不能適應客觀的變化。可是在他們被拋出以前，他們往往並不認為自己要被拋出，反而以為車子快要出軌了，快要倒臺了，而他們卻將蜚緣附會，成為真正識時務的角色。……社會處在大變革大改組的過程中所必然發生的某些暫時性的不完善不協調，從右派分子的眼中看起來，就是表明社會主義的命運已經不妙了，人民已經離開共產黨了，人民已經討厭社會主義了。他們以為，他們一跳出這個社會主義的列車，就會有千千萬萬人跟着他們一起走”。徐芻對於形勢的估計正好就是這樣的。

在這種“樂觀”的估計之下，本來就對黨和社會主義抱有刻骨仇恨的徐芻自然是得意忘形，認為進攻的時候來到了。於是在“共青團員”的外衣下面，露出了反共反人民的馬腳。徐芻本來是清華大學數學教研組的講師，去年年底才調到數學研究所來。整風開始以後，他不滿意我們所內和風細雨的做法，甚至連業務組的討論班也不參加，跑回清華去積極進行活動。那時，清華大學中以錢偉長為首的右派分子氣燄非常猖獗，他興高采烈地寫信給導師說：“清華正處在整風的緊要關頭，自己不盡一分力量，良心上過不去”。徐芻的為反動派效忠的“良心”的確是忍不住了，他在清華的教員中帶頭貼反黨的大字報，深夜還拿着手電筒研究別人的大字報，在別人的大字報上註上極其惡毒的小字，參加教研組的座談會

和学生班会，晚上熄灯以后还在学生宿舍找同学谈话，煽动一些对党不满的人“大鸣大放”，又为其他右派分子打气、出主意。他表面上打着“爱护党”、“帮助党整风”的旗子，背地里却在同学中散布“党没有决心整风”，“整风中报复是一定会有的。钱伟长已是全国闻名的科学家、大喽囉了，敢说敢做，谁也奈何不了他。我是小喽囉，只是不想往上爬，所以也不怕”。他在数学所的座谈会上说：“脱离清华是脱离了苦海”。可是在清华同学中却又说：“数学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严重到极点，揭发出来的事情简直惊人，你们没有到过社会，想像不出这种情况”。他就是用这种可耻的两面派手法来挑拨党与群众的关系。在这同时，他还对一些同他在思想上有共鸣的人散发了大量的、有系统的和极其露骨的反动言论。

当清华的右派分子为了煽动同学反对党，把团在思想工作中正常的思想分类污蔑为国民党特务制造的“黑名单”，而且在最猖狂的时候，徐芻竟以团干部的身份在一个学生班会上，“作证”说：“黑名单肯定是有的，我做过团支部书记就做了很多错事”。他还在一张驳斥所谓黑名单的大字报上恶毒地註上这样的小字：“你们不要扣黑名单这个词了”。并且说：“真正独立思考的爱国者会被认为立场不稳，‘歌德’、‘但丁’派会被认为进步，难道斯大林的秘密警察的害处还不知道吗？”果然，一些认识模糊的同学就说：“徐先生都说有‘黑名单’，这当然不会假了”。在这种情势之下，很多学生都要求团支部公布所谓“黑名单”，并且有一部分人包围清华大学人事室，要求公开档案，引起了极大的混乱。

这个反党野心家几乎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无孔不入，到处“放火”。他趁着清华大学全校听报告的时间，带着墨水瓶和笔，偷偷摸摸溜到几处地方的厕所里面，写“反对出卖烈士的鲜血”、“打倒法西斯(卍)”这样的匿名反动标语。五月初清华有一个同学自杀了。事前学校行政和党团组织对这个同学做过很多工作，这个同学的父母也认为她自杀是早就料到的。可是徐芻却不甘心，他私自跑到这个同学的家里去访问，极力挑拨家长与学校的关系，并且在同学中造谣生非说：“这个同学的死，是对教学制度的

控訴”。从这樁事可以看出他的手段是如何陰險、毒辣。

在我們的階級敵人中間也有一部分比較“聰明”的人，他們的反革命感覺是很靈的，像徐芻就是這樣一類的人。對於我們的反擊，那怕還只是剛剛露出一點苗頭，就聞出來了。五月中下旬召開了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毛主席向大會代表們作了親切指示，陸定一同志也在大會上作了重要的報告。徐芻立即對一個右派分子說：“現在看來中央有‘收’的趨勢，陸定一說青年們應該在風浪中站穩立場，就是這個意思，毛主席說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也是這個意思”。他還對他的弟弟說：“毛主席以前估計‘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現在會知道了，情況並不是這樣樂觀。我看他對大鳴大放也動搖了，不得不同意‘收’的意見。他發表文章，好給下級收場”。在發表毛主席在團代會上的講話的第二天，徐芻就在清華大學貼出了一張內容非常惡毒反動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是以清華的一個校友寫給團委書記阮銘同志的一封信的形式發表的。他一開頭就寫道：“毛主席昨天說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行動是完全錯誤的，我深以為然。但我擔心某些害怕羣眾的宗派主義者聽了這句話，會從另一個立場來‘歡迎’這句話，——他們有借口向批評者報復了。有些官僚主義者也‘歡迎’這句話，因為這頂帽子是推動‘工作’（應為官僚主義者的意圖）的好、快、省的法宝”。然後他別有用心地舉了兩個所謂“例子”，把清華大學的黨委會污蔑成為他所形容的那種官僚主義者，再接着寫道：“……我擔心在這大家起來鳴放的初期，也有人用‘離開社會主義’來作為法宝，變相地壓抑大家的愛國愛黨赤誠。我這一顧慮不是沒有根據的，根據我長期的觀察，團委會、黨委會對批評者總是往坏处想（對錢副校長即其一例）。因此我請求您向大家保證，除非有科學根據，除非有使羣眾心服的根據，不要宣傳誰、誰、誰是別有用心者，免蹈肅反之覆轍”。最後，他在末尾還加上一句：“不要誤會，我不是反對毛主席的話，不然又是官僚主義了”。請看看這個右派分子有多么陰險！他費盡心機，裝出一副擁護毛主席的面孔，把黨的領導描寫成隨便打擊陷害人的宗派和官僚，以便掩護他

自己和錢偉長之流的右派分子繼續向党进攻，而且不許我們还手。因为不同意他的意見的就是“官僚主义者”嘛！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他的真正的企圖，我們不妨听听徐芻对一个右派分子說的一段話。徐芻說：“我貼大字报用的方式是很隱蔽的：我先說拥护毛主席的這句話，然后才在下面提意見。並且在未貼大字报之前我就衡量过得失”。在清华开展反右派斗争以后，他又說：“我点中了他們的下一步棋；我得当心，他們当然很恨我”。

可是，右派先生們：你們这种“陰暗的聪明”又有什么用呢？徐芻虽然狡猾，归根到底不还是被我們徹底揭露出来了嗎？对这一点，徐芻自己估計不足的，例如在揭發他之前，他就对人說过：“我貼大字报第二天就对支部書記交代过，而且我在数学所沒有說过什么話。搞是一定要搞的，小搞罢。我看这几天那边的黨員对我的神色有点不大对了”。大家看他想得多么妙，可是这却只能使他走上絕路。

應該指出，徐芻一直到現在态度还是極其惡劣，非常狡猾。我們一共对徐芻的問題开过六次大会，另外还进行过各种形式的小会和多次的个别談話，同他展开說理斗争，希望他改变立場，幡然悔悟。他却把我們的这种仁至义尽的措施当成了軟弱。他在每次会上都答应下一次要徹底交代，可是会下給他一兩個星期甚至更多的時間，他却不利用这些時間好好考虑自己的問題，或者关在房里睡大觉，或者到处摸底，和知道他底細的右派分子訂立攻守同盟。到下一次会上又說時間不够，不准备發言。在对証事实的时候，他有时是当面抵賴；有时抵賴不过了，就当面承認，背后翻案。他对組織也使用了各种無恥的手法，有时是怒气冲冲，裝瘋裝死，有时是哭哭啼啼，跪地求饒。在羣众的压力之下，他也不得不陸續交代一点問題，可是却把大事說成小事，小事又說成大事。到目前为止，就我們已經掌握的材料來說，他就还有大部分的反动言行沒有作交代。

徐芻还对他的弟弟說过：反右派“要像肃反那么兇是不会了，因为‘阿斗’不多了”。看样子这个右派分子現在的头腦还没有清

醒，还以为我們向他进行說理斗争，要他主动交代，是由於羣众不像‘阿斗’了。必須要再一次說清楚，右派分子反抗社会主义革命，敌視、破坏社会主义建設，企圖搞垮党的領導，使千百万人头落地。他們是有罪的，是人民的敌人。我們之所以暂时不办他們的罪，是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可以寬大为怀，讓他們改变立場，接受改造，重新做人。但是如果他們累誠不改，繼續进行破坏活动，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以及国务院規定的“劳动教养办法”，對於他們，特別是徐芻，是完全适用的。

頑固的右派分子总是採取“拖”的手法，他們以为只要能拖下去，我們就会慢慢放松了，就可以混过去了。其实我們是不怕拖的，愈拖，我們的战斗热情愈高。我們是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而右派分子則会在人民中間愈来愈孤立。

我們要警告右派分子們：收拾起你們的那套破爛吧！那些东西是救不了你們的。如果你們要估計形势，那末当前最主要的形势就是：六亿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識分子的社会主义列車正在共产党火車头的引导下，向着無限光明的未来前进，一切擋在这条路上的絆脚石都將被压得粉碎！粉粉碎！你們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徹底交代，繳械投降，低下头来，向人民認罪！

## 駁斥右派分子夏永年反对馬列主义的論調

張宗誠

同志們！右派分子夏永年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論是全面的、系統的，尤其在反对共产党反馬列主义这一方面更为突出。現在我仅就右派分子夏永年歪曲、污蔑馬列主义的几个根本問題作如下反駁。

第一，右派分子夏永年否定階級的存在，提出階級是人为的。这个問題实际上並不是什么新东西，資产階級理論家早就喊过，蔣介石的走卒——胡适也曾提出过，其目的不外乎是掩盖資产階級

的剝削實質，企圖使勞動者不能認識到自己為什麼受剝削的命運，從而來維護資本主義的統治。如果我們不是閉着眼睛不看事實的話，就可清楚地看到階級確實是客觀存在的，人們在勞動中的地位不同，生產資料佔有不同，生活資料分配不同，自然就劃分成不同的階級。地主和資本家能不勞而獲任意為非作歹，而工人和農民整年累月流血流汗，而到頭來不能一飽，能說是沒有根本差別嗎？能說是同一個階級嗎？其實右派分子夏永年並不是不知道這一點，只不過別有用心地來否認階級，當然否認了階級的客觀存在也就從根本上否認了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什麼“運動”，什麼“思想改造”他們都認為這是共產黨製造出來的。正像他所說的“肅反是人為地製造緊張”一樣，認為這都是“庸人自擾”。企圖迷惑知識青年積極參加運動，進行思想改造，從而來瓦解青年的戰鬥意志。

我們歷次運動是人為製造的嗎？是庸人自擾嗎？不！不是的！讓我們簡單地回憶一下，讓事實來作証。土地改革我們徹底摧毀了封建基礎，土地回到了農民手里，大大地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能說這階級鬥爭不客觀存在的嗎？能說這是人為製造的而不是客觀需要的嗎？抗美援朝我們打退了美帝國主義對我們的挑戰，消除親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思想改造運動我們批判了許多反動思想，解決了知識分子為誰服務的問題；“三反、五反”我們擊退了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肅清反革命運動，我們狠狠地打擊了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肅清了反革命分子。就以55年—56年肅反而言由於發動了羣眾，由於在全國範圍內廣泛深入地開展運動的結果，全國有十九萬餘名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這不是說明反革命分子確實客觀存在着嗎？這不是說明運動是客觀必需的嗎？正像周總理所說的，如果沒有這些運動的勝利，便不可能在新中國成立不久的短短時間內，就取得社會主義的革命的 basic 勝利。

再以我們這次反右派鬥爭來說，不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首先利用大鳴大放的時機，惡意地向社會主義進攻，企圖恢復資本主義統治嗎？我們能不給以反擊嗎？能說我們運動不是客觀需要嗎？能

說是庸人自扰嗎？右派分子夏永年你的企圖是不会达到目的的。

階級和階級分析是馬列主義最基本的觀點。你們這些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是極端害怕它，極端仇視它；但人民却非常歡迎它。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一旦認識了這個真理，就會產生巨大無比的力量，將剝削制度剷除；即使在今天，它仍然是我們觀察問題，識別問題的有力武器。而對你們右派分子來說，它是一面照妖鏡，儘管你夏永年偽裝多么巧妙，但現在還是原形畢露，徹頭徹尾地暴露出你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本質。

第二，右派分子夏永年公開反對工人階級的領導。他說我不明白今天為什麼偏要工人階級領導革命，我怎麼也想不通，我可以替農民找出很多優點，可以替知識分子找出很多優點，還可以給工人階級找出很多缺點。他又說我認為推動社會前進的是文化、是科學，而代表文化和科學的是知識分子，因此是知識分子領導革命。

關於推動社會前進是文化、是科學的問題。實質上是把科學抬出來作為他們的招牌，企圖為排斥工人階級領導的陰謀找根據，好！就讓我們來看看，究竟什麼是歷史發展的动力。按照我們馬列主義者的意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矛盾的不斷發生與解決是歷史前進的动力，在階級社會中具體地就反映在階級鬥爭當中。在今天只有這種理論才能引導人們去打掉阻礙社會前進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枷鎖。真正地將社會推向前進。蘇聯十月革命後社會生產突飛猛進，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生產阻滯不前，就是我們理論的不可辯駁的鐵證。再以中國和美國為例，美國的科學水平是先進於我國的，然而美國仍然處於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資本主義黑暗統治的社會，以社會制度來說是遠遠落后於我國，這就說明科學雖然能對生產的發展起一定作用，但是科學不能使社會發生本質的變化。正相反美國的科學發展正受到社會制度的嚴重束縛。只有通過階級鬥爭，通過革命，消滅資本主義制度。才能將社會推向前進，才能徹底解放生產力，才能使科學和文化飛速地發展。而右派分子夏永年的意見，實質上就是說在資產階級統治的社會中，



为了推动社会前进，只要在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领导下去研究科学就可以了，因而也就不需要革什么资本家的命，也不需要什么共产党领导。看吧！这就是他所說的“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科学”的本意。我們完全懂得这已經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了，这完全是帝国主义者濫調的再版。是世界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其垂死的命运所編造出来的謊言。

關於知识分子领导革命的問題，实际上他是利用科学院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場所这一特点，別有用心地来抬高知识分子，把他們說成是最清高，最革命的，把知识分子一手捧上天，来迷惑一些知识分子，好像他是为知识分子“鳴冤”，抱不平。言下之意是共产党有意把知识分子压於工人阶级之下，还要知识分子进行什么思想改造，企圖离間党和知识分子关系，挑起知识分子对党不滿。

好！現在讓我們来看一看知识分子能不能领导革命。知识分子本不是一个阶级，有革命的知识分子，有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他們有不同的立場，維護着不同阶级的利益，决不能將他們等同起来。如果一定要籠統地說，旧中国的知识分子主要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虽然他們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但很难想像站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立場的知识分子，可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来消灭私有制，来消灭他們自己的阶级。我国的历史証明了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不能领导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既然新民主主义革命都不能领导，怎么能领导今天社会主义革命呢？而工人阶级則恰恰与此相反，当他們一旦懂得了革命的道理，他們就会起来，坚决地来消灭剝削。他們这种革命的徹底性是决定於他們过去長期受压迫受剝削的社会地位，革命對他們來說，除了丢掉貧困与枷鎖之外，再沒有別的东西了。除此，由於在近代大生产中的鍛鍊，他們还具有別的阶级所沒有的組織性、紀律性。这些道理都是經過千百次無产阶级斗争考驗过的真理。但是右派分子夏永年却在那里閉起眼睛来，別有用心地来編造一套謊言，企圖借此来达到煽动知识分子起来反对党，从而达到排斥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排斥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

的目的。

非常明显，如果他們排斥了黨的領導之後，要誰來領導呢？顯然就是要像他那樣的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來領導了。大家可以想一想要是像他那種具有濃厚資產階級人生觀的人，認為能滿足個人慾望就是幸福的人來領導革命，那麼其結局將會如何？可以肯定的說必然又要重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必然是反革命的復辟。

我想熱愛真理，熱愛社會主義的廣大知識分子，他們決不會上你夏永年的當，他們不要聽你們右派分子們的阿諛。從而跟你們去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相反，當他們一旦看破你們的陰謀詭計，看到重走資本主義道路要給中國人民帶來多么深重的災難時，他們會一致起來向你們鬥爭，堅決地走社會主義的道路，走真理的道路。你們的幻想是一定要破滅的。

第三，他否定馬列主義。說：理論都是為階級服務的，資產階級理論為資產階級服務，無產階級理論為無產階級服務，從而失去了真理性。

提出階級人為論，否認階級的客觀存在的夏永年，可是在這裡他又自相矛盾地承認了階級，他不是說“資產階級理論為資產階級服務，無產階級理論為無產階級服務嗎”？從這裡不難看出他提出的階級客觀存在不存在，並不是從尊重客觀事實出發的，而是以有利於向党進攻為前提的。前面他為了掩蓋資本主義的剝削實質是否認了“階級”，“階級鬥爭”；在這裡他為了否定馬列主義的真理性，他又承認了階級客觀存在。總之一句話，怎樣有利於向党進攻，他就承認什麼，同意什麼。

我們說馬列主義是真理，因為它符合客觀規律反映了客觀規律。資產階級在社會發展規律上是必定要死亡的，故為其階級服務的資產階級理論家，為了維護資產階級垂死命運，極力掩蓋真理。工人階級在社會發展規律上是新生的階級，它必將取得政權，進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這說明工人階級利益與客觀真理是一致的，故為其階級服務的馬列主義才能真正揭露真理。

我們一直就宣佈馬列主義是有它的党性，亦即階級性，我們從

不掩盖隐蔽这一点，正相反，我們随时随地都是公开向世界，特别是广大劳动者宣傳我們的理論是有階級性的。而為你們資產階級服务的理論家們，为了挽救你們垂死的命运所編造出来的那套“理論”，一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階級性，但是你們这些資產階級老爷們却从来不敢承認它。这是为什么？显然你們的“理論”的根本目的是压迫奴役人民的，是丑惡的，見不得人的。而馬列主义呢？它却是告訴劳动人民，怎样去反对剝削，怎样去解放自己，怎样去改造世界。因而它从来不害怕当众宣佈自己的鮮明階級性，它的真理性决不会因为它的階級性而被削弱；完全相反，正是由於它的鮮明立場，更使其本身的战斗性無比地堅強。而右派分子夏永年你呢！尽管你千方百計地裝造出来許多謬論來為垂死的資產階級辯護，但是你却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来申明你的資產階級立場。

夏永年还在那里制造什么“誰当权，誰有理”的惡毒言論，企圖說明社会主义的道理之所以正确，它之所以为大家所接受是依靠了政权的力量。但是我們要問如果按照你的說法，應該怎么來解釋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千百万革命者为了社会主义的事業拋頭顱，洒热血，前仆后继的事实呢？怎么來解釋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在敌人瘋狂鎮压下，於短短的時間內，便照亮了整个中国呢？鉄一样的事实都說明了馬列主义是反映了客觀規律，無論在什么时候他都是真理。俗語說：真金不怕火煉，我們的馬列主义就是这样，尽管你夏永年百般地歪曲、污蔑，想動搖人們對馬列主义的信仰，但真理畢竟是真理，馬列主义却已經在人們心中生根成長。

同志們！馬列主义是我們党的指导思想，有了它使我們能認識客觀規律，掌握客觀規律，來改造世界。右派分子夏永年針對着我們的要害反对我們党，反对我們社会最根本的东西。同志們！我們必須給以迎頭痛击來保护党的領導，捍衛社会主义事業。

## 夏永年“独立思考”些什么？

郭 銓

同志們：我代表化冶所化工冶金組的同志們，來揭露右派分子夏永年的所謂“独立思考”。右派分子夏永年一直把自己偽裝成一個善於“独立思考”、勇於“大胆懷疑”的聰明角色，並且高喊着是“理論探討”、“追求真理”，在美麗的外衣、動聽的口號掩蓋下，他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對黨的政策、各項運動、社會主義制度等，進行了惡毒的辱罵和攻擊。他懷疑馬列主義和工人階級的領導，詆毀黨的政策和歷次運動，他仇視新社會，還極力的誹謗蘇聯。現在我們來看看他的所謂“独立思考”、“大胆懷疑”、超階級及純客觀的“追求真理”的內幕：

一、首先看看他“独立思考”了些什麼？！

(1) 葛佩琦說：“黨員起了便衣警察的作用！”，夏永年就說：“有些黨員就是這樣嘛！”。葛佩琦說：“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夏永年也竟然認為“葛講的有道理，真痛快！”顯然，他並沒有經過独立思考，只是和右派分子們隨聲附和，相互支持，正如他自己說的：“報上反對的，我全贊成”。這裡不难看出，他站在敵對的立場上，同意所有的反黨謬論，絲毫也沒有独立思考的氣味。

(2) 夏永年極端仇視忠心耿耿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人，他咒罵黨團員、積極份子為“盲從”，說“有些黨員就是在舉手”，他還無恥的建議黨章上應加一條“独立思考”作為入黨條件。我們說這種“建議”本身就是一種污蔑。大家都知道我們的黨一貫教育青年人要具有独立思考、創造性和勇於進取的精神，千千萬萬祖國人民的優秀兒女，他們正是聽了黨的話，自覺地在為人民的革命事業而鬥爭；由於他們善於思考，站穩立場，與各種形形色色的敵人進行堅決的

斗争，才能保卫革命胜利的果实。夏永年想用讽刺、谩骂来丑化党员，发泄他内心的仇恨，正和右派分子谭天荣之流污蔑党团员是“白痴”，“条件反射”的腔调完全相同。

(3) 章伯钧要搞“政治设计院”，储安平放出了“党天下”的谬论，而夏永年就污蔑说：“我国宪法不民主，党说了算；美国国会更民主，所以应该竞选”，由此可见，夏永年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的腔调也毫不二样。

(4) 夏永年说：“什么阶级不阶级的，还不都是人为的”。我们都知道阶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如资本家、地主对工人、农民的残酷剥削，他们不劳而获，佔得被剥削者的劳动，难道这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吗！不是阶级的差别么！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就是企图否定阶级客观存在的事实，想借此取消阶级斗争，使劳动人民永远置於被剥削与贫困的地位。夏永年在此完全充当了他们的代言人。

(5) 夏永年污蔑说：“苏联援助我国是侵略，苏联帮助我国开采资源是掠夺，帮助建设是刺探情报，苏联驻军匈牙利也是侵略。”帝国主义污蔑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夏永年就把它具体化了。

(6) 夏永年怀疑卢森堡夫妇的案件，他说“美国没有证据会处死他们吗？”谁都知道，卢森堡夫妇的案件是美帝国主义为了制造冷战政策而一手制造出来的。因为卢森堡夫妇思想进步，在共产党竞选议员时签过名，于是就根据了一个人的假口供，诬赖他们为苏联原子间谍，加以处死。这是在美帝冷战恐怖政策下，被害的一对无辜科学家，多少正直的科学家们，如爱因斯坦等，都提出了抗议，全世界人民都在指责美帝这一阴谋，而夏永年却还认为美国宣判可能是真的，这就是他怀着资产阶级的偏见，进行的所谓“独立思考”。

由以上事实来看，夏永年并不是真正的在“独立思考”，他只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否认事实，对党进行歪曲和污蔑，他的一些谬论和社会上右派分子的谬论是一样的。凡是党讲的，他就要怀疑和反对；凡是右派分子们的叫嚷，他都赞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一条帶子把他們联在一起，夏永年就是把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謬論，毫不怀疑的全盤的吸收下来了，与他的思想結合后，再加以宣揚和發揮。所以章伯鈞罵“盧郁文是小丑”，夏永年就認為“史良最卑鄙”。縱然他有說法不同，可是實質上夏永年的这些謬論，不过是重复国内外敌人以及今天右派分子們的濫調，借用了“独立思考”为幌子，来宣揚这一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謬論而已。

二、其次看看他所謂的“大胆怀疑”實質上不是怀疑，而是敌視。

为了追求所謂“真理”，他提出要所謂“大胆怀疑”。凡是党所贊同的，对党和社会主义有利的，他不仅大胆怀疑，而且要抹杀事实，全盤否認；可是在帝国主义的造謠、污蔑，在反对社会主义右派謬論面前，他却非常信任。他怀疑苏联侵略社会主义国家，怀疑馬列主义和工人階級的領導；可是却不怀疑葛佩琦的謬論是污蔑，不怀疑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不难推論，他的“大胆怀疑”是不超出資產階級利益范疇的，他的“大胆怀疑”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目的在於否定党的一切。

实际上他已得出一系列既肯定的、又系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謬論，这决不是什么“怀疑”，而是敌視社会主义。“怀疑”的口号只不过是一个掩盖而已。

三、再看看他的超階級、純客觀地“追求真理”的實質。

他的又一謬論，即所謂超階級、純客觀地“追求真理”，他还說“哪个階級都說自己好，都有偏見”，“誰掌握政权，誰就有理”，因此追求真理就必須超階級，而馬列主义是有階級性的，所以他怀疑馬列主义是客觀真理。这一說法与資產階級学者胡适的論点，倒大有相似之处。胡适否認真理的“客觀性”，認為真理只是“人造出来的”，因为對他們有用处，才給个“真理”的美名。所以在他們看来国民党的統治，地主、資本家的剝削，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可以認為是“真理”。

我們認為，真理是人們的認識正确地反映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馬列主义是真理，这已經在無产階級的革命實踐中充分的証實了。馬列主义不仅是符合於無产階級的階級利益，並且也符合

於大多數人的長遠利益，符合於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而右派分子們則污蔑說，馬列主義是因為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主觀把它變為真理的。這種謊言是經不起辯駁的，因為大家都知道，資產階級即使掌握了政權，可是還是掩蓋不了他們對工人、農民的殘酷剝削，對殖民地進行掠奪的本質，而資產階級的剝削本能，已經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反映客觀世界的規律性。他們只能否認事實，歪曲真理，因此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是不可能追求真理的。在今天的階級社會里，觀察事物如果不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那就必定站在資產階級或其他反動階級的立場上，所謂超階級是不存在的。從事實來看，夏永年既然大談是超階級的“追求真理”，可是為什麼得出的結論全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謬論呢！為什麼說“凡是蘇聯反對的，我們都要來試一試”，他既然未去過蘇聯却污蔑說“蘇聯青年道德敗壞”；當然他也未曾到過美國却堅信說“不管怎麼講，美國要比我們民主些”。這裡可以看出，他的敵對立場非常鮮明。口稱超階級，可是足跟牢牢的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他的思考方法和內容具有多麼深刻的資產階級偏見！儘管他如何的標榜超階級“追求真理”，但實際上他是在純客觀“追求真理”的幌子下否認了真理，這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觀察問題的必然結果。

我們是需要獨立思考的。可是什麼才是真正的獨立思考呢！我們說只有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在馬列主義原則指導下的，以人民利益為前提的獨立思考，才是人民所需要的、真正的獨立思考。而獨立思考必須有事實的根據，憑借於實事求是的調查研究及科學的分析，絕對不能是憑空的狂言亂語。

我們黨一貫教導青年一代要具備對新鮮事物的敏感，具有獨立思考及勇於向反動保守思想作鬥爭的精神。回頭想想：我們前一代的青年，在黨的教導下，堅決摒棄了當時的正統思想，樹立了革命的觀念，即使在白色恐怖與死亡的面前，也從沒有放棄他們堅定為勞動人民解放事業而鬥爭的決心。他們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進行獨立思考的精神，可以作為我們的典範。革命勝利後，為了使落后貧窮的祖國變成先進和富強，千千萬萬青年也建立

了說不盡數不完的功勳。年青的地質工作者，在專家的幫助和指導下，打破了資本主義國家專家的謬論，為祖國找到了巨大的石油礦藏和鐵山。先進的煉鋼工人張明山、王崇倫經過了刻苦鑽研和獨立思考，使生產提高了好幾倍，甚至幾十倍。這些英雄事蹟是數也數不盡，說也說不完的。再看在右派分子向黨進攻的陰雲籠罩着清華園時，站穩立場的同學們，不顧最惡毒的咒罵和攻擊，挺身而出捍衛社會主義事業；北京印刷一廠的工人同志們，一眼便看穿了反動刊物“廣場”的本質，堅決拒絕排印。這樣具有高度獨立思考的人物，報紙上、生活中到處可見，正是由於他們，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才穩如磐石，使右派分子碰得頭破血流。

由此可見，我們黨教導青年人要善於獨立思考的目的是鞏固我們社會主義制度，加強我們人民走向繁榮幸福道路的速度；而右派分子們提倡的所謂“獨立思考”實質上是為了破壞運動，瓦解社會主義。他們偷換了“獨立思考”的概念，把造謠、污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論調說成是“獨立思考”，而把堅決擁護黨、相信黨的人丑化為“盲從”、“綿羊”，借此來顛倒黑白，迷惑青年，引誘青年走上背叛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可見在在同一獨立思考的口號下，卻具有完全不同的階級內容。右派分子夏永年就是牢牢站在資產階級立場，懷着資產階級偏見，引用一些捏造的事實的材料，以獨立思考為掩護，重復形形色色社會主義敵人的濫調，以期破壞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事業。

最後我們要正告右派分子夏永年，美麗的面紗掩蓋不住骯髒的面孔，還是老老實實剝下來，在羣眾的幫助下，徹底改造自己。

## 揭發和批駁右派分子夏永年的 資產階級人生觀

張煒芝

在有些人的印象里，認為夏永年是一個既聰明又天才，而又善



於独立思考敢於大胆怀疑的一个人；不但要求进步而且是个团员。

实际上，他是使用着政治上兩面派的手法，表面上伪装进步，内心里在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他不仅政治上反动，思想上也是一个極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

一、首先看看他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崇拜和他極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

还在中学阶段，由於他家庭父母和周围环境的影响，在他心灵上，就种下了资产阶级墮落腐化、追求享乐的种子，使他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玩弄女性、出入舞場、賭博等这些下流勾当感到兴趣。認為这种生活最愉快、最自由。因而到处宣扬美国，說什么我国和苏联青年生活得很教条，只按一条公式；而美国阿飞式的腐朽生活是活潑有趣。他又和落后同学一起，在学校里捣蛋、鬧事。解放后七、八年，他思想上仍然留恋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对麻醉人的爵士音乐，他特別感兴趣，也欣赏美国的电影，認為我国和苏联的电影，都是千篇一律公式化。

在一次团小組会上，大家討論革命的人生观时，他說：“只要一个人的慾望，能得到满足就是幸福。就有生活志趣；资本家他那有什么革命的人生观呢？！不也过得很幸福么？！”

誰都知道，资本家所用的每一分錢上面，都渗透着劳动人民的血汗。他却羡慕这种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他所追求的，就是个人的名利、地位和享受。他幸福的标准就是个人慾望的满足。告訴你！抱着这种極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到任何时候，你永远也不会找到真正的幸福和愉快！因为你个人的慾望永远得不到最終的满足！

真正的幸福，是建筑在多数人的集体利益基础上的。当一个人为了劳动人民集体事業，尽到了自己的力量，做出了一点点贡献时，他才会从内心里感到愉快和幸福。这是在劳动中可以体会到的。

夏永年为了得到个人的名利，他曾說：“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遺臭万年！”这是资产阶级腐朽透頂的人生哲学，为达到个人的名利、为了出人头地，显示自己，他可以把千百万人民的痛苦和灾难完全

置之度外。夏永年竟把这种资产阶级的衣鉢，作为他的决心和意志。难道你想做一个禍国殃民的英雄嗎?! 人民是不允許的!

就是在平时的生活里，夏永年自私自利的表現，也是十足；在接人处世中，为满足他自己，从不考虑別人。他的狂妄自大，盛气凌人的高傲神气更是十足；他瞧得起的人是微乎其微的，好像誰都不如他。平时，他也經常散佈他所主張的个性解放和絕對自由。他認為只有願意幹啥就幹啥，才可以發揮他的天才和独立思考能力。

从夏永年的过去到現在，从个别的到經常的表現来看，他的思想深处早已滋長了極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而且是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的人不为己，天誅地灭的人生哲学，夏永年是全盤繼承下来啦。

他竟还利用他的人生哲学，污蔑“社会上人人為自己，大家加起来的总和，还是為自己”。这种荒謬絕倫的說法，在事实的面前是不值一駁的。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事業，多少革命先烈貢獻了自己的生命。像黃繼光、邱少云、方志敏烈士，难道他們是为了自己嗎?! 在防汛工作中，有的黨員同志，因奋不顧身的搶救別人，而英勇的牺牲了，这又是为了自己嗎?! 这样的英雄事蹟，在今天的社会里是数不清的。沒有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又怎么能有今天呢?!

他們的生命是寶貴的，但他們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他們献出了一切，甚至生命。这种舍己为人、大公無私的精神是工人阶级的本性、是无产阶级的人生观的具体体现；也是生活在新社会里的每个青年所應該具有的品质。在这种高尚的道德品质对比之下，夏永年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显得是多么卑鄙！渺小！

## 二、政治上的兩面派手法：

从上面，我們清楚的看到了，夏永年是一个極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为了取得个人的名利、地位、达到向上爬的目的，他是不擇手段的。为了騙得組織上的信任，他使用了兩面派的手法。

### 1. 对組織的态度：

当庄一安退团时，他說：“入团没有什么意思，退团倒也是好办

法”。一位高級人員說怕党团员彙報時，他說：“团员倒沒啥，就是黨員。”他又在一位高級人員的面前說：“我入团后，从沒講过真心話。”可是在鳴放會上，他公开說：“肅反時，为了保留团籍，不得不做个假檢討，其实在思想上並沒解決問題。”

可見，他不願意留在团內，却苦苦的想办法保留团籍，目的当然很明显，要借团员的进步称号，达到他向上爬的目的。这种口是心非的兩面手法，是多么卑鄙！

他不但混进团內，而且要求入党。“八大”學習后，他向組織表示：这次學習收获很大，自己要努力爭取入党。而实际上，他是从內心里往外反对党、仇視党。当从报上看到葛佩琦要杀共产党的反动言論時，他拿報紙到处給人看，他說：“你看，这有道理呀！說得多痛快！多尖銳！”不但如此，他还从根本上否認了階級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把黨員污蔑为綿羊、盲从。这样的人却要求入党，其用心是很清楚的！

### 2. 对留苏的态度：

他說：“苏联的技术不多，雜誌內容不丰富、苏联的科学技术都是抄襲英美的”，他也認為苏联是一个侵略的国家，可是他却要求留苏。

### 3. 对政治學習的态度：

他怀疑客观存在和历史發展規律；認為这不过是为了維護自己統治的一种說法而已。他也不相信政治經濟学是一門科学。他說：“为什么到社会主义以后的部分，要以苏联代替呢？是不是为苏联服务的，硬說成是客观法則。”

我們說：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以后的部分用苏联來說明，不是更现实，更具体嗎？他的中国革命史的考試是优秀成績，可是他却否認階級的存在，說革命是知識分子領導的。

夏永年对这一系列的最根本的問題，都是否定的态度，可是他考了五分，我們要問你，你是怎样昧着良心，在欺騙自己，欺騙組織的？真难为你竟能背到五分的程度！口口声声說別人是教条主义、死背硬套！还是看看你自己！

上面这些就是右派分子夏永年，在政治上兩面派手法的具体表现。就是在生活上，对周圍的人，他也是表面一套心里又一套（事实很多，这里不多說了）。

从上面，可以看出夏永年是一个具有資產階級人生观，在政治上又要兩面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和对資本主义生活方式的留恋、向往，是他政治上反动的思想基础。由於他所留恋的資本主义生活方式和他的絕對自由的思想，得不到滿足，而感到处处不自由、不愉快，对新社会不滿。

开始，从思想感情上对新事物不滿，但随着年齡、知識的增長，仍然以資產階級的观点、立場，去看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情，自然会發展到对政治制度的不滿；感到公有制不如私有制好，今天的社会不自由、不民主、党不能代表人民利益，是独裁專政等等。所以說坚持資產階級的思想必然会导至政治上的反动，这就是使得夏永年成为一个右派分子的根本原因。

从社会上暴露出的右派分子来看，無論党内党外的，有相当数目的右派分子，是从思想上严重的个人主义进一步發展而成为政治上的右派的。他們斤斤計較个人名利、地位、物質待遇，在个人慾望得不到滿足时，就对党对新社会不滿，这种人不能正确的分析事物和观察問題；也不能正确地处理个人和組織的关系。这就会从不滿發展到仇視，而成为右派。这里，我們得到一个經驗教訓：对个人主义思想，不作及时的糾正，任其發展下去，在适当的土壤和气候下，就有可能發展成为政治上的右派分子（当然不是說：凡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都会成为右派）。我們必須要时刻警惕个人主义的危害，努力克服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个人主义，逐步培养大公無私的革命精神，把自己鍛鍊成为真正的革命的知識分子。

夏永年，你要想改造自己的話，就必须徹底放棄你資產階級的人生观和反动立場，向工人階級投降，否則只有絕路一條！

刻骨的仇恨、狂妄的野心

## 澈底揭露徐志国的反党面目

吴明瑜

右派分子徐志国是办公厅專家工作处的翻譯。他一貫的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滿、仇視。这次党进行整風，他說：“最近是广开言路，我應該部署自己的做法了”。他認為自己已經“悶得太久”“痛苦得很”，要“趁此开砲”。他說自己对党的意見“像黃河的水那样多”，要“决口”。因此，他“要抽時間准备和收集一些材料，在理論上充实自己”，以便对党对社会主义的进攻能够打得“有把握”，“击中要害”。

但是，徐志国的“砲”不是輕易就放的，他要“选择时机”，“取得羣众支持”。当“时机还不成熟”的时候，就在背地煽动羣众，进行点火，企圖利用別人的嘴來說他要說的話。

办公厅开始整風时，党支部邀請工会、青年团共同組織了領導牆报工作的小組，徐志国也参加了。可是他在背地却說要“反对有党员参加牆报小組”。並且私下到处張貼匿名大字报，捏造事实，挑撥离間，破坏办公厅整風运动的正常进行。办公厅工会委員曾互推一位党员担任工会主席，徐本人也是工会委員，他却鼓动工会副主席說：你的选票多，为什么她当主席。亲自准备筆墨，企圖强制別人写責問党为什么要“派”党员当工会主席的大字报。整風期間，有的同志向党员提出善意的批評之后，他就去拉攏，說“你很勇敢”，“我現在对你的看法改变了”；甚至無恥地說要以表妹相許，企圖以此来离間党羣关系。

到了徐志国認為“时机成熟”时，他就亲自出馬，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他在日記里面写下了自己行动的部署。他說：“我的砲面不要广，要集中打击”办公厅党支部副書記和專家工作处副處長二人。他捏造事实，用了許多惡毒的人身攻击的字眼写了一張大字

报，謾罵办公厅党支部副書記是“丑惡的面目，骯髒的灵魂”，是“瘋狗”。這張大字报立即遭到几十位同志的駁斥，他又繼續貼大字报誣蔑这些同志是“怕入不了党”，“不敢得罪領導”。徐志国这种破坏活动，引起了許多同志的义憤，和他展开了数小时的尖銳的辯論。因此接連一天半左右的时间，办公厅以至院部有些同志沒有安下心来做工作。徐志国在日記上总结他的进攻的战果时说：“我非常高兴，这是多么好的鍛鍊机会，应该爭取这种机会，甚至制造这种机会”。

徐志国对專家处副處長更是充滿着無比的仇恨。他在日記里不惜成篇累牘的咒罵她，說她是“寄生式的廢物”，要連根鏟掉，要“剝奪做人的称号”。这难道是帮助党整風，善意地帮助同志改正缺点的态度嗎？恰恰相反，这正說明了他对我們的党、我們的黨員同志是仇視到極点，在他眼中，这些黨員（即使有些缺点），根本不配叫做“人”！

这不过是徐志国向党进攻的第一步。他还咒罵整个办公厅党組織，咒罵一切和他接触过的科学院各方面的黨員領導同志。他要求去文学所，未成功，就罵王平凡同志“殘酷”，“厭惡透了”；他和杜秘書長一車回来，就罵他“陰陽怪气”。他表面上說張副院長、裴秘書長如何爱护他，“簡直像父亲一样”，背地却写大字报謾罵他們是“丑惡的官僚主义者”，並且捕風捉影的写小品文說他們“庸俗”，“裝作”。这充分地反映了徐志国的階級感情的本能。他仇視的、痛恨的、誣毀的是我們党，是我們党的幹部。

同时，他还極力为右派分子辯护，反对我們的反右派斗争。他公然在团支部大会上說右派分子敢於向党“提意見”，是“可爱的人”；批評办公厅同志对右派分子沒有从“團結”出發，不應該“疏远”右派分子。並且誣蔑办公厅反右派斗争是主观主义，不是“有一駁一，有二駁二”，是扣“大帽子”。人民日报批評了文匯报的資產階級方向，他却說文匯报的“內容新穎多采”，並且表示要从讀者角度写稿去肯定文匯报的成績。文艺界批判右派分子吳祖光、丁玲、刘雁宾等人，他則为之惋惜，直到9月9日晚間，他还去大右派

分子吳祖光家中，發洩自己对党的仇恨，安慰和鼓励吳祖光說：“运动过后，你仍应本着作家的良心，拿起筆繼續写你認為應該写的东西，写对人类有益的东西”。其实，他所空喊的“对人类有益”只是对资产阶级有益，應該說这是他和吳祖光的共同語言。

不仅这样，徐志国还對於我們偉大的党、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對於我国勤劳勇敢的人民，對於为广大人民所热誠敬爱的領袖用尽一切惡毒的字眼进行誣蔑和攻击。

从他的五年来的日記可以看出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感的强烈已达到何种程度。当然这也不过是他的供詞的一部分而已。胡風事件公布后，他就說：“要以極大的兴趣注意着事件的發展”。果然，他确是胡風的私淑弟子。他的日記中用了胡風式的筆法，充滿着这种陰險而又故意裝成隱晦的字句，来掩盖他的反动面目。即使这样，他对党、对社会主义、对人民領袖的誣蔑仍旧是十分露骨的。我稍举些例子說明一下：

### (一) 誣蔑領袖、誣蔑人民和誣蔑党的領導

当他听到“东方紅”的歌曲时說：“每一个字都刺进了我的心房”。他責問我們“中国革命难道靠毛澤东一人嗎？”斯大林逝世，全世界人民感到悲痛，他却說自己是表面上以沉痛的声調給大家讀报，实际上是“笑不能抑止”。这又是什么样的感情？

难道他是反对个人崇拜嗎？絕对不是。我們中国的人民革命，經過了多少次的失敗、困难。我們的党初期在陈独秀、王明等錯誤路線的指导下，曾遭受到莫大的損失。自从确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領導以来，我們的革命事業从此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新的胜利。現在全国人民已摆脱了反动时代的倒悬的痛苦，走上幸福的生活道路。毛主席是我們革命事業的正确的領導者、偉大的舵手，是我們人民勤劳智慧的集中表现，是我們党的偉大的代表。我們尊敬毛主席、热爱毛主席、歌唱毛主席不是很自然的嗎？这决不是什么个人崇拜。我們的党和毛主席从来就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早在1942年，党就一再強調要加强集体領導，反对个人專

权。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为了迎接胜利，党特别作出了不做寿，不送礼，不以人名作地名等规定，这些都防止了骄傲自满和个人崇拜的产生和发展。毛主席正是我国人民传统的谦虚的性格的体现者。在八大开幕词中，主席还一直教导我们“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恰恰相反，徐志国才正是一个典型的个人崇拜迷。他相信自己的智慧、信心，崇拜自己是天才、大人物。他竟然说出这样的话，相信自己是“天生的领导者”。似乎他像封建帝王为了欺骗群众而捏造的什么自己是“真命天子”“紫微星下凡”一样了。他还说他这个领导者要“像太阳从东方出来那样为全世界所公认”。大家看，他竟要全世界人民为他唱一支“东方红”。这和他诬蔑毛主席的话不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吗？很显然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所以攻击毛主席只是为了他梦想取而代之，他梦想推翻党的领导，他梦想统治人民。

徐志国还说：“人民都是盲从者”，“一人喊万岁，几万人跟着喊”。他认为人们拥护毛主席不是出于真心，是“成功了，人们都来奉承、颂扬”。告诉你！徐志国，这不过是反映了你自己有这种“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反动思想。而和人民衷心诚意的拥护党、拥护毛主席是毫不相干的。从党成立的第一天起，经过了各种艰难困苦以至各种失败，但是一切有良知的、了解真象的善良的人民，并没有来“打击”党，而是衷心的拥护党，支持党的斗争，拥护毛主席的领导。也正是由于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爱戴和拥护，才有今天的胜利。

反过来，看一看蒋介石、日本鬼子，不是取得过暂时的胜利吗？可是那时除了汉奸、反动派之外，又有那个正直的人来歌颂和赞扬他们呢？人民是一贯地在和他们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斗争的，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还不是明证吗？

徐志国还诬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是让工人在前面充死，党员却在暗底下工作，贪生怕死。这简直是莫大的诬蔑。我不用多举事实，我只要问一下徐志国你在上海长大的，难道就不知道共产党员



王孝和的偉大的革命事蹟嗎？千千万万的黨員为了人民革命事業，站在斗争的前列，吃苦在前，英勇奋斗的事实，就連我們的敌人也是無法抹煞的。你却为什么要这样来造謠誣蔑呢？徐志国还誣蔑我們党用馬列主义欺騙羣众，来吃人！他在日記上写道：“聰明的人会用主义、公理来使被噬者‘噬之無怨’。……使他們甘願跑上祭台充当牲品”，这是多么毒辣的攻击。馬列主义是全世界工人革命斗争的結晶。我国人民多少先烈为寻找革命的真理而流血牺牲，是党、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队——中国共产党創造性地掌握了馬列主义，並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教育我們广大人民，使我們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使我們懂得了什么才是人类的真理！可是徐志国竟然这样的进行誣蔑謾罵，难道不是为了挑撥党和羣众的关系、攻击破坏以至企圖推翻党的領導嗎？

徐志国在1953年2月5日的日記中有这样二句話：他說“死者的血已染就活人的荣誉皇冠，活人的肩可曾挑起死者放下的担子”。用心是很明显的了，他責罵党沒有担負起人民的委託，言外之意，不就是說要他才能“挑起这付担子”嗎？要由他来代替党的領導嗎？

## (二)徐志国仇視新社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解放前，中国人民过着牛馬不如的生活，工人、农民和广大劳动人民遭受的政治上的压迫，人格上的侮辱和殘酷的剝削是多么的沉重悲慘，只要稍有头腦的人是完全了解的。就說我們青年知識分子，解放前大多数人在發愁生活、失学和失業的威胁。我們为了取得一点兒自由民主权利——學習的自由，进行了多少斗争，遭到反动派的多么殘暴的鎮压。我在上海讀書时，国民党反动軍隊要駐到學校来，把我們赶跑，要把我們新造的体育館拆掉改建炮楼。我想許多同志都是經歷过各种学生运动的斗争的。解放以来，人民生活逐漸走向富裕安定了，人民当家做主了。入学的青年人数一年年在扩大，新的学校一个个地建設起来，失業的人数一天天在减少，建設一天天在發展。革命對於我們，只是失去了一付鎖鍊，而获得

了这么多的美好幸福的东西。过去成天愁眉不展的人民，现在脸上呈现出微笑了。

可是徐志国又是怎样看待我们的新社会呢？

他在1954年10月26日的日记里写道：今天“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经历着苦难的折磨”。他狂妄地宣称他要给中国人民“解除”这“苦难的桎梏”。他还说什么他会给“人类带来幸福和微笑”。我们解除了锁链，他却说我们带着桎梏；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获得了幸福和微笑，可是他说要他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和微笑。

徐志国痛恨我们的党，痛恨我们的新社会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把我们的党诬蔑成古代荒淫残暴到极点的夏桀，他引用商汤伐桀的誓言说：“时日曷丧，余及汝偕亡”。而且还说要“决心实现”它。为了要推翻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竟说出宁可与“汝偕亡”的话来，也就是说为了消灭党宁可同归于尽。大家看！他和党，和我们的新社会竟有如此不共戴天之仇。所以他还在日记里面写道：把“我现在存在这世界的生命当作是第二生命，当自己已经死了一次，那样我就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来大胆的创造出一切”。他竟想用这样“亡命之徒”的决心来对付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了！

徐志国的这种疯狂的野心正充分体现了被我们推翻了的反动统治、反动阶级的复辟要求。

徐志国这种企图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的阴谋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他是早有深谋远虑的。

早在1953年他就这样说：“我相信自己将来亦能同样受到全人类的尊敬，我的名字也将响遍全世界每一个角落，我的名字将活跃在全人类的心中，我的事业的光芒将照亮了全世界”。他竟想创造一个所谓“徐志国主义”来代替我们人类的真理——马列主义。徐志国还一再恬不知耻地把他这种狂妄的政治野心描写为青年人应有的理想、抱负。究竟他的理想是什么呢？我不用多说，也引用他在54年日记里的一句话就可以说明，他说：“我坚信在廿、卅年以后，朝鲜、蒙古、甚至於日本他们会合併於中国的，而我亦会成为这

工作的推动者，亦是我将来的理想之一”。請看，这究竟和我们新中国的青年一代的理想、抱负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这简直是帝国主义侵略分子的口吻！

新中国的青年，经过多年来党的教育，我们知道只有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实现共产主义事业才是我们的远大理想，也就是我们新中国青年的共同抱负。这是崇高的抱负，伟大的理想。有多少先烈志士为了追求共产主义的前景而牺牲流血，以至贡献出自己的生命。李大钊、方志敏、董存瑞、刘胡兰、黄继光……。现在在我国各个角落里，各种事业中，各个战线上，又涌现了多么多的青年积极分子，虽然他们各有不同的志愿，不同的职业，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农民，有的是解放军，有的是教师、医师、科学工作者等等，但是他们都全心全意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为建设祖国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着。他们从不夸耀自己，从不考虑自己如何“成名”，如何“响遍全球”，而他们的辛勤的劳动、平凡的劳动，他们的血汗，却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才是我们青年人应有的理想和抱负哩！对比之下，不是很明显了吗，徐志国所谓理想、抱负，不过是美化了的极端腐朽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的代名词而已。

当然徐志国这种野心，在我们今天的新社会里是不可能得到顺利实现的，就如他自己说的“我的野心很大……在现实生活中会碰得头破血流。因此，他认为他的命运受人控制了，他认为“每天受着鞭笞”，他感到“痛苦得很”，但是他又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徐志国说他的“理想如果十年之内不能实现，就要发狂”。他又说，自己不能实现，还要教育他的子孙后代继续为实现他的“理想”而奋斗。因此，我们就很自然地可以想像到，徐志国当他的野心得不到实现时，会怎样的不顾一切的起来反党反社会主义了。终于，由于思想上的反动发展到政治上的反动；由于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发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徐志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手法也是极其阴险毒辣的。

徐志国不仅打入团，还企图钻进党内进行破坏活动。他在1954年2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我和×谈了入团问题，为

了將來我要使自已这样去做,这是一种手段,我这样做是会有成績的”。果然,以后被他混进团內来了。但是,他又說,入团是为了进一步好混进党,因为党規定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入党,必須是团员,所以他以入团作为入党的“一种手段”了。

他在1955年3月18日的日記上曾写道:“做一个非党员同样可以造福人类,作一个民主主义者又何尝不可呢?”他对他爱人表示並不想作党员的。可是到了1956年12月,他又說:“我得出了一个結論,如果要实现我的理想,我非入党不可”。說得多么露骨呀!他入团只是一种手段,入团入党不过是为了將來实现他的理想!他根本不是为了党的事業而要求入党的。这里暴露了徐志国企圖从堡壘的內部来攻破我們的党、我們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陰謀!

徐志国还是一个腐化墮落、道德敗坏的坏分子。同时玩弄几个女同志,勾引有夫之妇。而且他自己說在玩弄別人的时候,为了准备將來翻臉,要抓些把柄在手。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徐志国对孔厥之流的坏蛋發生惋惜的感情,原来是“同病相憐”!

事实証明,徐志国是一个对党有不共戴天之仇的右派分子,是一个表面上在歌頌我們而背地里却在謾罵我們,企圖打倒我們的兩面派的右派分子。我們必須警惕!我們一定要坚决地和他斗争到底,斗争到他澈底投降,認罪,改造自新为止。

徐志国只有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罪行,澈头澈尾的进行改造,才有重新做人的机会!

## 揭穿徐志国的兩面派

于家珊

右派分子徐志国在昨天大会上所作的空空洞洞和自我歌頌的發言,又一次地表明了他至今还没有向人民低头認罪,同时也表明了他是一个典型的兩面派。今天,我代表專家工作处来揭穿徐志国的兩面派。

徐志国的兩面派，如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实际上只有一面，就是一貫反党、反社会主义。徐志国的日記就是最好的証据。在他全部的日記中，从来沒有一句話是歌頌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他从不把我們的領袖称作为毛主席；或毛澤东同志，而是仇視万分地叫做毛澤东或毛；他把我們所憎恨的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叛国犯都打上了个引号。整个日記中充滿了对共产党刻骨的仇恨和杀气騰騰的反动野心。虽然，徐志国是这样仇恨我們的党和社会主义，同时，他又經常为自己的野心始終沒有实现而痛苦得不能再忍耐，叫喊什么“十年不成名，我就会發狂”，他要“冲破密密層層的束縛”去“放开喉嚨大叫几声”可是，几年来他一直沒有明目張胆地發洩出来，就是在牛鬼蛇神已經大批出动的大鳴大放期間亦是如此。因为狡猾的徐志国知道，今天我們的党是强大的，人民是跟着共产党走的，明目張胆地要打倒共产党只会使自己孤立，会立刻碰得头破血流，粉身碎骨。但是，徐志国的資產階級反动派的本質驅使他不能沉默，於是他便採用了極為陰險的和毒辣的兩面派手法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惡活动。

徐志国为了获得打倒共产党的政治資本，居然伪装进步混进了党内，而且还要混进党内。徐志国究竟对党是怎样看法呢？他認為我們的党就是一两个人的“御用工具”，他在日記中把我們的組織兩字一律加上了个引号，他說“共产党处处像防盜一样防羣众一手，監視羣众”，“羣众总有一天会拿起棍子，把党一棍子打死”。就是这样一个人仇恨我們党的徐志国，却要把“爭取入党作为一九五七年五大任务之一”，而且还是“非入不可”。徐志国从他切身經歷中深深知道，在今天要想推翻共产党，最好的办法就是混进党内，利用黨員作为幌子，从内部把堡壘攻破。这种孙悟空鑽肚皮的战术他从过去許多事件中，尤其是从胡風反革命集团事件中已經学到了很多，正如，在胡風反革命集团被揭露后，他在日記中写的：“我以極大的兴趣注視着这件事的發展，他，使我懂得了很多”。

徐志国为了掩盖自己兩面派的實質，还制造了一种謬論，作为他一貫奉行的人生哲学，这就是他在一九五三年一月的日記中写

的：“我認为最無情的动物就是人，殘酷、兇暴……極大多數的人的心是兩套的，表面一套是假的，而內心一套是真的，而每个兩套的人都戴有一付假面具……”。在这里他故意撇开階級本質来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抽象地談什么殘酷、温暖、兇暴、善良、爱和恨之类的字眼，其目的不外是掩盖自己資產階級的反动本質，为自己罪惡的活动寻找理論根据。其实，如將他这里所指的人具体化为資產階級反动派，則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因为他們之間（包括徐志国在內）的确就是这样。我們要問，徐志国究竟对同志、对人民是拿出他內心真的一套呢？还是“精工雕制”的假面具伪装下假的一套呢？！

徐志国的兩面派是很講究策略的。他認为周圍的人都是些“可怕的耳报神”是些“陰險”的人物，他“憎恨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說“世界这么大，却找不到一个知己”，他說“他踏进了社会的門，到处是猛兽，到处是棘，到处是虛無莫测的东西”，因此，他得出結論說“我怎能不步步留神呢？！”，而且徐志国还在日記中写道：“我必須經常提醒自己要时刻檢点自己，如果被別人抓住把柄的話，那將对自己是不利的，而且会連說話的响亮也沒有了”。实际上徐志国却正是这样做的。举几个例子來說，当反右派剛剛反到他头上的时候，他就开始为掩盖自己作了一系列准备。首先他鬼鬼祟祟地查封日記，用毛筆把最露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字眼塗了去，並把日記寄回了家中，把一些更重要的文稿燒毀了和隱藏了起来，至今不肯交出。又如，他还对自己在大鳴大放时期的言行暗暗地作了一个自我檢查，結果他很得意，在日記中写道：“我沒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論，我不怕，讓他們去搞好了，党中央在北京”，他自以为他的兩面手法耍的高明，伪装得很巧妙，可是他錯了，他得意的太早了，在羣众雪亮的眼睛下他終於現出了原形。

徐志国还繼承了胡風的主觀战斗精神。他經常教导自己要善於“控制自己的感情”，“要学会冷靜”，“即使是痛苦，也不要流露在臉上”，“要学会忍受痛苦，使痛苦变成欢乐”，“要拒絕別人的安慰，埋头的幹！幹！幹！”，於是他就把自己对党、对同志的仇恨用一付

“笑臉”伪装起来。明明是他心里恨的人，他会“装着笑臉，去和他握手，找話題談話，送他出門”，是他厭惡的人，他会用最动听的詞句，用“客客气气”的办法去恭維他，会“請她去吃飯”。同时，他还为自己的兩面派，裝璜上一个“美丽”的、帶有“文艺性”的名詞，叫做什么“双重人格”！

徐志国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的日記中写道：“从我生活經驗中我有这样的感觉：凡是在一个生疏的新的集团中，如果你是活躍的話，那么你会引起这一集团的人的注意，如果你再能很好的做出一些成績，那么，對於你是有利的”。由此可見，徐志国是很懂得如何巧妙的来伪装自己的，而且他懂得实际行动的意义，怪不得他經常鞭策自己說：“要幹！埋头的幹！只有幹才能使理想变成现实”。接着这些所謂的“宝貴經驗”，徐志国到了科学院后，根据新的情况，对自己的活动作了佈署，制訂了一九五七年五大任务，作为具体的行动綱領，以便騙取領導和羣众的信任，积累政治資本。五大任务之一到文学所去，就是为了以文学所作据点，以文学作跳板，便於踏上政治舞台，这一点連徐志国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因此，我們决不能小看了像五把刀子一样的五大任务，要澈底粉碎它，使它不能实现。拟定了行动、綱領之后，徐志国便裝出一付“热情”“天真”“可爱”的面孔，欺騙过一些人，施展着吹、拍、拉、打的兩面派战术，到处进行活动。

为了达到出国的目的，徐志国到处探听有哪些代表团要出国的消息，經常到那些和院領導有工作接触的同志那里表示亲近，献殷勤，甜言蜜語地求他們帮帮忙，在領導面前多为他說些好話。不仅如此，他还亲自三番五次地向張副院長提出要跟代表团到苏联去的要求，吹嘘自己的“才能”，口口声声保証能胜任翻譯任务。他趁新年机会又給張副院長送上了精制的賀年片一張，恭維張副院長为“全国科学界的領導者和組織者”。他又趁張副院長向全院作傳達“八大”报告休息之机会，特意跑上台去，前去握手，祝賀他报告成功。在一次反右派的会上他还假惺惺地說：“我对張副院長、裴秘書長是十分敬佩的，他們对我父亲般的关怀使我深为感动，怎

么能设想，我会去反对这样的领导呢？”可是，他内心的一套究竟是怎样的呢？他张贴匿名大字报，向报社写小品文，污蔑张副院长等是丑恶的官僚主义者，是庸俗，是装作。这就有力的揭露了徐志国口口声声说热爱领导、拥护领导的丑恶嘴脸！

为了达到下所的目的，他在专家工作处副处长面前用最动听的词句恭维说：“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最好的、最使我满意的领导，我对你一点意见也没有”，可是在日记里他却骂他是一个“寄生式的废物”，他要“把他清除出去”，要“剥夺他做‘人’的称号”，看！徐志国是多么的恶毒和卑鄙！其实，徐志国才是“寄生式的废物”，失去了做“人”的称号。

为了达到下所的目的，徐志国又背着组织，私自和文学所联系（对于这一点，徐志国还恬不知耻的向别人宣扬说：我很善于作“地下”工作），他先后给文学所办公室主任王平凡同志和叶水夫同志写了五封信，信中吹嘘自己“从十五岁起就开始了业余的文学创作”，“发表了不少创作和译作”（其实，他根本没有发表过什么著作，他所谓的“创作”乃是变相的抄袭，如独幕剧“刘胡兰”，以及译文改编，如儿童独幕剧“铅字在哪里？”），他恳求王平凡同志不要再残酷的拒绝他，并说：“如果我将来在文学事业上会作出些微小成绩的话，我将永远不会忘掉你的帮助”，并恭维水夫同志说：“您是我从中学就慕名的益师”，请求水夫同志收下他这个苦口婆心要进师门的徒儿。并且他还用两面三刀的手段当着王平凡同志面说处里领导已同意，而当着水夫同志的面又说王平凡同志已答应他到文学所，企图混水摸鱼，鑽到文学所去。可是，当他的花招被揭穿时，徐志国就把人家骂个狗血喷头，然而，即使是这样，徐志国，正像他经常教导自己那样，还是用“客客气气”的办法，用“笑脸”去乞求人家，徐志国就是这样一个笑里藏刀的人物！

由于他的反动阶级的本性以及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所决定，徐志国即使伪装的再好，自己的尾巴也不能一点不暴露。然而，他却打起两块招牌来掩护自己，迷惑青年，一块是“我是有棱角的青年”，另一块是“我是善于独立思考的青年”，长期拒绝批评，拒绝思



想改造。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办公厅对他的右派言行进行了揭发和批判，他的态度十分蛮横和顽抗，在大会上常常面对着揭发出来的事实死不承认，常常沉默达数十分钟之久，不作检查，一直到今天他还没有主动交代出什么新东西，他的书面检查至今还没有交出来。更恶毒的是，在会上他还继续施展两面派手法，来掩盖自己的反党罪行。他提出“我不是攻击党，我只是对个别党员有意见”，然而日记里却留下了最好的供词，他写道：“我有自己一套做法的，我的砲面不准备广，集中打×和×”。又写道：“我应该提醒自己，火力要集中，不宜分散，要取得群众的支持”。很显然，他的进攻是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而且他还继承了胡风的衣钵“先打开一个缺口，然后再泛滥”的策略。

徐志国还提出所谓“反对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并不是反对党中央”的谬论，企图用这种偷天换日的手法，掩盖自己反党的本质和污蔑办公厅对他的批判。至于徐志国是不是反对党中央，在他的日记中已有肯定的答案，我们单就这一论调本身来看，也是极端荒谬的。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按一定的组织原则来行动的，全党的思想和行动统一要靠它的广大基层组织来保证，撇开党的基层组织，去谈什么拥护党中央只不过是一句骗人的空话，这如同把你攔腰一刀截断，却硬说，我并没有要割你的脑袋一样的恶毒和阴险。

当他的花招被一一揭穿后，当他的日记中反动言论公布以后，他在大量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不得不表面上软下来，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表示要老老实实作交代，可是，背地里却写了一篇日记说：“我现在是先给自己扣上一顶帽子，然后再去找寻、拼凑、甚至创造一些事实，显然，这些事实愈聳人听闻，愈反动，似乎表示交代的愈彻底，愈忠诚，我现在已不是根据事实来给自己戴帽子了……”。当这篇日记被宣布后，他却否认事实的说：“我的检查的确是真实的，不是给自己乱扣帽子……”。从这里可以看出，徐志国是多么虚伪和狡猾！

最令人气愤的是，在九月十一日处公厅的大会上徐志国装作

一种十分悲痛的声調說：“我感謝大家对我誠懇的帮助，我將終生不忘，終生不忘，我要革命，我要改造，我要脫胎換骨地改造自己……”。可是，还在九月九日，这个口口声声說要改造的徐志国居然跑到大右派分子吳祖光家里去了。他称右派分子吳祖光为吳先生。为了騙取右派分子吳祖光对他的憐惜和同情，他說自己是一个孤兒，沒有家，父母兄弟姐妹都沒有，說他生前的父亲是徐鑄成和严宝礼的朋友。实际上，徐志国有家，家在上海，而且他父亲、母亲、还有哥哥都还健康的活在人間，可是为了卑鄙的目的，他竟連自己活着的父母哥哥都咒罵他們死掉了，这極為露骨地暴露了他的兩面派丑惡的面目。他攻击我們是“六亲不認”，其实，依我說，徐志国才是地地道道的“六亲不認”呢！右派分子徐志国还欺騙右派分子吳祖光說：“我現在为了自己写的一些文章的观点問題和对你的欣賞而受到了批判”，又說“我不服气，他們对我是一筆抹煞”，說“現在批判一个人連对的也全說是不对的了”。說：“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見你一面，因为我要离开机关到农村去了”。徐志国他作賊心虛，不敢承認自己是徐志国，却改名为藍明，並說：“我知道在这个时候到你这里来是不方便的，也可能你会向我的組織彙報，組織上又会追問我为什么要到你这兒来，可是，这些我在打电话找你的时候就已經考虑过了”。

同志們！我們仅从以上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右派分子徐志国是一个典型的人面兽心的兩面派！兩面派是最令人可恨，也是最毒辣的了，因為他們总是戴着含笑的假面具，每天混在我們中間，暗地里幹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惡活动！

徐志国虽然才 21 岁，可是他渾身上下已經浸透了資產階級反动派的腐朽气味。他和今天我們党所教养的，忠誠老实、表里如一的新中国青年毫無共同之点。今天，我們揭穿了徐志国这样一个慣用兩面派手法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右派分子，对我們每一个青年都是一場極為深刻的教育！

## 談談右派分子徐志国的反动思想本質

譚北生

徐志国所以是右派分子，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什么？

从徐志国的材料和同志們的發言中可以看出，徐志国是一个在思想上仇視人类，在灵魂深处孕育着極端反动狂妄的个人政治野心的右派分子。徐志国的世界觀，浸透着法西斯的思想先驅、德国最反动的哲学家尼采的唯意志論，他認為他的意志可以决定一切。在他的日記里面，多次痴人說夢般地叫喊他的信心、意志、智丰和力量。他相信自己可以“剷除”一切，“創造”一切。他幻想在血泊中追求个人的权力意志，这就是他的思想本質和人生目的。徐志国的思想之所以極端反动，就在於它根本否認客观規律性。它不仅要使历史倒退，而且要按照他的意志来“創造”历史；它不仅是逆革命之潮流而动，而且在根本上与我們的时代毫不相容。

在他的日記里，在他的思想中，已經把自己封为“天生的領導者”，他还“要用自己的生命大胆地創造出一切”。在他看来，他周圍所接触的革命幹部甚或我們的某些負責同志，都是盲人、聾子、算盤珠、廢物，或是給他穿大衣的。可見，在他的心目中是沒有人民羣众的，對於广大的劳动人民，也只能受到他这个“天生的領導者”的“拯救”和“恩賜”。这种早已經过了时的帝王思想和元首思想又在今天要想出現在我們的面前，只是讓人們觉得好笑。因为誰都知道，历史并不是什么英雄人物所任意創造出来的。社会历史，首先是各种按照客观規律依次更替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因为这是構成社会生活真实基础的事物；历史也首先是生产物質資料的劳动羣众的历史，因为人民羣众用自己的劳动創造了一切偉大的物質財富和精神文化財富，發展了社会的生产力，把历史推向前进。我們也承認傑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但也只有那些善於跟先进階級

和羣众結合的傑出人物，並且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起着加速或迟緩事变进程的作用。因此归根到底，並不是英雄造时势，而是时势造英雄，也就是說，是人民創造了英雄並推进了历史。更何況，在人民已經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的今天，妄想騎在人民头上的徐志国，根本就不是什么英雄人物，他的思想已經反动透頂了，因此他所堅持的信念，除了做我們的活教材之外，是別無用处的。

其次，徐志国的思想，也必然使他否認階級和階級斗争，抱着“强者噬弱者”的反动观点来看待我們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了追逐个人的权力意志，他向往战争，搞武装，对外侵略，說什么他的理想之一就是要把朝鮮、蒙古、日本“合併”於中国，甚至幻想着如何“佔領”电台和对兒童施行毒化的思想教育，在已經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我們国家里，在世界各国人民爭取和平民主和維護民族独立运动空前發展的今天，他还夢想着法西斯的血腥統治。这种極端反动極端狂妄的政治野心，像嗎啡針一样刺激着徐志国这个嗜毒的人，向人們發出兽性的仇視。

徐志国的这种思想是非常可怕的。可怕的並不是因为他会搞起武装来，“主持整个世界”；可怕的是这种思想驅使着徐志国走向反动的道路。

还在今年二月，徐志国在他的日記中写道：“我將來会有孩子的，我應該教育他們，讓他們从小在腦子中就有为人类做出最大的貢獻的想法，讓他們有着成为政治家、領袖的想法，”又說：“我想我的孩子應該是我的事業的繼承者，……即使，我可恥的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失敗者’，那么我的孩子会比我更有出息。”看来，徐志国的雄心确实不小。他也許还未結婚，他已經在計劃怎样培养他的事業的繼承人，計劃怎样培养他第二代的“天生領袖者”。現在，我还不知道他对自己未來的孩子究竟还抱着什么样的想法。徐志国的年紀不大，但他的反动思想和反动立場却是根深蒂固的。我說，不管怎么样，徐志国还是死了你这条心吧！拿破崙的傳記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我想你一定是下过工夫仔細研究过的。他們的結局是怎么样呢？而在今天，徐志国，把你估計得再高，你也

不过是一个偉大的螞蟻！

徐志国还說过，十年后他的理想如果不能实现他会發狂的，又說帶着抱負和理想埋入黄土是最可恥的。其实，不必等到再过十年或等你埋入黄土，今天，你已經是最可恥的了。徐志国，你只有全盤交代你的罪行和反动思想，澈底批判自己，洗心革面，从今而后老老实实做人，这才是你的唯一的道路。否則，你將像垃圾一样，为我們这个偉大的时代所拋棄，最多不过是給社会主义的土壤增加一点点肥料而已。徐志国，你的年紀还輕，还有你的大好光陰，但是何去何从，只能由你自己选择。

## 从徐志国的日記中来看他的反动本質

蕭光先

我代表技术科学部全体同志發言，我們听了徐志国在大会上的發言以后，感到非常憤慨，徐志国过去从来也沒有而現在仍然沒有絲毫認罪悔过之意，他把早在一个多月以前办公厅第一次批判右派分子徐志国大会上的一套假話原封不动的搬来繼續欺騙大家，他把自己乔裝成为一个仅仅是狂妄自大、个人英雄主义的人，其实不然，他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是一个澈头澈尾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混进共青团內的叛徒。今天我們要剝掉他偽裝的外衣，摘掉他給自己戴上的狂妄自大，个人英雄主义的帽子，揭露他的反动本質。我們把徐志国的日記和胡風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对照一下，不难看出，他們是有着共同的反革命特点，主要提出以下四方面：

### 一、仇視党，仇視新社会，仇視人民政权

胡風分子和一切反动分子对我們的党，我們的新社会有着刻骨的仇恨，胡風分子說：“对这个社会我憎恨，恨一切人。”胡風在給胡風分子牛汉的信中說：“我在磨我的劍，窺測方向，到我看准了的时候，我願意割下我的头顱抛擲出去，把那个髒臭的鉄壁击碎。”

徐志国呢？他也說：“我恨！我恨这种所謂人与人的关系。”又說：“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是經歷着苦难的折磨、考驗；我已經生存在世上，使祖国人民能解除苦难的桎梏，已是我的責任”，这就是他們對我們的新社会，我們正常的人与人之間的关系的共同看法。至於對人民羣众呢？他們也是一致的，胡風說：“現在是在一个罩子下面，許多讀者都昏昏沉沉的。”徐志国說：“盲从者实在太多了，亦因为由於盲从的緣故，所以，一个人喊了一声万岁，几万个人跟着一起喊。”他們就是这样来污蔑、歪曲人民羣众，当人民坚定的跟着共产党走时，他們就大罵人民羣众为盲从，是盲人、聾子、嗅觉失灵的人，不仅如此，更使人憤恨的是他們對我們領導同志的輕蔑态度，胡風用尽了“馬掛”、“老爺們”、“官方”、“豪紳們”等的惡毒字眼，徐志国呐，在他的日記中對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却用毛澤东来称呼，要不然就是用一个字“毛”，瞧！他有多大的口气。在他听了东方紅的歌以后，又說：“我真奇怪，难道中国革命的成功就依賴了毛澤东嗎？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歌詞），难道沒有他中国人民死了不成？”，那么，我們現在倒要反問徐志国，难道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是毛主席領導的嗎？难道今天中国人民在高度覺悟下發奮的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設是盲从嗎？我們還要問难道中国人民現在是在經歷着苦难的折磨而要等待着你来解除嗎？

## 二、陰沉、灰色、歇斯底里的瘋狂情緒

一切反动分子對於人民的天下都是看不慣的，他們夢想着他們的天下，他們的“世道”，順他們的心，如他們的意。但是，遺憾得很，他們的夢想實現不了，他們是做為一个人生長在中国，那么，就不得不生存在我們的社會里，不过，他們是像蝙蝠一样見不得太陽的人，他們都必然具有一种不同於尋常人的觀點和感情——陰沉、灰色、瘋狂、歇斯底里。时时刻刻都流露出他們那种敌視人民事業的惡毒心機，胡風分子們是这样，徐志国也是这样，請看吧，胡風說：“在我們人民的社會里是籠罩着絕大的苦悶，許多人等於帶上了枷，像小媳婦一样經常怕挨打的存在着。”又說：“感到空气很窒

息,压制自由宛如被鎖在籠子里的猛兽,周圍还鑲上密不通風的鉄板”。徐志国在他的日記上写道:“我每天受着鞭笞,受着折磨,忍受着永不甘为人控制的控制”,他認為現在是受着管束,而且是密密層層的管束,在人民的天下里誰会这样难受,我們有这样的感觉嗎?沒有,只有一切反动分子才有。正是这样,我們人民羣众大喜大庆的日子,他們就会感到疼心和刺心,我們的好事,他們認為是坏事。人民革命胜利了,胡風分子就感到不妙,我們發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他們就看成是封建潛力的瘋狂杀人,我們的国庆遊行,徐志国就感到刺心,我們認為現在是大好陽光的天气,胡風分子却認為枯黃的叶子正在紛紛下落,正在腐朽,他們的所謂“莽子”会茁壯地生長起来,徐志国則把我們的今天說成是“死气沉沉”像冰洲一样冷酷,是个羣盜如麻的紛乱时代。

但是,畢竟客觀事物不是他們的主觀想象,他們得不了勢,於是便时常發出歇斯底里的喊叫和悲鳴,胡風分子阿壠喊道:“好的,讓人們瘋狂,从瘋狂里灭亡”,徐志国也大喊:“时日曷喪,余及汝偕亡”。

总之,我們高兴,他們就悲伤,我們認為不幸的,他們就拍手鼓掌,这就是所有帝国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反动階級代理人的共同情調。

### 三、有策略,有計劃,有步驟

為了他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企圖,他們知道必須要积蓄力量,因此,他們运用了一系列的策略来达到这一目的。

(1) 鑽进堡壘。企圖混进人民內部来进行他們的反革命勾当,胡風反革命集团就是採取这种孙悟空鑽进肚皮里去的战术,他們有的混进了共产党,有的打进革命团体內探听情况,盜窃文件,而这一套徐志国也用上了,徐志国不是这样說嗎:“組織这两个字对我的‘所去的路’有帮助的,为了將來,我要使自己这样做,这是一个手段。”又說:“我得了一个結論,如果要实现我的理想,我非入党不可。”徐志国是深深懂得胡風反革命集团的这一套手段。

(2) 要忍耐，要沉着。他們知道在今天人民的中國是無法猖狂的公開進行反革命活動，因此，他們就用這些忍耐啊，沉着啊來告誡自己，胡風是經常這樣來教導他的黨羽，說：“要忍耐，要沉着，要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一切為了事業，為了更遠大的未來。”徐志國也一樣，經常這樣來檢查自己說：“要有最大的忍耐，要忍受着，要學會冷靜。”在反右派時他還說：“要高高兴兴的來迎接這場大風暴，要從這裡面來接受教訓，吸取經驗。”徐志國現在就是抱着這種態度來假檢討一番，企圖以此來搪塞過關，等候時機，將來再起。

(3) 埋頭工作，培植基礎。胡風分子的手法是要學，要做，要掌握小刊，要埋頭工作，搞好基礎，要準備條件，不要在陣地未鞏固前就放槍，徐志國則要求自己要有臥薪嘗膽的精神，他在日記中說：“理想的實現不是空講高腔，而是要爭取，實幹，踏踏實實的去做。”他也要準備條件，搞好基礎，因此，他就想盡辦法來實現他的第一步就是一九五七年要做的五件事，什麼進文學所啦！辦院刊，爭取出國，要求入黨，翻譯書。

(4) 耍二面派。以此來爭取羣眾，胡風口口聲聲要“爭取人，聯絡人”，徐志國也照樣，當面奉承，背後謾罵，他在日記中寫着：“一些不想接近甚至厭惡的人，但又必須為了搞好關係去和他們在一起。”又寫道：“我想在自己的事業中獲得更多的朋友。”由此，顯而易見，徐志國就是為了他的反革命事業用這種卑鄙的手段來爭取人，企圖獲得同盟者。

#### 四、反革命分子是不會懂得客觀規律的

他們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觀主義的、形而上學的，因此，他們的估計也必然是錯誤的，但是，他們這樣一個腐朽的、註定要滅亡的反動階級本能都老是引導他們在想，他們自己是怎樣的了不起，革命力量總是不行的，他們總是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過低的估計我們的力量，如胡風在給路翎的信中說什麼以五年為期並不悲觀，意思是尚須五年他們的反革命活動可勝利，徐志國竟然也大喊其十年！十年！徐志國，你以為十年以後你的所謂事業就勝利了



嗎？你認為十年後就能推翻共產黨讓你登上天安門，成千萬的羣眾向你招手歡呼嗎？你做夢，社會發展規律告訴我們人民中國一定是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歷史決不會倒退，你若再繼續這種癡狂的妄想，將會被歷史的車輪輾得粉碎。

從以上四方面對照來看，徐志國的思想感情及對我們黨、社會主義的仇恨心與胡風有什麼兩樣呢？的確，正是徐志國在日記中所寫的：“我以極大的興趣注視着這件事的發展，他，使我懂得了很多。”這個他，就是胡風。徐志國還寫道：“從胡風事件中仔細的研究、推敲，可以看出一些東西，獲得一些東西的，那就是鬥爭是形形色色、復復雜雜的，無論是軍事、思想各方面都好。”看來徐志國還勝過了胡風，他不但搞文藝，搞思想，還要搞軍事，搞細菌。

從這樣一個活生生的對比里，我們會學到什麼呢？正如人民日報編輯部在“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序言中所說：“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將為兩方面的人們所注意。一方面反革命分子將注意它。一方面，廣大人民將更加注意。”是的，反革命分子和有某些反革命情緒的人們，將從胡風分子的那些密信中得到共鳴，並從那里得到某些反革命的階級鬥爭的教育，但是不管怎樣，總是無救於他們的滅亡的，胡風分子走了這條路，徐志國不也是在人民羣眾面前碰得頭破血流嗎？我們將從這件事里再一次的得到教訓，因此，我們決不能麻痺，我們決不能草率收兵，反右派鬥爭必須深入，再深入下去！

## 幾個右派分子的特點

尚山羽

看了我院五個右派分子的材料，使我大吃一驚。感到這五個青年右派的反動言行，較之我們在報紙上看到的其他右派言論，有過之無不及。我感到把幾個右派分子的共同特點在這裡談一下，是有必要的。

这些共同的特点,我以为有三个:

第一是狂妄自大,野心勃勃。像夏永年所說的,要反对就要反对党中央。我們知道像右派分子儲安平,他要向我們党中央进攻时,虽然是極尽誣蔑之能事,但还不敢直接提出要反对党中央。他还在那里借題發揮、玩弄花样。夏永年比儲安平干脆多了。直接了当的提出要反对党中央。項志遴則罵党中央胡塗,好像只有他才不胡塗。

最狂妄的是徐志国。他要在辽阔的世界上振羽飞翔、要去平服一切;要乘汽車或飞机到大电台向全世界人民进行广播、要把他的名字活躍在全人类的心中。他的事業的“光芒”要照亮全世界。而且相信將來会有印着他的像的徽章出現,他要推动中国把朝鮮、蒙古甚至於日本合併於中国。且認為世界史上將会有徐汉明或志国思想及主义出現,他要成为主宰者。看到了宪法上規定三十五岁才有权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便大为生气,認為他至迟在廿多岁就应当被选为主席、三十五岁实在太晚了。他自認為是个天才的领导者,應該像龙那样吞云吐霧,縱橫四海……。

請看一看这位年龄才 21 岁的青年,狂妄到何等地步了! 同志們也許認為这是笑話。同志們! 这不是笑話,徐志国說的很明确。这些目的,並不是說說就完事了。到了时候,他会行动的,而且要以臥薪尝胆的精神去做的。

第二是向往資本主义,公开提出要恢复資本主义制度。例如項志遴公开提出恢复資本主义企業的自由竞争。何肇講只有用自由竞争和淘汰的資本主义方式,才能發揮个人的积极性。夏永年認為我們国家的选举制度不如西方国家那样民主自由。要求改变选举制度,認為应采取資本主义国家的竞选办法。認為在解放以前上海的資本主义企業对人民很方便,認為企業只有采取資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方法才能办好。

第三是死抱个人主义不放,个人就是一切。例如夏永年說:社会上人人都为自己,那么大家加起来的总合反正也还是为自己。認為生活的意义就在於一个人的慾望和要求,能够得到滿足,这样就

算幸福。他公开地羡慕资本家，認為他們生活的很幸福。

何肇也講，他根本不相信人会不为自己着想，不相信会为人民服务。照这位右派的說法推論，以前为革命奋斗牺牲的先烈都是假的，他就認為所謂党的老幹部也都在追求个人利益；所謂黨員的修养也都是虛偽的。因而他公开提出要用一切是为了个人名誉地位来鼓励个人上进。至於徐志国那就更不用說了。他虽然曾經加入青年团，但他自己講，入团不过是为了达到个人野心的一种手段。

从上述几个右派的共同特点看来，他們之淪为右派，是这种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像他們这样狂妄自大、野心勃勃、對於資產階級的一切都感到衷心的覬覦，怎能不对党对社会主义感到痛恨和仇視呢！因此，我們必須狠狠地对这些反动思想进行斗争，只有澈底揭穿了这些謬論，才能澄清我們的思想，坚定我們的立場，巩固我們社会主义革命的偉大事業。

这几个右派分子的狂妄自大，是很驚人的。但也証明了他們的幼稚和無知。他們被資本主义的毒汁灌醉得瘋言浪語，竟不知道天高地厚，讓人憤慨，也讓人好笑！

这些人牛吹的很大，是否真有很大的本領，我們沒有發現他們的天才，委屈了他，以致怀才不遇，因而产生了不滿呢？我看不是的。譬如夏永年，他是不承認有什么階級的，說階級是人为的。这种資產階級的謬論，只能說是一种沒有常識的重复。階級的存在並非馬克思主义者独有的見解，連有些資產階級的学者已經早承認了。而右派分子夏永年却仍然重复这种論調，我看只能說明他的低能而已。

这些人口口声声在想念着資本主义，好像資本主义是什么寶貝，离开它們就不能生活似的。正如夏永年說的，他們的丑惡目的就在於要按資本主义那一套，达到个人慾望和要求的滿足，从而騎在人民头上为所欲为。当然，我們現在的社会不能實現他們的妄想，因而，仇恨新社会，仇恨領導新社会的共产党，猖狂地反对党中央，明目張胆地喊党下台。不难看出，他們的灵魂是多么齷齪！

最后,我要警告这些右派分子,你们已经步入歧途,走到绝路中去了,应该大吃一惊,赶快回头了。你们今天上午的检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只有痛下决心,真诚悔改,才能使你们从已陷入的泥坑中拔出来。

## 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科学才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

陸学善

亲爱的青年同志们，我很高兴今天能够同你们在一起参加这个两条道路的斗争。青年是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絕大部分的青年在各个岗位上都在忘我地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全部的力量。但是遺憾的很，在我們的队伍内，却出现了几个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青年右派分子，他們和其他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样，用各种各样的無恥謔言来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和攻击我們的帶路者——共产党——，想使资产阶级的死尸还魂。對於这些青年中的右派分子，我們只有把他們的謬論——加以严詞駁斥，希望他們認識錯誤，痛改前非，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今天我預备針對右派分子何肇的不要党领导科学的問題用我亲身所經歷的事实来駁倒他的荒謬言論。

首先必須指出，何肇的說法，只要仔細一看，是跟章伯鈞等主使下民盟所提出的所謂“對於有关我国科学体制問題的几点意見”这份徹头徹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綱領有“異曲同功之妙”的。何肇的“保护科学工作不受到各种摧殘”，正和意見書中所提出的所謂“保护科学家”的口号一模一样。何肇反对科学规划，意見書中主張把“研究工作”去“就人”，實質上都是主張科学事業各自为政，都是要使科学工作陷於無政府状态，不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右派分子何肇基本上否定了了解放以来党领导科学工作的成績，他以为在党的领导下不可能保証科学工作所必需的空气和陽光。同志们，科学工作所必需的空气和陽光究竟是什么呢？我以为，科学工作所必需的真正空气和陽光正好就是党的领导。科学有了党的领导才能够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

解放以前，專門搞科學研究工作的有兩個機構——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在反動統治下的二十多年內，這兩個研究院各搞一套，互相傾軋，各有靠山，鉤心斗角，甚至連科學工作者之間還分什麼英美派、法國派等等，互相歧視，不通聲氣。如果拿來跟解放以來中國科學院成立後黨所進行的團結、組織、教育和改造科學家的工作所獲得的效果來比一比，那恰好是一個鮮明的對照。國民黨反動政府本來不過把科學事業當作一種點綴品，當然談不到有什麼科學方針。研究院的經費一向少得可憐，尤其是北平研究院。我還記得有一年鑄學研究所全年外匯只有美金二百元，區區這幾個錢能作什麼用呢？結果只買了幾根水晶管子。十多年中，全所一直只有五個人，我既負責行政領導，又是唯一的研究員，還得兼管文書和會計、出納、採購等工作，每月發薪時要親自去銀行把大捆但又不值錢的鈔票坐一個多小時的電車背回所里。還有一件我永遠忘不了的事是，當時有一具感應電爐，因戰事存放在當地的堆棧里，戰後我千方百計想要領出來安裝，但籌集這筆運費和堆棧費卻化了兩年多功夫，研究工作當然也因而停頓了兩年多。去年秋天，我們所向蘇聯訂購的一具感應電爐，現在已經運到了實驗室門口，正等待我們去安裝。同志們，究竟那一個政府重視科學工作，支持科學工作，究竟那一種社會制度對於科學工作有保障，還不明顯嗎？

提到解放以前的黑暗年代里青年科學工作者的遭遇，更使我不勝感慨。儘管剛從大學畢業出來的青年懷有多少遠大的理想，願意為科學事業貢獻出他的青春，但是一踏進研究院的門，拿着少得連飯都不夠吃飽的工資，受着資產階級社會的譏笑和白眼，工作的熱情就漸漸地被現實所破滅了。解放前跟我做工作的青年人，最久的在鑄學研究所呆了兩年，有些人不過幾個月。我記得有位姓林的同志，來了三四個月就回到杭州家里去了，好久沒回來，當我寫信去催問他為什麼不回來時，他回信說，因為沒有棉衣服過冬，要等到設法湊集款項做好棉衣後才能來上班，我聽了心裡很沉重，我理解他的困難，因為那時我自己的日子也是顧了吃顧不了穿，

做一件棉衣对知識分子來說真是一个大問題啊！物質生活的清苦且不必說，知識分子还無时無刻不在提心吊胆地担心着迫害；那时特务惡霸，到处橫行，只要不順他們的眼，那末不幸的事便会降临到头上來。在这样暗無天日的恐怖統治下，科学工作者連性命都沒有保障，更有何保障研究工作之可言。但是右派分子何莽却說：“解放前科学家，只要有能力就可以‘有所作为’，可以按自己意圖办事，要仪器要圖書要人都有办法”，这真是徹底的瀰天大謊。解放前要是有这样的科学家，可以按自己意圖办事，样样都有办法，那末这些是什么人呢？那只是些个别的卖身投靠反动头子的所謂“科学家”，他們的“有所作为”，也不过是諂媚主子的“資本”而已，跟真正的科学事業是毫無共同之点的。

解放以来根本变了样。只要有眼睛有耳朵的人，誰能看不見听不到这短短八年內在生产战線上所完成的震惊全世界的事蹟。这些輝煌的生产建設，正好为科学工作者开辟了更廣闊的前途。党教导我們：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理論要联系实际。党教导我們：科学事業要能有效地服务於社会主义建設，必須要有計劃有組織。在社会主义改造正进入高潮的时候，党向我們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在党的领导下，我們已經有了十二年發展远景规划，向我們指出了我国科学技术發展的远景，从而鼓舞了我們的創造热情。同志們，在物理学的領域內，像原子核物理、半导体物理、低温物理等等是我們在解放前連想像都难以想像的，但是在这短短的八年中，我們已經建立了發展的基础。

再拿我們应用物理所的發展情况來說，1950年我来北京时，各級研究人員一共才10个人，現在已發展到125人（不包括外来實習的研究人員120人在內），而且絕大多数的青年同志都能刻苦鑽研，全心全意想为建設社会主义尽一臂之力，經過几年来的不断努力，不少人已經能够半独立进行工作了，有些人还为生产部門解决了好些迫切問題，有些人写出了学术論文。右派分子說党是外行，不能領導科学，說“今不如昔”，說學習苏联学坏了等等，只要看一看这八年来的成績，就是給他們一記响亮的耳光。同志們，中国

从古以来没有一个政府曾对科学事业有过像现在政府这样的大力支持，也没有一个时代科学工作曾有过像现在这样的蓬勃气象，这是铁的事实，决不是右派分子的无耻谰言所能抹杀得了的。

右派分子何肇说，“党在青年和科学家之间造成各种隔阂，使他们之间无法建立正常的、人与人、同志与同志之间的诚恳关系。”这真是恶毒的污蔑。跟我一起工作的青年同志一共有五位，其中有两位是党员，两位是团员。但我从也没有感觉到我们之间有什么隔阂。我们在学习上互相切磋，认真讨论，我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子弟，他们也都尊重我，我身体不好，他们在生活上也处处照顾我，天下雪了他们怕路上滑，自动地扶送我回家，同志们，这难道还不能算亲如家人吗？什么力量使我们青老科学家之间相处的这样融洽呢？这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都想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来把我们所从事研究的这个科学部门在中国国土上打下坚实的基础，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的年龄虽然不同，但我们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士，一条船上的水手，在党灯塔的照耀下，群策群力，向着社会主义建设方向在前进！

同志们，党指示我们方向，党鼓舞了我们的勇气。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科学才能有波澜壮阔的前途。只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相结合，科学工作者的事业才能有成功的希望。这次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时也给我们一次深刻的教育。我希望同大家一道，不断地改造自己，在党的领导下，向社会主义的大道迈进。

## 只有党才能领导社会主义科学事业

彭桓武

许多右派分子反对党对科学的领导，我现在就这个问题谈一谈。

下面谈一下党的领导。从道理讲起来很简单，刘少奇同志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在“党的领导”一节里说：“在我们国



家的社会主义事業中不可能沒有無产階級專政，而無产階級專政是經過無产階級的政党——共产党的領導來實現的。共产党的領導的力量，在於它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武器，有正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有丰富的鬥爭經驗和工作經驗，善於把全國人民的智慧集中起來，並且把這種智慧表現為統一的意志和有紀律的行動。不但在過去，而且在今後，為了保證我們的國家能夠有效地處理國內和國際的複雜事務，都必須有這樣一個黨的領導。這是全國各階層人民和各民主黨派根據實際生活所共同承認的。”

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設的工作中，也有極少數同志曾經企圖削弱黨的領導作用。例如民盟的科學綱領就是這樣。他們把黨對於國家各方面工作的方針政策的領導問題同單純技術方面的問題混淆起來，他們認為黨對於這些工作的技術業務還是外行，因而就不應當領導這些工作，而他們則可以獨斷專行。我們批判了這些錯誤的觀點。黨應當而且可以在思想上、政治上、方針政策上對於一切工作起領導作用。當然，這不是說，黨應當把一切都包辦起來，對一切都進行干涉。也不是說，對於自己不懂的事情，可以安於做外行。黨要求我們的幹部和黨員進行艱苦的學習來學會自己工作中所不懂的事情。我們學習得愈多，就會領導得愈好。所以問題談起來很簡單。在具體上，我自解放以後，與黨領導有過一些接觸。雖然我並沒了解很多，可是可以由一個科學家角度，看一看黨近年來在科學院作了些什麼。近年來接觸到的如思想改造、五三年以來的每年訂計劃、院內所內黨員幹部數量的增多和力量的加強，又成立學部，訂五年計劃，十二年規劃等等各個方面；還可以看到，黨領導着科學擴大了隊伍，改進了工作條件。還有，這次反右派鬥爭及整風運動，從一個科學家角度看出來，這裡面也有黨的領導。雖然我看到的還很不全面，但這幾年來看到黨的領導逐步深入及擴大，並且發揮黨領導的力量。為什麼黨能領導呢？劉少奇報告中說得很清楚：“在於它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武器，善於把全國人民的智慧集中起來，並且把這種智慧表現為統一的意志和有紀律的行動。”在實際工作中，的確也體現出來如此。所以，黨在解放後

六年的短短時間內，就可以在全國範圍內提出第三個五年計劃末的時候把我國科學在最主要及最急需的部門接近世界先進水平；使外國的最新成就，經過我們自己的努力，很快地就能達到，這樣一個任務，黨領導知識分子來解決。黨在解放戰爭以後，在這方面確實沒有幾個人；在短短幾年中就摸清了科學界的情況又要提出趕上世界水平，純就科學上講，與過去及與外國隨便什麼地方也不能比的。僅僅是提出這個任務也不是簡單的事，而且有信心解決這個任務。任何一個科學家沒有理由不認為這樣黨的領導是科學發展的幸運。知識分子、科學家很有信心在黨的領導下克服一切困難完成及解決這個任務。

最近看到于光遠一篇文章，說得更清楚。他講到黨對科學的領導主要是：

“第一，提出發展科學事業的方針政策擬定國家發展科學事業的計劃以及各種有關科學工作的制度；

第二，作好團結、組織教育改造科學家的任務，加強對科學研究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領導，批判各種錯誤的學術思想，幫助科學家了解國家的需要，加強和人民的聯繫；

第三，動員和組織各方面力量支援科學事業，保證科學家以順利工作的條件，推動各方面充分利用科學研究的成果，普及科學知識。”

使我回憶了一下以前科學院的情況，更能體會這几点，體會黨的領導作用。下面他又論證了只有共產黨才能完成這樣艱巨的任務。這篇文章我想所有科學院的人都應當學習，所以我不詳細引了。

我們再看一下反對黨領導科學的意見。那麼，應該誰來領導呢？最主要的一個意見就是說讓科學家來領導。可是讓那些科學家來領導呢？一定是讓那些反對黨領導的科學家來領導了，不然便不合邏輯了。我們看看，這樣將把科學領導到什麼地步呢？反對黨領導的人都反對思想改造，都是不肯思想改造的。如何搞呢？一個辦法便是回到解放前的情況。對解放前的科學我不太清楚，因為我只在國內教了一年書就跑國外去了。陸學善比我清楚，不過我

听到那时人非常少、房子非常小、錢也非常少。总之，只是起了个“花瓶作用”，点缀一下。对所内講，所長是在那里向政府要点錢；对政府講，所長只是因为有这样一攤子在那里作研究，所以要个官作。在那时，青年呢？大学畢業基本上就是失業了。只有極个别的，老师的好学生，十个人里也挑不出一个，給他鼓厉鼓厉或者送去留学。其他的，則教中学也好，失業也好就算了。留学的，有点成績或还没点成績的只是在那里爭天下第一。因为是“花瓶”嗎！里面一共很小的一点地方，花也插不了很多，所以要爭一爭是你能作还是我能作。在国外时就听說到，据說数学界华罗庚还有陈省身吵得不知道誰是天下第一。如分得細一点，每个人都能分到一个天下第一。何肇說，解放前只要学問好可以为所欲为。他應該問一問施汝为（現在他也入党了），便知道以前伪中央研究院时物理研究所的情况。解放前一共有四个小楼，这就算他們的高級宿舍。搞原子能的如吳副院長，那时还算很有能力吃得开了，可是也不过拿一点美金，什么也买不了，也沒搞出什么名堂。對於恢复到解放前的問題，年紀比較大一些的都可以知道。

不向半殖民地这方面走那就走英美資本主义的方向了，不过他們对我们留学生的估計还是过高了。我們在国外时与現在何肇在国内一样，也只是捞点本錢使得回来不致沒飯吃。科学上要爬得上去，在外国不同於中国，是不大容易的。資本主义比封建制度下的科学要先进一些，十年八年才能爬出一个，不过离开什么領導地位，还是差得远。能向政府提出很系統的意見嗎？也不能。过去知識分子只能为封建地主服务。中国历史上从来宰相沒领导过皇帝，公私合营以前的买卖里，算眼先生也不能領導老板，到現在，知識分子还能領導工农嗎？不允許也不可能。就这类問題講，知識分子如有能力，是有点騙人的能力。懂科学也就是唬人的。比如农业合作化，誰来領導呢？知識分子是領導不了的。

順便也可以提到一点，關於項志遴的思想来源，大家还不太清楚。所里开了几天会，搞得比較清楚了。他由1932年生下来到1937年的五年間，他还是一个小孩子懂不得什么事。由1937年他五

岁时起到 1948 年解放前他十六岁止他的生活，即他的社会存在，是在揚州大地主姨母家，和他的舅父——国民党的县长，后来又当汪精衛的科长一起生活的。这就是他思想的根源。这段时间内，現在他老拿出搖架的，也是我們所被他騙的，他的哥哥姐姐离他十万八千里，对他思想没什么影响。他的“知識分子领导工农”思想是由他舅父那里来的。他舅父是沒落的反动汉奸，沒落了，沒办法了，就只好想念念書；再憑一点知識来“领导工农”。

知識分子的缺点多得很。由阶级分析看，他既不能领导反动的剝削阶级也不能领导进步的無产阶级。因为他不是一个阶级，过去只能卖身投靠於某一个阶级。現在則不同，說我們知識分子工农化，因为这不是卖身投靠於工人阶级。知識分子要作领导的唯一可能，就是工人阶级化。

周恩来在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里，对知識分子的缺点講了很多，对一般知識分子也可以适用。青年知識分子現在表现出許多缺点，在团中央省市書記會議的報告中也指出了很多。我自己缺点也很多。我在反右派斗争中，要批判別人需要找点思想武器，也順便找到了兩句列寧的話，对我的缺点罵得痛快。列寧說“松懈、疏忽、大意、草率、举动急燥，要用討論来代替作事，用空話来代替工作的惡習，無事不幹而一事不成的惡習，是‘有学識人’底特性之一……知識分子往往能提供極好的意見，可是到了要实行这些意見时，他們却笨手笨脚，無力得荒謬絕倫。所以在这一方面，若沒有从工人和劳动农民出身的实际組織家的帮助，沒有这些人底领导作用，是無論如何也不行的。”\*这說明了沒有党和無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这就是說知識分子不改造，不工人阶级化是沒办法领导的，並且自己也做不好工作的。我体会，無論老科学家、青年都应坚决遵循党的领导，包括各方面，当然也包括科学方面，克服自己的缺点，克服外界的困难，使科学事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發展加快，才能完成党及国家事業的需要。

---

\* 見列寧：“怎样組織比賽”。

## 駁“党与科学家背道而馳”的謬論

鄭國章

右派分子說：“党不能領導科学”，“党是外行，把科学院总管不好”，他們又說：“党从来没有支持过研究工作的積極性”，这一些言論是絕頂荒謬的，是沒有任何事实根据的。讓我們看一看中国科学院这几年来發展的情况，这些右派言論就会不攻自破，我們也就可以看出党不仅能够領導科学，而且領導得很好，使得中国科学院有了很大的發展。

中国科学院是在1949年11月成立的，从成立到1956年底，已經先后建立了六十六个研究機構。从人員的發展来看，如果以1950年科学院里的研究技术人員为一百，到1956年底的研究技术人員已經增加到七百一十，科学院的經費也是每年都有显著的增加，如1956年的經費就等於1950年的二十一倍，絕對数值为六千六百七十四万元。过去的情况怎样呢？在抗日战争以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每年經費合起来最多不超过四百万元。再拿圖書來說，1950年科学院全院藏書大約六十多万册，到1956年底，根据不完整的統計，全院藏書已經达到三百万册。这一些事实不就說明了党对科学和科学事業發展的支持嗎？

由於党对科学事業的重視，使得我国的科学家在工作中發揮了積極性，解放后几年来，我国的科学工作者，在工农业建設方面，都作出了很多前所未有的貢獻，就是在基本理論研究方面，也得到了很多达到国际水平的卓越的研究成果。在这里，我只就中国科学院在科学出版工作的成就方面來說一說。在旧中国，直到解放以前的几十年中，出版过的学报不过只有二十三种，而且因为經費的困难，大部分的刊物常常被迫停刊，現在呢，仅仅由中国科学院出版的各学科学报已經有四十种（各大学出版的学报还没有計算在內），除此之外，各类通报有十种，譯报十四种，科学文摘六种。中

中国科学院几年来出版了学术性专门著作二百七十五种，其中有一些已经被翻译成外文，介绍到苏联和其他国家去了。这一些成绩是在旧中国根本无法获得的。

右派分子说：“党与科学家背道而驰：科学家要时间，党要开会，要搞思想”，我们要问：党真是与科学家背道而驰吗？请看看事实！

科学家需要时间，党就提出了保证科学家六分之五的时间进行研究。现在除了极少数负行政责任较重的科学家以外，除了在进行大运动的时期以外，绝大多数科学家的研究时间，都已经得到了保证。

就拿科学规划的会议来说吧，参加这一规划的科学家有几百位，苏联政府还派遣了十几位卓越的科学家来协助。这次会议的结果，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提出了五十七项重要任务，和为完成这些任务必须进行研究的五百八十多项中心问题。同时，也订出了实施的初步方案，这种规模宏大的科学发展计划是在我国历史上空前的，是在旧中国无法设想的。

右派分子污蔑“十二年科学规划将是一纸空文，不能实现”，那也让他们看看事实吧！科学规划中确定最关键的重点研究题目之一是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现在由于苏联的帮助，功率为七千瓩的重水型原子反应堆，能产生二千五百万电子伏的 $\alpha$ 粒子的回旋加速器，在今年内就要基本建成。这个事实就给右派分子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

党要搞思想工作，难道是和科学家背道而驰吗？不！正是因为科学家接受了党的教育，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的为科学而科学的思想，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我还打算提到我国的科学工作者，由于受了党的教育，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单就我国的中华医学会和畜牧兽医学会的会员来说，到朝鲜前线去服务的就有七千多名。1952年美国帝国主义灭绝人性地对中朝人民进行细菌战的时候，中国科学院的生物学家和中国的医学家、病理学家、细菌学家一道进行了坚决的反细菌战的斗争，获得了全

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积极支持。

以上我举出的部分事实，已经足够说明党不仅能够领导科学，而且也只有党的领导下，科学事业才能够得到发展。右派分子反对党领导科学的谬论，在事实面前，是站不住的，是要彻底破产的。

## 沒有党的领导就沒有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

王傳善

几个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他们对党在科学事业的领导方面所进行的恶毒的攻击和污蔑，使我非常愤慨。我用自己所看到的一些事实来驳斥他们的谬论。

### 解放前，科学界是满目凄凉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对科学发生了兴趣，很想将来献身于科学，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一些工作；同时也幻想着科学事业是如何的神圣，科学家如何为人所尊重。但是，当我在高中和大学懂得更多一些的时候，那还是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代，我却看到了一系列令人痛心的事情。那时挂着“科学家”招牌的学棍子是升官发财；而真正献身科学的学者们却贫无立锥之地。我记得曾经接触过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秉志老先生，他一身破长袍，穷得要命，只好叫儿子停学去当学徒。我看到我们学校的教授疲于奔命地到处兼课，为的是吃饱肚子。我们的系主任还开了一个烟纸店做生意。我从报纸上看到国外回来的学工程的留学生吊死在公园里。到解放前夕更是悲惨，科学家们不得不捣弄“大头”银洋，真是斯文扫地，那有一点受人尊敬的味道？

我也记得，从亲友中了解到所谓最高科学机构的中央研究院仅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个装饰品。他们根本就不重视科学。中央研究院只有两幢旧楼房，经费、设备等寥寥无几，当然也做不出多少

科学成就来。当时發展工業仅是口号，發展科学更是空談。我們学科学技术的人若無后台就沒有出路；即使弄到工作，也还是学非所用。記得1948年我們畢業的时候，極大部分同学找不到職業。有的人只好去跑單幫；有的人到商店去管賬；不少的人呆在家里。真是前途茫茫！什么科学、工業，吃得上飯，亡不了国就算是万幸的了。若不是共产党救了人民，也救了科学，那有今天这样的气象？那里来的科学院？那里来的这样浩浩蕩蕩的科学大軍？恐怕你們这些右派分子們还不知道在哪里混飯吃呢？能列身於科学工作者的队伍嗎？

### 党領導我們在廢墟上起家

解放后，我到东北科学研究所工作，也就是現在長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机械电机研究所的前身。土木建筑研究所也是从这个所分出的；此外，如金屬研究所，以及現在的自动化研究所、电子学研究所也是由东北科学研究所的人力、設備的支持而建立起来的。在当时，这个所接受的是伪大陆科学院的廢墟，房子都毀了，圖書都燒了，基本上是重新建設起来。在短短七八年的功夫，發展到現在这样的規模，分出了这么許多研究單位，若沒有党的領導又怎能想像？在国民党时代办得到嗎？我看一千年都不見得行。

### 科学研究工作必須有計劃，理論必須联系实际

記得在开始的时候，大家的确很混乱。党領導大家逐步修复了房屋，添置了圖書、設備，招聘了人員，准备了物質条件，逐步开展起研究工作。首先一个問題就是研究工作應該如何做？最初的时候，研究工作根本沒有計劃。研究人員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做了一段以后，想不幹就不幹；也有人終年拿工薪却不幹工作。沒有研究計劃，也就無法檢查掌握研究工作。自由倒是自由透了，但是研究工作是一片混乱，毫無成就。1950年时，党指示我們开始做研究計劃。做研究工作之前要做研究計劃，現在我們大家已經覺得是理所当然的事了，但那时却不然。当时我正做技术行政工作（像現



在所的業務秘書),具体就搞这工作,时常听到反对計劃的意見。有人說:“过去从来沒听說过要做研究計劃”;有人說:“研究工作本身就是要找未知数 $x$ ,既然是未知数又怎能做計劃?”的确,對於習慣於旧社会的“天才研究”、“学院作風”的知識分子們,做計劃当然是很不習慣的。但是不这样又怎能保證研究作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又怎能保證研究工作的互相配合、順利开展呢?由於党的說服教育,大家才提高了認識,对計劃慢慢重視起来。事实証明,研究計劃起了很大的作用,决不像何榮所說:“研究計劃仅是形式主义”。

何榮又說:“党的意見和科学家背道而馳”。我看正确的話應該是“社会主义的科学路綫和資本主义的科学路綫背道而馳”。在思想改造以前,我們那个研究所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题目是从兴趣出發,既不为国民經济所需要,也沒有什么学术价值。像有一位同志曾提出要研究“超音波洗衣服,洗筷子”,諸如此类的題目不少。仍旧是党領導我們走向了正确的方向。党再三強調“理論联系实际”,指出科学研究工作必需面向生产,符合国民經济的需要;批判了脫离实际的学院式的研究作風,才逐漸使大家比較踏实地結合实际地工作。几年来,不單在国家建設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解决了一些技术問題,也通过具体工作培养出一批科学幹部。像我們这么一批青年人在初到所的时候,对科学研究工作完全是門外汉,毫無实际經驗,理論基础也差。若不是通过实际工作,是不会很快就成長起来的,这完全要归功於党。

### 知識分子需要改造思想

右派分子何榮說:“科学家是爱国爱真理的”。的确,我国極大部分的科学家是爱国、爱真理的,但不是全部。像臭名远揚的胡适、丁文江、朱家驊、陈立夫之流都是学科学的,你能說他們爱国嗎?何况一切旧知識分子由於其階級出身及社会影响,均帶有相当濃厚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往往为科学而科学,却不知道搞科学为谁服务,甚至为反动階級所利用!有的則把學問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

向人民討价还价的本錢。“学而优則仕”，十年寒窗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發財，这样的例子难道还少嗎？当我初到东北科学研究所的时候，各个研究室研究組內，新老科学家之間，老科学家之間經常鬧不团结。当时所內有一个組就是典型例子，組員瞧不起組長，彼此間也瞧不起。有次选工会某职务时，全組七个人就提了七个候选人，每人一票。很多同志有亲美、崇美、恐美思想；也有一些人幻想着蔣介石再来，甚至在电影里看到蔣介石的相片时还感慨地說：“一日不見，如隔三秋”。有些人則掛着做研究工作为名，背后幹的是自己資產階級的一套。天津有个七星照相材料厂，这厂的資本家在1951年时，曾以“首先制出了国产全色干版”向毛主席报喜；並且由於这些产品而获得鉅利。但是資本家的科学研究机构在那里呢？就設在东北科学研究所內！有一小部分人瞞着組織，用公家的材料、設備和全部的工作時間，全心全意地为資本家服务。还拿資本家的津貼。項志遴及何榮等人說：“科学工作者的政治就在研究工作上”；“工作好就是思想好，就是进步，衡量一个人是否脫离政治主要是看他的業務工作”。前面我所举的例子中，那些人業務工作都是很好的，研究工作不能說不努力，但是能說他們政治好嗎？像他們这样的思想难道不需要改造嗎？难道依靠这样的科学家能够發展我国的科学嗎？为什么項、徐、何等人要反对思想改造，認為“不必要”，“太粗暴”，“副作用太大”呢？

党教育大家，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使絕大多数科学工作者們提高了認識，改变了立場。而右派分子却說：“三反、思改、肃反等运动搞糟了，破坏了人和人之間的关系”。这完全是胡說，通过这些运动，人和人的关系是更好了，而不是更坏了。以不团结著名的旧机械电机研究所自动化研究室的同志們可以为証，我們現在消除了隔閡，团结起来，新老科学家之間也更团结了。一方面是老科学家改造了自己思想，有了很多进步；另一方面是党不断教育青年要尊敬、团结老科学家，不要只片面看老科学家。哪一点像右派分子何榮所說：“党团在青年和科学家間制造出了各种隔閡”？我曾在研究所內做过五六年的青年团工作，从未听到过党在青年中散

布科学家是个“病人”的落后言論；正相反，党不断地教导青年人要团结科学家，但並不是像右派分子所說的“限制、利用、改造”而是一方面帮助科学家自我改造，另一方面要尊敬科学家，向科学家學習，把科学家当良师、長者看待。为什么何肇等右派分子要有意歪曲党团结科学家的政策，而且說“科学家和青年之間关系不好，党应負主要責任”呢？显然是別有用心，要想挑撥科学家和党組織間的关系。

我們看来，正由於党对知識分子进行了思想教育，我們大家才明确了工作的方向，研究工作的勁头也就更大，成績也就更显著。以我們所为例，所內每一个同志不論高級低級研究人員全是努力學習，提高業務的，晚上或星期天的時間也抓得很紧。一点不像何肇所說“現在青年人不在乎工作，上进心不强”。但在1952年之前，那时我們的确有很多青年人上进心不强，对工作和學習是抓得很不紧的，远远不如現在。也許只有像他所建議“要用一切为了名譽地位来鼓励个人上进”的少数人現在才不在乎工作，沒有上进心。但是假如党附合他們要求，放棄思想改造，鼓励資本主义方式的積極性，那一定会大批造就出錢偉長、曾昭掄之流的人才，而不是現在千万个忠心於社会主义事業的科学工作者們。

### 一定要學習苏联

党再三教导我們向苏联學習。的确，沒有苏联的帮助，沒有我們大規模的向苏联學習的热潮，我們的科学技术不可能达到現在这样的水平。但是，右派分子們却对此大加攻击。徐芻、項志遴等說：“苏联科学技术不如美国”，“苏联人关心我們还不如我們关心朝鮮人”。他怎么就忘了，沒有苏联的援助，物理研究所的反应堆能不能建成？美国会不会来帮我們建立？計算技术代表团去年从苏联要来了全套資料。“美国計算机多”，但他們給不給我們？給不給我們資料？右派分子說：“美国好”，但是我們都看到的，为什么美国要扣留我們的留学生，而苏联却派了大批优秀的專家来协助我們建設？美国是我們的敌人；而苏联是我們的朋友、兄弟。虽然美国

的科学技术有不少先进的地方，但是苏联是我们的榜样，先进的地方、好的地方更多。我们也向美国学习，但是重点向苏联学习是完全应当的。片面宣扬敌人的优点，强调向敌人学习，又是什么立场？

在六、七年前，我们很多研究人员对此是认识不清的，对英美盲目崇拜，对苏联技术怀疑。我们自动化所的一些同志和我自己都一样。但是党教育了我们，几年来我们通过学习苏联，才初步掌握了自动化的新技术。解放前，大学里没有自动化的课程，我国也没有一个这方面的专家。51年时，我们开始搞自动化。捧了英文的“伺服机械原理”和“网路分析及反馈放大器设计”为圣经，搞了一年多，进步很少，成绩也没有。只有后来掌握了俄文工具，学习苏联的文献，才有了很大提高，开展了工作。我自己是搞运动学的，我敢说从启蒙入门到现在，我依靠的完全是苏联文献，并且经过通信关系得到苏联科学家的指导和帮助。在这方面苏联肯定比美国先进。我们自动化所的同志敢说：正因为我们学习苏联，得到苏联同志的热情帮助，我们自动化研究所才能顺利地建立，我们祖国的自动化科学事业才能够如此蓬勃地发展起来。

通过几年来在研究工作中的亲身体会，我深深感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实在很艰巨，完全有必要。若不是党使我们大家进步，使我们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教导我们理论要联系实际，告诉我们学习苏联，并且把我们领导起来组织起来的话，我们的科学事业哪能像今天这样充满了阳光和新鲜空气呢？

### 满怀信心地努力赶上国际水平

党不单在思想上领导科学事业，并且也在组织上领导了科学。对科学研究工作在人员、经费、设备和图书方面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党还给了我国全体科学工作者指出了方向，这就是发展科学的12年规划，这个规划给我们极大的鼓舞，使我们增长了信心。我们自动化研究所就是按照这个规划成立的，规划促进了我们的研究工作。但是右派分子却对规划大肆攻击，说“12年远景规划是一纸空文”，说“规划在制造矛盾”，“看不见规划的指导意义”，对12

年规划沒有信心，看不見走的路，全是胡說。我們自动化所的工作就是按照规划的总的要求开展的，规划對我們並非一紙空文，有指導意义，我們看得見走的路；虽然自动化是新的薄弱的环节，我們都有信心在12年后赶上世界水平。去年年底，我参加科学院的技术科学代表团到苏联和捷克去，曾碰到不少苏联和捷克的自动化方面的科学家，他們對我說：“你們一定能很快赶上我們，因為你們有党和政府的最大支持，又可以吸取我們的經驗。”這話的確有道理，有根据。为什么薄弱的环节我們和国际友人們对规划有信心，而在数学、物理等較有基础的科学部門工作的几个右派分子竟說：“毫無信心”，如此喪气呢？很明显，他們並沒有想赶上世界水平，而實質上是反对规划，反对我国科学赶上世界水平的。徐芻說：“如果12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把我的头砍下来”。我想，假如他說了話真算的話，那末，他最多只能再活12年。

### 只有共产党才能領導我国的科学事業

右派分子說“共产党不能領導科学事業。”这是胡說。就以我亲眼看見、亲身工作过的範圍而言，从一个不成为研究所的破攤子發展为几个圖書、設備充实的研究所；培养出来大批的青年科学工作者，其中很多人已經担任起科学研究的領導工作；团结教育了大批的科学家，他們現在極大多数發揮了更多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开展了很多全所的重要的科学研究工作，这些工作在过去是毫無基础的。短短七、八年間，在党的领导下，我們的科学事業已經超过了旧中国几十年所做不到的事情。这正是党領導科学的成績。我們說：党能够領導科学事業，而且也只有共产党才能領導我国的科学事業，正像只有党才能領導我国的其他一切事業一样。我們警告右派分子們，你們若要执迷不悟，不願改过自新回到人民队伍中来，那么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上，我們將把你們当作路上的絆脚石一样，一脚踢开。而我們，將坚决地永远地跟着共产党前进！

## 反击右派分子何肇对党团结科学家 为人民服务的政策的攻击

孟憲振

右派分子何肇的文章是有强烈的煽动性的，带有浓厚的火药味。在他的“科学家与青年之间的关系不够好党应当负主要责任”的“文章”中，他说：“今天科学家和青年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够密切不够正常的，与解放前的情形对比一下便晓得。”接着他举他父亲为例，说过去他父亲与他父亲的学生之间的关系就非常好，而今天就非常不好。以此来说明“今不如昔”，他企图利用这个例子来作为全盘否定党的政策的所谓“事实根据”。应该说明，就是这个例子本身，他自己后来也承认不是事实，是他捏造的。

何肇接着说：“青年人的错误和偏见是哪里来的呢？”按照他的理论，这是因为“第一，青年同志思想简单，新事物来了一听便接受，事实往往未加深思。”他说：“第二，在思改过程中，党急躁粗暴地对科学家提出了过高的（违反认识规律的）要求。”最后他说：“第三，是党在青年和科学家之间造出了各种隔阂，加上各种戒规。在青年人到科学院时，马上受到训，其中内容便是神妙不可捉摸的“团结政策。”何肇在这里明确地提出了一切错误和偏见都是由这三个原因造成的，而他用了较多的话加以攻击的就是他所谓的神妙不可捉摸的“团结政策。”接着他说：“如果几年来党不是片面地向青年灌输团结教条，而是放手让大家自由相处，自由交换意见，今天科学家和青年之间的共事关系是不会如此令人头痛地难的。”何肇是怎样来形容今天的情况的呢？他说今天是糟到了“青年与科学家再也无法建立正常的人与人，同志与同志之间相处时正常的诚恳的关系。”而之所以如此，按照何肇的理论，都是这个“团结教条”的罪过。换句话说他是直言不讳地对党团结科学家为人民服务的政策加以攻击和诬蔑。

总起来說，何焜的主要論点是：第一，“今不如昔”；第二，“头腦簡單的青年未加深思就輕易接受了这个‘可惡的团結教条’”；第三，由於这“团結教条”的罪过，今天已經再也無法建立正常的人与人之間的关系，如果打算改变这种情况，何焜出了一个主意，就是根本不要党的政策。

何焜的用意是惡毒的，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實質是險惡的，为了徹底摧毀他的論点，我想着重談一下關於党团結科学家为人民服务的政策的問題。

为了用事实来駁斥何焜的謏言，有必要实际敘述一下党到底教育了青年些什么，党的政策到底起了些什么作用。

自从五二年以来，党曾經不断地教育过年輕人，我們所里，在年輕人中間就曾經进行过几次学习，这就是：

1) 1952年9月，我們分配到科学院以后，在院本部集中学习过一个多月。

2) 1953年3月28日起又学习过一次。

3) 1954年5月1日——20日在总路綫学习之后又学习了一次。

4) 1954年9月23日青年团的幹部为了领导好青年的学习，又先学习了两个星期，在10月份起始一直到年底又大規模地全面地学习了一次。应该說明，正是在这一次，何焜曾經被重点地批評过。

5) 1956年2月1日周恩来同志作了有关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以后，又学习了一次。从以上的几次学习来看，差不多每年都学习过一次党的政策。除此以外，每年新分配到所的同志还都先学习过一次党的政策。

在这些学习中，一次又一次地学习了陈伯达同志的報告，列宁斯大林的一些講演以及有关的一些文件。在青年中进行了認真的檢討，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实践，再不断地学习，因而一次又一次地端正了青年向科学家虛心学习，努力帮助科学家工作的态度。

在学习政策之前，在执行党的政策的过程中，在我們所里的青

年同志中是存在着一些思想問題的。如有的青年不能好好學習科學家踏實工作的態度，不能循序漸進，好高騖遠的缺點相當嚴重；有的青年同志工作一段時期，稍有成績，便驕傲自滿，目空一切，認為別人沒什麼；也有的青年同志對如何正確全面認識科學家的優缺點，學習他們什麼，幫助他們什麼不夠明確。有少數人其錯誤思想曾經發展到十分嚴重的程度，認為自己的老師沒有什麼本領，抓住一點便全盤加以否定，甚至個別的人認為自己的領導先生連大學生都不如，認為他們受尊重是沾了黨的政策的光。如此等等錯誤思想，如果任其自由氾濫，其結果是不堪設想的。黨就是針對着這些情況，在青年中一次又一次地進行了教育。

何肇為了挑撥科學家與黨的關係，竟惡毒地說青年人一到所，黨便把他們悄悄地拉到身旁告訴他們“科學家是如何如何的落后，是一羣需要謹慎相處的病人，摸不得的國寶。”何肇這種言論的作用之所以陰險惡毒，正是因為他作為一個共青團的叛徒，盜用了共青團員的光榮稱號，偽裝過積極分子，因而使得一些人認為他的言論也許反映了某些“內幕”。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也許有必要引一段從過去學習筆記中摘下來的小組給我們作的報告，使我們重新回憶一下黨和團到底告訴了我們些什麼。下面我引一下其中的一段。

“黨教育我們說，我們尊重科學家，也是尊重科學。必須肯定，科學家的知識比我們高得多，踏實得多。如果從一個問題上輕視他們，從一個問題上來確定一個人是片面的，錯誤的。必須看到科學家的優點，只說他們的缺點或者和和氣氣都不是一家人的態度。

團結科學家為人民服務，這就是說我們必須真誠地幫助他們工作，這是黨交給我們的任務，黨和人民的利益要求我們這樣作。有人看不起科學家，認為他們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他們不懂得，科學家即使有一技之長，對國家和人民有多麼大的作用。因此在這個問題上作好作壞，就是考察一個同志是否有原則性，是否稱職的標準。反對團結科學家為人民服務的政策抽象來談，口頭上承認



政策的正确性，而接触到实际問題便否定党的政策。”

在 1954 年的學習中，党委副書記田夫同志，曾經在我們所的礼堂的講台上講过一段話，至今我还記得很清楚。他說：“今天在青年中存在的問題是对科学家和自己都沒有一个全面的認識。世界上沒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也沒有一个从头到脚尖都不行的人，必須反对这种看問題的片面性”。

這些話何肇都是听到过的，这里可曾有半句說“科学家落后是註定了，他們是一羣需要謹慎相处的病人，摸不得的国宝”嗎？

我們不能不問，何肇既然听到过這些話，曾身受过党团的教育，那么为什么要信口雌黃，顛倒黑白呢？指鹿为馬当然別有用心，歪曲事实顛倒黑白的用意何在呢？这除了用有意識地点火以挑撥科学家与党之間的关系来解釋以外，还能用另外的理由来解釋嗎？

曾經有些不了解何肇的人产生过一些疑問，他們怀疑何肇写文章的动机也許是好的，是为了搞好青老关系，也許是看法上的錯誤，不見得是有目的地攻击党的政策。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想可以說明一下何肇自己是怎样执行党的政策的。他是全所中执行政策中最不好的人之中的一个。党要求科学工作要有計劃，何肇則是愛搞什么就搞什么，完全憑兴之所至。在所內工作六年以来，沒有記滿过一本工作筆記，沒有听完过一門所內为研究人員开的課程，沒有真正訂过工作的計劃，他自己也根本沒有上班的制度。党要求青年要向科学家虛心學習，何肇則說他的导师是一个“傻子”，当然談不上虛心學習了。党要求青年尊重長者，通过自己的工作帮助科学家工作，發揮他們工作的積極性，何肇則是对長者的态度蛮橫粗暴，动不动發脾气。在 54 年，就曾經因为与錢临照先生無理大鬧，受到了团組織的严厉批評。从他的情况来看，他要求的所謂讓青年与科学家自由相处到底是什么不是很清楚嗎？他是否真的想搞好青老关系不是很明显嗎？就用何肇自己为例，青老关系不好到底應該誰負責呢？是党？还是他自己？問題很明显，他只是借題發揮，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他的矛头是指向党的政策，是向

党进攻的第一砲。

今天青老关系不是愈来愈坏，而是愈来愈好，这是無法否定的事实。經過对党的政策不断地学习，兩輩人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了。这新的基础就是共同为社会主义而努力发展我們的科学事業。这与解放前的青老关系是有本質的不同的。那时候除了少数的以外，很多都是勾心斗角，搞宗派，“文人相輕”，互吹互捧，互相利用，或者互相打击，很多都是以个人利害为前提处理一切关系。旧社会中人吃人的那种人与人的关系，有时候也竟然会表现在科学家与其学生之間。关于这些，我們在偉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从很多教授和科学家的檢討中不是听到过許多嗎？当然由於我們的年齡不大，对旧社会中那种人与人之間的关系体验不多。老一輩的人說我們有时是生在福中不知福，那里尝过旧社会里那許許多多辛酸的事，这确实是不錯的。我們生長在这偉大的时代，無产階級革命胜利的时代，当我们开始跨进社会主义的大門时，当我们被分配到科学研究的工作崗位上的时候，我們便立刻被分配給一定的导师，在他們的指导下开始工作，我們有各种机会發揮自己的才能，能够与科学家自由相处，絲毫不必勾心斗角，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为我們祖国的科学事業的發展而努力。就是这些难道是旧社会里能够想像的嗎？难道是旧社会中人与人，科学家与其学生之間的关系所能比拟的嗎？这是否只是某些科学家的善良的願望的結果呢？不，不是的，某些人的善良的願望虽然会起一定好的作用，例如一个热心的老师当然对他的学生帮助和教导的会更多些，但是如果沒有党的政策，怎么会有今天整个的情况？正是党团结科学家为人民服务的政策，把青老兩輩团结在一个目标下工作，也正是党的这项政策，使得今天与过去發生了本質的不同。

在旧社会里，一个科学家有时也培养出个把得意的学生，但是就是这个僥倖的学生确也常常是在排挤了它周圍的同伴，踏着自己同伴的幸福生長起来。在旧社会，在資產階級“天才教育”的观点的影响下，有多少本来可以有所成就的青年被淘汰了，他們痛苦地掉了下来，有誰关怀他們？許多青年就是这样被埋沒了。这种

情况真的能与今天来比么?!何肇的“今不如昔”的理論,除了說明他对过去的留恋和对今天的敌視之外还能說明什么呢?右派分子是不欢迎党的政策的,对它进行了極其惡毒的攻击,但是党的政策是正确的,任憑右派分子如何攻击,我們决不动摇。何肇的青老关系不好,並不是因他执行了党的政策,而正是因为他破坏了党的政策。

当然我也不認為在青老关系中今天的情况已經很好了,更不想也沒有必要为了批判何肇而否認事实。我認為在青老关系的問題上,在一些研究組里,在一些人之間还存在着一些問題,有些方面問題还相当大,当然这包括青老兩方面,需要及时的加以解决。同样我們在这一方面过去做的还不够,在一些青年中还存在着前面談过的一些錯誤思想以及对科学家帮助不够,或者过分迁就等缺点。同样我也不認為科学家,我們的老师們已經沒有缺点了,是有的,但是我相信所有这些在党的教育下都会很好地得到改进。

总而言之,我們也說缺点,但是与右派分子何肇的观点有根本的不同。我們主張在肯定党的政策与發揮其作用的前提下,檢查今天的缺点,改进今天的缺点,把青老关系向前推进一步。而何肇則是在根本否定党的政策的前提下,企圖將青老关系恢复到解放以前的情况去。为此竟然任意歪曲事实,作为反对党的政策的借口。这就是何肇与我們的根本分歧之处。何肇的言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實質也就在这里。因为如果按照他的主張做,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人,老师与学生之間的关系,因而也就沒有社会主义的科学事業,也就沒有社会主义。

右派分子何肇是有“功”的,他的“功劳”就在於他从反面告訴了我們一条真理。这就是右派分子所爱的,正是我們所恨的;他們坚决加以攻击的,則正是我們坚决捍衛的。他告訴了我們,當我們在討論我們的缺点时,要多想想,多动动腦筋。反右派斗争深深地教育了我們每一个人,通过說理斗争,使我們深深地懂得了党的政策的偉大,在今天更感到党的政策的可亲。与右派分子說理的过程中也使我們又重新想了一遍党的政策的作用和在这些政策的指

导下所取得的成就。

党的政策的原则不可动摇！任何对党的政策加以根本上否定的企图，都必须给以迎头痛击！

同志们！党的各项政策引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党在科学工作中，团结科学家为人民服务的政策，是党对科学工作的重要政策。我们决不听信右派分子的挑拨，坚决团结在党的周围，为捍卫党的政策，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而斗争！

## 党是科学事业的领导者

林 啓 欣

右派分子何肇，仇视党和人民，他向党进攻是有系统、有策略的，表现在多方面。现在我仅就右派分子何肇反对党领导科学的谬论进行驳斥。

右派分子何肇认为：“科学院办得不好，主要是因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学术空气，也不愿意去体会什么叫学术空气，造成科学院学术空气不浓，有些机关衙门气。”并借此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说：“这主要应由党来负责，因为过去是党而不是科学家在办科学院。”这实质上就是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反对党领导科学。那么究竟什么是内行的标准呢？党是否能够领导科学呢？

我们说党的领导是科学事业生命力的源泉，为了保证科学为社会主义服务，党的领导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阶级社会中，不管是本身具有强烈的阶级性的社会科学，或本身没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总是为当时社会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不管科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客观上总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资本家是直接通过他的企业，和间接通过国家的机器，来对科学研究的组织机构，和研究方向进行控制的，他们根据获得最大利润和军事政治上的需要，来指挥整个科学界的活动。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科

学是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为劳动人民创造幸福生活，为建设伟大、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而服务。

如现代原子能科学，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则用于发展人民生活 and 保卫和平事业。譬如在苏联第一个实现了利用原子能来发电，在今年又将建成世界上第一艘原子破冰船，更重要的是苏联虽然是优先于帝国主义掌握了“最后的武器，洲际导弹”，而苏联政府却仍坚决地、不懈地争取停止核子武器实验，并在裁军问题方面达成协议。这不充分说明了苏联维护和平的诚意吗？而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们，则是用核子武器来做为侵略和敲詐的手段。这样鲜明的对比，就是科学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阶级性的铁证。所以在阶级社会中，超阶级的业务领导关系是没有的。社会上的统治阶级总是按着自己的愿望和原则来组织和领导各项社会事业，为本阶级服务。因而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事业的领导，总是一种阶级上的领导，政治上的领导。因而在领导问题上的内行与外行，只有一个政治标准，也就是阶级标准。

所以内行的领导者就是：“精通阶级斗争规律的，坚决执行本阶级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来指导本行的事业。自觉地为本阶级利益服务的领导集团及其成员”。在我国，科学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因而只有共产党这样由马列主义所武装起来的，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才能代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才是科学事业最内行的领导者。

而何肇则认为只有科学家才是内行，才能领导科学，这是非常荒谬的。因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是极其复杂和广泛的，即便是在一个研究机构中，所涉及的问题也是相当多的。因而要想找到精通许多门类的科学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如果按何肇的说法，那么实际上就不可能有对整个科学的领导。

右派分子无耻的污蔑说：“党在科学院所起的作用不是思想指导”，“党的干部自以为有领导者的本能。而不调查研究当前环境的特点，盲目地老一套地干。”企图借此来否定党能领导科学。但污蔑成不了事实，谎言骗不了追求真理的人。我们要警告你右派

分子,你的陰謀是可恥的,也是必然要失敗的。當然,黨是一個政治組織,黨領導科學不是直接去做實驗,帶助手,而是通過下列三方面進行的。

第一,提出發展科學事業的方針政策,擬定計劃和制度。因為只有黨才能以唯物主義的觀點和辯證的方法對客觀事物進行調查研究,才能深切了解國家建設對科學目前和將來的需要,了解整個科學和各門學科發展的現狀和趨勢,從而對科學工作提出理論聯繫實際,科學為建設服務的方針和具有預見性的、切實可行的規劃、任務。

第二,加強對科學研究工作的馬列主義思想指導,和團結教育改造科學家的工作。因為只有黨才能了解科學家在社會主義事業中的作用,了解他們的政治態度,思想覺悟,並用馬列主義的理論和社會實踐進行教育,才能使科學家認識到資產階級思想的反動本質和工人階級思想的先進、偉大,從而拋棄那些為個人名利、個人興趣的單純技術觀點的工作態度,堅決為人民服務,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使科學家了解到國家的需要和自己的工作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更好地發揮他們的工作熱情和積極性;才能使科學家能夠掌握馬列主義的武器去批判錯誤的學術思想,使科學在馬列主義的思想指導下,健康順利地發展。

第三,組織和動員各方面的力量,支持科學工作,並推動各方面充分利用研究成果。在社會中,科學是作為理論武器來指導生產活動的,而生產的經驗又反過來豐富了理論,支持了科學的發展。所以科學發展不能是孤立的,必須要有生產的物質基礎和人力物力的來源。共產黨是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造事業的政治組織,只有黨才能了解和調動各方面的力量去支持科學工作,保證計劃和任務的完成;只有在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里,才會為科學工作培養了幹部,製造和購買了器材,提供了物質基礎;只有這樣科學才能按着和生產相適應,重點工作優先發展的原則,進行合理的調整和分配,保證計劃的完成。而且由於黨在工作中堅持了羣眾路線,依靠了科學家和羣眾的力量,並善於集中大家

的智慧,这样就更保証和加速了我国科学的发展。我們向科学进军的战斗计划——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定,不就充分的証明了党的领导的正确和偉大嗎?

右派分子何肇是参加过科学规划工作的,他是知道,我們是根据国家建設任务的需要,来确定国家科学技术任务的,是依靠了科学家的集体智慧反复討論通过的。但他却歪曲事实說党的工作不經調查研究,說党不信任科学家。这不是故意破坏党在羣众中的威信,挑撥老科学家和党的关系,来达到他無耻的个人目的,又能做何解釋呢?是的,我們說右派分子何肇,坚决反对党领导科学,底确是別有用心的,何肇說:“要找一套工作生活的制度,来保护科学工作不受任何摧殘,来保証科学工作必要的陽光和空气。”而且事实上他已經找到了这样的制度。何肇說:“英美那一套工作制度和科学体制,对中国的落后情况來說都是先进的,未尝不可找出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工作制度和科学体制”。很显然这就是公开污蔑和反对社会主义的科学制度,反对科学走社会主义道路,企圖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办法、制度来领导科学事業。

但謊言代替不了真理,事实胜於雄辯。新旧中国科学發展的事实对比,有力地駁斥了右派分子的謬論,也說明了究竟什么是科学工作的陽光和空气。在旧中国,那些官僚资产阶级是投靠帝国主义来剝削中国人民,从中获得最大利潤。因而他們根本不重視中国民族工业的發展,当然就更談不到科学工作了。那个时候科学工作,不过像花瓶一样,来点綴一下资产阶级的門面而已。在旧中国科学事業經過二十年的發展,研究機構仅有四十几个,研究人員六百多人。而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經過八年的時間,科学院和产业部門的研究機構就發展到一百七十多个。此外还有高等学校的几十个研究機構以及各省市所屬的兩千多个研究機構。全部的研究人員是数以万計,仅科学院就有四千七百多人。在旧中国科学是無組織,無計劃,自發、盲目的發展。同时由於工业基础的薄弱,实验設備差,即或是有些科学家在極困难的情况下,做出些工作,也是不能实现。譬如我国有名的物理学家王淦昌,發展了一种用实

驗來証實微中子是否存在的方法，但因舊中國沒有實驗設備，只好讓美國人根據他的理論，做了實驗而得到了成功。這是中國科學家很痛心的事。

如果說在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所反映出來的科學狀況，還不是何榮所夢想的資本主義科學道路的話，我們不妨再看一看，科學事業在美國的遭遇又是如何。在美國是以私有制為經濟基礎，生產是為了資本家得到利潤，因而科學也成為資本家的私有財產，為資產階級服務。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使科學工作大量的重複，造成科學工作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費。壟斷資本家為了獲得超額利潤，把科學上的新發現，先進的技術成就，收買為私有財產而埋沒掉，這難道不是發展科學事業嚴重的障礙嗎？右派分子企圖用美國科學研究工作的效率高，我國的科學研究工作效率低，來抹殺我們八年來科學戰線上的偉大成就，給他反對黨領導科學的謬論找依據。但實際上，據我們化學研究所一位新從美國回國的老科學家講：根據美國科學家拉辛所著的“唯一出路”的書中提到，在美國科學家在研究工作中所能發現出來的研究成果，只有科學家實際所貢獻的百分之十。其原因就是由於工作中的大量重複和做了很多沒有任何實用價值的不必要的工作，浪費了人力。所以看起來個別的效率可能高些，但總起來由於互相抵消，所表現出來的效率就僅有百分之十。這樣的後果，是由資本主義的制度所決定的。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DDT是一種最有效的殺蟲劑，在美國就有幾百家的公司和企業，分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進行研究工作。但最後却是用相同的辦法，得到了同樣的產品。這樣巨大的浪費不是很驚人嗎？又如在美國，阿西埃和克倫比亞，兩家有色電視機公司，在技術上是各有所長，但資本家為了自由競爭，把技術上的研究理論和經驗變為專利而成為自己的私有財產，由於在技術上不是互相交流，取長補短，而使得這門技術在長時間不能達到完善的地步，嚴重地影響了科學事業發展的速度。再看一看美國資本家為了追求利潤是多麼不擇手段，譬如為了引人注意，要做一種能夠浮起來的肥皂，就為了如何能把空氣加到肥皂中去，進行



了很多沒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工作,因为誰都知道,肥皂中的空气是不起任何去垢作用的。这不是浪費了科学家的劳动嗎? 很多右派分子說,美国的学术空气濃,那么美国的学术空气究竟如何呢? 在美国对吸烟是否有害的問題(吸烟会引起肺癆对身体健康不利),曾引起長时间的爭論,而且爭論得很厉害,其原因是如果說吸烟有害,那就意識着烟草叶資本家的破产,因而制烟的資本家就僱佣了一些科学家进行研究工作,論証吸烟对人体無害。而反之制糖的資本家也很清楚,如果說吸烟有害,就給制糖業开辟了市場,因而为了賺錢也僱佣了一些科学家进行論証吸烟有害的研究工作。这样表面上看来是学术界的爭論,而实际上都是資产階級內部的狗打架。这样黑暗腐朽的資本主义制度,只有右派分子才会把它看成是科学工作的陽光和空气。今天在党領導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了公有制的經濟基础,生产是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是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因而为了保證科学为建設服务,科学工作也必需是有計劃的發展。

解放后党動員和組織各方面的力量去支持科学工作,因而給科学事業开辟了無限广闊的發展前途,在仅仅八年的時間,其成就是相当大的。我是学化学的,因而就从化学方面的發展来看一下。

在几年內發展了过去的空白学科:如放射化学,高分子化学,有机合成,物化分析等。更突出的是科学为生产服务,这也是在旧中国所不能設想的,我們制造了过去从来不能制造的产品,其中部分产品的質量已达到世界水平,如合成橡膠,人造石油,航空用的人造纖維等。又如高分子化学在旧中国是个空白点,解放后,是在党的領導下才建立起来,由於党的有計劃的正确領導,和科学工作者的積極劳动,現在高分子化学不但在理論上有了一定的成就,而且所研究的有机玻璃已經能够大量生产了。在制碱的工業中,氨碱法的生产,由於原料中的氯离子不能利用,生产过程中氨的循环,造成原料和設備的浪費,是有缺点的。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侯德榜先生,早在解放以前就研究成功了碳酸鈉和氯化銨联合生产的方法,克服了氨碱法生产中的缺点,綜合地利用了原料,並同时生

产了大量氯化铵肥料。这样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上的伟大成就，在旧中国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联合生产的方法，经过几年中间工厂的实验，在今年就将投入生产了。应该着重指出，这样方法是在我国第一个实现的。我们坚信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科学事业将日趋繁荣，由胜利走向胜利。我们所以会有这么巨大的成就，那就是因为我们优越的社会制度，有党的英明领导，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阳光和空气。

右派分子歪曲事实，造谣污蔑，不择手段的企图推翻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是反对和仇恨党和社会主义，是要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的统治。但是我们要告诉你右派分子，你的阴谋是一定要破产的，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每个科学工作者，都深感觉党的领导的正确和伟大，我们要像保卫自己生命一样的来保卫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随时准备给予胆敢侵犯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右派分子如果不幡然悔悟，低头认罪，那将自寻死路，自绝于人民。

## 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作为科学的指导思想

唐稚松

右派分子徐芻认为马列主义不能作为科学的指导思想。他攻击马列主义的办法是首先污蔑苏联的科学成就，然后说苏联科学是由于马列主义思想指导坏了。

他对他的学生说：“你们无知，教材都是苏联的，以为苏联了不起；我看的书多了，以英文为主，眼界深了，得知英美之厉害，不单水平高，而且发展也快”。他说：“美国科学在总的方面大大超过苏联，无论在人员配备、设备和门类方面”。他并且以电视台为例，说美国有几十个电视台，古巴有九个，而苏联只有八个。对于许多主要的科学技术门类，像和平利用原子能、喷气式飞机等等他都不谈，单单举一个电视台作例子，而且插上一个古巴。他言下之意好

像苏联的科学連古巴都比不上。他这类污蔑性的話很多，譬如他說什么“苏联今年不举行航空节是怕現丑啦”！“要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肯定是社会主义陣营崩溃”，因为“苏联科学不如美国”等等。更坏的是他由这些誹謗中間得出結論說：“苏联科学之所以不如美国，是因为馬列主义指导坏了”；“苏联科学貼标签”。他这些言論是很惡毒的。我們現在要看看苏联科学成就是不是不如美国，苏联科学工作的条件是不是比美国差，苏联科学是馬列主义指导好了呢，还是指导坏了呢？

### 从苏联的科学成就說起

徐芻說什么苏联科学总的方面如何如何。我看，他还不配对苏联科学作出总的估計。他究竟掌握了多少材料，有多大的知識能对苏联科学作总的估計？我看还是謙虛一点吧！我們是搞数学的，还是談談数学吧！苏联数学的成就是举世聞名的。甚至美国也在用專門的机构和專門的刊物来介紹苏联的成就。只要不是像徐芻这样別有用心的人，誰也不能否認这个事实。

苏联数学首先就是全面發展的。苏联科学院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所長維諾格拉多夫院士曾經說过：“在我們所里，沒有漏掉数学中任何大的方面，不像資本主义国家那样有所偏廢”。同时，苏联数学不但全面發展，而且每一分支都有世界第一流的大数学家在工作。譬如：解析数理方面維諾格拉多夫的工作，概率論方面柯尔莫哥洛夫的工作，微分方程方面彼得罗夫斯基和索伯列夫的工作，函数論方面伯恩斯坦、拉夫連捷夫的工作，拓扑学方面亞历山大洛夫和潘特列金的工作，泛函分析方面盖尔封德的工作，都是世界第一流的。就拿徐芻自己所从事的数理邏輯來說，虽然苏联过去曾有一时期对数理邏輯不够重視，但近年来一經認識到它的重要以后，就大力开展起来。就在这个苏联比較弱的分支里，也有馬尔科夫的算法論和諾維科夫關於半羣和羣学上的問題的工作。他們解决了代数中数十年未解決的問題，这都是世界第一流的科学成就。这些事实，不是对徐芻最好的回答嗎？

徐芻說：“苏联科学在人員配备、設備和門类各方面不如美国”。英国物理学家曼德尔在“观察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目前苏联科学方面已經佔主导地位，苏联平均每一个科学家所拥有的技术員要比美国多”。他又說：在苏联，“科学家不必为寻求实现他的主張所必須的东西而花費時間，行政人員和會計人員可以為他們做到这一点，有組織得很好的技术服务人員去关心、供应和維護設備，科学家不必为此操勞”。他还說：“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是大学實驗室里的充实的設備，如电子显微鏡、精确攝譜儀等。莫斯科一年培养出500名物理学家，而英国牛津只能造就70名；莫斯科有70名物理学教授和教师，而牛津只有5名”。他最后說：“显然，苏联在科学方面的費用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要多得多！”讓我們再看看力学家郭永怀先生在美国时听到几位在1955年訪問过苏联的美国科学家的話吧。他們說：“在理論方面，比如高温物理，苏联人才力量就远远超过美国。美国最感恐慌的是苏联能够有計劃培养大批有成就的科学家。美国每一个大学有和他們同等水平的不超过一、二人；他們在苏联的时候每到一个大学就有五、六十位水平都很高的人能参加討論。这决不是美国所能想像的。”这些話都是大科学家亲身經歷之談，我想比徐芻那一派胡說总要可靠得多吧！由此看出，徐芻对苏联科学的誣蔑是完全沒有事实根据的。当然，我們在这里並無意否定美国科学家的一些成就。不过我們不要忘記一个事实：美国近代科学發展到現在有一百多年了，而且在兩次大战中美国本土都沒有波及，还吸收了大量的外国科学家。而苏联在十月革命前的基础就差一些，更遭受战争殘酷的破坏。虽然在这样的条件下，可是短短几十年間，苏联科学已經有許多部門發展成为世界第一位。这些事实說明什么呢？我們認為苏联科学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与馬列主义思想指导分不开的。

### 只有馬列主义能指导社会主义的科学事業發展

科学能不能不要哲学来指导呢？不能的。恩格斯老早就說过：“不管自然科学家高兴采取怎样的态度，他們总是在哲学的支配之

下”。因为你要研究世界的规律，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你总对世界有一个看法，这样就总是在一定的哲学思想指导之下。有些资产阶级学者说，我们既不主张唯物主义，也不主张唯心主义。这些都是哲学，我们要中立。这中立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说世界是非心非物的中立原素构成的。这是不是哲学呢？这正好是哲学，而且是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列宁早就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批判过这种哲学了。所谓中立原素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將感觉加上一个好名词而已，所以仍然是唯心主义。有人问：既然非哲学指导不可，让唯心主义来指导好不好呢？当然不好，因为自然科学是研究客观世界的规律的。以唯心主义指导科学，就是以违反科学本性的思想来指导科学，这当然只有阻碍科学的发展。我们就以数学为例，数学是一门极抽象而又有计算、既有理论又实用的一门科学。这些方面都不能偏废。而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在近代数学教学中有些人夸大数量的抽象理论方面，把数学说成是一种形式符号的体系；说数学不过是由前提推结论的一种思想游戏而已。资产阶级哲学家罗素甚至公开这样说：“数学远离人类的感情，甚至远离自然界的杂事，它创造出一个有秩序的宇宙……在那里一个人将逃脱现实世界的悲惨的放逐”。我们现在一听就可以感到这是多么有毒素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数学工作者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岂不会成为一个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吗！甚至就是数学研究本身，由于他不重实用，不重计算，其结果也一定会到处碰壁。在我们旧中国的数学家里不是可以找到这种思想的毒害吗？所以，要使社会主义科学事业得到健康的发展，我们一定要坚持和唯心主义的侵蚀作不可调和的斗争，一定要坚持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以及思维发展规律的科学。所以，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有助于科学家如何地去认清客观世界，发现客观世界的规律。同时，马克思主义也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关于社会主义胜利、关于共产主义建设的科学。这就使得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之下的科学事业具有鲜明的目的性。我们的科学事

業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這就使得我們科學事業可以自覺地有計劃、有步驟地發展，這個目的本身就要求我們的科學是理論和實際密切地聯繫起來的。這樣，就使得我們的科學事業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它有着無窮無盡的生命力。法國物理學家郎之萬就曾經這樣評價過蘇聯的科學事業，他說：“在蘇聯凡屬有關控制自然力的科學研究都是為了儘可能迅速地發展和充實技術上的應用，以便達到人類的物質精神和道德上的解放的目的……特別是像在數學這一些抽象科學部門的成就，這些抽象科學由於同實際密切和直接地相結合而獲得了一個巨大的推動力量”。由此可見，蘇聯科學的先進性，首先應該歸功於馬列主義的指導。

### 不准右派分子嫁教條主義之禍於馬列主義之身

我們也想提一提過去在蘇聯曾經發生過的一種情況，就是有些專門啃書本的哲學家，他們有時在對一門科學還沒有很好領會的時候，就發表一些責難。顯然，這種哲學家對待科學的粗暴態度是不好的，我們認為這是教條主義對科學的干涉。教條主義本身就是反馬列主義的。我們工人階級、共產黨為了我們社會主義事業，是熱愛科學的。絕不容許教條主義阻礙科學的發展。因此，蘇聯的黨和科學界一經發覺這些哲學工作者的教條主義錯誤以後，馬上就起來糾正了這種錯誤，這些教條主義的哲學家已經受到了批評，而曾受到他們影響的科學分支也已經大力發展起來了！這些事實正好說明了蘇聯科學事業正是馬列主義指導下得到健康的發展。它是在一方面反對資產階級假科學理論，另一方面又反對教條主義對科學的危害，在和這兩條錯誤路線的鬥爭中健康地發展起來的。熱烈的爭論正是蘇聯科學的特色。而右派分子抓住少數教條主義危害科學的現象，予以歪曲，把教條主義說成是馬列主義，說什麼哲學代替科學。說什麼蘇聯科學是在馬列主義指導下壞事了等等，這完完全全是對我們的誣蔑。他們的用心不過是想嫁教條主義之禍於馬列主義，借此來反對馬列主義，以混淆人們的視聽。我們必須粉碎他們這種別有用心的誹謗。

**科学工作者只有学好馬列主义，才能辨明是非，  
捍衛科学成果，为人民服务**

近代資產階級哲學家的慣用伎倆之一，就是以唯心主義的觀點歪曲自然科學的成果。列寧指出：“正因為現代自然科學遭受着急劇的變革，所以往往有大大小小的反動哲學學派和哲學流派發生，……任何唯物主義，若拿不出強有力的哲學上的論證，就抵擋不住資產階級觀念的攻擊……如要能支持住這個鬥爭那麼自然科學家就必須做一個辯證唯物主義者”。為了說明這個道理，舉一個例子，比如羅素，他是個唯心主義哲學家，也是個數理邏輯學家，但他歪曲地把數學說成就是邏輯。在他所著的“哲學史”的最後一章里，他自己承認他把數學說成了邏輯是他反動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由此可見，如果一個數理邏輯工作者沒有很好地用馬列主義武裝起來，又如何能辯明他這種對數學的歪曲呢？事實上，曲解科學成果的這種手法，徐芻自己就幹過。他在院部辦的哲學課的討論班上，就曾公開地說過數理邏輯中有一個哥德爾定理，證明了辯證唯物主義是錯誤的。當時因為在場的都不知道什麼是哥德爾定理，就讓他瞎吹了一陣。事實是怎麼樣的呢？事實恰好與徐芻的說法相反，哥德爾定理正好是用數學的方法證明了數學中形式主義是錯誤的，從而捍衛了唯物主義。而徐芻自己在那裡完全是信口胡說。因為他根本沒有好好地學過哥德爾定理，自己還沒有學就在進行歪曲。徐芻的手法比起資產階級哲學家來，似乎多了一籌了。這些事實使我們看到，我們科學工作者學好馬列主義，捍衛科學成果是一件多么迫切而必要的事。

我們的科學事業是社會主義的科學事業，它要求每一個科學工作者要樹立起共產主義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也要求我們科學工作者學習馬列主義。當然，自然科學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但是，研究科學的人都是有階級性的。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科學是資產階級的附庸，科學工作的成果是為資本家服務的。在那樣的社會里，科學工作談不上什麼高尚的意義；科學家也說不上有什麼真正

崇高遠大的理想。列寧說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把科學解放出來，使它擺脫資產階級的桎梏，擺脫對資本的依附，擺脫卑污的資本主義的奴隸地位”。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科學的性質根本不同了，它是屬於人民的。但是，從事科學的人是不是跟得上任務的需要呢？遠遠不是那樣。資本主義的傳統勢力統治了世界幾百年，尤其像我國解放也還不過八年，舊中國過去的教育是資產階級教育，所以科學家要從事社會主義的科學事業，就必須堅持思想改造，學習馬列主義，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只有以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科學家才能真正地以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從事科學工作，才能真正不計個人得失，不怕困難，勇敢地进行創造，才能具有集體主義的精神而與周圍的同志合作，也才能不被一時的成就或名位沖昏頭腦，而能堅持終身的努力。只有這樣的人才跟得上社會主義科學事業的要求。在這次科學界所揭露的右派分子中，不正是有許多人由於資產階級思想腐蝕而墮落的嗎？

### 堅決粉碎右派分子對馬列主義的進攻

右派分子向党進攻的時候，反對馬列主義也總是他們的毒箭之一，說法當然可以各種各樣，有的把馬列主義說成是教條主義，有的說馬列主義過時了，有的說科學不要馬列主義指導……等等。所有這些都不外是反對馬列主義，他們為什麼這樣仇視馬列主義呢？因為馬列主義和資產階級思想是不相容的。他們要堅持資本主義，首先就要反對馬列主義，可惡的是當他們反對馬列主義的時候，一般地並不敢公開承認自己是為了要搞資本主義，總是把自己打扮成好像是為了維護科學的發展似的，這就使得一些有脫離政治傾向的同志混淆不清，受他們的騙，徐芻不正是這樣嗎？一方面口口聲聲不問政治，專搞業務，在學習中間散布不重視政治學習的情緒；而另一方面，他却在搞反動政治活動。事實上宣傳不問政治，宣傳不要馬列主義等等，正是他的反動政治活動的一個環節。這些事實，總結起來都活生生地教育了我們，必須堅持馬列主義的指導。



## 永远做党的忠诚的儿女！

刘玉芬

右派分子间臭气相投的一点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因此，他们都首先向党员发起攻势，丑化共产党员是“六亲不认，冷酷无情”。

共产党员是不是像右派分子所说的是“六亲不认、冷酷无情”？

**为了党的利益而检举亲友中的反革命分子，  
是大仁大义的行为**

在解放后，同志们都羣策羣力，一心一意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懈地奋斗。这是为的什么呢？还不是为了祖国人民的利益吗？为了捍卫它，的确有一些同志不认他平素骑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罪恶累累的亲人。在三反、五反中，许多党员挺身而出，与自己的贪污腐化而又拒不交代的亲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大胆检举其罪恶行为。在肃反、镇反中又有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起来与自己的反动家庭从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界限，检举自己家属中的反革命分子。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也是如此。

这在右派分子看来是“大逆不道”、“六亲不认”的，可是，对于我们、这些党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的行为，就成了学习的好榜样。其英雄事迹传诵在人们的口头，铭刻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人们对这些党员从内心中敬慕不已，因为他们捍卫的事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业，同时，由于这些党员勇敢正义的行为，也才使那些腐败堕落的分子，得到了教育和改造的机会，从而得到了新生。共产党员的这种作法才真正是大仁大义的壮举。

## 最高尚、最美好的是共产主义道德

往日的父母教育自己的孩子如何自私，如何骑在别人头上发展自己。可是今天，孩子们不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他们今天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砖石、螺丝钉和栋梁。在一切孝父母、爱子女的道德标准之上，还有一个更高、更美的共产主义的道德标准。这个标准使我们在父子之间也要明是非，辨善恶；并不是父亲要点火，儿子就应该加油，或者儿子要当反革命，父亲就供给手枪。共产主义道德标准不仅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也加强了父慈子孝的关系。

建筑学家梁思成同志提起他女儿入党的事情说：“当我祝贺我的女儿光荣入党的时候，她却说，她不仅要做一个共产党员，而且还要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女儿”。因此，这个父亲就感动地说：“我认为，这是新中国的新型孝女所能对爹爹说的最孝顺的一句话，也是为共产主义的崇高事业并肩奋斗的同志间最友爱的一句话”。这才是最温暖的、崇高的新的父子关系。

## 看看右派分子怎样认的“六亲”

其实，资产阶级的情谊才是用金钱串起来的肥皂泡般的情谊，一旦利害冲突，马上就会各奔东西，烟消云散。右派分子孙大雨在解放前存有大批煤油，他的母亲用些点灯，还得用钱向他购买。到底是誰六亲不认呢？

再看看我们所里的一个右派分子是怎样对待自己的亲人的。他的父亲现在七十高龄，无劳动力，需要儿子养活自己，再三写信希望能给家中寄十元至十五元，可是他却连信都不回。难道就真的拿不出十元来赡养自己的父母吗？可是，他却答应了我们所里的另一右派分子考取了大学后，可每月供给十元。看！这就是右派分子所说的情谊，宁可遗弃自己年老的父母，而甘愿为右派分子孝忠。右派分子所认的是什么样的“亲人”，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当他的母亲死后，他向组织上领了50元福利金，说是为了葬母，可是从他父亲的来信中却知道入了他自己的腰包。右派分子

污蔑我們“黨員六親不認、冷酷無情”，難道這樣對待自己的父母就是“六親相認”嗎？難道像右派分子徐志國那樣為了達到個人可恥、卑鄙的野心而詛咒自己的父母、兄弟，去投靠右派分子，這就是六親有人情嗎？

**右派分子丑化黨員，企圖使黨孤立，  
以便實現資本主義復辟**

右派分子為什麼要大喊：“六親不認、冷酷無情”？因為他們反對社會主義，仇恨共產黨，企圖恢復舊制度，因此，就對共產黨造謠誹謗，他們所指責的“大逆不道”、“六親不認”正是為各種敵對分子所作的辯護。為了社會主義，為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真正的革命者就必須從階級立場到思想感情都同各種敵對階級和敵對分子劃清界限，一刀兩斷。這是共產黨員起碼的政治品質，也是我們所贊揚的無產階級黨性。

右派分子說我們不願與他們推心置腹，是“見人只說三分話”。實際上是他們要和黨、和人民死抱兩條心，不願把自己的歪心擺正。難道要我們黨員去和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推心置腹嗎？決不能，我們對敵人、對人民的叛徒只有冷酷、殘忍與無情；但對待我們人民却要無比的爱、溫暖與關懷。共產黨人也正是堅持這個原則，而且我們也正需要培養這種階級感情。

由於右派分子同我們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所以，對右派分子來說，我們的春天，正是他們挨不盡的冬天。我們在歡樂；他們在抽冷氣。我們感覺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他們却痛心：使奴喚婢的日子永不再來了。於是在他們眼里，這個世界是冷酷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溫暖了。我們說，任何溫暖的感情總要有一個共同的世界觀為基礎。如果不在共產主義世界觀上建立我們互相之間的感情，却終日沉溺在舊社會的追憶里，那必然得不到什麼溫暖，一定會走向墮落和死亡。

我們共產黨員的爱和信任是有原則的，即毛主席提出的六條標準，最重要的是擁護社會主義，擁護黨。離開了這樣的政治原則

去談什麼愛和信任，就是不分敵我，喪失党性。

右派分子之所以要揚言什麼“黨員是六親不認，冷酷無情”。其目的就是要否定黨的領導，來丑化黨、污蔑黨，企圖削弱黨的領導，使黨在羣眾中孤立，失去羣眾基礎，以達到篡奪黨的領導，實現資本主義復辟。

## 二

我還要駁斥右派分子對我們黨的領導的否定與污蔑。

我是一個工人的孩子。我決不允許右派分子這樣瘋狂地攻擊黨。事實是抹煞不了的。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是誰將工人從苦難的深淵中拯救出來？是誰使工人當家作主？又是誰使工人階級充分地發揮了從未有過的勞動積極性？這一切都是共產黨！

**提起解放前的工人處境，哪個有良心的人不心酸！**

日本統治時期，工人被認為是他們統治下的奴隸，可以任意糟蹋、污辱。工人的命被日本工頭掌握着！工人都想不到會在何時因何事即被任意打罵，工作作錯了，是先挨一頓毒打，而後才知道錯在何處。工人在廠內，大小便都不自由，時間長了，會用棍子將你趕出。人們見了自己的工頭會吓得手足無措。

國民黨時期，工人照舊如此痛苦。工廠內有糾查隊，負責搜查工人腰包，實際上起了便衣隊的作用。工作時間通常是10—12小時。加班沒有加班費；誰要求，就會被開除。冬天工人無棉衣，只好穿水泥袋。夜里只能睡在高爐旁。每天吃二頓飽的時候都很少，工人們吃的糧食都是發了霉的。過去一個工人為了維持家中生活，养活老小，只能日日夜夜的工作。我們所地震組吳鑑的母親就是白天在一個工廠里工作，夜間再到另一個工廠里工作。日夜緊張勞動，不得休息，以致後來病倒。身體一直不好。

**共產黨是勞動人民的命根子！**

解放後，工人吃的是純糧。工資逐年增加。我們組內劉成吉

的父亲，解放后由普通技术員升到机务段主任。吳鑑的母亲由普通的紡織工人升到車間副主任。我的父亲由普通工人升为一級工。工人的劳动得到了应有的重視，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更多的报酬。工人家里也有了手表、自行車、收音机。解放前，有哪一个工人可以买得起这些呢？

我父亲是个老工人，已六十有余，作工人作了四十多年。有一次他对我說：“可惜我年龄老了，五十多岁上才来了共产党！”这句话含意深刻。因为他从十几岁学徒，学了一套好技术。但解放前是不能充分發揮出来的，因为他还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可是，解放后，他虽年老，但領導上对他很重視，照顧他的身体，注意他的飲食，特别是年青的徒工更尊重他的劳动經驗。党对工人、老工人無微不至的关怀与尊重，和工人階級这种偉大的階級友爱，使他从年老的心灵中煥發出了青春的活力！他自願多帶徒弟，保證質量，因此，还得到了領導上精神与物質上的表揚和鼓励。

在政治地位上，解放前有誰敢向領導提意見，有誰能參予国家大事。可是今天，工人有了合理化的建議就会被採納，工人能亲自討論国家的宪法和各項政策。刘成吉的父亲就曾被評为先进生产者。我的父亲也被評为先进生产者。吳鑑的母亲就被評为一等劳动模范，被評为社会主义建設積極分子的代表。我們組吳敏芸的父亲解放前是一个有經驗的老工人，可是並沒能被重視，但解放后入了党，被評为劳动模范和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些例子真是举不胜举。

在生活福利方面，工厂中劳保費用逐年增加；在高爐旁工作的工人，房內有很大的电風扇，另外有休息室、工人宿舍。医疗費增加了。工厂車間中有保健站；宿舍里有接生站。工人組織了文化班，从扫盲队到夜大学都有。又有俱乐部、剧院、电影院。父亲夜班工作一小时是給相当於白天一小时兩倍的錢。我大哥得病已兩年，但領導上仍然每月發給薪金。这种事，在旧社会哪里能找出一个？不要說不工作养病，就說工作少有一点差錯，也会被任意踢打出去。

## 保护党，捍衛党，为無产阶级的事业奋斗到底！

事实証明，工人得解放，工人的劳动被看为光荣的，工人的創造性得到發揮……，这一切都是中国共产党給帶來的。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命根子！共产党給工人、給全国人民帶來了新生与光明。党使工人变得更聪明、更爽朗，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正日新月异的改变着祖国的面貌。可是，我們彩色繽紛、如花似錦的前程愈誘人，則右派分子会愈忌恨，从而对共产党加以攻击、污蔑和中伤。但無論如何，党的事业是光明正大的；党的领导是巩固的。我是一个無产阶级的女兒，我誓死要为無产阶级事业奋斗到底！我坚信，共产党会领导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唯有共产党是我們自己的亲人，是自己的救星，失去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將重新陷入火坑。工人的命运將重新被統治者掌握。我要坚决的保护党、捍衛党！右派分子們！你們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我們不共戴天的仇敌。我們坚决把自己一顆赤誠火热的心献給党，永远作党的忠誠的兒女！最后，我还要喊：共产党像太陽一样是最温暖、最有人情的！我要高呼：“共产主义事业万岁！共产党万岁！”

## 駁斥右派分子对积极分子的攻击

曾 威 夷

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候，惡毒的攻击积极分子也是他們一个重要的手段。比如：夏永年这个右派分子他最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污蔑积极分子之所以要積極“都是为了获得自己的政治資本”，并且还惡毒地說：我們社会上只有“盲从和会拍馬屁的人才吃香”，在这里他是把我們的一些积极分子說成是“盲从”、“拍馬屁”的人。徐芻也無恥地繼承了臭名昭彰的右派分子黄万里的衣鉢，污蔑积极分子为“歌德”“但丁派”。另外正如同志們所說的那个“偉大的螞蟻”徐志国，在他的日記中（这些日記我

們稱它為螞蟻日記)，也用盡了惡毒的字眼來攻擊我們積極分子，什麼“可惡的人”啦，“可憐的盲從者”啦，“丑惡的嘴臉”啦等！他說看到我們積極分子就很“可憎”，听了積極分子的發言就有“發嘔的感覺”。他並且用極端仇恨的口氣說：“我相信將來我會毫不留情的剷除這些人物的”。徐志國就是這樣地仇恨我們的積極分子。此外像我們文學研究所的右派分子李荒蕪也罵我們積極分子是“太監”。所有這些攻擊和污蔑，都說明了這些右派分子對我們的積極分子的仇恨是深如海底的，他們同我們積極分子是有“不共戴天”之仇的。

那麼，右派分子為什麼這樣仇恨靠攏黨的積極分子呢？為什麼要這樣惡毒的攻擊和污蔑在運動中起骨幹作用的積極分子呢？是不是右派分子同積極分子之間有什麼私人仇恨呢？不，不是的，遠遠不是的。他們之所以這樣仇恨是一種階級仇恨的表現，他們攻擊積極分子也不只是個人之間的攻擊，而是攻擊我們的黨和社會主義的一種表現方法。

很顯然，右派分子站在他們反動的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對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必然是百般仇恨的；對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共產黨更是刻骨的仇恨，也是不難想像的。而積極分子正是積極的建設社會主義和保衛社會主義，積極地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的同志，右派分子恨社會主義恨共產黨，也就必然會恨積極分子。特別是在我們積極分子的政治生活中，常常要與右派分子展開面對面的鬥爭。積極分子一方面積極的響應黨的號召，與黨有着血肉的聯繫，一方面又是生活在廣大羣眾中與羣眾又有着親密的聯繫，能及時地反映羣眾的意見和要求，因此右派分子攻擊黨，首先就要用盡辦法挑撥黨和積極分子的關係，攻垮積極分子。所以，惡毒地攻擊和污蔑積極分子，正是右派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必要手段。

在揭穿右派分子攻擊和污蔑積極分子的反動目的以後，讓我們再從下面兩個問題來駁斥右派分子對我們積極分子的污蔑。

第一，我要駁斥右派分子污蔑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是“六親不認”、“冷酷無情”。

共产党人和积极分子是不是冷酷无情？事实表明，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人，他对什么样的人的爱，对任何阶级都爱，他既爱共产党同时又爱国民党，既爱人民同时又爱人民的敌人，假如真正有这种人的话，那必定有一面是虚伪的。因为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阶级的爱，爱这方面就要抛弃那方面，我们爱人民就不能去爱反革命，爱右派及其他敌人。新社会有许多人检举自己的父兄爱人也不说明这一点吗？他们之间一方面从家庭关系来看，是血肉关系，但另一方面从人民立场来看，那他们之间就是敌我关系。为了划清敌我界限、坚持人民的立场，我们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的积极分子，对敌人的斗争就是冷酷无情的。拿项志遴来说。你如果不彻底改变立场，从新做人，那你的哥哥姐姐等都不会认识你，都会同样对你冷酷无情的，因为你们之间的关系是阶级敌我关系。从他们的来信中就表示了这一点。右派分子之所以说我们“冷酷无情”，其目的就是要我们不要阶级观点、离开劳动人民的立场去爱那些罪恶深重的反革命和右派分子，去对他们热情。告诉你们，你们的所谓热情与我们的热情是有根本分歧的。

我们的感情都是无私的，崇高的，不是局限於自己的小家庭中。不是有一种人，只爱他们的父母兄弟爱人等少数身边的亲人吗？他们不懂得也不会去爱全人类，而我们是对整个世界上所有的劳动人民都充满着热和爱。为了解放全人类，我们充满着对全世界人民热情的心，我们可以不惜一切贡献出自己的生命，这难道不是崇高的、无私的爱吗？难道这是冷酷无情吗？这样事例实在太多了，我们大家所知道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者罗盛教烈士就是这样，他不顾自己的生命去抢救朝鲜儿童崔莹，这是说明什么，崔莹又不是他的亲属；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朝鲜劳动人民的孩子，这不就说明他是爱全世界所有的人民吗！？从事实来看，假如用温度表来测量的话，可以肯定的说，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热爱人民的温度是最高的。

那末，右派分子为什么会感到我们革命者是冷酷无情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派。我们要实现社



会主义就要坚决地和他們斗争，那当然会说我們無情。

从以上来看，我要告诉右派分子，我們对人民的敌人决不能热情，因为这种热情，就是对人民無情；姑息右派分子，就会造成人民的損失。我們的热情是有立場的，你們只有彻底改变反动立場，回到人民队伍中来，我們才会伸出热情的手来欢迎你，否則人民將永远对你們会冷酷無情的。

第二，就是所謂“盲从”也就是所謂“唯唯諾諾”的問題，徐志国等右派分子把緊密团結在党的周圍，積極拥护社会主义的積極分子污蔑为“盲从”、“唯唯諾諾”、“拍馬屁”的人。現在我們要看一看，右派分子用这些惡毒的詞句背后的用意究竟何在？他們說我們青年積極分子听党的話，服从組織，順从人民，就是所謂“盲从”，就是所謂“唯唯諾諾”，就是所謂“拍馬屁”，这些污蔑本来不值一駁，但是为了徹底粉碎右派分子污蔑的謠言，我还是要說几句。我們說对一个積極分子，对一个坚决維護社会主义利益的青年人來說，首先的条件，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祖国的需要就是要下定决心，永远听党的話，跟着党走。党代表了劳动人民的最高利益，跟党走就永远不会錯。听党的話，越多越好，跟党走，越坚决越好，听党的話，跟党走，就是跟着真理走，决不是“盲从”，也不是“唯唯諾諾”。

在旧社会里那些奴才們，对帝国主义、地主、資产階級才是唯唯諾諾。所謂“拍馬屁”这样的字眼和我們团結在共产党周圍的積極分子也根本联系不上。而右派分子才是最会幹拍馬屁的勾当。右派分子夏永年、徐芻等不正是在拍帝国主义的馬屁嗎？帝国主义說朝鮮战争是北朝鮮先出兵，夏永年也就跟着叫“北朝鮮先出兵”，帝国主义叫喊所謂“西藏独立”，徐芻也就像鸚鵡学話那样跟着唱：“西藏独立的卖国論調。很清楚，右派分子这才正是在对帝国主义献媚，唯唯諾諾的听帝国主义的話。

最后，我們要驕傲地說，能够做一个社会主义的積極分子，是光荣的。不管右派分子怎样攻击和污蔑，我們每个有志气的青年，都要爭取做一个热爱社会主义，站稳工人階級立場，緊密的团結在

党的周圍，積極的維護党和人民的利益。積極分子是党的好兒女，当然囉！也是右派分子的“眼中釘”，我們要正告右派分子，假如你們不改變立場而甘心与人民为敌的話，我們許許多多青年，是要做你們的“眼中釘”的，这个“眼中釘”也是永远拔不掉的。

右派分子，你們越罵我們，我們越要積極，越要听党的話，在党的领导下積極的工作，積極的反映羣众的意見。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我們又更積極的向右派作斗争。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保衛党，保衛社会主义建設。正因为如此，我們不怕罵，我們就是要做積極分子，將來还要做共产党员，我就是个共青团員在这里發言，徐志国！你听了是不是会感到發嘔，就讓你發嘔去吧！

## 必須用工人階級思想武裝自己

劉后貽

右派分子項志遴、何拳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樣，都是反對思想改造的，認為思想改造“沒有必要”，“也不可能”；認為思想改造運動是“強迫的”、“太粗暴”、“副作用太大”，認為政治學習是“入股”，可以“根本不要”。

右派分子之反對思想改造，按其實質說來，就是頑固地堅持他們的資產階級的反動立場，反對社會主義思想，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共產黨。

右派分子項志遴歪曲“存在決定意識”的原理，否定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可是，在我們看來，“存在決定意識”的真理，正好說明思想改造的必要，而不是什麼“不必進行思想改造”。

現在的青年都是在舊社會生下來，都受過舊社會各種舊思想的影響。而青年知識分子，大多出身於剝削階級的家庭，受的是資產階級的教育，在沒有經過改造以前，一般說來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絕對平均主義、民族主義的舊思想和輕視工农、輕視體力勞動、盲目自大的舊傳統——這在今天說來都是反動的思想。這就是說，他們舊的“存在”決定了他們這種舊的“意識”。我們黨之所以重視每個干部的出身和歷史正是根據這一正確的原理。右派分子從章伯鈞到夏永年、從羅隆基到徐志國，絕大多數是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

項志遴說：“生活在社會主義社會里，自然會產生社會主義的思想。”是不是“生活在社會主義社會里，自然會產生社會主義的思想”呢？我們說，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存在”里，是要產生社會主義的“意識”的。但是這必須作具體的分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受到的資產階級思想毒害較深，如果不是主動、自覺地去進行長期

的、艰苦的思想改造，那么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思想意识就将顽固地守住它的阵地，因而也就不能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必然会形成“意识远远落后于存在”的情况。至于有些年轻人，虽然受到的剥削阶级影响不多，但在社会上旧的思想残余还未肃清和意识往往落后于存在的情况下，如不接受社会主义教育，努力改造自己，是不会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意识的。决不是如项志遴所说的那样“自然会产生社会主义思想，不必进行思想改造”的。像今天我们国家虽然在经济上过了社会主义的关，而很多人在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过关，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右派分子，也就说明了这种情况。

“存在决定意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意识也可以反过来影响存在，未改造过的知识分子，虽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仍将顽强地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随时企图以他们的世界观来改变世界，这样，他们不但不可能对国家和人民带来什么贡献，而且必然会要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祸害。只有经过思想改造，才有可能抛弃旧的立场，旧的思想感情，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和工农结合，才有可能有所成就，才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意识，有计划的运动，没有自觉的人民大众的努力是不行的。

项志遴一方面说“自然会产生社会主义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说：“既然我是知识分子，就不可能和工农一样，也不可能培养成他们那样的思想感情”，从而企图否定思想改造的可能性。的确，如像项志遴那样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死抱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不放的话，要改造思想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对于那些愿意，乃至主动、积极地进行着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则并不是不可能的，而是大大可能的。因为思想意识虽为存在所决定，但这种决定并不是机械的命定的，至死不变的，而是可塑的。这种意识的可塑性也正说明了思想改造的可能性。在今天，有着党的正确领导，有着系统的政治学习，有着正在进行着的社会主义建设，更为我们的思想改造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事实上，許多科学家，数年来在党的教育与自己的努力下，思想觉悟大大地提高了，因而在科学上做出了成績。有些老科学家，通过思想改造，初步建立了無产階級的人生觀，因而被吸收到工人階級先鋒队里去，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員，更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光輝范例。

右派分子也污蔑我們的思想改造是“强迫的”、“太粗暴”、“副作用太大”。例如何肇对蔣介石誣蔑思想改造是“洗腦筋”的說法有同感，項志遴也說，“要改造也不必經過激烈斗争”等等。这些說法都完全是錯誤的。

首先，大家都認識得很清楚，思想改造本来就是新思想和旧思想的斗争，新思想和旧思想本来就不可能“和平共处”，說“不必經過激烈斗争”是胡說。其次，我以为思想改造的方式、方法問題，也決定於具体人的具体情况。對於絕大多数的、願意接受思想改造乃至主动，是在自覺的基础上进行思想改造的。而對於不願意，甚至在某些問題上执迷不悟的知識分子有时是必要“大喝一声”的。这里我以为可以称为“自願与必要相結合”。至於坚持反动立場，仇視共产党，仇視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則是人民的敌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對他們的反动言論和行动，人民是不能容許的。

右派分子何莽提出，“思想改造过程中，党的領導未能抓住中国科学家爱国、爱真理的主要方面，急躁、粗暴地对科学家提出了过高（違反認識規律）的要求。”这里有兩点必須駁斥：

第一、党的領導是不是“未能抓住中国科学家爱国、爱真理的主要方面”呢？事实証明，是抓住了的。而且党是以階級分析的方法，結合着各时期的具体情况，对知識分子进行教育的。爱的什么国？党教育我們爱的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祖国。爱甚么真理？党教导我們爱的不是资产階級的所謂“真理”，而是無产階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

第二、党是不是違反認識規律，急躁、粗暴地对科学家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呢？事实証明，党对知識分子是进行着有步驟、有計劃的教育和改造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五大运动，三大改造，广

义上都可看作是思想改造运动，党都号召、並組織知識分子参加。此外还組織知識分子到各处参观，参加各种会议等等。党对知識分子改造的長期性与艰苦性也是有着足够的估計的。因而，党在过去对知識分子进行了長期的政治教育，而在目前，正在开展大規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党在不同时期对知識分子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而广大知識分子的思想也是在党的循循誘导下在逐步地提高的。

## 党对知識分子的政策不容歪曲

王孔立

右派分子徐芻、何肇等在党对知識分子的政策上竭力进行歪曲、污蔑和惡毒攻击。徐芻說：“党对知識分子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拉攏、收买”。何肇也对党的政策忿忿不滿地說：“解放前，科学家只要有能力，就可以有所作为”；說現在“从来沒有人支持做研究工作的積極性”；“今不如昔”等等。

### 党对知識分子“团結、教育、改造”的政策 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

我們先来駁斥右派分子徐芻污蔑党对知識分子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拉攏、收买”的謬論。

解放后，党在全国范圍內，对知識分子实行了“团結、教育、改造”的政策。我們認為党的这个政策是有充分根据的。

首先，党認為革命需要吸收知識分子，建設尤其需要知識分子。为了建設社会主义，除了必須依靠广大工农羣众外，还必须依靠知識分子的積極劳动；特別是由於我国在解放前是一个文化落后科学落后的国家。

党又認為我国旧时代的知識分子的特点是：一方面受了帝国主义和反动階級的种种影响；同时，他們的絕大多数也受着帝国主

义和国民党的压迫，因而一部分参加了革命，一部分同情革命，多数对于革命中立观望，而反革命总佔極少数。事实日益证明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一道，別無出路。因此，党认为团结知识分子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其次，党根据同样的理由认为，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使他们抛弃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如果他们不彻底改变自己的思想、观点、立场，就不可能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就不能发挥他们的知识的作用。教育者必须受教育。何况时代正在一日千里地进展。目前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同他们在政治上和社会地位上的变化不是完全相适应的。

由此可知，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不是党凭空想出来的，更不是为了说说好听；而是党科学地根据社会发展规律和分析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特点而得出来的。我们质问徐芻有什么理由说“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拉拢、收买”呢？是不是我们党在理论上是一套、实际上又是一套呢？不是的、请看事实：

一、全国解放以后，党对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包下来”的方针，绝大多数都继续给以适当的工作，其中一部分还分配了负责的工作；对于原来失业的知识分子也努力帮助他们就业，或者给以适当的安排。最近报纸上不是还报导过北京、上海等地数以万计的失业知识分子就业的消息吗？在政治方面，党也给了许多知识分子以应有的地位。这些不是足以说明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政策吗？

二、党为了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例如党组织他们去参加土地改革、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的斗争，参观工厂和农村，访问苏联，参加各种国际活动，领导他们学习马列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心观点，进行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并且在学习的基础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这些不是足以说明党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政策吗？

事實證明，黨是一貫堅持和貫徹“團結、教育、改造”政策的。正是由於黨貫徹了“團結、教育、改造”政策，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了。我們又要質問徐芻是根據什麼事實說“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拉攏、收買”呢？

### 解放幾年來科學事業的發展是執行黨的政策的结果

右派分子何榮說：“解放前，科學家只要有能力就可以有所作為”，說那時“真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時代”；“現在從來沒有人支持做研究工作的積極性”，“現在已經有個危機，沒有鑽研工作的積極性的危機”等等。他的這種謬論實際上是从兩方面在攻擊我們：（一）攻擊社會主義制度不好；（二）攻擊黨和黨的政策不好。他和徐芻說的“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拉攏、收買”謬論是一拍一和。

我們來講講道理，擺擺事實，看看到底是怎樣的？

歷史事實告訴我們：有史以來，沒有任何一個黨像工人階級的政黨——共產黨這樣重視知識和愛知識分子。任何時代都不可能像今天社會主義時代這樣能夠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封建王朝的統治階級只要那些對他們有利的、忠誠地做他們奴才的知識分子。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也是這樣。早在1847年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產黨宣言”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過：“資產階級抹去了所有一切素被尊崇景仰的職業上面的神聖光彩，它把醫生、律師、牧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拿錢僱傭的僕役”。顯然，如果知識不利於資本家獲取巨額利潤，他就不需要了。因而知識分子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是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知識分子在資本家眼中和“商品”、“工具”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何榮說“解放前科學家只要有能力就可以有所作為”。除非那些“偽科學家”，而且也不是指學術上的才能，而是指吹、拍、當走狗的才能。的確，在解放前，偽科學家們，要有吹、拍、當走狗的能力就可以有所作為，而且可以無所不為。胡適、陳立夫之流就是實



例。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根本不同。工人阶级和党知道，要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要向自然界作斗争，没有知识是不行的。也只有在这里，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充分发挥他的作用。

我们再举一些事实来看：社会主义的苏联在革命以后所培养出来的工程师，按人口比例超过美国两倍以上。从这里可以看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重视知识分子，更需要知识分子呢？

再以我们力学所为例。解放前，我国根本没有力学研究机构。只有在解放以后，到1950年我国才第一次在数学所内建立了力学室，当时一共只有四个人。1956年1月我们正式成立了力学所。现在我们光是研究工作人员总数已达130人。右派分子除法总会算吧，4除130等于32.5。就是32.5倍。右派分子何荣用什么来解释这些事实呢？再进一步说，我们全部高级研究人员中有90%是解放后回国来的。这不是由于党的政策的正确和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后果吗？青年知识分子的培养也是这样。在解放前我自己就不可能唸大学，更谈不上能到力学所做研究工作。过去“毕业即失业”是司空见惯的，没事干就在家“孵豆芽”。现在呢？还以我所为例，今年准备培养的青年研究人员总数就是原来全部总数的150%。在这些事实面前，我们要问问何荣，你根据什么说“今不如昔”呢？

目前我们知识分子的面貌，如党所指出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巨大的胜利。这个成就的本身最深刻有力地说明了党和党的政策的伟大、正确。同时，我们也从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可以得出结论，今后必须继续贯彻这个政策。“明察秋毫的大知识分子，不但不见舆薪，而且看不到翻天覆地的变化，都要等待普通的工人、农民来纠正”。这些情况不是证明了知识分子必须继续进行思想改造才能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吗？右派分子徐芻、何荣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在事实面前完全破产了。

**右派分子歪曲党的政策，用心何在？**

右派分子所以进行这样的歪曲、污蔑，其阴谋何在呢？

第一是惡毒地挑撥黨和知識分子的关系，挑撥知識分子間的关系。右派分子把我們黨和知識分子的“團結”污蔑為“利用、拉攏、收買”。這是對黨，也是對知識分子的污蔑。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与人的关系才充滿了金錢关系，知識分子才被當作“商品”看待。在座的各位！我們也都是知識分子，我們靠近黨，相信黨，跟着黨走，難道是黨“收買”去的嗎！？在座的還有不少我們尊敬的老科學家們，他們在舊社會反動統治下就是不受“利誘威脅”的正直的科學家，具有“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優良品質。可是右派分子非要把他們污蔑為“被收買的商品”，而把我們的黨污蔑為“收買”商。在座的還有不少解放後從國外經歷了重重困難，不顧及個人生活條件，回國來參加祖國社會主義大建設的科學家們，難道他們又是黨用“高價”“收買”來的嗎？我們每個人難道能容忍右派分子徐芻等對我們的黨和全體知識分子的最惡毒的污蔑嗎？

第二是赤裸裸的反對“思想改造”。這一點別的同志已談得很多了。

最後，特別要指出的是，右派分子在歪曲污蔑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時，套用了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在經濟上採取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的字眼是別有用心的，企圖在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策方面造成大家的迷惑、誤解和不滿。因此有必要在這裡指明這一點。劉少奇同志在八大政治報告中清楚地說明過：“我們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同過去一樣，仍然是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政策。這就是說，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工人階級還保持着同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聯盟，在經濟上，資本主義工商業具有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具有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作用，另一方面，具有不利於國計民生的作用。因此國家對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採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十分明顯，這是完全不同性質的兩類問題。黨根據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兩面性，在經濟上採用“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這對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本身都是必要的和正確的。而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是我們勞動人民、國家的財

富，当然要採取不同的政策。而且前者是一種經濟上的政策；而後者是對“人”言的。右派分子有意混淆，企圖達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目的。我們說，兩者都不允許歪曲、污蔑，也決不允許混淆。我們一方面高呼堅決擁護和捍衛黨和黨的政策；另一方面我們要警告右派分子必須老實交代，向人民低頭認罪！

## 駁斥右派分子的“先專後紅”和 “政治即業務”的反動觀點

陳能寬

同志們：

我參加了兩天的“青年大會”，現在並且有機會在這裡發言，內心是有許多的感受的。因為對於我說來，這是新鮮的事物，同時，由於過去幾年在我腦中留下的舊印象，還清楚地、自動地會湧現出來，作為對比，所以感想很多，新鮮的事物變得更新鮮！

我是1955年底從美國回到祖國來的。我、我的愛人和三個孩子們，能夠從美國回來，是人民政府在日內瓦打開了美國留難學生的大門，才能辦到的事。記得1955年9月10日，中美會談交換平民的協議傳到美國時，我們非常地興奮，我們深深地感到黨和祖國的偉大和溫暖，很多同學們（在坐的就不少）今天能夠回到人民的大家庭中來，想必也都曾有過同樣的感覺。所以黨團結知識分子的政策，不僅國內廣大的知識分子，認為是正確的，千百里外的愛國知識分子，也都感到正確和溫暖。右派分子們挑撥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實在令人憤恨而不可容忍！

另外，我有一個深的體會。今天我們將五個右派分子的言論，整齊的印出來發給大家看，並到這裡來進行大辯論，大家想，在國民黨時代，有這種與政權掌握者背道而馳的言論的人，不早已遭到“頭破血流”嗎？我也在想，即使在標榜“民主”的美國，我也從沒有看到過，聽見過這樣氣魄偉大的民主。到過美國的人都知道，他

們對於真正有关痛痒的問題例如階級剝削的問題，黑人平等的問題，国外殖民政策的問題，甚至於統治階級要制造“兩個中國”的問題等等，都是从来不敢拿出来，攤開事實，进行全民大辯論的。而我們呢，敢於和右派針鋒相對，据理相爭，这种真正民主的風度和气魄，确是太偉大了！走进这个大厅，踏上这个講台，作为一个中國的公民，我为我們的民主而感到無比的自豪！

現在，我想就一個問題來駁斥右派，我要駁斥他們的“先專后紅”和“政治即業務”的右派观点。

右派分子討論政治和業務的观点时，有一个迷惑青年的口号，就是“先專后紅”。意思是先成为專家，然后过問政治。因而，受了蒙蔽的青年就会在一个很長的时期內，脫离政治。同时，右派分子又托出来一个“政治即業務”的口号，那就是說，搞業務的本身就是服務於政治，因而，科学工作者永远不問政治，也有借口了。

例如，右派分子何榮說，“知識分子的政治是在研究上”，右派分子項志遴說，“衡量一个人是否脫离政治，主要的标准是看他的業務工作”。除此之外，這兩個右派分子还不約而同的对列宁的話，“科学家要通过自己的工作來逐步接受共产主义”，进行了歪曲，作为宣揚反动观点，“政治即業務”的理論根据，这些言論和科学界大右派分子錢偉長的一貫謬論，真是如出一轍！

這兩句口号，看来簡單，用意很深。它們企圖使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在年青人中先是擱淺、触礁而后全部破滅。它們企圖迎合知識分子的弱點，拒絕社会主义思想改造，因而得挑撥党与知識分子之間的关系，这种打算是非常惡毒的，是必須加以严厉駁斥的！

讓我們先看一看，右派分子真的希望青年“先專后紅”嗎？不，他們实在希望青年的是“專而不紅”。何以見得？因为右派分子表面上除了裝得像一般科学家一样，教导青年人作工作时要專心致志，要埋头鑽研，但除了这个所謂“專”之外，实际上他們还有意的教青年借口“專”而养成个人主义，不問政治，脫离实际，使青年分不清大是大非，看不見真理与謬論的客观标准。这样，他們以大知

識分子的身份出現時就可以混淆黑白，乘機而起。我們回想今年6月6日錢偉長在文化俱樂部得意忘形的發言，“學生到處找領袖”，如何如何……，就可以明顯的看出，當時他在打算利用平日培養出來的“專而不紅”的學生，上街遊行、鬧事了，這個生動的例子，還不夠青年作為警惕么？

實際上，右派分子的先專，既不是真的為了後紅，那麼我們倒可以贈送他們一個“先專後黑”的口號。看看徐志國就是一個例子，一個典型的例子。他不安於專家處的翻譯工作，卻想盡方法要進文學所去，夢想一天成為專家，就可以作為政治資本，騙到人民的信任，然後騎到人民的頭上，作威作福。這種黑心腸的打算不是“先專後黑”是什麼？當然，青年右派分子中像徐志國那樣狂妄的“偉大的螞蟻”，恐怕不多，但抱著“先在業務上成為專家，然後在社會上變為紅人”的打算者，就太普遍了。按我們的了解，“紅”代表革命烈士的鮮血所染紅的道路，代表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是多麼崇高的一個字，而資產階級的右派分子卻把它作為功利主義看待，又是多麼的卑鄙和無恥！

現在，讓我們端正地看看業務和政治的關係。大家知道，業務所追求的知識有階級鬥爭的和向自然鬥爭的兩種，也就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有鮮明的階級性：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則為無產階級的利益服務，這是大家都很清楚，所以當前社會科學工作者的首要任務是提高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水平，這一點郭院長在駁斥“一個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中已經提及。至於自然科學本身，雖無階級性，但掌握自然科學的人，是有階級性的，所以同一自然科學的規律，為不同階級的人所掌握，便可為不同的階級服務，因而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自然科學工作者，如要站穩無產階級的立場，是不能脫離政治而孤立的。

曾經有人將業務比作武器，則政治解決的，可以說是槍口向誰，個人作戰所處的地位，和應該如何配合集體作戰的問題。很顯然，槍口方向不對，武器愈銳利，為害愈大；不明白個人的適當地

位，不与集体配合，则会处处发展个人主义的东西。一旦个人的要求和利益，不得满足，就会发展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可耻地步。右派分子项志遴、何肇等所提的“政治即业务”的观点，配合着许多右派分子所走过的道路看来，就正是这么一回事！

这里应当指出：右派分子所歪曲的列宁的话：“科学家要通过他自己的工作来逐步接受共产主义”，是1921年2月21日列宁在“论统一经济计划”中提出的。当时列宁为了教导党员尊重旧日的科学专家和技术专家所经历的特殊途径，所以提出了这个论点。因为，很自然，不少1921年的苏联专家们是“不免渗透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习惯”的。但是，列宁并没说新苏维埃的青年，也要走旧日科学专家和技术专家的道路，因而提出“先专后红”的口号！或是什么“政治即业务”的谬论！为了赶上世界科学水平，我国的青、老科学家们将在专业的钻研上，付出巨大的劳动，但是，难道中国的青年们在人生的途径上，却要重复年纪大一些人的经历么？是的，由于事实的发展，有些年老的科学家，接受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是比较迟的，这倒也是真正的先专后红，但抱有错误的“先专后红”的观点的青年，不改变你们的观点是永远红不了的。

最后，右派分子也许会想，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有自由不问政治，还是不失其为科学家，为什么我们就强调业务不能脱离政治呢？照我的体会，可以奉劝右派先生们，不要羡慕这个自由吧！人民日报在“用人可以不问政治吗？”的社论中，曾说了一句极为精深的話：“真正不管干部的政治情况的国家，在世界上是没有的”。现在我想简单地谈谈美国在这个方面的情形。

在美国，统治阶级鼓励知识分子追求并沉湎于物质享受里，因而不问政治；政党又把政治一字弄得肮脏不堪，因而使任何正直人怕受沾染，不愿过问政治。这种脱离政治的科学家，在美国是有的。资产阶级的统治者所以这样做，是希望知识分子永远安于与资本家分一杯羹，所以本身也就是一种政治的手法。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显然也是剥削的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是所谓自由的真空的。但为了保险些，统治阶级还是要大学里的教授们作

忠貞宣誓，說明自己忠於美國，昨天不是、今天不是、明天也不會是一個共產黨徒。這個算是有自由不問政治嗎？相反地，假如一個專家對政治有些興趣，並且有些違背統治階級的利益，那麼，就不妙了，失掉職業或受迫害，是意中的事，這樣的例子很多，舉一個我所知道的事。—— 從前做過蔣介石的政治顧問的拉鐵摩爾，後來在 Johns Hopkins 大學教“遠東關係”，只因為比較系統的說明蔣賊腐敗，新中國有政治前途等等比較接近事實，而並不是什麼親共的話，竟為統治者所不滿，吃了官司又丟掉職業。這叫做有過問政治的自由嗎？還有，從中國釋放回到美國的犯人中，有談到新中國情況良好的人，是需送進神經病院醫治的，這算什麼話呢？今天右派分子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大大地崇拜資本主義的自由和民主，但仍有的謀生之路，也還沒有被送到神經病院去，難道還不覺得我們是站在真理的一邊嗎？而美國所謂讓科學家只搞業務，不問政治的自由，是絕不存在的。我們這些從美國回來的人們，雖然政治生活經驗缺乏，政治理論水平很低，但知道所謂有政治自由的美國，是個虛構。我們回到祖國來，也就是不滿意美國的政治的一個例證。這一些事實難道右派分子都不明白嗎？

總起來說，今天我國的政權已掌握在人民手裡。作為一個公民，我們應該關心政治，並有鮮明的屬於社會主義的政治立場，為了使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無隙可乘，青、老科學家們應該堅決的站起來反對“政治即業務”的反動說法，清除“先專後紅”的丑惡思想。我們堅持科學應為社會主義服務，科學工作者應不斷地進行自覺自願的思想改造。在這次偉大的、史無前例的全民大辯論中，我們要徹底打垮右派，使自己和廣大的羣眾受到教育，使人人能作一個毫無愧色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我們要更好地團結在黨和政府的周圍，為正義的、社會主義事業而奮鬥！

## 駁斥右派的“不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 主張先專後紅”的謬論

譚學奇

同志們：在今天與右派分子論戰的莊嚴大會上，我代表中國科學院土壤隊全體同志，來駁斥右派分子項志遴、何肇等“不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主張先專後紅”的謬論。

1. “先專後紅”的謬論本質，我們認為是一種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反動思想，提出這樣謬論的人，本身就有問題。這種提法，是別有政治企圖，別有用心的。右派分子們幻想一旦在科學上有了成就，就可以名利雙收了。拿專家的招牌可以混進到黨里去，不學政治自然而然也會得到政治地位。發表幾篇文章之後，報刊上，雜誌上都有了他的大名，真是轟動全國，名振四方，到此時名譽和政治地位自然會送到他們右派分子門前。要錢有錢，要勢也有勢，真不愧英豪啊；何肇，項志遴我們要警告你，你們這是晴天白日下做夢，不行，這不符合客觀發展規律。這種幻想未免頭腦過於簡單和愚蠢。你們永遠不會達到目的，也永遠不會紅，我們堅決不允許你們謬論的泛濫。右派分子“先專後紅”的目的，就是要瓦解黨領導科學隊伍，瓦解黨在政治上組織上領導科學。企圖把我們科學機構變成他們爭名奪利的工具，用“先專後紅”思想來腐蝕廣大青年科學工作者，最後企圖達到使科學工作者離開黨，推翻黨。你們這種陰謀早被我們看穿了，我們要堅決清除這種“先專後紅”不問政治的反動思想！

2. 右派分子說：馬列主義把科學領導壞了，研究科學可以根本不要政治。我要質問你，你靠什麼思想體系支配你專？你又站在什麼階級立場上專？你專的目的與成果又是為了誰？

難道你在社會上是孤立的生存嗎？和宇宙的一切沒有聯繫嗎？肯定不是，那麼你所作所為必須站在一定的階級立場，為一定



的階級服務，有一定政治目的。你所說科學研究不要政治，你是不要社會主義的政治，而是要資本主義的政治。除此你又要什麼呢？

3. 右派分子項志澁說：存在決定意識，生活在社會主義社會里，自然而然會產生社會主義思想，不必進行思想改造。

存在決定意識是唯物的，是對的。但是，對於來自舊社會或有舊意識的知識分子，決不能否定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照右派分子說：“生活在社會主義社會里自然的會產生社會主義思想”。我要質問你，你們這些右派分子，生活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里，我們有優越的政治制度，社會科學，文化教育，在經濟建設上得到空前未有的偉大成就，例如：我們祖先所幻想的，從來未實踐過的今天我們實踐了。今天我們有汽車製造工業，飛機工業，長江大橋與成渝鐵路的建成，我們鞍鋼鍊鐵技術水平遠遠超過英美等活生生的事實，舉不勝舉。這些活生生的事實一一擺在你們面前，那麼是可以決定你應當具有愛黨愛社會主義的思想啦？

然而，恰恰相反，黨給了你們一系列政治思想教育，並沒有改造了你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反動思想。一直到如今你還在仇恨黨，仇恨新社會，企圖推翻黨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有這樣思想支配你專，肯定你專不好，更專不進去，不但不會紅，而且會變黑，黑得臭不可聞也。否則必須進行思想改造，胆敢拒絕政治思想改造，不痛改前非，你們就會變成社會主義罪犯，自絕於人民。

4. 在階級社會里，政治是人的靈魂，是人活動的動力源泉，是思想的指南。沒有社會主義的政治，就沒有的一切，就沒有社會主義。不要無產階級的政治，就要資產階級的政治，中間路線是不存在的。右派分子說：“不要政治”，實質你早在資產階級思想支配下，猖狂的向黨向人民進攻，要推翻黨的科學路線，復辟資本主義科學路線。這就是你的政治目的，所以你們才仇恨我們今天的一切。

與你們右派分子思想行動相反的，以我們土壤隊全體同志實際行動事例對比一下。我們土壤隊於1956年4月成立到現在短短時間里，我們足跡踏遍了祖國內蒙河套、中灘，甘肅銀川，一望無

际的华北平原与山西汾河流域,大同等盆地,給祖国調查达 105 万余平方公里土地面积,相当於阿尔巴尼亞、比利时、丹麦、瑞士四个国家面积的总和。不但在数量上完成党和人民交給我們的任务,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質量上有保証,我們这些資料正在广泛地应用到各省农業部門,国营农場,拖拉机站等。

如今我們正向長江流域四十余万平方公里土地资源进军,为發展社会主义农業生产,打下有利条件。回想我們初初工作时,甚至連基本操作都不太懂,通过党的亲切教育和熊毅与席承番先生热心培养之下,我們全队 100 多名大学畢業生和其他同志都認識到土壤科学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設中的重要意义。鼓舞了我們工作热情与忘我劳动的精神及向科学进军的决心。所以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我們初步学会了写总结和掌握基本操作,大家都在不断成長中。

我队同志們在野外風吹、雨淋、日晒的情况下,向祖国的田野、草原、深山、沼澤、蘆葦地区进军,不論是高山,或是荒無人烟的草地,不論遇深山荆棘,或是虎狼吼叫,以及被毒蛇咬伤……所有这一切並沒有吓倒我們! 我們逢山过山,逢水过水。偶然因天气驟变或交通工具事故,行李和煮飯人員到不了,同志們吃不上飯,睡不好觉,並沒有怨言。更不像右派分子項志遴所說:“党和政治工作損害了青年的心灵与个性,給青年人苦惱不堪”的謬論。

我們情况正与右派分子謬論相反。越在困难环境下,就越想起了党一再教育我們青年人团結起来战胜困难,向困难作斗争,能克服困难的人,才是党的好兒女。这些话鼓舞了我們越在艰苦环境下越發揚了阶级友爱的精神,工人給幹部棉衣服披,幹部給工人雨衣穿。即使偶然吃不上飯,睡不好觉,第二天仍坚持工作。我們情緒很好,我們感到党對我們很温暖,我們生气勃勃,这不正是党給我們的空气和陽光嗎? 並沒有像右派分子項志遴所說:“党的政治工作給青年苦惱不堪”。相反的,我們很乐观。

我們所苦惱的並不是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而是因为我們學習馬列主义太少,科学水平不高,还不能善於用辯証方法来解剖大自

然。还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尽管在我们面前有不少困难，但我们有决心和信心克服它，这种决心是党给我们一系列政治思想教育的结果。绝不是党的政治工作损害了青年的心灵与个性。相反的——党的政治工作健康了我们青年的心灵与个性。因此我们才忠诚的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我们有无穷尽的力量去建设社会主义与保卫社会主义。

这力量的源泉就是来自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没有政治工作就没有我们生活的自由和今天的一切。

右派分子何肇、项志遵所以不要政治的谬论，及苦惱的原因，正因为他们是别有政治企图的野心，当他们达不到目的的时候，他们就苦惱，他们就咬牙切齿的仇恨党，仇恨社会主义，所以才提出“先专后红”的谬论。并且他还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真的不怕吗？不成，尽管你们学好了数理化，正因为你们把专与红绝然分开，才使你们干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右派分子钱伟长、曾昭掄就是例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专”我们绝不需。我们需要的是既红又专，在红的基础上的专，在专的同时必须红，红与专绝不允许分开。右派分子的“先专后红”谬论实质是否定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否定了学习马列主义的必要性。一句话不要党领导科学。这是极其反动透顶的。我们绝不能允许右派分子“先专后红”的病毒蔓延，我们坚决清除与扑灭这种病毒。

右派分子你们好似生了疥瘡的小青蛙一样掉在井里，尽管你们在深渊的井底下叫出討厭的反党反人民的声音，但是坐井观天的你们，所见的市面太小了，你们永不会成大事，如果你们不悔心转意，一旦人民巨掌把井口盖上，到那时你们自己才永不会见到空气和阳光哩！你们胆敢不痛改前非，那么你们将像陰溝老鼠穿过街道人人喊打一样下场。

5. 右派分子项志遵、夏永年、徐芻等说：马列主义没有阶级性。右派分子他们明明看见太阳，硬说成黑暗。马列主义不但有强烈的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而且给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指出奋斗的方向，并且带来无比的幸福。正因为我们学习了马列主义，正因为

馬列主义武裝了我們的頭腦，今天我們才能用清醒的頭腦把一貫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何肇、項志遴、夏永年、徐志國、徐芻揭發出來，我們一致認清了你們是我們的階級敵人，你們必須繳械投降才有出路。

馬列主义照耀的結果，在世界上出現了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及其他十多個社會主義國家，給九億多人口帶來無比的自由幸福和愉快的生活。所以說馬列主义是無產階級解放的科學，是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科學，是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最好的最有力的法寶和武器。有了馬列主义的指導就能戰勝一切敵人，就會指導我們永遠前進！

#### 6. 研究科學可以不要馬列主义嗎？

(1) 自然科學雖然沒有階級性，但科學本身就是實事求是的東西，它是唯物的，反對唯心的。

從科學內容來說，它在階級社會里，對各個階級一視同仁，可以為這個階級服務，也可以為另一個階級服務。不同的階級掌握了科學為不同的階級服務。

(2) 掌握科學的人是有鮮明階級性的，由於階級不同研究科學與運用科學目的就有所不同。例如：美帝國主義利用細菌科學作為殺人的工具，在朝鮮戰場就是例子。又美帝國主義利用原子能科學作為戰爭資本。相反的，蘇聯利用原子能科學服務於工農業建設上去，為人類造福，如原子能發電站，原子破冰船等。右派分子或者會反咬一口，蘇聯為什麼製造洲際導彈呢？回答很簡單，這是為了保衛世界和平和防禦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如果他們敢於發動侵略戰爭，就叫它粉身碎骨徹底滅亡。

由此可見，研究科學不要馬列主义政治是不行的，科學成果不是為人民，就是反人民，甚至變成殺人民的工具。

因此在我們社會主義的新中國，科學研究絕不能脫離黨的領導。每個科學工作者必須樹立起堅定的共產主義世界觀，只有走科學與生產實踐相結合堅決不移的方針道路才行。

右派分子“先專後紅”的謬論，引起我們隊同志無比憤怒，我們

要以实际行动来保衛党的科学路綫。

最后，我們要警告右派分子，誰要在科学領域中玩弄“先專后紅”不要政治，就等於誰拿刺刀插入我們胸膛，这絕不能容忍。我們將磨起人民的銳劍，坚决回击和消灭他。

今天我們全队 160 顆無比憤慨的心，全国六亿人民有六亿顆無比憤慨的心，都在激烈跳动着，我們握紧六亿双鉄拳，眼对着右派，手指向右派，我們全国六万万人民內心深处，激荡着一个共同的声音，为了捍衛党，为了捍衛社会主义，为了捍衛党的科学路綫，我們坚决向右派分子“先專后紅”不要馬列主义这种反动思想行为作無情斗争，不获全胜絕不收兵。

最后讓我們高呼，我們將永远高呼：

馬列主义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人民科学胜利万岁！

## 不要上右派分子叫囂“独立思考”的当

利广安

許多右派分子，尤其是青年右派分子，像自命为青年“革新者”的刘宾雁、被全国的右派分子称贊为“勇敢的化身”的林希翎、譚天荣，像我們現在批判的这五个右派分子，都打起“独立思考”的旗帜，企圖用漂亮的言詞和动人的口号，为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掩护；引誘青年走上背叛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他們看来，能向党提意見的就是“腦筋好、善於独立思考”的人；要不然，就是“腦筋不好，不善於独立思考的人”。他們把自己打扮成“革新者”、“能独立思考”的人。

作为青年，要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作为科学研究工作者，更要提倡独立思考。因此，独立思考的問題對於我們年青的科学工

作者就有着特別重要的意义。無怪乎这五个右派分子死死抓住“独立思考”的口号,現在看来一点都不奇怪!

### 一、右派分子的所謂“独立思考”的政治企圖

我想从兩個問題上駁斥右派分子所謂“独立思考”的謬論:

右派分子污蔑黨員是“盲从者”,並惡意地要建議党章增加一條“独立思考”作为入党条件。那么,就党内來說,是不是党章里头不鼓励或者沒有提到独立思考呢?不是的。我們党在任何时候都不提倡盲目的服从性,相反,党倒提倡和鼓励每个黨員在党的政治原則方針下独立思考問題,独立进行工作的創造精神。党章第三条規定:黨員有對於党的工作提出建議;在工作中充分發揮創造性的权利,邓小平同志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把工作中充分發揮創造性,作为黨員一項权利規定下来,是有原則意义的。这个規定……可以大大激發广大黨員在党的紀律所允許的範圍內,在工作中充分集中羣众智慧,运用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地創造性地解决問題”。党章第三条又規定:我們党的民主集中制又充分保證黨員有在党的會議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参加關於党的政策的理論和实际問題的自由的切实的討論。这个权利的实现,这就証明党章已經体现了独立思考的精神。党中央許多重要指示都是以草案形式由上而下进行討論試行,再根据各地意見修正發布。如果地方組織由於具体情况确实不能执行,中央又同意地方組織按照实际情况加以变通。毛主席經常教导我們“凡事應該用腦筋好好想一想”,才能辨别是非,加深对事物的認識,真正做好工作。毛主席說:“共產黨員对任何事情都要問一个为什么,都要經過自己头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絕不应盲从……”。

我們的毛主席是善於独立思考的典范。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結合的原則,取得了史無前例的胜利。証明党是最善於独立思考的。因为它集中了整个階級的思考来作出方針、政策和决定。至

於广大的共产党员，他們是人民勤务員，也是最有自觉性、最善於独立思考的人。他們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的自觉性，自觉地願为共产主义事業貢獻自己的一切。这些都証明党章已經体现了独立思考的精神。为什么夏永年还誹謗共产党员是“盲从者”，硬說党章还要增加一条“独立思考”作为入党的条件呢？除了狂妄地想用修正主义来篡改我們的党章，企圖抹煞共产党员的党性，引誘他們反党之外，还有什么呢？

再就党外來說，党同样教育人民羣众不要盲从，要有自觉性。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就是說服教育、自我教育的方法。在我們的国家里，广大的人民羣众享有充分的民主，可以充分提出自己的意見，發揮自己的积极性和創造性。對於学术問題，党提出了“百家爭鳴”的方針。陆定一同志指出：“我国的历史証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沒有自由討論，那末，学术的發展就会偏廢。反过來說，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討論，学术就能迅速發展”。

事实是怎樣的呢？解放八年来，在祖国的各个战線上湧現出了千千万万的積極分子、先进生产者和英雄模范。單就工業方面來說，1956年上半年全国厂矿企業評选出来的先进生产者就有111,993人。解放以来有862,000个职工羣众提出了合理化建議1,378,420件，其中已經實現的有680,489件。难道他們都是你們右派分子所誣蔑的“阿斗”嗎？他們的腦袋都是“木头腦袋”嗎？他們都是有智慧和有創造性的人。广大的人民羣众深信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国，要永远跟着党走，这决不是盲从。對我們党这样高度的信賴，是在長期艰苦的斗争中成長起来的。我們之所以完全自觉地执行党的政策方針，决不是像徐志国所誹謗的“盲从者”，决不是像何肇所誣蔑为“腦筋簡單”的人，而是深刻地認識到这样做就完全符合了广大人民的利益。我們是經過独立思考的，这正是我們革命队伍團結一致，組織性强，执行任务坚决、忠实的表現。由此可見，右派分子之所以用“独立思考”作幌子，他們的反动政治企圖是：第一，就是要造謠中伤，顛倒是非，企圖使青年不听党的話，

不相信党；第二，就是要丑化共产党员，动摇他们对党的信任，抹煞共产党员的党性和积极分子的组织性纪律性；第三，就是要借这个口号来怀疑一切，否定一切，贩卖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烂货。破坏党统一的政治思想领导，引诱青年发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腐蚀青年，使革命队伍的战斗力松懈，在思想上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市场，使青年走上背叛社会主义的道路。总而言之，他们说我们不会独立思考，是盲从，而只有和他们一样来反党反社会主义才是所谓善于独立思考的天才，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 二、我們和右派分子对独立思考的根本分歧

恰恰和右派分子的誹謗相反，我們党是經常教育青年培养独立思考，刻苦鑽研，反对盲从和武断的。問題在於我們和右派分子对独立思考的理解有着根本的分歧，独立思考的口号有着不同的阶级内容。

首先，我們認為沒有正确的阶级立場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独立思考。世界上沒有不站在任何阶级立場上的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永远是和阶级立場紧密联系的。因此說立場是独立思考的前提。离开無产阶级立場而站在资产阶级立場，离开馬列主义的观点而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去独立思考，这就是右派分子的所謂“独立思考”。的确，他們对人民的利益不仅是“独立”的，而且是势不兩立的，對於全国的右派头子处心积慮思考出来的什么“党天下”、“政治設計院”等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謬論，他們不是独立思考的，而是共鳴支持的，並且他們自己也都思考出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行。这說明什么呢？这只能說明他們愈善于頑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場，用资产阶级观点独立思考，就愈显得他們反动。相反，我們却是站在無产阶级立場，用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来进行独立思考的。为什么要站在無产阶级立場来进行独立思考呢？因为無产阶级是最先进最有远見的阶级，只有站在这个立場上才能真正認識事物的本来面目，才能正确地进行独立思考。那么为什么



又要以馬列主义作为我們独立思考的指导思想呢？因为馬列主义是解决革命实践唯一正确的普遍真理，它本身就要求我們在解决实际問題时要独立思考。正因为这样，在这次大風大浪中，我們自觉地經受了考驗，不会盲目的跟着你們右派瞎喊瞎跑，相反地倒証明我們經過自己的独立思考，嗅出了你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害。我們今天在这里坚决地跟你們作斗争，这就是我們独立思考的結果，独立思考的立場是这样，而独立思考的观点方法和态度又是和立場紧密联系的。

其次，我們独立思考的根据是事实，右派分子所根据的是他們捏造出来的謠言，實質上是毫無根据。我們是用实事求是、調查研究、科学分析的方法，用实践作为檢驗真理的标准来进行独立思考的。党經常教导我們反对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者是不善於独立思考的人。党提倡实事求是，調查研究是为了更好地独立思考，从而得出正确的結論，把工作做得更好。而我們現在所批判的这几个右派分子，看看他們的材料就可以看出他們在那里造謠、誹謗、顛倒是非，这就是他們“独立思考”的所謂根据和方法，實質上根本不是什麼独立思考。甚至像徐志国竟然用極端狂妄的态度独立思考出要独霸世界，要讓“全世界都知道徐志国”。項志遴不是承認自己在苏联吃了許多免費的面包又誹謗苏联农業已經破产嗎？这就是右派分子所謂的“独立思考”。据說右派分子为了独立思考竟然要怀疑一切，馬克思主义者並不反对怀疑，而且認為正确地运用怀疑确实是探索問題的方法之一。但是右派分子和我們是有根本分歧的，在他們看来，怀疑就是一切。徐志国就这么說：“人們應該用怀疑的眼光看世上一切的事情”。夏永年不是連对客观存在，对历史發展規律都怀疑嗎？在他看来，“这只不过是維持自己統治的一种說法而編出来的”。他們所謂的怀疑，實質就是否定，就是反对。他們在“独立思考”的幌子下否定思想改造。大家知道，恰恰是思想改造使我們能够站在無产階級立場上更好地思考。項志遴却說思想改造妨碍了自由思考。他們又否定肃反、否定社会主义优越性，总之是否定党的領導和社会主义方向，这就是右派

分子在“独立思考”幌子下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

广大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人士、广大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在党的教导下，从历史和现实生活中认识到党的伟大、正确、光荣，认识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们的先烈在为人们事业战斗的时候，不仅独立思考，深思熟虑，而且抛头颅，洒热血，多少烈士当敌人的枪口对准自己胸膛的时候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是因为他们自觉地知道为人们的事业而死是光荣的。到今天，我们想一想，算一算，看一看，比一比就深深地体会到我们生活的幸福和前途的美好。这正是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正是马列主义和党给我们指出正确的方向。我们感到十二万分的自豪。难道我们不听党的话而要听你们右派分子的话吗？正像向日葵永远向太阳一样，我们是永远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 駁斥所謂“階級是人为”的謬論

申昌萍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毒箭之一就是他们拚命的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奴颜婢膝的右派分子夏永年，在大鸣大放期间，向人民放出的所谓“阶级是人为的”谬论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化身。当我听到这一反动言论时非常愤恨。

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观察社会一切现象时不能离开阶级分析的方法，因为离开了它就不可能观察社会的本质。资产阶级与此相反，他们观察社会的方法就是唯心论。因为他们是被剥削阶级。资产阶级认为私有制是“上帝给他们的荣誉，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夏永年的谬论恐怕他就是奉上帝之命发出来的吧！可惜这种荒诞无稽的反动调言在中国早已变成了垃圾。在大鸣大放中夏永年却又从垃圾堆里捡回来了。

同志們！純粹的垃圾也能为人造福，因为它可以变成肥料，把肥料上到地里去还可以多打粮食。但是夏永年的这一堆垃圾却不同，它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人民只能把它埋到三千丈深的地獄里去。讓它在那里永远变成牛鬼蛇神。

階級斗争是社会發展的必然規律。在階級社会里階級斗争是推进社会發展的动力。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已經变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难道不是階級斗争的結果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在几十年来进行了坚决的階級斗争，終於推翻了封建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長期統治。人人皆知，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階級斗争，我們就不能設想获得今天的偉大胜利。右派分子夏永年为什么高喊“階級是人为的”这一謬論呢？其本質就是他掩盖中国人民經過階級斗争获得胜利的事实，企圖煽动羣众向党向社会主义倒算。

死亡的資產階級，总是希望人民不进行階級斗争。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使資產階級保持对人民所謂“永恆的剝削和压迫”。因此資產階級反动派总是拚命的来反对階級斗争，制造种种的反动謬論来迷惑羣众。夏永年的理論就是那些死亡階級的瘋狂掙扎。

事实最能雄辯真理。現在我用我的亲身經歷来駁斥夏永年的“階級斗争是人为的”这一反动理論。我是生在农村，長在农村。我参加革命后从減租減息到农业合作社，一直在农村工作。解放前我的家也和祖国千千万万的农民兄弟一样过着極端痛苦的生活。在解放前多少年来，我的父母和大哥受到地主的殘酷的剝削和压迫。我現在还清楚的記得，我在六岁的时候，家住在黑龙江省东宁县的一个荒涼的村庄里。在这个村庄里住着180多戶人家。这个村里有一个姓王的大地主，他佔有一千三百多公頃土地。

这些土地是怎样变为地主所有的呢。我的父亲告訴我說：“地主勾結日本鬼子，强佔村周圍的所有荒地，然后讓农民自力开基。开基后，讓农民耕种，三年后就把地权交給地主”。全村180多戶人家从王大地主的手里租种了五百多公頃土地。我們家租了三公頃水田，地租是四、六分（即打了10石粮食，交租六石，我們佔四

石)。有一年，在这三公頃的土地上打了六千多斤粮食。粮食刚刚打下来，地主就派狗腿子催促我们交租子。在十五石粮食中地主老爷收去9石多，给我们只留下了6石多，当时我很得意，给我们留下了这样多的粮食，可是地主又翻开帐本说：“今年春天你们还借了我的四石玉米，现在也该还了”，我大哥无可奈何，站在那里没有说别的，他只是气的说，“你们都拿走吧”。地主不慌不忙的又在六石中连本带利息又拿走了四石。其余两石呢？地主说：“别忙还有第三笔帐，你大孩子闹病时借了我的18元钱，这也得该还了”。夏永年，我问你，难道说，这不是地主剥削农民吗？你有什么根据说“没有阶级”的反动言论。你的居心何在？大家看，这样辛辛苦苦地打下来的粮食都交给地主，家里再没有吃的了，更不用说有什么穿的了。我的嫂子、老娘、小弟弟和小妹妹恨的、饿的几乎成天流泪度日。我还记得，过年过节的时候，地主的孩子穿花衣服，出来得意洋洋，可是我呢？仍然穿那一件破单衣。有的时候，我常常跟同志们和我爱人谈，我在一生中难忘的一件事。有一次地主王大棒子的小儿子，穿带道的白襯衣、对我说：“这是我妈妈给我做的”。我当时立刻跑到家里，跟妈妈谈，小童穿了那样漂亮的襯衫，我呢？穿的这样破，我就跟妈妈闹，给我做白襯衣穿。我娘对我说：“好孩子，人家有钱可以穿得起，咱们那有钱呵，眼看就又没有吃的了，你别闹啦，闹了没用，你长大了也会穿白襯衫的”。她说着就流泪了。她指着我说：“你爸爸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可是到时候，没有吃没有穿的。人家不劳动，在夏天竟摇扇凉风，可是怪得很，过日子过的很好”。这天晚上我做了梦。我也彷彿穿上了白襯衫，据我娘说，我还说了梦话。到清晨醒过来到处找我在梦中穿过的白襯衣。

我娘常常到庙堂里去烧香求神，可是日子过得总是吃不饱穿不暖。打下了新粮，通通交给地主，再向高利贷者借旧粮吃。有时候，没有办法我娘扔掉吃奶的小妹妹，到山里去采木耳。我在八岁的那年，因为我们无力偿还地主王大棒子的债，被恶霸地主王大棒子赶了出来。怎么办呢？我爸爸领我们迁到穆稜县的偏僻的村庄

里——大城厂。在那里又开垦了兩公頃荒地。种了一年后又被日本开拓团强佔,又变成了無地的农民。

痛苦的年月,一年一年过去了。我長大啦。抗战胜利了。八路军来到了咱們村,才吹散了滿天云。17岁的我,跟三哥一起参加了革命,向地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共产党领导我們实行減租減息、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和农業合作化运动。从此我們永远摆脱了封建的剝削和压迫。党把我培养大啦,党把我送到大学和党校里去培养。我娘告訴我的话如今已經实现了。当我在1953年結婚的时候,我娘特意給我做了一件帶道的白襯衣,送給我。

土地改革以后我曾經錯誤的認為現在可以万事大吉了,再不会产生剝削了。然而,事情並不是如此,不法地主富农分子,不甘心自己的死亡。他們到处破坏合作化运动。根据黑龙江省樺川县在1954年的調查:全县三百多起反革命案件中,不法地主富农分子破坏合作化的案件就佔75%以上。地主富农分子,拉攏富裕戶,搞低級社,組織富农組,暗地破坏。放火燒庄稼;暗杀合作社的幹部。我还記得星火集体农庄中發生过这样的一件事。稻子快要熟啦,一望無际的田野上呈现出丰收的景象,社里的男工女工兴高采烈,在这个时候,富农分子在农庄的大堤上挖了一处洞,結果大片的庄稼被水淹沒啦。

右派分子夏永年,我問你,这一切难道說,“階級是人为的”嗎?大家皆知,自从社会上产生了私有制以来就产生了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佔有生产資料的集团剝削一無所有的人。以夏永年之流看来,中国根本没有什么地主,也沒有資本家了。夏永年之流看来,地主对农民的剝削,資本家对工人的剝削,这都是“上帝給他們的荣誉”。

我正告你,千千万万的被剝削者是最深刻的懂得階級和階級剝削的。他們为了生存,就要消灭階級和階級剝削。今天我們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的斗争就是階級斗争。你就是資產階級的反动派。你就是我們的敌人,我們一定要澈底干淨地消

灭你的反动理論。

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是太陽。人民見不到太陽就不能活着。六万万人民沿着党和毛主席所指出的道路勇敢地前进着。五万万农民推翻了地主富农的剝削制度,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千千万万的工人,已經基本上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剝削制度,爱国的知識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也都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你呢?却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場上向党向社会主义惡毒的进攻。

我們的国家像似海洋上的大浪一样出现在世界上。它已經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这一偉大力量的源泉就在於: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按照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說,进行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才获得的。

夏永年,你必須徹底改造你的反动观点,树立無产阶级的立場和观点,否則你只能把你的反动观点帶到棺材里去。(1957.9.20)

## 駁斥右派分子夏永年“党不是代表人民的利益”的謬論

廖集仁

我是一个出生在国外,並且从小在国外長大的华侨。当我看到五个右派分子的材料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憤慨。現在我要用自己亲身的经历,来粉碎右派分子荒謬的言論。

右派分子夏永年,你別有用心的惡毒誣蔑党說:“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一致,是假借人民名义,本質就是一党專政,表面一套,实际又是一套。”又說什么“对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这一点,我不信。”我要用事实来駁斥你的謬論。

在解放以前,由於国民党反动統治阶级投靠帝国主义,出卖祖国的主权和人民的利益,我們国外一千多万华侨的处境是很悲慘的。那个时候,我們华侨經常遭受外国統治阶级的欺凌和压迫。他

們歧視我們，在各種場合下，辱罵我們為“支那”。他們公然侵犯我們的人權，對我們華僑，特別是對我們華僑婦女，進行無理的搜身，並且加以侮辱。他們有些旅館、餐廳、劇院、電影院等，公然拒絕接待華僑，以盡其侮辱華僑的能事。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外國統治階級的僱傭軍人，竟敢在華僑商店买东西不給錢。當善良的華僑向他們要貨款的時候，他們就加以毒打，甚至開槍殺害。在那個時候，我們華僑，雖然名義上有祖國，也有政府，但是，面對着那些數不盡的欺凌、壓迫和殺害華僑的事件，國民黨反動統治者抱着什麼樣的態度呢？他們雖然看到了那些損害華僑利益，关系到華僑生命財產的問題，他們却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他們從來也沒有任何關懷的表示。

正是在國民黨反動統治者出賣人民的利益，不關心華僑利益的慫恿之下，外國統治階級，才敢於肆無忌憚的對華僑進行侮辱和迫害。雖然在解放前，我年紀不大，但是，看到那些令人痛心的事件，在我幼年的心靈上，就常常深深地感覺到做中國人是很不體面的；我也深深体会到華僑是被人遺棄的海外孤兒。在那個時候，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會回到祖國，更不用說會想到回祖國上大學。

但是，在黨領導下，中國人民革命取得了勝利。由於新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人民政府對華僑無微不至的關懷，已經完全改變了我們悲慘的處境。我們華僑受人欺凌、侮辱的時代從此一去不復返了。我們不再是受歧視的中國人，而是受人尊敬的中國人。過去“支那”這個用以歧視和辱罵我們的字眼，再也聽不到了。我們深刻体会到，華僑已經不再是被人遺棄的海外孤兒，而是受到祖國母親日夜關懷和愛護的幸福的人。自從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每當泰國、菲律賓、馬來亞、南越等反動統治者無理迫害我們華僑，損害我們華僑的利益的時候，我們的祖國，便像慈愛的母親一樣，挺身而出，維護我們，一而再、再而三的發出她莊嚴的聲明，向欺侮和迫害我們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幫兇，提出嚴重的抗議和警告，使他們不敢輕舉妄動。同時，我們駐在有些國家的領事館，也經常關懷着僑居在國外的華僑，時時刻刻維護着華僑的利益，爭

取华侨的正当权利。

党对国外华侨这样無微不至的关怀，使我們非常感动，我們内心深刻体会到，清楚的看到，党对待华侨的态度，与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对待华侨的态度，实有天淵之別。正是由於我們有这样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偉大的党，我們华侨常常都会因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驕傲。右派分子夏永年，你說什么“党不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我們要憤怒的駁斥你，这是你对党的惡毒的誣蔑。

現在我再举一个事实来駁斥你的謬論。1948年，英帝国主义在新加坡实行了反共反人民的所謂“紧急法令”政策。在那个白色恐怖之下，許許多多被英帝国主义認為有嫌疑的华侨青年学生，都被关进了集中营，在集中营里，他們受尽了兩年的殘酷摧殘之后，便被英帝国主义無理的驅逐出境。那許多無辜的华侨青年学生，有的被送到台灣，有的被送回祖国。当然，被送到台灣的那些青年学生，他們的命运是悲慘的，当他們一登上台灣島的时候，就被国民党的宪兵和特务抓去当兵，充当蔣匪帮的炮灰。相反的，回到祖国的那些青年学生，却获得了新生。他們受到人民政府無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顧，在學習上、生活上，党給他們作了很好的安排。今天，这些回到祖国的青年学生，有的还在学校學習，有的已經参加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設，过着幸福的生活。以上二种迥然不同的遭遇，青年学生迥然不同的二种前途，不是充分地說明了国民党反动統治階級是出卖人民的利益嗎？同时，不也是强有力地証明了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嗎？这鉄的事实，难道不是有力地粉碎了你——右派右子对党的惡毒誣蔑嗎？

我們华侨是热爱祖国的。我們虽然侨居在国外，但是，我們清楚的看到，中国共产党是代表着全体人民的利益的政党。我們深深地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我們的祖国將走向繁荣富强，我們祖国人民將过着美好幸福的生活。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們国外华侨，在祖国革命胜利和党的事業的感召下，紛紛回国。每年回国學習和工作的青年和学生就有数千人。此外，每年还有成批成批的侨眷，回国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設。我們回到祖国以后，党給



我們無微不至的关怀,在生活和学习上,給我們以很多的照顧,在工作上又給我們以很好的安排。使我們感覺到,生活在祖国大家庭中,是無比的温暖,投回祖国的怀抱是多么的幸福!

在华侨里,掀起这样一个一年比一年更高漲的回国热潮,是反动統治时期所从来不曾有过的現象。在历史上,国民党反动統治只会迫使祖国人民逃亡国外,並且對於回国的华侨进行各种卑鄙的敲榨、勒索和迫害,因此,使我們华侨有国不敢归,有家不敢回。今天在党領導下的祖国,这样的現象,已經是历史上的笑話了。

华侨能否回国,是决定於領導祖国的政党所代表的階級利益。只有在革命胜利以后,代表着人民利益的共产党領導下的祖国,华侨才能幸福的回到自己的祖国。这难道不是清楚的嗎? 我們华侨对新生的祖国,是怀着我們从来不曾有过的热爱。因此,我們都紛紛回国,跟隨着党走,願意在党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起用我們自己劳动的双手,建設我們富强的祖国;建設我們幸福的国家。华侨如此地心向祖国,回国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設,是因为我們看到党领导下,祖国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自己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是真正出於內心的感受。这不也是充分駁斥你——右派分子徐志国惡毒誣蔑人民羣众是“盲从者”的謬論嗎?

就以我自己來說,今天回到了祖国和平幸福的土地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常常感到,现实生活比我們的夢想还要美好。过去,我們不敢夢想能够回到自己的祖国的,但是,現在我們一家已經有了四个兄妹先后回到祖国;过去,我們从来不敢夢想过上大学,現在我們都上了大学,分別在北大、清华、地質学院和医学院愉快的学习,受到党很好的关怀和教养,使我們都幸福的成長起来了。目前除了一个妹妹在大学学习,我們三兄弟已經胜利的結束了大学的学习生活,开始参加祖国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正是由於党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这几年,我們亲身体会到党領導下的祖国社会主义建設事業,不但为国内人民,並且也为国外华侨創造了充分發揮才能和智慧的可能性;祖国無限光輝燦爛的前途,不但为国内人民,並且也为国外华侨照明了美好幸福的未来。在場的右派分

子，我要問你們，如果沒有黨的領導，沒有全國革命的勝利，難道能夠改變我們一千多万海外華僑，百年以來受盡外國統治階級任意欺凌、侮辱和迫害的孤兒處境嗎？如果沒有全國的解放，難道我們從小生長在國外的華僑子弟，有可能回到我們祖先世世代代勞動、生息的祖國嗎？如果黨不是代表人民的利益，難道我們華僑子弟有可能上大學學習，受到政府的關懷和照顧嗎？如果黨不是代表人民的利益，難道我們華僑又有可能為自己的祖國建設事業，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嗎？

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迫使我們華僑妻離子散，離鄉背井，不得已僑居在國外，備受外國統治階級的欺凌、侮辱和迫害。但是，共產黨領導全國革命的勝利，改變了我們一千多万華僑悲慘的處境，並且使我們無數的華僑重返久別的祖國，過着幸福的生活，這些活生生的事實，不是十分令人信服地說明了黨是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嗎？難道不也是最充分有力地駁斥你——右派分子夏永年，對黨所進行的惡毒誣蔑，說的什麼“黨不是代表人民的利益”的謬論嗎？

做為華僑，我要嚴正的警告你們右派分子，我們華僑絕不容許你們對黨的誣蔑和毀謗，我們絕不容許你們破壞黨和人民的关系，不容許你們動搖黨的領導。我還要再一次警告你們，我們華僑將永遠跟隨着共產黨走，在黨領導下，和全國人民一道，走向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

## 斥右派分子夏永年否認“黨和人民利益一致”的荒謬言論

張彭熹

同志們：我是剛從祖國的西北柴達木盆地回到北京的。在黨開始整風的時候，我們就出發到野外去了。在這個時期里，右派分子借着黨整風的機會大肆向黨進攻，妄想搞掉黨的領導使資本主

义复辟。我們科学院的青年人中間也出現了这样的叛徒。右派分子夏永年污蔑党說：“對於党是代表人民利益这一点，我不信”。他否認党和人民的利益一致。作为一个共青团員一个公民我不允許你污蔑党，我以最大的憤怒向你提出質問：你有什么根据。你否認共产党和人民的利益一致，那就是說共产党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只有資產階級的政党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也就是过去的地主、买办、官僚資產階級專政下的那一小撮殘暴的独裁者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那么咱們就比較一下吧！上午应用物理所副所長以自己親身的經歷已經將你們的反党言論駁得体無完膚了。我是劳动人民出身的，現在我以个人亲身遭遇及亲眼所見來駁斥右派分子的“党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动言論。

解放前在黑暗的統治时期我生在貧民窟，一家七口只住着一間小房，仅有兩床破被。在日寇統治时期，做为一个“人”，我們吃的是什么呢？是当作肥料用的發了霉的豆餅，各种混合面，以及用白薯干而更多的是白薯秧磨成的面。如果每天能吃到这些那还是万幸了！絕不誇張的說：在那段时期里我們沒有一天吃过飽飯。父亲就是这样餓死了！当他临死时嘴里还叫着棗餅餅，等我母亲卖掉仅有的兩床破被当中的一条，买来棗餅餅时，父亲已經嚥气了！我們挨餓受冻是不是因為我們沒有劳动力呢？不是的，当时我的兩個哥哥都在作工，可是誰还管工人的死活呢？我十二岁就在天津北站机务段擦車，人小，肚子無食沒力气，时常遭到日本技工的毒打，我有一次偷用了机油擦車，他們就毒打了我一次，以致日后不能去上工。我們苦苦的幹了一个月得到的报酬是什么呢？十二斤半黃豆面。而工人悲慘的工作条件那更是說不完的。我亲眼看見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由於沒有安全設備而掉到鉀碱鍋里活活燒死，而当时日本人看着只是一笑了之。在那种悲慘屈辱的日子里，我們沒有一时不盼着抗日胜利，盼着自己人来。我們盼星星盼月亮，盼到抗战胜利，但却盼到右派分子們認為代表人民利益的“蔣政权”。我們仍旧过着悲慘非人的生活。由於蔣介石的接收，有的工厂关闭了，我的一个哥哥失了業。但当时姐姐参加了工作，在一

个小学里教書，按理說現在应过个像人一样的生活了吧！但不行，当时物价一日三漲，而工資又迟迟不發，等工資發下来，却买不了几斤面，我們和从前一样还是挨餓受冻！我为了获得知識寻找飯吃，就考入了天津失学进修班。这个进修班表面上虽像一个学校，但实际上是收留流亡地主子弟及供給蔣介石特务的处所。因此我們考进去的一批穷孩子，就成为他們压迫和侮辱的对象。每頓飯只發一个窩头，一些劳动的事都要我們去幹，稍事反抗即加个“思想不良”的罪名，作为他們迫害的对象。我就是因为說了他們一个“贪污”，被叫到訓导处审問很多次，挨罵罰跪，几天不叫出門。地主买办官僚資產階級的代表蔣介石从日本侵略开始就採取不抵抗主义，使大半个中国淪陷。抗日胜利后首先宣佈对日本要採取“寬容仁愛”的政策，留用日本軍人及特务大肆屠杀中国人民，將日本战犯岡村宁次奉为上宾，台灣总督也被請进台灣，对在日本的侵华战犯採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实际上是听从美国之命，美国人要日本在中国領海捕魚，蔣介石举手贊成；美国人要中国和日本通商，蔣介石就强迫通过恢复日中貿易；日本警察槍杀中国同胞，美国佔領当局宣佈無罪；美国兵强姦中国女大学生反而污蔑我們；我曾亲眼看見美国兵槍杀我国三輪車工人。这些事实右派分子們你們怎么解釋呢？

我們再看看解放后吧！四九年天津解放，当时人民生活很苦，国家也很困难，党就是在那样条件下，首先幫助我們修被炸毀的房子，救济我們工人小米。从此我們再也沒餓过肚子，才算过着人的生活。父亲母亲姐姐都被旧社会吞沒掉了，而現在的兩個哥哥都在工厂里作工，妹妹也在紡紗厂工作。再也不是七口人只有兩床被子的年代了。解放以后在党的关怀下我讀完大学，这在解放前是連作夢也夢不到的，56年就参加了地質所工作，就是在这样的社会里，作为一个工人階級的貧苦孩子！我們首先获得生命，然后是获得知識，繼之获得工作，以便有机会將自己力量貢獻給人民。以上仅是我个人在解放前后生活的对比，就足以駁倒右派分子的謔言，而千百万劳动人民那一个不是在解放以后才过“人”的生活

呢？右派分子們別有用心的污蔑黨，說：“黨和人民的利益不一致”，難道解放以後你還看得到貧民窟嗎？北京龍鬚溝臭氣沖天的情況還存在嗎？美國兵還能在我們神聖的國土上胡作非為嗎？

黨是代表人民利益的，這是任何人也不能抹殺的。人民要的是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資本主義，右派分子否認黨和人民利益一致，企圖蒙蔽人民，使人民相信唯有右派資產階級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真是白天做夢。我們說：在現在的社会里資產階級要想統治人民，那就必定依靠帝國主義，即使是這樣，也只能說是暫時的，而這樣的資產階級統治，他和蔣家王朝的統治絕不會兩樣。人民只能接受真理，他們只注重事實。過去不被人當作“人”的人，現在挺起了腰板，一幢幢新的樓房興起了，一個個新的工廠建立了，成渝、寶成、鷹廈鐵路通車了，並正在建設着蘭新鐵路，鞍鋼、包鋼、武鋼有的已經建立完成，有的正在建立，康藏、新藏、青藏公路通車了，現在鐵路上奔馳着自己人民製造的火車，天空中飛着的有我們自己製造的噴氣飛機，而公路上跑着自己人民製造的汽車！我今年就是坐着自己人民製造的汽車在柴達木工作，這在從前能想到嗎？作為一個工人階級的窮孩子能讀大學嗎？能在大學畢業後到科學院工作嗎？又能坐着自己人民製造的汽車去柴達木進行調查工作嗎？不，這些都不能。鐵的事實擺在我們眼前，解放前的悲慘生活及解放後黨領導下人民的幸福生活，我們是會比較的，人民很清楚的知道誰是代表自己利益的。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否認共產黨和人民利益一致，企圖推翻黨的領導，恢復資本主義統治，使我們再過那種屈辱非人的生活。我們說：不。我們要的是共產黨的領導，因為她是唯一代表人民利益的，我們向往的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也正在為着她的實現而奮鬥。過去我們已經將資本主義送進了墳墓而且永世也不叫它翻身。

## 絕不允許右派分子离間藏汉民族的团結

安世兴

我是一个藏族青年，看到徐芻等右派分子对我們的党、我們的社会主义制度、我們的民族政策的誣蔑，以及破坏我們民族大团結的卑鄙言論，感到無比的憤慨。

右派分子徐芻說：“西藏人民要求独立，如从藏族利益应讓它独立，只是由於汉族利益不讓它独立”。这种說法和英美帝国主义者論調是一模一样的。这是徹头徹尾的卖国言論。

举世皆知，西藏从来就是我們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們祖国各民族共同締造的大家庭。我們藏族和祖国各族人民之間有着深厚的感情，有着血肉不可分的关系。这些事实就連帝国主义者也是不得不承認的。但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者一直在藏族人民中間进行挑撥，陰謀制造所謂的“西藏独立”。他們的目的就是为了对西藏地区进行侵略和掠夺，要把西藏变为他們的殖民地，奴役和統治西藏人民。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毒辣手段是他們对其他民族进行侵略的一貫手法。因为，誰都明白一个国家被分裂以后力量就小了，帝国主义就易於統治。所謂“西藏独立”的陰謀如果得以实现，西藏必定陷於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地位。因此，“独立”只是对帝国主义者有利；對於西藏人民不仅毫無利益可言，反而必定給西藏人民帶來無窮的痛苦和災难。

解放前，帝国主义在西藏曾長期进行分裂活动，这就是現在右派分子所說的“应讓它独立”。但是結果怎样了呢？結果是使我們西藏人民的生活困苦不堪，人民羣众大都穿不上衣服褲子，光着身子在大街、田野中走来走去。一百年来，藏族人民是不甘心忍受他們奴役和統治的。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鎖，人民也曾进行了多次的反抗；但是，我們这个多年来的願望直到1951年才得到徹底的实现。我們藏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鼓舞下，在

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得到了解放，西藏地方政府也签订了和平协议。从此我们全体藏族人民都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可是帝国主义是不甘心他们的失败，至今还不断在进行挑拨离间，破坏藏汉民族团结，阴谋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的侵略目的。右派分子替帝国主义宣传的“西藏独立”，这种出卖祖国领土，出卖民族利益的美国言论，我们藏族人民是绝对不答应的。

解放以来，我们深深体会到党对于藏族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反动统治的时代里，我们不仅得不到丝毫关怀，反而遭到歧视和迫害；民族不仅得不到繁荣，反而受到摧残，人口由四、五百万减少到只有三百万人。同时，我们也深深体会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只有在各民族的团结一致、相互帮助、特别是在汉族老大哥的帮助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藏族才能得到发展和进步。我们更深深的体会到祖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绝不允许右派分子把藏族的利益和汉族的利益对立起来。谁要阴谋破坏，他一定要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击下，碰得头破血流。

解放以来，我们藏族和祖国各民族一样，在祖国大家庭中，充分的享受到民族平等的权利。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等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也逐步地改善了。想不到在藏族人民从黑暗走到光明幸福的日子已经有了六年的今天，右派分子居然还丧心病狂地为虎作伥，甘心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竟大肆叫嚣“西藏独立”的调调，企图挑拨我们祖国的民族团结，不让我们藏族人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把我们拖回到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的老路上去，要我们放弃日益美好幸福的日子，仍旧去过那种牛马不如的生活。这是藏族人民、也是全国各族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右派分子的这种恶毒心思，正如我们谚语中所说的“草原上的火，羊圈里的狼”。但是这只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妄想而已，他们也正像我们藏族所说的是“没有睡着就在做梦”。

西藏人民在祖国温暖的大家庭中正过着一天比一天幸福光明的日子，这是我们藏族人民在百余年来，梦寐以求的光辉前途。这

有什么不好呢？而右派分子們竟狂妄地叫囂“从藏族的利益出發應讓他獨立的”荒謬論點。藏族人民的利益是什麼呢？藏族人民的利益就是在黨的領導之下，和祖國各族人民一道，沿着社會主義大道前進。

為了揭穿右派分子這種蒙蔽、欺騙，這種挑撥離間的陰謀，現在我要把黨和政府對於藏族的幫助，告訴給這些右派分子們。

解放以來，在黨的領導之下，藏族人民已經得到了政治上的平等權利，普遍地實現了區域自治，成立了甘南、阿壩、海北、海南、海西、望南、果洛、玉樹、康定等藏族自治州，並且成立了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藏族人民獲得了當家做主的權利（各自治州和西藏都是藏族當家作主）。這充分地體現了黨的光輝的民族政策的精神。

經濟和文化建設方面更是突飛猛進，如：跨過四五千公尺高山的康藏、青藏公路的建成，北京拉薩航線的通航，以及發電廠、血清製造廠、汽車修配廠、礮砂廠、煉鐵廠等現代化工業的建立，都給西藏帶來了史無前例的繁榮。

解放前，西藏一直沒有一所正式的學校。現在已經有了七十九所小學和中學，學生六千多人。並且培養了藏族自己的醫藥、衛生、獸醫人材和汽車、拖拉機駕駛員。文化生活方面，我們不但能看到電影，而且看到的還是藏語配音的影片。我們有了數量充足、內容豐富各種藏文讀物。從前我們藏族人民是吃不到蔬菜的，而且從來也沒有人試種過。現在在西藏高原上已經試種成功了三四百種糧食作物和蔬菜、果樹等。不僅如此，而且每種都達到了很高的產量，烏克蘭冬黑麥每畝可產一千二百多斤，春小麥每畝產量在五百斤以上，番茄每畝可以收到五千多斤，二、三十斤重的大蘿卜和四、五十斤一棵的洋白菜都是很普遍的。

上面這些事實，只不過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後，在這短短的六年當中，所取得成績中的一部分。但我們從以上的事實中，就可以看出：沒有黨的領導、沒有藏漢人民的團結一致、沒有漢族老大哥的幫助，是不可能取得這些偉大成就的。同時，也說明了只有走社



会主义道路，才能使各民族达到繁荣和发展。右派分子反对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我们是坚决不答应的！我们要警告这些右派分子，如果你们不幡然悔悟，重新做人，你们就是自绝于我们各族人民，也正像我们藏族的谚语所说的“如果不回头，就会像扑灯蛾一样，自走死路”。

我们藏族人民永远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谁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就向谁作无情的斗争，不胜利，我们绝不罢休！

## 党是代表各族人民利益的

古力米尔

同志们：

我是塔吉克族，家乡在祖国的边疆帕米尔高原上。我在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工作。现在我和大家一起批判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

真正帮助党整风和恶意地向党进攻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人民完全能清楚地分辨出来。

右派分子的目的是要推翻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企图建立一个把人民引向贫困、痛苦的腐朽的资产阶级专政。这是我们誓死反对的！

过去我们少数民族遭受压迫、剥削和歧视，被人骂作什么事也不能干的“牲口”。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得到了解放，得到了政治上的平等权利。

解放后，新疆成立了维吾尔自治区。我们塔吉克人也成立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同国内各民族一样，我们也得到了自治权利，当家作主了。这是史无前例的大喜事。

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时期，人民生活是极端贫困的。新疆的绝大部分耕地都被地主恶霸占有，众多的农民都没有土地或只有一小块土地。生产工具也很简陋。农业产量十分低下。

我們塔吉克族是以畜牧業生产为主的，人口有一万多人，畜产品不够維持这些人的生活。解放前全县只有三万头牲口，而在解放以后短短的几年中就增加到八万多头。解放前新疆的少数民族一般只在冬季吃些玉米面，夏季就几乎没有吃的，农民們虽然辛辛苦苦种植了小麦、大米，然而自己却吃不上。塔吉克人民每年从五、六月到九月的期間，因为没有粮食，只能靠奶品度日；没有牲畜的人只好吃草根、啃树皮。解放后，在新疆就再也找不到挨餓的人了，人們不論冬天或夏天，都能吃到大米、白面。解放前，塔吉克人民沒有住过像样的房子，現在新房子一幢幢地修建起来了。

以前新疆各少数民族穿不上像样的衣服，尤其我們塔吉克人穿得更不像样。那时候老百姓別說穿現在这种衣服，就連土布做的衣服也穿不上，很多人只能用装土、装粪的麻袋縫成衣服穿，而且麻袋也是补丁連补丁的。可是現在就再也看不見一个披麻袋的人了。

在医疗衛生方面，过去在新疆大多数人生了病是沒有医藥治疗的，因此就用跳神等落后的迷信方法来治病。一九四五年在塔吉克族地区霍乱流行时，一个村子里差不多每家死二、三人，沒有死人的家庭几乎没有。每年天花流行时，一村至少死三、四十个孩子。現在新疆境內每个县都有医院，很多区里也有了医院。例如解放前沒有一所医院根本談不到医疗设备的塔什庫尔干，現在也建立了一个县人民医院，每个区都有医疗所，並免費为貧苦人民治病，而且几年来也培养了一些本民族的衛生幹部，保健工作有了很大成績，因而上述傳染病沒有再流行，因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大大減少。由於推行新法接生，产妇及嬰兒的健康也有了保障。

在反动統治时期，新疆各民族的文教事業与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得不到發展，学校很少，电影院、圖書館更少。拿我們塔吉克族地区來說，解放前，塔什庫尔干只有一所破旧的小学，連桌椅也沒有，學生們在草堆上學習，冬天教室里沒有生火，写字沒有黑板，只好把鍋灰抹在門板上写字。現在新建了十几所学校，都是新房子，有教室，有宿舍；过去全县只有七、八十个小學生，現在有九百多

全。此外还有一个容纳六十多个学生的完全公费的高小学校。

过去塔吉克人看不到电影，现在时常有电影放映队到各地巡回放映。

显然，我们少数民族的生活在解放后起了很大的变化，这都是由于有了党的领导。党给我们带来了美好的生活，而且还引导着我们建设更富裕、幸福的生活！我们少数民族人民坚决地拥护党的领导！右派分子想要推翻党的领导，我们决不答应！

右派分子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说它不如资本主义私有制，说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使商人必须经营得很好，对人民方便。现在，听听我们那里的情况吧！

从前，我们塔吉克族居住的地方由于物资缺乏，地方偏僻，交通不便，人民又很忠厚老实，于是商人就来残酷地剥削我们了。他们在秋天用贱价收购我们的粮食和畜产品，把喀什带来的烟草、茶叶、针线等以高价卖给我们，甚至一块砖茶要换走三、四只羊，一根缝衣针也要换走几斤羊毛；春天一到，我们卖一只羊只能买到三、四称（一称约等于十三斤）粮食。为了不至饿死，只好忍受剥削。

现在，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地方上有日用品国营商店，供销合作社，以合理的价格与我们交易。卖一只羊可以换到十五称粮食。以前卖一只羊只能买三十折土布，现在卖一只羊就可以买到一百五十折土布（十五折土布可做一套内褂裤）。

以前，有些日用必需品要到喀什城去买，要走七天的路；现在很近就有货色齐全的合作社。夏天还有流动贸易组到牧区去售货，为牧民们服务。由于政府照顾少数民族，有些货物的价格和喀什或乌鲁木齐的价格一样，不加运费。难道这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里能够办得到吗？

政府为了促进物资交流，便利交通，正在修筑从喀什到塔什库尔干的公路。尽管沿途都是高山急流，荒无人烟，我们的党和政府还是大力地进行这项建设。由此可见，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人民着想的。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优越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像我们这些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就不可能得到这样的帮助和发展。

全国各少数民族在旧社会里都深受剝削和压迫，因此我們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决不允許走资本主义道路。

右派分子誣蔑党不能领导科学，說十二年科学规划不可能实现。这种論調是要取消党对科学專業的領導权；反对我們制訂的科学工作规划，要我們像资本主义社会以那种分散、無組織、無計劃的方式做研究工作。我們少数民族語言研究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几年来迅速的發展和巨大的成績，是鉄一般的事实。这就可以說明党能够领导科学事業前进。

我們塔吉克族一向都用維文进行学习，文盲佔絕大多数，所以在与別人交往上困难很多。人們想要远方的亲人来探望自己，只好用毛線捆上羽毛託人帶去。青年男女要表达爱情只好用紙包着石头和麦草等物，用線紧紧纏上，表示爱情像石头一样坚固，表示想念情人以至像麦草一样枯黃，表示关系紧密坚定。这些方法当然不能滿足人們表达更細致和复杂的思想的要求。

很多少数民族受到因为没有文字，文化得不到發展的痛苦。这在解放前是無人过問的。因为反动統治者連少数民族的存在也不承認，他們是不会管这些事的。但是，解放以后，虽然我們人口很少，党和政府还是很重視我們民族的語言文字研究工作，派了調查队去調查語言，請了苏联專家来帮助，培养了本民族的語文幹部，这对我們民族文化的發展，各方面的进步是有很大作用的。

这种工作不仅限於我們塔吉克族，解放后，党和政府在少数民族語文工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苏联專家及汉族同志的帮助下，为苗、彝、僮、傣等族創立或改革了文字。一九五五年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語文科学討論会，总結了几年来民族語文工作的成就和經驗，提出以后的工作重点和方向，制定了民族語文工作的远景规划。一九五六年成立了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有一百七十余人在研究着几十种語言。各民族地区成立了民族語文研究機構。科学院派出了有七百多人参加的七个調查队，深入到祖国的各个角落，普遍調查了全国各民族的語言。民族出版事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这些事实充分說明了解放以来党在少数民族的文化事業方面做了

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难道在解放前無人过問的只靠个别学者埋头苦幹的少数民族語文研究工作，解放后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不是党能够领导科学的証明嗎！

十二年科学规划是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制定的。从我們少数民族語文工作看来：現在有了党的正确领导；人力物力方面的支持；苏联專家的帮助；再加上所有科学工作者的努力，我們是完全可能完成和实现十二年规划的。

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論引起了我們極大的憤慨，我們少数民族不容許他們对党橫加誣蔑。事实上党处处为我国各族人民的利益着想。祖国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的成就是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各方面工作的进展，人民生活的显著改善，都体现出党对各民族的关怀与爱护，証明了社会主义道路是美好、正确的道路，是我国各民族幸福、繁荣的唯一道路。右派惡毒地攻击今天的社会制度，这就是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然而我們决不答应！在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偉大建設事業中，我国各民族人民有充分信心，在党的领导下大踏步前进！

## 回答右派分子在民主問題上的挑战

劉大年

我想在这里說一說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社会主义制度民主的問題，駁斥右派在這個問題上的謬論。

右派分子从各方面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民主問題是他們發動攻击的一个方面。他們荒謬地拿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和資產階級的民主相比、誣蔑我国的民主生活。照右派分子看来，社会主义国家不民主，只有英美等資本主义国家才算民主，要求在中国实行英美式的民主。他們有的是任意顛倒黑白，有的是人云亦云，並不知道英美式的民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和今天中国的不民主又表現在什么地方。

民主是人和人之間的一种关系，不是抽象的，是有階級性的。从来沒有一个当权的階級給予敌对的階級以民主，對於敌对的階級只有專政。問題在於哪一种民主真正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和代表什么階級的利益。

資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只給予資產階級。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表面上看来他們輪流执政、互相攻訐，好像英国美国确是很民主。其实那些政党的上台和下台，那些人的贊成这个，反对那个、半点也不會超出資本主义制度和資產階級利益的范围。互相爭論的那些报纸、政党、派別和个人，不过是代表着英美資產階級不同的階層或不同的壟断集团的利益，表現了那些階層和集团之間的互相爭竞和利害冲突。在資本主义制度之下，这些矛盾和冲突永远会存在。反过来看，世界上沒有一个資本主义發达的国家真正給予过工人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政党以民主自由的权利。迄今为止，大多数資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處於非法地位。在那些国家里，“共产党员”这个称号就構成头等严重的罪名。右派

分子所認為最民主的英国和美国，名义上共产党是合法政党，但是他們的活動要受到重重限制。美国的所謂麦卡錫法，史密史法等，目的是要禁止美国共产党的活動。甚至仅仅是思想比較开明的人，就有可能被加上“非美”的罪名，受到調查、剝奪公職。这个事实的本身是对資本主义制度民主的一种無情諷刺。簡單說，資本主义国家的所謂民主，就是那里的資本家們有剝削劳动者，获取最高利潤，互相竞争，彼此吞併的自由和民主。这些對於工人、农民等劳动人民是沒有份的，他們只是專政的对象。

英美式的民主在旧中国曾經推行过，但是早就徹底破產了。清朝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一九〇五年就“預备立宪”，直到一九一一年清政府被推翻，也沒有見他頒佈过宪法，实行过民主政治。北洋軍閥表演过許多幕“选举”“制宪”的活劇，其中有穢名远播的一九二三年曹錕的賄选。曹錕只有依靠公然用每票五千元收买議員和用軍警包圍議會，才达到了“选举”他当总統的目的。一九四七年蔣介石的偽国大更加反动卑鄙。沒有必要去說明偽国大的种种丑聞，只須指出蔣介石坚决排除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势力，依靠美国几十亿美元軍火的支持，發动規模空前的大內战，在全国屠杀人民，就可以了解他的“民主”是些什么貨色。中国資本主义不發达，資產階級势力很小，清朝政府、曹錕、蔣介石等人的活動主要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利益。他們不但絕對不会給工人、农民以民主，而且連英美資產階級民主的形式也做不到。

今天我国实行的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享有民主权利的是佔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相反，是生产手段为公共所有。在这种所有制度之下，不存在資本主义制度中那种各个壟断集团之間的排挤和竞争；因之，我們的选举、人民代表會議、報紙言論等，都不可能反映出資本主义社会的那种竞争冲突和利害关系，不可能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务。我們的选举、報紙言論等都力求在最大的限度上代表全国絕大多數人的要求，为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我国的民主生活表現在多方面，只須举出下面兩件事就可証明这一点。

一件是反右派斗争的本身。古今中外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中，只要右派暂时得势，左派就要人头落地，血流成渠。远的有法国大革命中的例子。那时雅可宾派是左派、他们掌握了政权却不肯彻底镇压反革命。结果是右派得势以后，左派遭到屠杀，罗伯斯庇尔等人被送上了断头台。早一点的有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例子。那时共产党和其他进步人士是左派，蒋介石的国民党是右派，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大屠杀来血洗左派。最近还有匈牙利反革命发动白色恐怖的例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今年六月初六教授会议所估计的形势一旦实现，右派分子得势、现在不知有多少革命群众已经人头落地。今天我们对于右派分子，却一般不用法律制裁，而是进行说理斗争，揭穿他们的面目，驳倒他们的谬论。这是由于人民政权的巩固，同时也充分表现了我国广泛的民主生活。再一件是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学术思想的领域里，实际上只有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两家，所谓百家争鸣、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都可以争鸣，自然我们是坚持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反观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禁书；在今天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学说也仍然是被严厉禁止的。学术思想上的民主、正是我国民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许多事情都有两种标准，阶级立场不同，衡量事物的标准各异。前些时见到一位英国客人，他表示不同意我们说右派的反动言论是有罪的。我们向他解释：说右派的言论有罪、不是单从法律标准来看的，更重要的是从全国六亿人民根本利益的标准来看的。这位客人立即反驳说：“我们西方不存在后面这个标准。”他的话很直率，用“西方”资产阶级观点来看，当然只需要考虑资产阶级的利益，没有什么全国人民利益的问题。民主就是这样，是两种民主，一种是资产阶级的只有少数人有份的，一种是社会主义的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我国今天的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它体现着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右派分子说我国今天不如英美民主，正因为他们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看问题，对于反动的资



产阶级来说、社会主义的民主确实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没有什么优越性。

没有人说过、我国现行的民主制度已经尽善尽美、不需要改进了。事实上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有许多事情需要不断的改进，民主生活也不例外。社会主义制度是使我国人民享有充分民主权利的可靠保证。

青年具有很多值得珍贵的东西。但是就多数人来说，由于年轻，未免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知识都有所限制。右派分子就抓住这一点，在青年群众中散布各种毒素，他们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不如资产阶级的民主优越，只是一个例子。其实资产阶级右派所关心的不是谁民主、谁不民主的问题、或谁民主多、谁民主少的问题。他们所痛恨的、所要反对掉的只有一条：社会主义制度。不过右派既然提出民主问题来挑战，大家就有必要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彻底揭露他们的原形，驳倒他们的谬论，来维护社会主义的利益。

中国今天的民主制度远远地优越于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这是事实，是真理。我们所以能够彻底击溃右派、正因为真理是在我们这一边的。

## 驳斥右派的“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要求 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谬论

林 蘭 英

这五个右派分子都非常向往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他们所指的，都是歪曲事实，造谣乱说，诬蔑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不民主。我想就他们提的几点，用事实来加以批驳。

(1) “英美的民主，人民能影响政府，我国人民不能影响政府政策。——例如艾登侵略埃及失败，就要下台；美国人民迫着美国政府在朝鲜停战。”这完全是歪曲事实。艾登的下台，完全是因为

苏联同我国要派志願軍去援助埃及，英法害怕才退兵，艾登把侵埃的事情弄糟了，只好下台由別人来收拾殘局，哪里是被人民迫着才下台。要是英国人民能影响政府，英国人民本来一开始就不贊成派兵去侵略埃及，那么英国政府就應該不至於出兵埃及。對於朝鮮的停战，更是謊謬絕論，美国出兵朝鮮，人民早就反对了，記得我在美国的时候，一位老师的爱人告诉我，他們非常不願意参加朝鮮战争，但是政府不听人民的話，有什么办法呢？更进一步可以証明的，当越南在同法国打仗，法国打得落花流水时，向美国求救，美国国会討論是否要出兵越南，結果，美国是害怕他們一出兵，我国也会派志願軍去的，国会並不考虑到人民意志、这很显然的禁止美帝的侵略是民主陣营的国家的力量，並不是美国人民能禁止他們的政府不侵略別的国家。

(2) “美国选举自由——在美国如果人民真的拥护共产党，他完全可以选举共产党。”右派分子这种謊論也是与事实不符合的，我們来看看事实，共产党在美国，自从一九五二年后已經不是法定的政党，人民即使欢喜共产党，他們也不可能选举共产党，而且共产党也不可能同其他政党一样来竞选的，美国共产党党员是受很殘酷的摧殘，我在朋大的一位同学，他以前是共产党党员被政府知道，一定要他把共产党内部一切活动及名單写出来，这位同学只把个人的活动及历史交代，其他的不肯交代，結果政府要办他的罪，剛好那时他在朋大要考博士初試，政府要朋大停止他考試的机会，朋大的校長及物理系主任不答应，以为：朋大这是高等学校，只要学生不犯学校規矩，不能不讓他考試，他政治上有問題，政府可以办他，学校不能無理由的乱处分他，結果一直到現在还在打官司，他是学原子物理、一畢業就不能找到工作，任何机关都不会要他，而且他的爱人是医生，也同样的遭到美帝的歧視，他們兩人都得不到工作，生活也發生問題，这就是美国民主的真面貌，还不够猙獰丑惡嗎？

(3) 美国的言論自由——这完全是掛羊头卖狗肉的，我把自己亲身經過的一件事实来証明他們的自由，記得一九五一年四月

左右，美国移民局調查中国学生对朝鮮战争的看法，而且也問了許多問題，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对蔣介石的印象等，我們的一位房友，当然也是被审問的，当她去移民局的时候，該局就問她对中共的看法，她說共产党是好的，审問官很不高兴，她就說：“你們美国是最好的国家，要是最好的話，为什么也有共产党。”审問官很气的說：“美国的共产党員是理想家”。我們的房友說：“中国共产党员不但是理想家而且是实行家，有什么不好呢，”从那一天起，移民局把这些情况报告国务院，因此联邦調查局派了祕密警察来查我們，我也是被查之一，而且早上五点多鐘来打門，我的房友很生气他这么早来，祕密警察說：“我还是对你客气，要不客气，下半夜三点鐘来，你能不起来开門嗎？”这件事一直被麻煩了几个月，美国的自由就是这么一回事，事实胜於雄辯，大家應該明白了他們的自由了。

(4) “美国国会無論怎样，他們有爭論，就是民主些”——他們的爭論是站在資產階級的同立場来爭論，不管是民主党，或是共和党都是資本家的走狗，他們都是代表資本家說話。他們的爭論只是为自己党的利益而意見有时相左而至於發生爭論，並沒有反面的爭論，要是有反面的爭論，就應該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来爭論。所以这种爭論怎样能代表民主呢？

(5) “人事制度不自由——我們試看美国人事制度的自由吧！記得我进公司工作时，要簽填許多表格，有的須發誓，公司中不但有人事組来管每人的档案，而且有安全部門来同祕密警察联系，来监督你的一切行为，这难道是人事制度的自由嗎？尤其是在政府机关工作，要是做保密工作，未进去工作之前，祕密警察来查你的祖宗三代和一切亲友都查过，至少半年以上才查清楚，才能工作，工作后祕密警察是暗中随时在监督你，我在朋大时，朋大有一部門是为政府工作，保密的这座樓的電話是由警察控制的，同外所有通電話的，他都知道的，而且四周有兵保着，其他閒人絕不能进去的，記得几年前我有一老师要在弗蘭克林研究所做兼任研究工作，祕密警察去查他的鄰居，鄰居告訴祕密警察，我的老师有一老母亲在中国大陆，而且还有通信，这样祕密警察不准許，我的老师就不能

去工作了，这是人事制度的自由嗎？我希望右派分子不要再受美国之音的迷惑，来恶意的向党进攻，应该清醒、彻底交待，向人民低头認罪重新做人，痛改前非。做一个工人阶级的科学工作者。

## 駁斥右派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攻击

巢紀平

右派分子項志遴、夏永年和徐芻等对社会主义的民主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对于他們所提出的一系列謬論，我們必須給以严厉的駁斥。

我們首先要揭穿右派分子在提出这些論点时所站的立場和他們的企圖。項志遴和夏永年認為：“党独裁，專制，不民主”。在这方面，地球物理所的右派分子郑树藩对社会主义的民主还作了一个比喻，他說：“现在的民主像自来水管里的水一样，管水龙头的人想放就开一点，不想放就关上”。这二种說法尽管不同，但意思是完全一样的。在他們看来，民主的权力是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的，而党又是独裁和專制的，或者說，水龙头关得很紧。因此人民沒有民主或很少有民主。为此，右派分子提出要反对專制，反对独裁，向党“要民主”，要党“給民主”。

我們認為，“民主”是上層建筑，是为社会經濟基础服务的。因此是有阶级性的，是一种阶级的特权。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統治阶级总是享有着高度的民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有剝削工人阶级、压迫工人阶级的民主，而对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來說，有的只是飢餓和貧困。因此，在那样的社会里，被侮辱与被損害的劳动人民为了爭取生存的权利，他們一定要向統治阶级要民主，要統治阶级給民主。然而，在今天，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了解放，已經做了国家的主人，做了統治阶级。民主的所有权在今天已經起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享受着民主的特权，被剝夺了民主权利的那些少

數被專政的反動階級。在今天，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和廣大勞動人民間的關係已經不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他們間的關係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他們的目的和利益是共同的、一致的，這種共同的、一致的目的和利益就是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當然，社會主義民主的發揮是隨着歷史條件的改變而改變的。例如，現在由於社會主義改造在經濟方面的完成，國內反革命基本上被肅清，社會主義的建設取得了一定的勝利，黨就進一步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等方針來擴大社會主義的民主。因此，在今天社會主義的民主是進一步發揮和擴大的問題，是進一步改善民主作風的問題，沒有“給”與“要”的問題。右派分子認為“黨獨裁、專制、不民主”向黨“要民主”、要黨“給民主”，這一方面是他們在向黨進行惡毒的攻擊，把今天黨和廣大的勞動人民間的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誣蔑成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以達到他們挑撥黨羣關係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正好暴露了他們所站的立場——資產階級右派的立場，正因為他們牢固地站在這樣的立場上，所以他們才感到沒有民主，才向黨提出“要民主”，要黨“給民主”。

右派分子一個最中心的論點，是認為“有領導、有集中的民主不民主”，例如項志遴說，“有領導的羣眾運動就是不民主。”首先，我們必須着重指出，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在我們國家里，領導與被領導的利益是一致的，這種一致的利益的基礎就是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正因為有了這種共同的利益作基礎，才能談到民主，也才能談到集中。其次我們說，社會主義的民主沒有領導，沒有集中是不行的。這是因為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是一個集體的集體的事業，集體的集體的事業需要有許多人的統一行動和高度的分工。沒有領導沒有集中，就無法實現統一的行動，也無法實現高度的分工。所謂不要領導沒有集中的“絕對民主”，實際上在任何社會里都是不可能有的。那末有了領導有了集中是不是會妨礙民主的發揮呢？是不是會像右派分子所叫囂的那樣不民主了呢？在回答這個問題時，首先我們要指出社會主義民主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的性質。這是大家所熟知的事實，中國共產黨不同於歷史上任何的政黨，更不同於

資產階級的任何政黨。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同時它也代表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因此它按性質來說就是一個走羣眾路線的政黨。走羣眾路線明確的規定在黨的總綱里，而黨的總綱又是黨的最基本的政治綱領和組織綱領。就從事實上來看，黨的羣眾路線一直貫串在黨的一切行動中。黨在解放戰爭中，在土地改革和肅清反革命的鬥爭中，在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鬥爭中，在發展工業、農業和其他經濟文化建設事業的鬥爭中，黨都是嚴格地執行了走羣眾路線的政策。黨的走羣眾路線的政策就保證了民主的發揮。因此我們的領導者雖然只能是少數人，但是他們對一個問題的決定不是憑他們少數人的或個人的好惡而決定的，而是以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為根據的。當決定一個比較重大的問題時，領導上一向都是先從各个方面，用各種形式調查研究、徵求意見了解情況經過詳細分析後才作出決定的。例如，黨中央在作出農業合作化決定時，毛主席曾親自研究過有關農業合作問題的一千多份文件，並且還親自訪問過農村和農民交換意見。不但決定是通過這樣的方式作出的，而且當決定作出後，還要在羣眾中進行充分的反復醞釀，聽取羣眾的意見和反映，使作出的決定尽可能符合客觀情況，如一旦發現決定和客觀情況有距離時，領導上就會馬上修改決定。例如，“中共中央制定的憲法草案初稿，最初全文只有九十七條，1954年3月23日以後，此初稿即在北京和全國各大城市組織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社會方面代表人物八千多人用二個月的時間進行討論，提出修改和補充意見八千九百多條，經過這次討論，憲法草案初稿的全部條文，除有七條未動外，三條條文被刪去，其他各條也在不同程度上作了修改，不僅如此，1954年6月14日交付全國人民討論，共討論了二個月之久，參加討論的有一億五千萬人之多，提出了一百八十八萬零四千二百條的修改和補充意見”<sup>\*</sup>。像這樣的工作方法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因此我們說社會主義民主的保證就在於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走羣眾

<sup>\*</sup> 見1957年9月20日人民日報焦實齋文。

路綫的政党，同时我們的一些领导人又是从羣众中来的，他們决定問題时是以广大的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依据的，而领导的工作方面又是密切地与羣众相联系的。这样，很清楚，有领导、有集中的民主不可能妨碍民主的發揮，更不可能是不民主的。右派分子項志透等提出的“有领导、有集中的民主不民主”的論点是站不住脚的，只能說是一种誣蔑。

項志透等另一个論点是說，“民主集中制限制了民主的發揮”，並且进一步誣蔑“民主集中制是造成官僚主义的根源”。对这个惡毒的論点必須給予駁斥。与右派分子相反，我們認為民主集中制是保證充分發揮民主、保證领导不致脫离羣众变成官僚主义的最有效的制度。这是因为，第一、在各級党和政府的领导中，我們都是集体领导，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在集体领导时少数得服从多数。因此即使有少数领导者可能脫离羣众，但一般說来，也不会导致整个的领导方針离开了羣众路綫。第二、即使在某一級組織中，由於某种原因有較多的领导者脫离了羣众，但是民主集中制又規定了下級組織要服从上級組織的決議。第三、中央对政策的制定，对党而言，要經全体党員代表大会审查通过，对政府而言，要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通过。因此，虽然看起来是领导集中了羣众的意見，但是实际上最高的决定权仍然在人民羣众手里。而党代表和人民代表来自羣众之中，个别代表有可能脫离羣众不顧羣众利益，但是，大多数代表都脫离羣众不顧羣众利益的这种可能性可以說是不存在的，这已經是一个最起碼的常識問題了。再者，根据宪法人民完全有权撤換不称职的代表。不但我們有如此紧密的上、下級的組織关系，而且，第四、我們还有与各級政府組織相平行的監察机构，監督政府政策的执行。因此，能說像我們这样的民主集中制还不能保證充分發揮民主嗎？还不能保證不产生官僚主义嗎？能說有了集中就沒有民主嗎？相反，我們說要民主得更好就要集中得更好，只有集中得更好才能民主得更好，而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就是保證集中得更好民主得更好的最好的制度。因此右派分子的“民主集中制会造成不民主，会产生官僚主义”的論点是沒

有根据的，只能說是一种誣蔑。

右派分子还会狡猾的說，“官僚主义不是出現了嗎？”我們說，是的，官僚主义过去出現过，現在出現了，將來还有可能出現。但是，正如我們上面論証过的，民主集中制不可能是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社会的根本制度，但是我們也不否認在一定程度上人也起着作用。决不能忘記，我們的国家是在推翻了旧的剝削階級的統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們的思想意識和工作作風不可能不受旧社会的影响。如果一个人不經常注意改造自己，那末，旧的思想意識和工作作風就有可能使你变成官僚主义。因此，官僚主义的出現，不在於民主集中制而有其历史原因。但是，即使如此，在今天我們的国家里，官僚主义者畢竟还是少数。而我們的党，對於無情的反对官僚主义历来都是很坚决的。这次党在全国范圍內开展的整風运动，其目的之一就是反对官僚主义。

右派分子又一个論点是說，“說是走羣众路綫，但羣众的意見不一定照办，一切还是由領導决定，这不算民主”。我們說領導要走羣众路綫，这决不等於說領導只要把羣众的意見簡單地集中一下就可以了，更不是說領導要做羣众的尾巴，大伙兒怎么說，領導就得怎么做，这才算羣众路綫，才算民主。显然，和羣众比起来，由於所处的地位不同，領導上总是比較能够从整体利益、从長远利益来看問題。因此，羣众所提出的某些不合理的要求，一时办不到的要求，或者虽然符合目前利益而对長远利益有妨碍的要求，經過領導上的全面考虑后，就往往不能照办，或不能完全照办。那末，这是不是可以被指責为不民主了呢？我們認為不能，完全相反，在集中的指导下，使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目前利益服从長远利益，这不但妨碍民主，而是更深刻的民主。事实上，我們的領導从来都是一方面从整体利益从長远利益出發来考虑問題，另一方面也还是根据当前具体情况、根据当前羣众的覺悟程度来考虑問題的。因此，这就很清楚了，我們国家的民主集中制，既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又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进一步使民主深刻化。由此可見右派分子的这一个論点是站不住脚的，也



只能說是一種誣蔑。

由此看來，對於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人民而言，只有社會主義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右派分子項志澐、夏永年和徐芻等硬要說我們國家的民主不民主，這只是因為他們所站的立場和我們有着根本的分歧，他們的利益與我們的利益也有着根本的分歧。如果他們硬要頑固地站在資產階級右派的立場上，維護着資產階級右派的利益，那末，社會主義的民主對他們說來不民主，這倒確是事實。

## 批判右派分子夏永年、徐芻的新聞自由觀點

徐崇澐

右派分子夏永年、徐芻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毒箭之一，是污蔑社會主義沒有新聞自由，而資本主義反倒有新聞自由。他們說：“美國言論自由，資產階級報紙和無產階級報紙可以同時發行。”“我們新聞不自由，只有一個通訊社。”

在美國的確有共產黨辦的報紙，在我国的確沒有資產階級辦的通訊社。但是，為什麼美國會有共產黨辦的報紙呢？為什麼在我国的確沒有資產階級辦的通訊社呢？是不是因為像右派分子所說的那樣：因為美國有新聞自由，而我国却反倒沒有新聞自由呢？同時，所謂新聞自由又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讓我們來看吧！

在今天，美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有自己辦的報紙，但是他們並不是一開始就有自己的報紙的，而是經過了長時期艱苦而反復的鬥爭，才出版了自己的報紙的。在工人運動還沒有帶有羣眾性的時候，資產階級反動派總是用赤裸裸的血腥鎮壓手段來對付工人，用皮鞭、用槍桿、用監獄、用絞架來答复工人鬥爭的要求的。他們根本就不允許工人有什麼合法的組織，當然更不允許工人公開地辦報了。但是，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階級隊伍擴大了，同時，現實又教育了工人階級必須組織起來進行鬥爭，這樣，

形势就發生了根本的变化：現在站在資產階級面前的，已經不再是自發的工人，軟弱的鬥爭了，而是有組織的、羣眾性的、聲勢浩大的革命浪潮了。因此擺在資產階級面前的，就只有二條路，要么繼續對工人採取血腥的鎮壓手段，要么改變一下統治手段。到底走哪條路呢？按照資產階級的階級本能和主觀願望，当然是想把工人的鬥爭用鎮壓手段一下子消滅干淨的。因為這樣做，既直截了當，又干脆痛快。但是問題是：對於多得不可勝數的羣眾，却是關不盡、殺不絕的，就算能夠關盡殺絕吧，也還是不行的。因為這樣一來，就沒有人养活資產階級了，資產階級如果還想繼續做資產階級，就只好讓工人活下去。但是要讓工人活下去，要對他們進行剝削，就一定會有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就一定會有規模愈來愈大、目標愈來愈明確的工人運動。這是一個客觀的規律，是不以資產階級的意志為轉移的。不管資產階級採用什麼手段，它總是無法消滅工人階級的鬥爭的。除非它首先消滅自己，但是貪得無厭的資產階級又怎麼肯自己消滅自己呢？因此，問題很明顯：血腥鎮壓的老路走不通了，不能再走了，因為它已經走進了死胡同了，剩下來了的，就只有另外一條路：用新的統治手段來對付工人。就是說，在鞏固資產階級統治的前提下，以不危害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為限度，適當的滿足一下工人階級鬥爭的某些要求。於是它就答應工人階級組織自己的政黨，出版自己的報紙等。為什麼資產階級反動派會這樣做呢？是跟工人階級講博愛、平等、自由嗎？當然不是！資產階級反動派之所以會這樣做，是因為不這樣就不能對付工人，不這樣就要徹底暴露資產階級專政的血腥統治面貌，而工人的鬥爭鋒芒也就要隨之而直接指向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指向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了，而採取新的統治手段又怎麼樣呢？採取新手段，在資產階級反動派看來，就會緩和一下工人階級的鬥爭，就可以用假面具欺騙工人，迷惑工人，引起落后工人的幻想，就會分化工人階級的隊伍，削弱工人階級的力量，就可以把工人階級的鬥爭拮制在資產階級的法律範圍內，秩序範圍內，拮制在不危害資產階級根本利益的範圍內。既然這樣做，對資產階級有利，那它又為什

么不这样做呢？所以美国资产阶级允许共产党办报这出把戏，说穿了就很简单，它只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而采用的一种统治手段、一种欺骗手法而已。但是，就在这样做的时候，资产阶级反动派也忘不了要对工人采取镇压的，不过暂时把它降到次要的地位、作为一种辅助的手段罢了。正因为这样，所以在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以前，它就决不会允许工人办报。也正因为这样，在工人阶级抓住这种让步，利用它来进一步地巩固自己的组织，更有力地发动革命的斗争，因而直接威胁到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和根本利益的时候，资产阶级也决不会再允许工人继续办报。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上台以后，立即取缔共产党，立即查封工人报纸。英国资产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革命形势的时候，对工人阶级的报纸，立即抛弃了自由主义的假面具，毫不犹豫地采取了纯粹沙皇式的书报检查制度，监狱里关满了社会主义者。这些事实难道不是完全证明了：资产阶级允许工人办报这出把戏只是一种统治手段、一种欺骗手法吗？

但是右派分子徐芻说：不管怎么样，在美国，无产阶级的报纸总还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报纸同时发行，而这也就是新闻自由呀！我们说，这是胡说！为什么呢？

因为共产党在美国尽管出版着自己的报纸，他们可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享受到什么新闻自由。首先，在政治方面，尽管美国资产阶级反动派在宪法上堂而皇之地规定了什么言论出版自由，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又用什么诽谤法、叛国法、国内安全法等等一系列严密得像蜘蛛网一样的刑法条例来为这种“自由”划定一个圈圈，在这个圈圈里，资产阶级反动派有歌颂剥削的自由，欺骗群众的自由，宣传战争的自由，鼓动侵略的自由，种族歧视等反正是无限制的自由。但是就在这同一个圈圈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可从来没有用任何方式发表或者表示进步思想即马列主义思想的自由，甚至没有宣传和平的自由。如果硬要在这方面来一下自由，那么，就要被认为犯了严重的罪行，根据一九四〇年颁布的史密斯法就得被判处监禁十年，罚金一万。而发表这种文章的报纸和报

館也得被查封和沒收。一九五三年二月三日美国联邦法院在紐約福萊廣場开庭的时候根据所謂“陰謀用強力推翻美国政府”的罪名，把美国共产党的十三个领导幹部关进監獄，那么这个陰謀推翻美国政府罪名的証据是什么呢？最主要的証据就是他們在工人日报上發表了反对战争、保衛和平的文章。最近美国資产階級反动派还根据“进行非美活动”的罪名，傳訊了前上海密勒氏評論报总編輯鮑威尔夫妇，並剝夺了他們从事新聞工作的权利。那么到底这二位自由主义的新聞工作人員进行了哪些所謂非美活动呢？原来他們向美国人民报导了人民中国和朝鮮战争的真实情况。看！这就是美国式的所謂新聞自由。其次，在經濟方面，大家知道，要办报就得有印刷所，有紙張，有錢。但是美国資产階級不但壟斷了社会財富，而且掌握了百分之九十几的印刷所和紙張。他們把最好的东西都給了資产階級報紙，並且用大量的美元来收买作家，收买报館，為他們制造輿論，欺騙人民，散佈思想毒素。他們的收买手段是出奇地惊人的，單單登一条广告，他們就化費二千到三千美元的代價。这样，資本家的報紙就不但印刷好，紙張多，而且價錢低得等於奉送，而資产階級反动派則通过这些鋪天塞地的報紙來大量傾銷廉价的黃色思想毒素，把美国人民包圍得水洩不通。而处在这种包圍中的工人日报，除了要承受反动派的政治迫害之外，还不得不在印刷坏、紙張差、經費少等等經濟压力下进行艰苦斗争。試問，在这种条件下，又哪里来的真正的新聞自由呢？再次，为了办报，就得有讀者，工人日报主要的讀者当然是工人階級和劳动羣众，而这些讀者，在美国不但被貧穷困苦压榨得無暇过問政治、被貧穷困苦排挤到社会政治生活範圍之外，而且还要受到各式各样的政治迫害。因为在資产階級反动派和它們的法官走狗眼睛里，經常閱讀工人日报就是对美国不忠誠的鉄証，就是有危險思想的鉄証，就是有进步观念的鉄証。對於所謂不忠誠的人，根据美国的总统檢查忠誠令，資本家可以立刻把他开除。對於所謂有危險思想的人，根据奧伯尔法，可以被偵查、逮捕、审判、監禁和罰款。而對於所謂有进步观点的人，根据麦卡倫法，在資产階級反动派認為有

必要的任何时候，可以大量大批地無限期地把他們关进集中营。試問：在這種情況之下，美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究竟要冒了多大的危險才能讀到自己的報紙呢？而根據美國憲法的規定，有所謂出版自由的工人日報，在反動派這種從政治、從經濟、從讀者等等方面所發動的全面迫害和進攻之下，又究竟能夠享受到幾分所謂新聞自由呢？

這樣看來，資本主義的所謂新聞自由，除了是資本家用金錢來購買和賄賂言論機關的自由，除了是資本家用財富來偽造所謂社會的輿論的自由，除了是資本家用謊話的麻藥來麻痺人民羣眾的自由以外，還可能是什麼自由呢？這種所謂自由，對於人民羣眾說來，除了是忍受資產階級反動派的思想迫害、思想奴役的自由以外，還可能是什麼自由呢？很明顯，資本主義的所謂新聞自由，就是一小撮資產階級反動派在新聞自由的騙人招牌下進行的為非作歹的自由。而他們所以會有這種自由，只是因為人民羣眾被徹底地剝奪了真正的新聞自由。

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根本沒有真正新聞自由是很明顯的了。但是右派分子夏永年却說：美國無論怎樣，共產黨還可以辦報紙，可是你們社會主義却只是一個通訊社，而沒有一個發表反面消息的通訊社，就是說沒有資產階級的通訊社。是的，可愛的右派先生，在我們社會主義社會里，的確沒有資產階級通訊社，但是這有什麼辦法呢？我們的社會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呀！而社會主義所以是社會主義，就在於它根本不同於資本主義。我們並不需要資本主義，沒有資本主義我們也能夠生活，而且生活得更好。我們不但不要資本主義，而且一定要消滅資本主義，如果不消滅資本主義，又哪兒來的社會主義呢？所以我們能夠而且必須全部、徹底、堅決、干淨地消滅一切資本主義，消滅資本主義的一切殘余。而且在經濟領域里，我們已經基本上消滅了資本主義。這就是說，在我們社會主義社會里，資本主義已經沒有了生命基礎。既然這樣，那么在我們國家里，沒有資產階級通訊社，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嗎？老話說：“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在我們社會主義社會里，資本主義經

济基础这张皮已经不存在了，如果再要鑽出一个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通讯社，那么叫这根毛放到哪里去呢？更其重要的，在我们国家里，允许资产阶级办通讯社，就是允许资产阶级反动派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全面进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既然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那么又怎能给资产阶级反动派以复辟资本主义的武器呢？如果把革命停留在消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而不同时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打败资本主义，反倒听其猖狂地进攻社会主义，那么又哪里来的全面而又巩固的社会主义呢？远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最初几天，列宁曾说过：“我们早就讲过，我们一旦掌握政权，就要封闭资产阶级报纸，谁要是容忍这些报纸存在，那他就不能成为社会主义者。谁要是说‘让资产阶级报纸出版吧！’，谁就不懂得我们是在以全速度向社会主义迈进。”（列宁全集，四版，二十六卷，二五三页）这样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能让资产阶级有通讯社的道理，不是很明显的吗？右派分子又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

但是右派分子夏永年会说，你们没有资产阶级通讯社，不就是证明了你们没有新闻自由吗？我们说，这还是胡说。世界上从来沒抽象的自由，而只有具体的自由。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从来沒有一般的自由，而只有一定阶级的自由。不是剥削阶级的自由，就是劳动人民的自由。自由从来就是有目的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是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奴役劳动人民的自由。而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是消灭剥削的自由，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的自由。所以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自由和劳动人民的自由是对立的，不可能和平共处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有了资产阶级反动派剥削和奴役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而且不会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不受奴役的自由。因此，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自由，就是劳动人民的不自由，只有剥夺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自由，才会有劳动人民的自由。这不是很容易理解的吗？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我们的国家里，允许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新闻自由，这是什么意思呢？允许这种自由，就是说要让他们通过思想毒素的散布来剥夺劳动

人民的新聞自由，就是說要讓他們通過資本主義思想的自由氾濫來削弱工人階級的思想障地，就是說要在殘酷的階級鬥爭中叫工人階級放下武器。既然我們要有勞動人民真正的新聞自由，那麼我們又怎麼能夠讓資產階級反動派自由地剝奪勞動人民的自由呢？既然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那麼我們又怎麼能在思想上放棄障地、在政治上拋棄武器呢？難道不正是因為我們剝奪了資產階級反動派的新聞自由，才贏得了、才保障了勞動人民的新聞自由嗎？而勞動人民的新聞自由，卻是真正的新聞自由。這種自由之所以是真正的自由，是因為我們憲法上不僅宣布了這種自由，而且國家供給了必需的物質上的便利來保障勞動人民享受這項自由。因此自由不再是形式的、虛偽的自由，而是確實能夠享受的自由。這種自由之所以是真正的新聞自由，還因為勞動人民可以通過言論自由和批評自由來參加和監督國家管理活動。因此自由不再是空談的自由，而是人民羣眾當家作主的自由。這種自由之所以是真正的自由，更因為在今天，資產階級反動派既不可能用政治迫害、經濟壓迫的方法，又不可能用思想奴役的手段來剝奪勞動人民的自由，因此自由已經不再是少數人的自由，而是人民羣眾能夠普遍享受的自由，所以它就是最大多數人民羣眾的最大自由。

這樣看來，正因為資產階級的允許工人辦報，只是為了欺騙和統治工人，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就沒有、也不會有人民羣眾的新聞自由。而社會主義社會則正因為不許資產階級有通訊社，才保障了人民羣眾的新聞自由。事情既然這樣極清楚，那末夏永年、徐芻這些右派分子又為什麼要顛倒黑白，混淆是非，造謠污蔑，硬把沒有說成有，把有說成沒有呢？原來他們所要的並不是什麼真正的新聞自由，而是想在新聞自由的幌子下偷運資產階級反動派反社會主義的自由。的確，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里，不但沒有資產階級反動派反社會主義的自由，而且還要堅決取締這種自由。但是，這跟真正的新聞自由又有什麼關係呢？難道不正是因為我們剝奪了反動派的反社會主義自由，才確保了人民羣眾建設社會主義的自由嗎？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關於新聞自由的濫調就是如此。而在資產階級所謂民主自由的其他方面，例如他們所宣揚的在以資產階級兩個政黨進行分贓的基礎上，同時又是為了蒙蔽人民羣眾，阻止革命政黨興起的前提下，所舉行的那種丑名遠揚的競選制，以及其他十足的假仁假義的所謂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以及遊行示威自由等等，都無非是資產階級統治集團自己營私舞弊、貪贓枉法的罪惡行經。而對廣大勞動羣眾來說，只是一種愚弄和欺騙，在整個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已經腐朽透頂、徹底破產的今天，它怎麼能和我們的社會主義的和人民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相提並論呢？



## 駁斥右派分子何榮攻击人事工作的謬論

尚 明 軒

右派分子何榮在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猖狂进攻时，这样說：“人事幹部，大权在手，人人看了都要害怕他。有些人对別人都可以不怕，只要人事組有話，再厉害的也害怕。我真不懂不管那个單位，即使很小也要搞上个人事幹部。人事幹部……在幹些什么？”好像人事工作在新中国是不需要的，它是一項威胁人、压制人的多余工作，應該去掉似的。这真是对党的一个惡毒的攻击。

难道真正不需要党領導下的人事工作嗎？我們可以用事实来粉碎这种荒謬的怪論。

人所周知，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权問題。革命成功的標誌，就是被压迫被剝削的劳动人民起来取得了政权、掌握了政权。翻开历史看看，古今中外，历史上任何国家政权——不論封建社会的、資本主义社会的，都是以一定的階級、一定的政治力量为基础組成的。我們社会主义国家，並不例外。早在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中的第一步，是無产階級变成統治階級，爭得民主。”在取得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的經驗以后，馬克思进一步指出：“工人階級絕不能簡單的提取現成的国家机器，並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說，工人階級必須用新的人、新的組織、新的方法来代替旧的国家机器。我們的国家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人階級領導的国家。關於人民民主專政的問題，毛主席早就指出过。我們的宪法第一条也庄严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工人階級領導，而不是与任何人分掌政权的領導，这是不能絲毫含糊和动搖的。为了巩固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权，就需要党領導下的人事工作，用它来按照工人階級的政治标准挑选幹部，使我

們的国家机关的組成确实符合於国家根本大法的規定，由工人階級領導、以工农聯盟为基础。尤其是在我国，由於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同，參加無产階級領導的政权的，不仅有广大的农民和革命知識分子，而且有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的政治活动家；在这种情况下，党挑选幹部的任务就显得格外繁重与复杂。为了社会主义事業的利益，为了保証工人階級对整个国家政权的領導不被动搖，对各种出身不同、經歷不同的幹部，进行了解其政治历史、政治傾向和政治品質，从而依据他們的政治情况和業務能力作适当的安排，很清楚地这是極为必要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像右派分子何榮所要求的那样，取消党領導的人事工作；这就是說，党糊里糊塗的使用幹部，既不問道德品質，也不管業務能力，不顧一切的胡乱安排，那就必然會讓那些大騙子李万銘一流的坏分子与反革命分子和政治面目不清的別有用心的人，在国家机关內橫冲直闖，到处活动，篡夺了人民的政权。这个道理，是極为清楚的。所以，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工作，正如人民日报的社論所說的，它“不是普通的行政事務問題，而是关系国家命运，影响国家政权性質的原則問題。”

並且还要指出：我們的党和国家對於幹部是非常重視和关怀的，这和国民党反动派把工作人員当作蔣、宋、孔、陈四大家族的私产，当作奴隶和走狗，人人随时都有失業威胁的情况完全相反；党把幹部視為国家的最重要的財富，当作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設的主要力量。正因如此，特制定出幹部政策与幹部管理制度等，以保証党和国家对幹部的重視。这项关系整个幹部利益的措施，需要設置人事機構由專职的人事工作者去具体执行貫徹。

由此可見，新中国的人事工作，不仅不是無关輕重的多余工作，而且是影响甚大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

何榮污蔑人事幹部“人人見了都要害怕”，我們从他攻击的“人事幹部在幹些什么”的問題里，就可以完全揭穿这惡毒的謊言。

总的人事工作，已如上述。至於人事幹部的具体工作，主要有

二項：一是，任用和審查幹部。掌握幹部條件，依據德、才，調配人力，使用幹部。這是一項重要工作。我們歷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長范文瀾同志曾指出過，我們要求在人事工作上嚴格地掌握德、才與適宜於作研究工作的幹部條件，以堵塞住缺德、無德與沒有業務能力及追求個人名、利者鑽進我們的單位。可見，把大門，是各個單位非常重視的工作。對幹部的政治審查，目的在純潔機關內部，防止壞分子的破壞社會主義事業。二是，了解和關懷幹部。對幹部的各方面情況，全面了解，用以進行培養、調配與提拔等，從而發揮幹部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俾便出色的為國家貢獻力量。對幹部的生活福利及有關困難問題，設法幫助解決，便於幹部安心工作。這些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為人民非常需要的工作。可見，人事幹部和擔任其他工作的幹部，分工雖有所不同，都是分擔着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一部分重要工作；彼此是相互幫助和學習的革命同志關係。只有那些與社會主義事業為敵的右派分子等壞人才害怕人事幹部。這是因為像何榮這樣的右派分子，完全處在和人民敵對的地位，他苦心孤思的是如何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領導，而這種反動分子正是我們的人事工作部門需要進行嚴格地審查和監督的。我們單位有個右派分子，對人事幹部咬牙切齒的刻骨仇恨，甚至達到“一聽人事幹部說話就討厭”的程度；他惡毒的污蔑：“人事幹部不幹人事。”其所以這樣的瘋狂仇恨，是不難理解的。由於他是右派分子，他和人事幹部處於敵對地位。仇恨是由害怕產生的；害怕發展的自然結果，一定上升為仇恨。

大鳴大放期中，右派分子惡毒的攻擊人事部門，卑劣的污蔑人事幹部。把人事部門說成是“宗派的窩子”，說成是“閻王殿”；將人事幹部說成是“閻王爺”，說成是“掌生死簿的人”等等。他們如此的仇恨人事工作、害怕人事幹部，更可以使我們看到人事工作在階級鬥爭中的地位是如何的重要了。讓所有的右派分子都害怕人事工作幹部吧！這正是我們人事工作幹部具有堅強的黨性的表現。

右派分子何榮又說：“人事幹部，年紀輕輕，又不懂業務。”這也

是惡毒的攻擊。

新中國成立不久，全國的人事幹部的年齡，按比例來說，是年輕的比較多一些；一般的說，經驗不夠豐富，也是事實。但是，人事幹部的年齡較輕，並不是缺點。青年朝氣勃勃，易於接受新鮮事物，正是作好工作的有利條件之一。至於業務不夠熟悉，這是在人事工作建設中一種暫時的現象。過去人事工作中所存在着的一些缺點，甚至有的（如工作的方式、方法等）還是比較突出的缺點，正是業務不熟所造成，需要大力改進的。今後隨着工作經驗的積累，思想水平的提高，會逐步得到解決。重要的事實是，我們的人事工作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指導下，遵照黨和政府的政策、決定，同時依靠黨和上級政府的領導，通過羣眾路線的方式來進行的。絕不是由人事幹部個人獨斷獨行，隨心所欲地隨便去做工作。如評定工資、培養幹部等等，無不如此。就正因為如此，又有全國人事幹部的辛勤努力，所以建國八年來，我們已經組成了新型的為勞動人民服務的国家機關，將舊社會的那種任用私人、貪污詐騙、欺壓羣眾等等丑惡現象基本上消滅了。這些鐵的事實，是右派分子推翻不了的。

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此。何肇攻擊的絕不是人事幹部年紀輕、經驗少或者令人害怕與否等的問題。和所有的右派分子攻擊人事工作的陰謀一樣，他的主要標的是要取消黨的幹部工作制度和幹部政策；也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和右派分子有着根本上的原則分歧。人民需要的是社會主義的統一調配的幹部工作制度，和為人民服務的德、才兼備的幹部標準；而右派分子所搞的是“自由市場”的你爭我奪的用人制度，和資產階級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德”、“才”用人標準。完全可以想像，若是反黨、敵視社會主義事業的壞人，即便年紀再輕與經驗再少，也定合乎何肇的脾味要求，他不但不會害怕、仇恨與攻擊，反而要大加歡迎和稱贊的。

堅持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這並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而是有具體內容的。黨領導人事工作，即是黨掌握用人權，這

正是体现着党对国家建设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右派分子何肇所以故意颠倒黑白，攻击人事工作，是有其恶毒的阴谋的。他企图离间党和群众的关系，使群众对党的事业不满，来反对党的领导，从而达到危害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罪恶目的。因此，对他散佈的各种烏七八糟的反动谬论，我们必须予以揭穿与驳斥，认真、彻底、全部的将这些毒草剷除干净。

何肇企图攻击人事工作，离间党群关系，篡夺党的领导的阴谋，自然是白天做梦，不可能实现；但是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右派分子在这个问题上，正是利用我们知识分子幻想绝对民主和小资产阶级自尊心的弱点来鑽空子。我们单位就有过这种情况：一个同志，组织上在肃反时对他的历史进行了审查，他就有了情绪。鸣放期间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形势下，他也就跟随着很气愤地提出了极为不满的意见来。似乎党不应当审查他，审查本身就是面子不光彩、不尊重人似的。其实，只要是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真正拥护，对人民事业真正拥护，有什么理由不可以让组织上一再审查呢？一再审查，弄清所有问题后，革命组织既可以大胆使用，又能使个人丢掉包袱，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这只有对社会主义事业更为有利。所以，通过粉碎右派分子的恶毒进攻，提高了认识，擦亮了眼睛，我们一定要更热爱党，更热爱社会主义！

## 全面驳斥项、夏、徐等右派分子对肃反运动的恶毒诬蔑和猖狂进攻

范繼淹 陈章太

肃反运动是大大小小的右派分子所集中攻击的一个焦点，他们都異口同声地大喊“肃反搞错了”。因此有必要针对这个问题，跟右派分子们进行一次大辩论，对右派分子们进行一次全面的、彻底的驳斥和批判。

我们发言的内容主要是我们在参加肃反运动之中所亲眼见到

的一些具体事例以及自己切身的一些感受和体会。首先需要說明：我本人(范繼淹)在肃反运动中曾經被审查过，被斗争过(关于这个问题以下要談)；而在弄清楚問題以后，我参加了后期的肃反工作。陈章太同志当时在福建搞專案小組的工作。可是不論是陈章太同志或是我，不論是肃反前期的我或是肃反后期的我，我們对于肃反运动的認識都是一致的，都得到了相同的結論。下面我們分兩部分來談。

### (一) 肅反运动究竟是不是“搞錯了”？

右派分子項志遴誣蔑肃反运动在“形势估計上、指導思想上、政策上、具体做法上都做錯了”，說肃反运动“80%都搞錯了”。这是企圖全面否定肃反运动，企圖証明共产党一开始就錯了，而且一錯再錯，錯到了底。这比其他某些右派分子的进攻更加猖狂，更加露骨。我們且从具体的事实上来看一看，肃反运动在以下四个方面究竟是不是“錯了”？

第一方面，在形势估計上：大家都知道，肃反运动是在历次运动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即將到来的前夕进行的。当时国内外的反动势力为了作垂死的掙扎，为了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千方百計地进行着各种陰謀破坏活动，因此当时的階級斗争是很尖銳的。例如：当时在山东、河北一帶出現了各式各样的“土皇帝”，所謂“真命天子”；反动会道門勾結特务在各地組織所謂“黑头仁义軍”、“抗共复蔣仁义軍”、“中美联合革命党”、“中国反共救国軍”、“灭共工作团”、“中天道”等等不胜枚举；广州市在1955年在厂、矿、企業就發生破坏事故 263 件；再加上1954年底和1955年初胡風反革命集团的暴露，說明反革命已經潛入了我們的队伍，企圖从內部来瓦解革命事業。这就是当时的客观形势，还只是随便举的一些例子。党和政府针对当时的客观形势，为了巩固人民政权，順利地进行和保衛社会主义建設，保衛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因此在1955年發动了羣众性的肃反运动，並且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上作出了关于开展全国性肃反运动的决

議。再从結果来看，由於肃反，清查出来而已經定了案的反革命分子就有 8 万多名，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有 19 万多名，並且徹底摧毀了胡風集团和其他一些反革命組織。这些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实，面对着这大量的客觀事实，我們要質問右派分子們，难道我們当时對於形势的估計是錯了嗎？項志遴所謂“肃反前后階級斗争沒有变化，反革命愈来愈少，不必大張旗鼓来肃反”显然是別有用心的进攻，企圖麻痺我們階級斗争的意識。我們說反革命不多了，階級斗争基本上結束了，是指肃反运动以后說的，而項志遴却把它扯到肃反以前来加以歪曲。至於徐鶴所謂“共产党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找几个人来斗争”更是惡意的誹謗。肃反运动完全是根据上述客觀形势的需要而进行的，上面所列举的大批反革命分子难道是我們無中生有硬造出来的嗎？

第二方面，指导思想：在肃反运动中我們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我們的指导思想就是：“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决不冤枉一个好人”，我們的指导思想就是：“坚决、徹底、干淨地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夏永年誣蔑肃反运动“宁可錯斗 99，不肯放走一个”。“不肯放走一个”这倒是事实，至於“宁可錯斗 99”則完全是無恥的造謠。据我們所知，有檢舉材料的，很多都沒有作为斗争对象，而且也根本沒有怀疑他是坏人。例如：我就知道外交部有一位姓罗的同志，被人檢舉是軍統特务，如果是“宁可錯斗 99”的話，这样的材料难道还不值得斗嗎？可是組織上經過考虑研究，認為材料不确实，根本沒有怀疑他，只是对他說：“有人檢舉你是軍統特务，你把某一段时期的情况写一个材料来我們去对証，你安心工作，不要背包袱。”就是这样解决了問題。这就証明我們的指导思想是“决不冤枉一个好人”，而且这样的指导思想确实得到了貫徹。我們要質問右派分子們，难道这样的指导思想是錯了嗎？

第三方面，政策上：在肃反运动中我們的政策又是什么呢？我們的政策就是：“鎮压与寬大相結合”，我們的政策就是：“坦白从寬，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獎”。在这样的政策感召之下，

許多反革命分子紛紛投案自首(19萬多名)，許多歷史反革命分子和現行的反革命分子坦白以後受到了寬大的處理。例如，就我親眼所見到的，文化部電影局有一個姓蘇的現行女反革命分子，就在肅反運動期間，還在進行反革命活動，到處張貼反革命標語。由於她最初拒不坦白，組織上已經联系了公安局，準備第二天就要逮捕。在逮捕前夕，組織上和同志們對她作了最後一次的幫助和挽救，向她再三交代政策，她終於坦白了，於是馬上通知公安局，不予逮捕，以後並得到了寬大處理。此外還有不少反革命分子自首以後還得到了適當的工作。我們要質問右派分子們，像這樣的政策難道是錯了嗎？唯有共產黨和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才能採取如此英明偉大的政策。

第四方面，具體做法上：這是我們要談的主要部分。

我們在肅反運動中採取的是什麼樣的具體做法呢？我們的具體做法就是採取羣眾路線。羣眾路線就是公安、司法機關和各單位內部組織以及廣大羣眾相結合的路線，就是從羣眾中來（發動羣眾檢舉）到羣眾中去（發動羣眾鬥爭）的路線。這是我們革命工作中的根本路線。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平日的反革命言行在羣眾中留下了跡象，由羣眾來加以檢舉揭發，是對反革命分子最沉痛的打擊。羣眾路線的優越性在於：

1. 發動廣大羣眾，人多面广，發現問題多。例如：軍隊系統在運動中就有103,272人檢舉了154,945件問題，其中屬於反革命性質的有33,168件，屬於重大政治問題的有31,023件，而且大部分屬實。又如甘肅省單是羣眾檢舉機關、企業內部反革命分子的材料就有49,000多件；廣州市羣眾檢舉5,997件，其中經公安機關証實而加以逮捕法辦的就有199名反革命分子。再如前不久廣州中山公園內特務企圖爆炸案，若不是羣眾提高警惕，及時發現，就會遭到毒手。

2. 由羣眾協助公安機關進行肅反，可以更加精確，更加全面，可以縮短調查偵緝的時間。

3. 各單位對自己的成員了解較多，對於思想品質、一貫表現等



基本情況一般是掌握的，出偏差的可能性小。

4. 問題公之於世，案件公開擺出來，讓羣眾認識，使廣大羣眾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警惕，使反革命分子處於天羅地網之中；同時也受羣眾的監督，清清楚楚，毫不含糊，是錯是對，羣眾一目了然。而國民黨和資本主義國家則是偷偷摸摸行事，陰謀陷害，暗中抓人，殘害進步人士既不願意也不敢讓羣眾知道。

這樣的羣眾路線難道是錯了嗎？我們說，好得很，它是我們的最根本的路線，是我們工作中最寶貴的經驗和方法。

再來看一看我們處理案件的具体步驟和方法又是怎樣的呢？根據我們自己參加肅反工作的體會，處理一個案件要經過下列許許多多細致的步驟：

發動羣眾檢舉——各單位內部組織研究分析檢舉材料——初步調查和考查——綜合在外調查和內部考查情況加以研究判斷——初步確定對象——上級批准立案——與對象進行個別談話交代政策，動員坦白——大會鬥爭——研究對証本人交代的材料——深入調查，各方對証（肯定或否定）——作出初步結論——甄別定案組反復研究作出結論——上級批准定案——听取本人意見——罪行重大、拒不坦白者提起上訴——逮捕法辦——法院審理復查——最後判決。其中對証材料，個別談話，交代政策是頭到尾反復進行的。

這就是我們處理案件的具体步驟和過程，可以看出，從開始到結束，要經過許多的步驟。在處理過程中，必須是肯定了第一步才作第二步，否定了第二步就不再作第三步。而且絕大部分的案件都由本機關從寬處理，並未送交法院，受到本機關行政處分的也只是很少數。

在處理案件的過程中，我們對於有關材料的調查和研究是萬分慎重和實事求是的。

1. 每一件材料都要經過幾次反復的調查和核對，不論是肯定或否定一項材料，都同樣慎重。

2. 凡是可以用以定案的資料一般都要經三人以上的証實，或

档案材料的証明，否則重新研究。如果証人数不足，再根据其他方面的旁証。同时，还要考虑到証人本身的可靠程度。

3. 即使是細节也必須完全符合，否則重新研究。

我們为什么这样仔細慎重地、不厭其煩地三番五次对証材料呢？就是因为，那怕是有一件材料不准确，都可能出偏差，不是漏掉了反革命分子就是冤枉了好人，兩种情况对我們的革命事業都有害。

还要指出，領導上在运动中一直是教育工作幹部要防止过“左”和过右。运动开始时反对右傾麻痺思想，在羣众起来以后立即防止过“左”的傾向，坚决反对任何粗糙的作法。个别幹部工作不够实事求是，材料不够确切，随时都会受到批評和糾正。某些單位（例如中央乐团和一些文化部門）还特別組織肃反工作幹部去看昆曲“十五貫”，目的就是要教育幹部处理案件时要仔細謹慎，不可主觀片面。

再来談談“大会斗爭”。剛才我已經談过，肃反运动是右派分子攻击共产党的焦点，而大会斗爭又是右派分子攻击肃反运动的一个主要中心。他們誣蔑大会斗爭“不人道”，“違反宪法”，“侮辱人格”，說大会斗爭“斗錯了”很多人。从上面我說的处理案件的具体过程之中就可以看出，大会斗爭只不过是肃反运动中若干細致、周密的步驟中的一步，只是羣众路綫表現形式的一种。肃反运动並不等於大会斗爭，羣众路綫也不只是大会斗爭，而大会斗爭也並不一定进行。（例如：文化部有一个姓蔡的，过去是国民党中航會川特务学校里的政治教官，經人檢舉以后，本人向組織上表示願意徹底坦白，要求不开大会，組織上同意了，一直到最后定案都沒有經過大会斗爭。）那末为甚么要进行大会斗爭呢？进行的目的是帮助斗爭对象認識問題，帮助他坦白交代，尽量挽救他，使他坦白以后可以从寬处理不送法院，否則由公安机关抓了就是，何必开会？因此羣众斗爭正是我們高度人道主义的表現。

还需要說明，开大会具有兩种不同的性質：主要的是斗爭反革命分子；另一种是在肃反初期对一些严重的反动言論、反动思想也

进行过批判。因此被开大会的人也有两类：主要的一类人是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嫌疑犯。这类人不消说是应该斗争的，斗争的结果肯定了其中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也否定了其中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肯定了的自然没有问题，否定了的是不是算斗错了呢？不能算是斗错。既然是嫌疑犯，必定事出有因，有所牵连，有一定的材料根据，斗争结果证明没有问题，这正是天大的好事，绝不能说是坏事。古今中外审理任何一宗案件都会牵涉到一些嫌疑犯，有谁说过传讯嫌疑犯或审问嫌疑犯是“传错了”？“审错了”？而我们对于反革命嫌疑犯难道不该追问清楚吗？真正的罪犯正是在审问和斗争嫌疑犯的过程中逐渐肯定出来的。因此绝不能认为是“斗错了”。嫌疑犯必定事出有因，现在我们来举一个例子，请大家看看该不该斗。文化部有一个姓田的女的，曾经在国民党军队里混过，跟特务同居过，运动中有人检举她是特务；而且发现她本人的履历表中除掉“性别”一项所填写的是真的以外，其余如姓名、年龄、籍贯、出身、成分、学历、经历、社会关系等等全部都是假的。大家看一看，这种人算不算得上反革命嫌疑犯？这种人该不该斗？当然，最后查明，她本人只是有一些政治问题，思想严重落后，并不是反革命分子。但是查清了对她本人不是很好吗？另一类被开过会的人是具有严重反动思想的人，这类人该不该批判呢？当然应该。因为这种人容易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批判他，是让他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改造思想，这是批判大会。

再谈一谈“隔离反省”的问题。右派分子项志遵、夏永年诬蔑我们“隔离反省”是“侵犯人权”，我们说，恰好相反，这样做正是为了充分地保障人权。“隔离反省”是为了防止发生事故；防止斗争对象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危害别人的安全；防止他本人和其他同案人串连勾结或受同案人的陷害；防止他本人自杀。因此才暂时地对极个别问题严重的人进行隔离反省。这样做一方面是保障了社会安全，一方面也是保护了他本人。

以上所说的就是我们在肃反运动中的具体作法，我们要质问右派分子，这样的具体作法难道是错了吗？

以上各点証明，肃反运动在形势估計上、指导思想、政策上、具体做法上都是十分正确的，都是实事求是的，絕不容許右派分子謾罵和攻击。我們都是搞科学工作的，科学工作要求我們根据事实，仔細分析，慎重研究，正确判断。我們的肃反工作本身也就是一件科学工作，而我們正是採取了科学的方法来处理肃反这项科学工作的。反过来看，右派分子們呢，他們不顧事实，歪曲事实，信口雌黃，胡乱造謠，連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起碼条件都沒有具备。当然他們也不敢談事实，因为他們自己也知道，一談事实，他們的謠言就会不攻自破。

当然，我們在肃反工作中也有一些錯誤和缺点：例如漏掉了一些反革命分子，个别幹部态度粗暴，有打罵人的現象；調查研究不够仔細，把好人当成了坏人。（例如我們知道有兩個同名同姓的人，一是反革命，一是好人，运动中誤把好人当成了反革命分子。）但是这些偏差都是次要的，是極个别的，並且不是我們願意有的；現在又提出了“有錯必糾”更說明了我們党的政策的偉大。

## （二）肃反运动的效果究竟是不是很坏？

右派分子項志遴誣蔑肃反运动“效果很坏，很多人垂头丧气，很多人不敢講話了”。我們从兩方面来駁斥：

1. 从总的方面来看：肃反运动在全国範圍内收到了極好的效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 1) 清查出 8 万多名反革命分子。
- 2) 19 万多名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
- 3) 130 多万人弄清了政治問題。
- 4) 广大羣众提高了觉悟，懂得了如何識別敌人。
- 5) 为三大改造打下了基础，为社会主义革命鋪平了道路。

2. 从我本人的角度上来看：前面說过，我在肃反运动中曾經被审查过，被斗争过，可是我並不認為审查我是坏事，相反地，我反而感觉对我有莫大的好处。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 1) 弄清了我自己認為一輩子也弄不清楚的問題：我有兩個很

要好的同学是現行的反革命分子，解放以后逃到香港去了。我和他們的关系之中有一些在我看来不容易搞清楚的問題，他們既已逃走，死無对証，我以为永远無法証明了，我大概要被怀疑一輩子了。可是結果証明，很快就弄清了我的問題，使我丢下了几年来的思想包袱。

2) 在审查过程中以及审查的結果都証明，只要是真情实話組織上都相信。我历史上有些無人証实的問題經過自己真实交代，組織上都能相信，对我並不怀疑。

3) 弄清楚問題以后組織上对我更加信任，向我道歉，开大会宣布，开小会欢迎，並且立即吸收我参加了后期的肃反工作。历史上那个政党那个政权能像共产党这样光明磊落？能够道歉？同时，在肃反以前，我曾經請求調来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工作，就是因为历史上的問題沒有解决，結果沒有調成；經過肃反运动弄清了我的問題以后，我於1956年5月再度提出請求調动，9月初就調来了語言所，使我长期以来想从事語言学研究的願望得以实现。以上这些难道不是組織上对我更加相信的証明嗎？如果不信任我，能够讓我参加后期的肃反嗎？能够同意我調来科学院嗎？

4) 問題弄清楚以后我感觉轻松愉快，敢說敢为了。語言研究所的全体同志可以証明，看我平日是不是“垂头丧气”，是不是“不敢講話”？这次整風运动我也積極地帮助党改进工作中的缺点，提出自己的意見；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我又積極地投入了这个斗争，向右派分子們进行坚决的反击。同志們，請看一看，我这样是“垂头丧气”嗎？“不敢講話”嗎？

从以上所述証明：肃反运动是絕對必要的，正确的，偉大的。項志遴、夏永年、徐芻等右派分子攻击肃反运动沒有任何一点事实的根据，純粹是造謠和誹謗。他們的目的是企圖以此来全面否定肃反，企圖証明共产党从头到尾都錯了，以此作为他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据，然而在事实面前他們原形畢露了，造謠和誣蔑是經不起任何駁斥的。

最后必須指出：項志遴、夏永年、徐芻等右派分子對於肃反运

动的攻击决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他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整个系統中的一个組成部分，这只要把他們在其他方面的言行加以对照就可以得到証明。不过，單是在肃反这一个問題上，也就已經充分地暴露了他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惡面目。

## 对肃反运动的一些看法

蔣 鋒

我在下面想談一談自己对肃反运动的一些認識。組織在肃反运动中曾經审查过我的历史，作为一个當事人，我想由自己的体会出發来反駁右派分子对肃反运动的攻击和誣蔑。

首先，五五年的肃反运动是否必要？我以为是必要的。肃反后的事实証明已經清查出来及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为数达27万余人，这說明在肃反前我国仍然潛伏着相当数量的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只要有反革命分子，不論多少都必須加以肃清，这是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保証。建設非常艰难，而破坏只需要一个反革命分子就可以做到，这是显而易見的道理。党的政策一向是对於階級敌人决不容忍，只有願意放下武器真心投降的敌人才可以得到寬大的待遇。右派分子要求党能容忍敌人，目的在於抹杀敌我界限，給反革命分子寻找合法存在的根据，这正是每个爱国的人决不能容忍的事。

这次肃反运动是在过渡时期三大改造沒有完成以前进行的。当时無产階級和資产階級在經濟上誰战胜誰的問題还没有解决，階級之間的矛盾仍然很尖銳，甚至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会更加尖銳化。如果在解决这个矛盾以前不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一步肃清，他們就一定阻撓和破坏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使人民付出比現在大得多的代价。党教导我們說：在过渡时期內資产階級尚与無产階級共存，因而階級矛盾仍然很尖銳，这是符合於社会發展的客观規律的。这与斯大林同志提出的：“在資产階級已經消灭、社

会主义社会已經建成后阶级矛盾仍旧日愈尖銳化”的理論，在內容上是完全不同的。

这次肃反基本上是在机关、学校和工厂的范围中进行的，这些地方知識分子很多。我国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数是爱国的，願意为社会主义建設尽自己的力量。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知識分子中的大多数仍是由旧社会过来的，很多人出身於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上層小资产阶级甚至於反动的家庭，社会关系一般都比較复杂。譬如說我自己出身於一个反动的家庭，自己的历史中有一些政治問題，过去的社会关系中有一些人是反革命分子，而在解放后自己还犯过隐瞒历史的政治錯誤。像我这样的情况党对我进行政治上的审查是完全必要、合理的。我想在知識分子中这类情况的人絕不只有我一个，因此極少数的反革命分子混在知識分子的队伍中就比較容易隱藏。如果党不对历史出身比較复杂的人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把反革命分子从知識分子的队伍中剔出去，势必妨害党和人民对知識分子的使用和信任，这本身就是一件大不利於社会主义建設的事情。我想知識分子是希望党更信任我們的，党一定也願意賦与知識分子以更多的重任；但是我們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信任的問題需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知識分子的历史复杂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只有通过認真的审查才能被党了解。因此在前一阶段中肃反运动在客观形势上講是需要的。右派分子說：“肃反在形势估計上、指导思想、政策上都錯了。”“肃反防特都是制造出来的人为的緊張，是小題大作。”都是一片胡說八道。

肃反用什么方式好？我們的肃反採用革命的羣众运动的方式，在广大羣众的積極参与下可以提供大量的材料，比較容易發現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防止偏差，也可以教育羣众自己。用羣众运动来协助專門的公安司法机关工作，肯定地說，这比完全由公安司法机关担任要好。

党所领导的肃反运动是否实事求是？肃反运动已經結束，我們大家看到並未冤枉了好人。真正搞得不够恰当的人只是極个别的。由总的效果来看这就是实事求是。右派分子惡意地說：“肃反

运动扩大化了。”“肃反时各單位硬湊 5% 的控制数字。”都是造謠惑眾。

运动中有没有偏差？小偏差是难免的。我們这里的同志都了解科学研究是很艰难的工作，然而由各种材料中去判断一个人是否反革命却更为困难。反革命不会坐待搜捕，他們还会多方躲避对抗，对付活的、隱藏的对象很不容易。肃反並不像做实验，倒是像演三岔口，如果要求不出現一点偏差是不现实的。我們也应该体谅負責肃反工作同志的艰辛。

是否委屈了若干同志？應該說是有些人受了委屈。但是我認為这些同志應該这样去想：反革命的存在是反动派留下来的遺毒之一，而这个毒素又是非除去不可；由於历史的现实性，出身不好的人就需要更严格的审查。这决不是党对那一些人有私人恩怨，肃反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因此受了委屈的人要把委屈归咎於旧社会。如果要記帳，就把帳記在反动派的头上。我們生於一个正在变革中的社会，要打倒剝削階級，建立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充滿斗争的过程。对每一个人來說，都免不了要經受一些風浪。为了实现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几十年来有很多革命同志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感觉受到委屈的同志最好回忆一下过去的史实，就不会过分計較自己的委屈了。

我們應該看到这次肃反运动和民族資產階級工商業的公私合营、农村的合作化运动配合在一起已經給国家的政治生活帶來了巨大的进步。我們基本已經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經過这次运动整个反革命活动受到沉重的打击，我們的社会进一步得到巩固，因此毛主席說：“在我們国家里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此外有一百三十多万人的政治历史搞清楚。像我自己就感觉历史搞清楚了，去掉了精神負擔，滿心愉快，做起工作来更有勁头。从此以后党更加信任知識分子，扩大了人民内部的民主，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我們的經濟和文化將进一步繁荣起来，这就是全国人民最大的收获！

因此我認為右派分子所說“肃反弄得人垂头丧气，使很多人不



敢說話，教条主义增長了。”是不符合於事实的。真心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是不会垂头丧气的。肃反以后人民内部民主的扩大使更多的人能够暢所欲言，为社会主义建設出主意。請看最近这一时期連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論都可以大批地說出来，还能說“不敢說話”嗎？党在文艺和科学战線上提出的齐放爭鳴的政策使学术上的論爭更活躍起来，这样將使馬克思列宁主义更丰富、更發展，正好防止了教条主义傾向的增長。右派分子荒謬的言論在事实面前必然会徹底地破产！

同志們，党所領導的事業从来都是正义的，肃反运动也是一样。有反必肃的政策是所有爱国的同志都拥护的，但是一接触到具体的做法大家的看法就有一些分歧。同志們，革命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階級斗争是艰难的，决不像电影或小說上描写得那样單純美丽，那样一帆風順。我認为在任何情况下从階級立場看問題，由大处着眼是最重要的。基於上述的看法，我体会毛主席所說的：“肃反运动大致还好，問題不少。”的結論是十分正确的。

## 駁斥右派分子項志遴的反苏謬論

錢 卓 韻

右派分子項志遴的反苏活动是打着所謂“兩次去苏联”和“根据事实”兩塊招牌的。

所謂“兩次去苏联”倒底是怎么回事？他第一次去苏联是1955年4月前后，一共不过一个月左右，主要是参观；第二次从1955年11月到1956年12月，在苏联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實習。实际上在苏联的时间不过一年另二个月。在这样短的时间中，不可能对苏联有全面的了解。不过从另一方面來說，这一年多的时间在苏联是变化很大的时期。苏共20次党代表大会就在1956年2月召开的，会上批判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錯誤，通过了向共产主义又迈进一大步的第六个五年計劃。这一年中，苏联党和政府采取了很多

措施来提高人民的福利，例如宣布休息日和节日前一天的工作日縮短二小时；准备从1957年起职工工作日逐步減为七小时；产妇的休假期从77天延長至112天；另外对未成年工人及退休老工人都有各种福利措施。这一年中，苏共中央又通过了关于發展畜牧业和蔬菜生产的決議；大規模开垦荒地等等。工农业的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凡此种种，表示苏联各方面都欣欣向荣，愈加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每个去苏联的人从这些事实中都感到社会主义前途光芒万丈，建設社会主义的信心百倍。而項志遴呢？他亲身经历了这些事情，而且也享受到了它們帶來的好处，但是由於他对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一直未加改造，和社会主义的一切总是格格不入，他在苏联总是覺得到处看不慣，在實習的时候就只想回国，而回国以后却变成了一个向人民兇惡进攻的右派分子，發出了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並在他的四周散布了很多的反苏謬論。

項志遴还有一塊所謂“根据事实”的招牌。那末我就以自己亲眼看到的真正事实来回答他的实际上是一些捕風捉影，憑空捏造的“事实”。

(1) 項志遴譏蔑苏联說：“苏联政治不民主，新聞不自由，官僚主义多”。首先要說清，右派分子的語言与我們是不同的。他們对民主、自由和所謂官僚主义的看法是与我們有根本分歧的。这里我想就事实来談談。

苏联的政治是民主的。以苏維埃代表的訪問制度來說，代表必須定期的与选民見面。見面通常在区内的一些“紅角”内进行。来与代表見面的有白髮老太太，有家庭主妇，也有年青的小伙子，可以提出对工作的批評和建議，建議中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安裝一个路灯都有。对政府的重要措施，都要进行全民性的討論，譬如今年六月份起實現的改組全国經濟管理机构的措施，从三月份起就在机关内展开討論，那个时期的真理报差不多每天都有一、二版的篇幅發表来自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最后在五月份的最高苏維埃通过，这充分說明了苏联政治是民主的。

在新聞自由上，我們與右派分子的看法也有根本分歧。右派分子主張資產階級式的新聞自由，我們主張以無產階級的立場來辦新聞。報紙是教育人民的工具，不是販賣庸俗消息的雜貨攤。蘇聯的報紙上無產階級的立場非常鮮明，愛憎分明。右派分子以美國有共產黨的報紙來贊揚美國的新聞自由和攻擊蘇聯。當然不一定非要有反對派的報紙才叫新聞自由，不過右派分子如果一定要這樣說的話，我們也要指出，蘇聯倒是還有美國雜誌出售的，就在我們住的旅館樓下的理髮室內就有美國畫報。

說蘇聯的官僚主義多，完全是誣蔑。到過蘇聯的人都有一個感覺，就是蘇聯機關內行政辦公的人很少，但事情辦起來卻是很好。例如列寧格勒大學物理系全系有 1500 個學生，但是管理學生學習，考試，甚至生活上的事務的只有一個系秘書，管得井井有條。相似的例子到處都有，官僚主義多又怎麼能夠這樣？

(2) 右派分子往往也從否定蘇聯科學技術的成就來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項志遴說：“蘇聯科學技術不如美國”。對於一個自己親眼看到過蘇聯的各種第一流實驗室，並且自己就在這樣一個第一流實驗室中，學習了一個蘇聯能拿到日內瓦國際會議上去報告的國際水平的工作的項志遴竟會說這種話，這就不能想像了。甚至連一位美國有名的物理學家 Luis. W. Alvarez 在今年五月份的“今日物理”雜誌發表的他的日記中也不得不承認蘇聯實驗室的設備在技術上是頭等的，他承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的那個 680 兆電子伏的迴旋加速器比美國所有的加速器都好，項志遴實習的那個研究所也在他贊美之列。“科學美國”的一篇文章中也佩服蘇聯在一年內就可以使迴旋加速器在工廠內成批生產，而美國要組織這個工作卻需要三年。去年蘇聯科學院院士 Курчатов 在英國哈爾原子能研究中心第一次報告了蘇聯研究可控制熱核反應方面的結果，大大的震動了英美的原子核物理學界，其實這些實驗結果還是蘇聯在 1954 年完成的。至於蘇聯政府關心和支持科學研究工作，連美國的雜誌也不能不承認。單是物理方面的研究機構，在蘇聯就有幾十個，我們參觀過幾個，只覺得參觀不完，一個比一個好。

右派分子徐芻說：“苏联今年不举行航空节，是怕現丑”。这完全是胡說。不举行是因为天气的緣故。还在去年的航空节苏联就拿出了各种各样的噴气歼击机、重轟炸机和运输机，还展出了几种超音速的噴气飞机，其中包括三角型式的，我这里还有照片。連当时被邀参加的美国空軍參謀長特文宁也不得不表示出乎意料之外。一年以后，当苏联連洲际導彈也試驗成功了的今天，苏联空軍的力量会不足嗎？标榜“根据事实”的項志遴，在这些事实前面，又怎样自圓其說呢？

項志遴又說：“苏联的哲学學習教条主义”，又說：“苏联的科学界教条主义气氛重”等。事实上是怎样呢？我們在日常科学生活中处处可以看到对某一問題的大爭辯，而苏联同志那种追求真理，不崇拜偶像，为了真理可以爭得面紅耳赤，在講台上白髮斑斑的院士、老教授可以和剛畢業的大学生針鋒相对地討論問題，这种作風，往往使第一次去苏联的中国人感到惊奇。当然我們知道，右派分子口中的所謂教条主义，实际上往往是指馬列主义而言的。如果他真是指責苏联哲学學習是馬列主义的，科学上馬列主义气氛重，我們倒也承認这个指責。

(3) 右派分子另一个否定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手法就是故意抑低苏联工農業生产方面的成就。項志遴就造謠說：“苏联農業接近破产，产量不如革命前。”事实上呢？苏共 20 次党代表大会前夕，真理报發表：农作物播种面积如果以革命前 1913 年为 100，則 1955 年为 178.31，增加將近一倍；再以每公頃的平均收获量來說，1913 年谷物为 7.4 公担，1955 年为 21 公担，增加二倍；1913 年棉花为 10.8 公担，而 1953 年已为 20.3 公担，增加一倍。如果数字还不够具体的話，再可举一二个现实的例子。1954 年起，苏联的各个公共食堂都陸續將面包放在食桌上，只要买了菜就可免費得量吃，个别地方甚至連蔬菜制的涼菜也放在桌上免費供应，这充分說明苏联农产品儲备的充分。再以与農業有密切关系的畜牧業來說，赫魯曉夫同志說过，明年苏联要在牛奶产量方面按人口分配超过美国，其实就在今年，苏联牛奶产量已增加非常多，而且便宜到这样地

步，每听一斤裝的奶粉只售八个盧布，我們有的同志甚至以吃奶粉代替上食堂。苏联的工業水平也是先进的，上面說过的苏联科学技术上的成就沒有先进的工業来支持，是不可想像的。原子能發电站是苏联第一个造成的。世界上最大的能把質子加速到一百亿电子伏特能量的稳和同步加速器也在不久以前完全建成开始运转，这个加速器光是磁鉄上就用掉 35,000 吨鋼，相当於一个大战艦。另外拿苏联帮助我国的 156 項建設來說，北京电子管厂我是參觀过的，帮助設計該厂的莫斯科电真空厂我也參觀过，在设备的先进和自动化程度上比莫斯科厂还高明，当然莫斯科厂現在正在扩建中。沒有先进的工業，又怎么能造出这种机器装备呢？苏联工業的生产力也是大的。全苏联用的鋁制家用品仅是一个飞机工厂附帶生产出来的，而全苏联用的电冰箱和大部分自行車是莫斯科李哈乔夫汽車厂（即从前的斯大林汽車厂）一个車間附帶生产出来的。另外如果比較一下 1950 年前和今天的苏联百貨商店，就可看到各种消費品，如衣服、家具、收音机、电视機、照相机等不論在花色品种与供应量方面，都大大的增加了。多种高級消費品也不断大量出現，战后一共七次全面降低另售价格，1955 年起虽然沒有再全面降低物价，但个别商品仍經常在跌价。这些都是生产力發展的結果，而右派分子却硬說苏联生产力小，不知他們的根据何在？

(4) 右派分子为了描繪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过如此，說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低。項志遴这样說，徐芻也这样說。事实上我們有很多同志到过苏联人家去作客。差不多城市中的每个家庭中都有沙發、电视機、电冰箱、地氈、各种摆飾品（如窗帘、花等），农村中不一定每家都有沙發、电冰箱，但在住和吃的方面，不亞於城市。休假制度是宪法上規定的劳动人民的权利，每年少則有 12 天，多者有一个月。由於有工会的貼补，劳动人民化很少的錢，可以到全国的名胜地方去渡假期。項志遴說：“苏联沒有学問的人，不管做多少工作，待遇总是很低，这也是制度不好”。我就用他自己看到的事实来駁斥他：就在他工作的一个組內，一起有六位苏联同志，其中二

位是副博士，一名機械員，一名無線電技術員，二名實驗員，他們之中已有兩輛自備小汽車，另外還登記了三輛。其中機械員 Ермаков，中學程度，在所內工作了十年，現在才56歲，可是他已買了24,000盧布公債，這數目相當於一輛半勝利牌小轎車，十架電視機，他已登記了新型的伏爾加小轎車，在莫斯科近郊正在修別墅。這些都再一次證明項志遴是睜着眼睛說瞎話。

(5) 項志遴說：“蘇聯人民政治熱情下降，工作效率不高。”我們說，蘇聯人民的政治熱情是高漲的。舉一個開墾荒地的例子。從1953年起至1956年為止，蘇聯已開墾了3550萬公頃的土地。每次當政府號召發出時，響應的總是超過需要的。譬如1953年冬天這次的號召，號召發出的第二天，莫斯科大學的共青團員大部分就送上了申請書，但當時大學生中需要的名額不多，結果大學生團委不得不化了很大力氣來說服大家留在校中繼續學習。這批墾荒隊伍出發了一年多一些，1956年就得了個空前大丰收。僅僅一個俄羅斯聯邦共和國這年向國家上交了就有3000多萬噸糧食，相當於1953年全蘇聯上交給國家的糧食。另外特別突出的哈薩克共和國，這一年上交了1600多萬噸糧食，相當於這個共和國過去最高上交量的十倍，提前完成了1960年的任務。組織開荒這件事並不簡單，它牽涉到一系列巨大的物資、器材、糧食等的後勤工作，但蘇聯黨和政府和人民一起在很短期間做好了，使我們不得不佩服蘇聯人民工作效率之高。項志遴可能是指他在蘇聯實習的那個組說“工作效率不高”的，那末我們就以這個組來說。他們六個人在項志遴在他們那里實習的一年內，共寫出二篇副博士論文，指導了一篇大學畢業論文，雜誌上發表了四篇論文，實驗上制成了幾個重要部件，再加上指導了兩個中國實習生，這能說工作效率不高嗎？

(6) 最後，再來駁斥一下項志遴對蘇聯青年的道德面貌的歪曲和污蔑。

項志遴說：“蘇聯青年覺悟不高，亂搞男女關係。”事實上呢？上面所說響應黨的號召，毅然離開城市，去到遙遠的沒有人跡的地方去安家立業，開墾荒地的就是青年，這正是蘇聯青年覺悟高的表

現。以我們在校內看到的蘇聯青年而言，他們有一個最大的優點，就是全面的發展。政治上他們是敏感的，對每件國內外政治上的重大事件都很關心，在宿舍內，常可聽到為了某一政治事件的看法爭論。他們除了自己的專業外，對體育都是很有興趣的，對文學藝術也人人愛好，在中學時就已唸了很多國內外的有名文學作品，藝術欣賞力也強，在評論某一文學作品或藝術品時，常使中國同學發窘，因為中國學生恰恰常在這方面表現得比較欠缺。此外，蘇聯青年的直爽，坦率，國際主義的友好精神，中國在蘇聯的留學生都有很深的切身體會。蘇聯男女青年相處是開朗、活潑、正常的，可是一部分中國留學生在剛去蘇聯時由於自己腦袋中的封建思想作怪，認為青年男女多談談話，跳跳舞就大驚小怪起來是有的，後來也就認識正確了。可是項志遴在蘇聯，總共不過一年多一些，又由於語言的困難，接觸的蘇聯人不過十來人，就作出“蘇聯青年覺悟不高，亂搞男女關係”的結論，又不知他根據的是什麼？

上面我們以事實駁斥了項志遴的各種反蘇謬論。我們列舉了蘇聯各方面的很多優點，說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正因為如此，我們才以蘇聯作為我們學習的榜樣。當我們說蘇聯有很多優點時，並不是說蘇聯毫無缺點，個別缺點是有的，蘇聯也並不隱瞞。而且即使這些個別的缺點，在蘇聯社會中也是輿論劇烈譴責的對象。不過今天右派分子既然拾起蘇聯社會中極個別的缺點擴大成全面的，甚至以莫須有的罪名來大肆攻擊蘇聯，那我們就不得不拿出上面所說的那些事實來，讓羣眾看到，蘇聯人民的各種優點，才是主要的、根本的。這是掌握了自己的命運，以共產主義作為奮鬥目標，在蘇共黨教育下必然的產物。是這些優點推動蘇聯社會主義向前發展。而那些個別的缺點只是次要的，而且還逐步在消滅中。

右派分子一個最惡毒的，從根本上反對社會主義的辦法，就是挑撥中蘇人民最偉大的友誼。因為他們也知道，社會主義陣營之所以能夠鞏固壯大，世界和平之所以能夠得到保證，是與中蘇友好同盟的存在分不開的。動搖了這個聯盟，就等於根本上動搖了社

会主义阵营。

我們說：“中苏人民的友誼不是一般的，而是亲如兄弟的友誼”。这句话並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留苏学生对这点体会特別深刻。項志遴說：“苏联人不关心我們”，“苏联人不管我們”。事实上是怎样呢？到了莫斯科后，我們去實習的那个研究所很热情的来招待我們。給我們在城中心离紅場不远处找到了一个价廉而又可長期居住的旅館。因为离开較远，研究所就每天派一輛汽車接送我們，遇到值夜班的日子，即使深更半夜还用小汽車送回旅館。

他們知道我們午飯的習慣与他們不同，加之不少同志語言又不很通，就把他們食堂的作息時間提早到十一时开始，留出几个給我們的專用桌，指定了一个服务員專門帮助我們点菜，我們可以不必排队买票。因为我們参加的工作对身体健康有影响，他們就在自己的鮮牛奶定額中保證了給我們的牛奶，而且为了照顧我們熱飲的習慣，破例供应热牛奶。在这样的無微不至的热情招待下，能說苏联人不关心我們嗎？在工作上，这个研究所給我們的安排也是很好的，給我們每个人都指定了專門指导帮助的苏联同志。我們学到的是最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对我們保密，苏联却毫無保留地把技术傳授給我們。到庫房去要材料总是先給我們，到工厂去定活总是优先做。这些难道能說苏联人不管我們嗎？

在大的方面，中苏友誼首先表現在政治上苏联处处支持我們。每次有苏联参加的任何国际會議，如果我們被排挤的話，苏联一定要仗义执言，提出恢复我国席位的问题，上至联合国，下至季节性的小規模国际运动会都是如此。右派分子徐芻說“苏联不支持中国整風”，这完全是胡說。今年五月赫魯曉夫在回答美国哥倫比亞广播公司記者問題的电视节目中就明确表示苏联贊成的态度。中苏政府政治見解上的一致，完全是由我們的指导思想一致、目标和利害关系一致所决定了的。除此以外，苏联對我們进行了全面的、大公無私的援助，八年来我們有了自己的飞机、汽車、机器制造、仪表、無線电等工業，給我們国家的工業化打下了一个基础。回想在



国民党統治时期，美国是不肯幫我們建立工業的，所謂美援就是大量的屠殺人民的軍火，再不然就是大量充斥市面的高級消費品和所謂剩餘物資而已。我們有不少有名的原子核物理學家，在美国工作的时候，就是不讓看見原子核反應堆。而苏联还远在聯合原子核研究所成立以前，就接待了中国派去的同志參觀和實習。

总之，苏联對我們的援助完全是以崇高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為原則，衷心的希望我們迅速成為工業化的國家。他們把四十年来建設經驗完全告訴我們，免得我們走彎路，很多問題由他們代我們週到地考慮了。从這些地方，我們真正體會了什麼叫兄弟般的、大公無私的援助。項志遴和其他右派分子對苏联的忘恩負義，以及別有用心的歪曲誣蔑，即使拿舊社會的道德來衡量，也是沒有良心，而在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不是什麼良心問題或思想問題，而是明確的立場問題，走那條道路的問題了。陸定一同志在人大發言中說得好：“聯合苏联還是反對苏联，這是革命與反革命的分界線”。

項志遴和其他右派分子這樣瘋狂地反蘇，他們的居心何在呢？右派分子都是極端仇視社會主義制度的，而社會主義的老家是苏联，所以他們也就一定要來挖我們的牆腳，反對我們的命根子——苏联。很明显，如果照他們所說，苏联的政治是這樣黑暗，工農業和科學技術是這樣的落后，苏联人民的道德又是這樣敗壞，那社會主義制度就有問題，向苏联也沒有什麼可學的了。一句話，他們要以描繪苏联社會一片黑暗來動搖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信心，他們要以破壞中蘇的友誼來根本上消滅社會主義制度，其手段不能謂不毒辣。

這些右派分子重複着的是“自由歐洲電台”或“美國之音”的反蘇老調，儘管他們拼命叫喊，歷史還是按照它自己的發展規律前進。苏联和社會主義陣營內各兄弟國家還是大踏步前進，而且更加團結強大了，掉在歷史後面的是那些不肯改悔的右派分子自己！

## 何榮的右派言論

### I. “保护科学工作不受到各种摧殘,来保証科学工作必須的空气陽光”

1. 科学家只有小範圍的权力。何榮說：“科学家只有小範圍內的权力(如在選擇研究題目确定研究方向、生活福利、領導青年方面的权力)”，而在主要方面却是絕對的無权，幹部要不來(統一分配)，儀器買不來(外匯緊，削掉了)。在文章中他說：“科学家在实际工作中有多么大的实际权力？有些地方不少，譬如房子問題，生活福利問題等是說話很有力。再譬如，在和青年人相处中，可以說啥算啥，因为在这种場合下，党为了防止青年人冲撞科学家，根本就不使得青年人有机会表示意見。但有些問題上却又絕對地無权。比如前年新大学生来到所里之后，關於新人的一切情况(人事、學習成績等)，党一律向科学家保密。其原因是怕科学家要爭、要搶，結果每个科学家也不知道是根据什么机緣(是天緣湊巧还是党的乱点鴛鴦，不詳)得到了自己的新弟子。試問，这中間可有一絲一毫相信科学家、依靠科学家的思想？再如反胡風學習中，党請科学家参加了領導全所的学委会，但实际上並不信任科学家，許多情况都不讓科学家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讓科学家出面，担上領導运动的名义未免太令科学家寒心了吧！在其他的政治思想工作，党什么时候真正地誠懇地邀請了科学家参加領導？更談不到交給科学家去領導了”。“解放前科学家，只要有能力就可以‘有所作为’可以按自己意圖办事，要儀器要圖書要人都有办法，可以搞出些名堂来，如蔡元培办北大就因为他有名望，好教授都請得來，真是‘百家爭鳴、百花齐放’的学术繁荣时代，現在的科学家那有这样大的权力”，这主要是由於“党的权力太大”。

2. “科学家認為要作科学工作，需要有时間，但党的幹部認為要發展科学，需要开会表报，需要使科学家忙些，更忙些”。“科学家認為要搞科学工作需要集中精力，專心致志，但党的幹部認為科学不能‘脱离政治’必須着重整一整脱离政治倾向，並把科学家(尤其是青年人，那是社会主义的新一代尤其重要。)从埋头工作的‘泥坑’里拖出来，要他保証看报、發言、鍛鍊、文娱、搞思想(党对脱离政治要比脱离業務敏感得多)”。“以前有些人習慣比較坚持長期的鑽研業務，但漸漸習慣於上下班便离开工作，在科学院不像研究而像生产，这不只是上下班制度的問題，而是社会活动开会等对正常的工作習慣都有影响，党是有

意識的領導大家這樣做的，改變了大家良好的工作習慣，有人工作放不下，黨便說脫離政治”。“現已經有個危機，沒有鑽研工作的積極性的危機”。“從來沒有人支持做研究工作的積極性”。

3. 黨在科學院中所起的作用，不是思想領導，而是或多或少地根據自己的看法和意圖在推行這，建立那，要別人辦這，不叫別人辦那樣等等。造成科學院“學術空氣不濃厚，有些機關衙門氣”，主要責任“應當由黨來負”，“原因很簡單”，“過去是黨，而不是科學家在辦科學院”。“給知識分子的自由度很小，過去一個人起的作用很大而現在無法只能坐以待斃”。而黨的領導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學術空氣也不願意去體會什麼叫學術空氣。因此，何舉要“找一套工作、生活的制度，來保護科學工作不受到各種摧殘，來保證科學工作必須的空氣陽光”。

4. 他又說：“科學院是黨在辦而不是科學家在辦科學院”，“黨的意見和科學家背道而馳”，“黨脫離了基本羣眾——科學家”。

## II. “知識分子的政治是在研究工作上”。“不是知識分子脫離政治，而是搞政治的人脫離知識分子”。“對十二年規劃沒有信心，看不到走的路”，“科學家都不重視計劃”。

1. 何舉說：“秦祕書長在傳達毛主席報告中說：“知識分子不問政治，就剩下吃飯生孩子”。這是不對的，知識分子也想到作研究工作，他們有一套政治，而別人不去理解他，科學家有自己的理想，他的理想在研究工作上，科學家不見得脫離政治，如這次‘鳴放’中科學家談出了很多問題，知識分子的政治是在研究工作上”。“不是知識分子脫離政治而是搞政治的人脫離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關心政治的，在鳴放中知識分子積極性是很高的而主要是政治待遇不平等，黨內外有牆，沒有充分機會，沒有充分可能讓知識分子去關心國家的事務”。

何舉在文章中說：“黨的工作者對人對事的看法有其固有的政治家的尺度，他從來沒有想到這種尺度用來量科學工作者和科學工作有可能是對口徑的”。“黨未能真正体会到斯大林名言：“科學家要通過自己的道路來接受共產主義”的客觀規律意義”。“這和黨的幹部只是通過“宣傳員的方式”來接受共產主義，而脫離實際形勢，不体会各種類型的人的特點的情況是有聯系的，必須承認認識過程的長期性，反對“接受愈快愈進步”的簡單化看問題的方法”。“在思改過程中，黨的領導未能抓住中國科學家愛國、愛真理的主要方面，急燥粗暴地對科學家提出了過高（違反認識規律）的要求，並將這些觀點在青年同志中進行有組織的宣傳佈置，然後用過激的方法向科學家開炮。經過思改和以後的運動，科學家落后的看法，在青年人中間，已成不移的定論”。“回想

思改时，把老科学家拿来斗一斗有否必要，就很可怀疑”。“我作为一个在过去思改运动中言論激烈的一个積極分子，借此表明我的內疚”。“罗隆基說‘知識分子和党之間的牆和溝是思想改造造成的’，有人說这是右派言論，那簡直就太豈有此理了”。

何肇說：我不相信思改是在自覺的基礎上進行的，是強迫的，我認爲強迫思想改造是很痛苦的。對蔣介石謬誤我們說思改是‘洗腦筋’的說法，有同感。

“我認爲用運動的方式搞思改不合適，這是黨內整風的方式。而對黨外就不合適。”

“科學家就是落后也不要緊，大科學家有些錯誤亦可以原諒，大科學家就有些缺點如貪污又何妨。我不贊成‘論共產黨員修養’里面提那末多的個人主義問題，我認爲沒有必要老在那里扣個人主義。”

2.“規划就規划一些重點，愈是重點問題就愈多，例如電子計算機研究所，半導體，物理研究所，訂規划就規划到××年發展到多少人，××年機構擴充到多大，××年成立什麼所，而不是規划到××年工作做多少，結果發展重點，就拚命增加人員，擴充機構，結果人浮於事，沒有工作做，房子不夠，這是在製造矛盾”。“黨集中了一批科學家到西郊搞遠景規划，搞得很浪費人力、物力、時間浪費也很大，但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到底能起什麼作用”。我對十二年規划沒有信心，因為看不到走的路，從自己組的工作中也看不到他的指導意義。

3.“作什麼研究工作黨也沒有依靠知識分子或依靠得不得法，科學院這樣領導，使科學家都不重視計劃，科學家不重視科學計劃是有理由的，對院里佈置下來一大套沒有興趣，黨和院的領導，只是佈置，幾天之內就要把計劃訂好，是形式主義”。何肇還反對報表。

4.“我國的科學家大多是留學英美，對英美的那一套科學制度、工作制度都熟悉，也很習慣，這一套對今天中國現有落后的情況來說都是先進的。假如讓老科學家們談：他們所熟悉的那一套中，未嘗不可找出適合於中國實際情況的工作制度，科學體制等。然而現在在訂規划，擴充機構，訂規划老科學家們對英美的那一套既不好拿出來，而對蘇聯的那一套又不熟悉，只好從科學家腦中空想出一套東西來。搞得不符合實際，蘇聯那一套也不見得就適合中國。蘇聯專家對於中國的遠景規划，表面上是說中國兄弟真偉大能制訂出這樣長遠的十二年發展規划，要趕上國際先進水平，而在內心實際是在想，訂了能實行得了嗎（有太不盡力的語氣）？能有用嗎？”

### III. 何肇說：“黨人為的在科學家和青年人之間造了一道牆， 黨對青年人進行的“團結科學家政策”的教育是很荒謬的”

何肇說：“今天科學家和青年的關係是不夠密切、不夠正常的，以解放前情

况对比一下便曉得。那时一个科学家和他的学生之間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以我的父亲为例,青年人經常到我家里去拜訪,有些熟悉如一家人,从生活到學習,大家無話不談;老师事实上是青年人的業務、生活思想上最亲密的長者,愛学生如愛自己的子弟,把他們当作自己事業的助手和繼續者。但今天的情形就差得多了,大家充其量是有一些業務上的联系,其他方面則是互相淡泊陌生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党在青年和科学家之間造成了各种隔閡,加上各种戒律”。在思改时党讓青年斗了科学家(詳見II)“青年一来所党便悄悄地对青年人說‘和科学家相处要小心,科学家思想落后’……”。“必須青年(先进的,靠近党的新血液)从各方面去团结他們幫助他們改造等等云云。这样一来,已經使青年人觉得科学家是新社会中很特別的,处处要小心照顧的病人。”这說明党不依靠科学家,也不讓青年人依靠科学家。但党的领导尤以未足,再加上一条絕對是非律:“凡有青年同志在与科学家相处中惹事生非,引起不愉快者(如爭論、生气之类),首先应由青年人負不执行团结政策之責”。“几年来的效果証明,年輕人与科学家吵嘴是少了,但青年和科学家之間再也無法建立正常的,人与人、同志与同志之間相处时的正常的、誠懇的关系。青年人对科学家有意見,最后都彙报到党的字庫里,党有什么仙方能消除这些問題?科学家对青年人不滿意,只好把意見埋在心里。事实上人不是專門吵架的动物,党不必設五关六將,青年人也未必就和科学家發动內战,造成灾难。如果几年来党不是片面地向青年灌輸团结教条,而是放手讓大家自由相处,自由交換意見,今天科学家和青年之間的共事关系是不会如此令人头痛地难”。“向青年人宣傳所謂‘团结政策’的戒律,也正好說明党对科学家的看法:一羣需要謹慎相处的病人,摸不得的国宝”。

#### IV. “党是專橫的嚴密的統治”,“在各个基層單位不一定要有党的領導”

他認為党的幹部“以为自己有領導者的本能”,表現在:“不調查研究当前环境的特点盲目地老一套地幹”。

何幹在文章中又說:“党的領導幹部却沒有这么开明。他們拥有的主觀(教条)主义要比馬列主义更多些。他們往往以为自己一通百通,把教条当作普遍真理”。“党的工作者对人对事的看法有其固有的政治家尺度,他从沒有想到这种尺度用来量度科学工作者和科学工作有可能是不对口徑的,換言之,党的幹部在科学的新崗位上沒有对自己旧的一切进行批判,因此也就不能使思想赶上形势,切合实际”。

他又說:“我認為党是統治者,党通过組織、政策和运动把羣众統治起来。党沒有把羣众看成是自己一样平等的人。党是严密的專橫的統治,說什么是

什么。党从来不检查错误，很顽固”。

“党领导运动，没有发挥群众的积极性，而只是利用群众的压力。党在发号施令，群众则跟着在喊，因此觉得不民主。运动中的斗争对象是最倒霉的，只能吓得发抖，如果本来没有问题亦很难辩解”。

“党的群众路线是用压力，群众跟着喊，群众不敢说真心话，群众在根本问题是沒有发言权和讨论的余地，在肃反问题是民主不够”。

“对胡风的许多话也是共鸣的，感到舆论一律，社会纪律组织严密，觉得统治比解放以前还利害。旧社会虽不许说，但可以想，而新社会连想都不允许”。再随便举几个例子(1)“……但问题不仅在老爷们，而在于老爷们也是一大群读者底代表，我想以后得在下笔前先变成老爷们，再来和变成了老爷们的自己作战，一面防止他们不懂，一面防止他们构成罪案。这当然也无聊，但也只好做能和无聊作战的大勇者”。“我们是要动摇二十年的机械论的统治势力，多花一点力气是必要的……”(2)“要做商人，只得和对手一道嫖赌，要在这圈子里站着不倒下，也就不得不陪陪一道跳加官！”(3)“好像置身在大家无端得意忘形地欢乐，但自己感受的正是相反，因而不但落莫不欢，反被当作异端仇视的那一种处境下的心绪。”(4)“现在是，在一个罩子下面，许多读者都是昏昏沉沉者。一、‘舆论’一律，一个普通读者也实在难于判断。二、绝对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的空气是压迫人的。三、文艺上的问题也实在以机械论最省力。”对于这些话都有共鸣。对胡风的两面策略也很欣赏“一定要是無‘距离’的态度：(1)送上理论，同时送上入党申请书；(2)应参加的文艺活动与社会活动都是积极的参加，例如，奉邀出席甚么座谈会之类，不推托，不沉默；(3)不对任何人发甚么牢骚。”

我不相信人会不为自己着想，会为人民服务。对党的老干部亦是这样想，认为他们也是要追求个人利益。党员的修养，对人谦虚等是虚伪的，这是他们联系群众的手段，实际上还是看不起群众的。积极分子有两类，一类是虚伪的、假的、向党献殷勤的，我自己就是属这类的。另一类是头脑简单，跟着党喊的人。群众也有两种：1.不讲话，听支配，对什么都不大关心。2.有话不敢讲，有意见不敢说。党和群众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党的干部自以为无才有德，对有才无德的群众，怀着本能的宗派主义的不信任”。“党有这样的惊人的宗派主义难道有可能联系群众吗？今天党的干部群先要把旧的宗派主义思想，教条主义戒律好好整一整，听听群众的意见，悔悔过，再洗心革面，消除对“落后群众”的本能的蔑视真正地和群众携起手来，依靠科学家办好科学院”。“思想改造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不敢要求所有党的领导干部都能立刻有很大进步，但我认为一切错误的，过时思想，如果不自动退出舞台，群众会把它清出去的”。

“很多人都說共產黨員在政治上最先進，我認為倒不一定，不能用這個來衡量一個人，說共產黨是光榮的，偉大的，正確的，就使不少人因為光榮而入黨。因此我認為是不正確的”。有黨中央領導就可以了，在各基層單位就不一定要有黨的領導，至少，也不應該有今天這樣的具体領導。特別是在高等學校，科學院這樣的單位，可以不一定要黨委和黨組的領導。“院里應當讓科學家對所內的工作更多負責，如周總理找施所長負責，施所長找科學家負責……院本部與黨可以不管。這樣也許搞得好些。至少比今天這樣要好”。

“人事幹部，年紀青青，又不懂得業務，大權在手，人人看了都要害怕他。所里有些人對別人都可以不怕，只要人事組有請，再厲害的也害怕”。“我真不懂不管那個單位，即使很小，也要搞上個人事幹部。像我們所里人事幹部五、六個不知在乎些什麼？我說審查幹部可以放在院里，所里可以不要有人事組，至少不應當有那麼多人事幹部”。

“部隊轉業的人總是特別兇，好像就憑自己有汗馬功勞”。

他說：“儲安平的言論並沒有什麼，如果只從他的話看出問題那就太聰明了，批判他是沒有什麼道理的，所以，我現在對人民日報沒有很大的興趣”。“看到人民日報的批判就癡心”。

他覺得別人翻護批判儲安平就大以為不然，說：“你們一看（指看人民日報）就信，真是頭腦簡單，水平太低”。

他又說：“儲安平的說話可以從好的方面去理解，也可以從壞的方面去理解……從好的方面去理解，儲安平所說的是事實，在各個基層單位都安置一個黨員做頭兒，即使形式上不是，也要黨員幹部點了頭才算數。在科學院，在研究所里也是這樣”。

他說：“說錢偉長要當清華校長，錢偉長作校長又有什麼不好？理工台校又有什麼不好？這些也要批判嗎？”

他說：“肅反時有些人亂哄哄地盲目地跟着共產黨喊，後來就參加了共產黨”。

## 何榮的一貫表現

土改運動。何榮的母親是地主，她在土改中未把地契交給農民。何知道這件事以後，覺得是件小事，未採取任何措施來補救。同志們在思改和1952年的整黨學習時，向他提了許多意見，而他始終沒有對這個問題好好做過檢查。

何榮說：“三反五反運動中，由於和一個貪污分子一起經手過許多東西所以思想情緒和運動是非常對立的。”不相信有老虎存在，看老虎則覺得很殘忍。他認為“三反五反運動在科學院搞的太過火了，老是搞運動，不作業務，真是人人成為運動員了。”

总路線學習开始后，彭桓武付所長作動員報告，他不去听，章綜批評他，他不仅不覺得錯反而發脾气。另一次張稼夫付院長向全院做報告，他虽然去了，但回来后他向別人得意洋洋地說：“我一点也沒有听进去，一直在那里画小人”。討論的时候催着要散会，有时干脆就說：“今天要学，我就不幹”。有一天，在黑板报上出了院学委会的一个通知，提出了当前學習还不够深入等問題，何看了便当着許多人面前大罵說：“这些家伙（指領導）真不要臉，吃飽了飯沒事幹，讓你來深入深入看”。何榮會對章綜和陶祖聰說：“頂討厭什么事情都扯到思想上和階級界限上來”。

何說：“反胡風學習一开始，就很抵触。”何會對徐稚岐講：“在反胡風學習时，我沒有好好學習，學習开始了許久，連第一批材料都沒有看（那时第二批材料已經出來了）”。徐当时會批評他，說他不像一个團員，对反胡風沒有責任心，何却說：“我沒有學習，並不等於我不关心反胡風”。第二个禮拜何又去找徐，对徐說：“我还是沒有學習”。

何榮自己說：在思想上与胡風反革命集團就有許多相同之处。他在檢討中說：“胡風的文艺思想与自己的想法是一样的，覺得解放后的文艺作品是千篇一律，簡單枯燥和無血無肉的認為是机械观点和教条公式主义在作怪；是提出为工农兵服务的結果。自己很欣賞‘主观战斗精神’，‘到处是生活’的說法，三批材料揭發后很害怕，因自己与其中的很多有相像的地方，如表現对社会不滿的东西都有共鳴之处”。

關於肅反，他在小組会上說：“肅反运动中說5%是坏人，是教条主义的理解，全所忙了一年，結果一無所获”。

肅反时他會在一次團小組会上說：“在总的情緒上我是宁右勿左”。又有一次他对陶祖聰說：“應該站在落后羣众的立場来看問題”。在檢討中又說：“在肅反运动中讓科学家參加領導，只是表面上要表示联系羣众，实际上則是讓科学家給党背黑鍋，我所說的寒心就是指的这个”。

在鳴放中他說：“我們应当反过来想一想，不要为老腦筋束縛住，思改不搞又怎样？肅反不搞又怎样？”

在研究工作方面，何會對徐稚岐說：“有一种人虽然是个人主义者，然而鑽勁很大，那还是值得羡慕的”。

何榮是向来不管計劃的，他也不想去訂計劃。並且常和別人說，“科学研究計劃根本沒法訂，訂了也是形式。”

在業務工作中，他認為与人合作不能發揮个人的積極性，他常常在同志中說，不能合作的道理，有时甚至說：“要我和別人一齐做工作我干脆就不幹了”。

他还說：“我認為只要發揮每个人的積極性就可以了。只有用自由竞争和淘汰的资本主义方式才能發揮每个人的積極性。现在的青年人不像科学家过



去在国外那样积极,不关心自己的工作,个人上进心不强。思想教育不通过业务进行就不解决问题。要用一切是为了名誉地位,来鼓励个人上进。”

何曾說：“在科学院,研究应站绝对第一位”,“科学院搞了许多非业务的事,中国科学本身是落后的,反而去搞这许多非业务的事,我倒很着急,党的领导反而不急”。1954年刘少奇同志关于宪法作了一个报告,所内播放录音,事后何就对徐稚歧說：“我听了一会就睡着了”徐稚歧发现何常常不看报,她曾为此批评何,何則說：“不看报有什么关系,張明山發明反圍盤时,就未見得他当时就看报”。

在8月15日,何做了第三次检讨,同志们指出了他不老实的态度,他竟慚羞成怒,进行了全盘的反攻。他說:

“很早以来就有这样想法,认为运动整我整冤了”!

“对同志们的帮助有对抗情绪,但我知道同志们是为了搞好运功,所以我沒有理由来反对,我觉得沒有办法,检查沒有办法,不检查也沒有办法,就是再检查一千次,你们也不能希望交代出反动集团和陰謀来”!

“我痛苦的不是因为我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是因为觉得我没有路可走”,

“我的检查是勉强的,情绪是對抗的”!

“但我对自己的問題沒有仇恨”!

“如果同志们想要我談出惊人的东西,那么我以后就不再作检查了”。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可以仔细地回想但不能像倒口袋一样倒出来,而且也不能希望我有質的变化”!

\* \* \*

何 犛,男,29岁,浙江諸暨人。1949年11月入团。

现为应用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 項志遴的右派言行

### (一) 項、張聯合攻击“黨反”

整風初期，項志遴和張家璵聯合攻击肅反運動，企圖翻案。張講“項漫問題，斗項是領導上製造的”，項則為張抱不平。在大鳴大放期間，他們一唱一和，聯合發言，分頭点火，支持右派分子劉治平。在反教條主義的偽裝下，全盤否定肅反成績，說肅反運動在形勢估計上、指導思想上、方針政策上、具體做法上都錯了，效果很壞，弄得人垂頭喪氣，肅反唯一結果是教條主義增長了。

1. 污蔑我們“由於斯大林錯誤理論的指導，對形勢作了錯誤的估計，把肅反擴大化了”。他說：“經過土改，地主老實了，經過五反，資產階級願意接受改造，階級鬥爭，並不是日益尖銳複雜和深刻，反革命愈來愈少，不必大張旗鼓來肅反，這是“中央受斯大林階級鬥爭尖銳化的影響”。他要黨“應該承認有類似斯大林錯誤理論”的指導。

2. 認為胡風不是反革命，說：“胡風集團的材料有80%是錯的”，“人民日報揭露胡風材料是小題大做，浪費紙張”，“胡風是對黨不滿”，“反黨不是反革命”，“胡風指出了目前文藝界有几把刀子，是指出了我們的缺點”，“現在證明我過去的認識是完全正確的”，“我完全相信，張家璵講胡風不能定案和林希翎說胡風問題弄壞了”。

3. 他誹謗凡是大運動“都不是羣眾自覺自動參加的，而是領導強迫的”。“肅反是各次運動發動羣眾最壞的一次”，“肅反運動違反了法律，對人權有了侵犯，隨意鬥爭、關閉，隨意責罵”。

4. 說肅反“傷害人多”，“效果很少，缺點很多”，“80%是錯的”，“應該重新估價”，“全國是這樣，物理所也是損失大於收穫，這次整風這樣亂，是肅反的結果”。

### (二) 對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看法

項志遴利用青年中存在“先專後紅”的思想，披着馬列主義外衣，大量散布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宣傳“政治即業務”的謬論，反對黨的政治教育，反對思想改造。

1. 歪曲列寧“科學家要通過他自己的工作來逐步接受共產主義”的話，並以它作了幌子，宣傳：“政治即業務”的反動觀點，他說：“工作好，就是思想好，

就是进步，衡量一个人是否脱离政治，主要标准是看他的业务工作”，主張：“整天啃書的人就讓他啃好了，他對社会主义有貢獻，不必去管他的資產階級觀念”，說黨“不能領導業務，思想工作也是白費”。因此，他大肆諷刺黨的政治教育工作，逢人便說：“現在的報告和文章都是教條主義，宣傳工作也是脫離實際片面化公式化”，“政治學習逐漸成為八股，大家學習情緒越來越低”，“黨的政治工作損害了青年的心靈和個性”，“使青年人苦惱不堪”，公開要求：“現在沒必要規定大家學習哲學，學了半天沒什麼東西，以後根本不要政治課”。

2. 他在團員中歪曲“存在決定意識”的原理，否定思想改造的必要，說：“存在決定意識，生活在社会主义社會里，自然會產生社会主义的思想，不必進行改造”，“沒有什麼特殊個人利益，就沒有什麼階級性，就不需要什麼改造”，“我是愛好自由的……我的思想不願受任何束縛”，“既然我是知識分子，就不可能和工农一樣，也不可能培養成他們那樣的思想感情”，所以，他詆毀思想改造說：“要改造也不必經過激烈鬥爭，以前方式太粗暴，使青年人心靈老化了”，“心情緊張妨礙積極工作，大大束縛了個性，把青年人變成四四方方”，“妨礙自由思考和個性發展”，“思改是把老教授搞掉”，他大聲疾呼：“思改搞成這樣，副作用太大”，簡直是“斯文掃地”。

### (三) 攻擊社会主义制度宣揚資產階級民主

1. 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上不民主，新聞不自由，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他在討論會上講：“中國比起波匈來是落后了，民主問題還未提上日程”，“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到今天還很嚴重，使得不少人不肯講話”，“農村民主更少，強迫命令很多，合作化統購統銷都是強迫命令，中央指出要合作社90%的社員增加收入，這是不可能達到的，中央犯了錯誤，農村幹部就要虛報產量，強迫命令，農民也只好執行”。

在討論斯大林問題的會議上，他說：“新聞報導都是假的”，“新聞太片面，太主觀，常是按照自己的願望改造事實，對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對美國專造些非常荒謬的消息，如出賣月球土地等，沒有說服力，更不能說明資本主義國家真象，而對蘇聯及社会主义國家則只造好的，不說坏的”。“真理報對中國農村增產的情況的報導沒有普遍性，是挑出來的”。他還攻擊人事制度，說：“活人背了個死檔案，人事制度不民主”。

他公開為儲安平辯護，說：“黨天下的提法沒有什麼錯，過去黨不是把政治、經濟、軍事權力集中於一身嗎？”“各部門都有黨員領導”，“十二位副總理都是黨員，就是證明”。他斷定由此一定會產生“獨裁專制”，說：“一個國家開始時要求權力集中統一，對異己就要排斥，斯大林的獨裁專制就有這種必然性在內”。他說：“斯大林問題是制度問題，各國共產黨都有與斯大林類似的情況，

無产階級專政，民主集中制，就会产生这类問題”，“伊拉克事件是早都料想到的”，於是他總結出：“社会主义陣营不够民主，是制度問題，有其必然性，和普遍性”。“專政專到人民头上了”。

2. 拥护右派分子鮑誠光、刘治平的“一切为了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言論。認為“波、匈極端民主化时期，是一个新的道路”，对“南斯拉夫的企業民主管理，自由竞争，極对胃口”。对張家璣說：“大民主是反官僚主义的有效方法”，称赞北大右派分子鬧遊行“非常好”，認為“党應該領導”，林念芸（黨員）不同意，他罵林“混蛋”。正定地質部會計学校鬧大民主，李忠珍（團員）反对，他却說：“为什么不可以这样，畢業后，每月只給你 20 元，你幹嗎”？

他反对站在無产階級立場看問題，說：“無产階級立場也会妨碍客觀了解問題，作为一个科学家，應該有更客觀的立場”。黃胜年（黨員）同他講階級立場問題，他說：“你若講階級立場，我就和你划条溝”。他說：“不能过分強調立場，像文艺理論中，不是人民性，就是反人民性，难道沒有中間的东西嗎”？他要求“人人都敢講話，每个人都有充分自由”，“沒有神聖的东西，沒有权威”，“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領導工作輪流作，像值班一样”，“党要把权力逐漸交給人代会及人民委员会”，“中央集权要下放”。他要求：

(1) “知識分子（我心目中不是指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掌握政权和領導权……因为他們有能力，懂科学，是內行，工农在知識分子领导下工作”，“工农講話簡單、粗暴，知識分子教育工农”。

(2) “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雜誌报刊独立”。

(3) “經濟上恢复資本主义企業自由竞争”，“农业合作化慢慢来”。

#### (四) 攻击党的領導

1. 說党是三个主义的根源，“三害是反社会主义的”

(1) 認為有党就有宗派，說：“既然有党，既然有这部分人和那部分人的区别，就有宗派主义，这种区别就是宗派主义”，“黨員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党是偉大光榮的提法，也造成黨員驕傲，与众不同”，“我沒有看到一些黨員作領導工作，是保證党的領導的必要方式”。

(2) “官僚主义的产生，主要是工作能力与工作要求不相适应”，“这是目前一大矛盾”，“党既然这样集中，紀律性这样强，加上很多黨員文化水平低，不懂業務，担任重要工作而這些人的职位一般說来，总是不会下降的，这就使得他的表現不好，也無关系，造成官僚主义”他惡意地以“第一代皇帝英明而其后代則往往昏庸”，来比拟，並說：“这是历史的必然性”。

(3) 叫囂“三害就是反社会主义的”，“三害的产生是其本身的緣故”，“整風起不了什么作用”，認為只有按他的方法来“扩大民主”，来消灭党，才是“肅

清三害最有效和唯一的方法”。

## 2. 認蔑黨集權,是“个人野心家集团”

(1) 說黨“極端集權,太缺乏民主”,“選舉名單由上級決定”,“黨的權力太大”,“中央集權太多”,“各國共產黨領導人很少變動,一旦權在手就無法更動”。

(2) 認為貝利亞事件、高饒事件是“鬧宗派,領袖爭權奪利”,匈牙利伊拉克事件、波蘭斯蘭斯基事件也是“爭奪權利”。

3. 污蔑馬克思主義哲學,面臨危機。他說:“黨內教條主義濃厚,把一些經典著作,說為神聖不可侵犯,領導權威的話看作為定論”,“幾年來哲學,沒有什麼進展”,“哲學現在好像只是整理遺產或註釋經典”,“哲學上幾個基本觀點,以前一些嘗試效果不大,遺傳學應用失效了,物理化學方面收穫不大,面臨危機”。“目前發表的‘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沒有什麼意思”,不過表示問題早已解決了,是用大矛盾壓小矛盾解決的。

## 4. 否定黨的領導作用和組織原則

(1) 他說:“領導不過是幾個人的意見,不免有錯誤”,“領導不過是根據事物本身的發展辦事,往往是事物本身逼着領導這樣做,而不了解情況的羣眾就以為他是英明的先見者”。

(2) 他宣稱:“組織性對於不自覺和認識不清的人重要,但對於自覺和認識清楚的人就不重要了”,他說:“自由就是認識了必然性,只要我們認識了必然性,就可以不要組織性了”。所以他号召:“可以不重視和執行領導的意見和決定”,“團員可以自由散漫些”。“組織性應該削弱”。

5. 製造所謂“黨應當逐步削弱”和“組織壓力”的謬論來削弱黨,挑撥黨和羣眾的關係

(1) 他說:“過去在革命時期需要建立異常堅強,權力集中的黨,今後情況不同了,權力不應過分集中”,“在和平建設時期黨就不能有那麼大力量,黨就會鬆懈下去。現在已經逐漸鬆懈,以後也將逐漸鬆懈着”,“因為這是符合在階級鬥爭消滅後,黨也就不需要了”的原理。因而他認為“黨應當逐漸削弱”。在這個謬論的掩護下,他提出:“黨的權力應逐漸交給人代會及人民委員會”,要“討論總理人選問題”,“學校黨委制問題也應該仔細討論”,“黨只應當做些政治思想工作,不能起領導作用”。

(2) 他認為入團入黨就造成了對青年人的壓力,他說:“青年人的道路是不是只有組織關係呢? 物理所許多超令團員當然不能全部入黨,他們的政治道路怎樣呢?”並說:“少年先鋒隊也沒有必要,小孩子有什麼好壞之分,不應劃一條線,使他們幼小的心靈上受到刺激”。

6. 企圖鑽進黨內來瓦解黨。幾個月前,項志達曾申請入黨,聲稱:“百家爭鳴政策出來後,我感到黨和我的距離接近了,入黨後可以拿自己的思想影響黨

了”。他供称他“是根本不需要党的”，所以入党是想要鑽进党“瓦解党”。

### (五) 对苏联的看法

他以兩次去过苏联的身分，打着全面客观看问题的招牌，对许多人散佈了一系列的反苏言論，对苏联的政治、經濟、文化和道德进行了全面的攻击。

1. “公开在会上会后散佈：斯大林的錯誤与社会主义制度有关，是必然的”，“这不是品質問題而是制度問題”，因为“历史上一个国家开始时要求权力集中統一，把異己排斥掉，斯大林的專制独裁也有这种必然性在內”，所以“社会主义各国都有类似斯大林的情况，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斯大林是历史上的罪人，应重新估价”。他写信給朱培基說：“苏联有特权，在克里姆林宮可以买到的东西，在市場上买不到”，虽然講按劳取酬，可是“苏联沒有学問的人不管做多少工作，待遇总是很低，这也是制度不好”，“工人並沒有徹底翻身”。

2. 說：“苏联农业上犯了錯誤，政策忽左忽右”，“苏联农村接近破产，革命后的产量还未达到革命前的水平，农民不起来反抗，是由於秘密警察的鎮压”。“苏联的輕工業产品差些，科学技术还不如美国”。“苏联政治热情下降，是由於革命时期轉入和平建設时期的必然結果，是历史的必然性，只靠生产資料公有制不能解決問題”，“苏联虽已提出新的五年計劃，但共产主义目标已不如以前那样吸引人了”。因此“共产主义还是很遙远的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論仍需研究”。

3. 認为苏联学术遭到形式主義和宗派主义的束縛。他說：“現在似乎把哲學的作用提的过高，企圖用哲学来解决科学的根本問題，例如遺傳学的問題，生命演化，物理学質能关系等，效果並不很好，而且有不少形式主義，宗派主义的气氛，这在苏联更显著，遺傳学上完全排斥了摩尔根学派，物理学上一提質能互換就要受批評，生物学言必米丘林，物理学唯罗蒙諾索夫是崇”。

4. 說苏联同志“只管自己，不管我們”，“苏联人关心我們还不如我們关心朝鮮人”。到处散佈：“苏联人政治热情不高，工作不积极，一年中什么事也沒幹。”

5. 他說：“苏南关系惡化主要責任是苏联”，“苏联第一次援助匈牙利是做錯了，扩大了矛盾”，“中苏貿易不公平”，“我在苏联什么也沒学到”。

### (六) 反对反击右派

1. 人民日报連續發表反击右派的社論时，他和張家理叫囂：“民主受到妨碍了”，“人不敢說話了”。当韓江貼出了第一篇反击右派的大字报后，他們更是气势兇兇，項志遠罵領導是“瘋”了。在6月18日鳴放会上，張項联合發言，公开反对人民日报和所內的做法，說这是“圍剿”，是“人身攻击”。在此前后，他

还和张联合写了“一点建議”，“几点分歧”等小字报，企圖为右派撑腰（后因形势不利未發表）。同时还写信給他哥哥胡繩說：“很多人不同意这种做法，这样下去它的后果將是加强教条主义……加深溝壑”，他質問：“领导有什么动机？”，罵“党中央糊塗，这样下去將有很多人不敢講話，还能暢开言路嗎？”为了表明他的坚决态度，还說：“我本来已提出口头入党申請，現在也要考虑撤消了”。

2. 与葛运凌等乘团员認識模糊，篡夺了共青团二室三支部的领导，写了所謂“漫談会綜合記錄”的大字报瘋狂地向党进攻。其中項志遴認党反右派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是“令人生長的邏輯”，讚揚右派分子刘治平是一个拥护党而有正义感的青年，同情刘的“遭遇”，为刘打气，宣称“讓刘知道也有人同情他”。事后該支部团员孙守庫不同意这个記錄，和这个記錄的执笔人葛运凌爭辯时，他却伪善地劝孙說：“何必这样激动呢？”但当在团二室三支部会上听到反右派积极分子謝滋駁斥右派言論时，他馬上就起来斗争謝滋。

3. 当右派分子仇士华發表了以反教条主义为幌子，号召羣众来反对反右派的大字报，項志遴和张家珉馬上就在旁边加上批語，大加贊揚。項志遴並在团三支部小組会上宣傳說：“这是所里內容最好的一篇大字报”，建議大家“利用政治學習時間来學習討論”。

4. 反击右派开始，“綜合記錄”受到严厉的批判，項志遴还想拉住人不放，企圖阻止三支部团员認識錯誤，他在会上說：“既然領導上讓我們討論国家大事，在討論中自然会有錯誤意見，沒有什么值得認为严重的”，並和张家珉联名發表一篇“檢討”，繼續为自己辯护，仍然咬定所內反右派是教条主义。

項志遴，男，26岁，江苏苏州人。家庭出身职员，个人成分學生。1950年在清华大学入团。1953年曾去苏联短期學習。現为物理所助理研究員。

## 徐芻的右派言行

在整風鳴放初期的反动言論及活动。整風开始，徐芻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認為时机到了，以“爱护党”，“帮助党整風”作为幌子，非常“热心地”，以自己过去是房 95、房 96、水 91 等班的数学教师和房 96 班主任的身份，回到清华到这几个班和数学教研組到处点火。这段时间在所內很少能見到他，組內的討論会有时也不参加，而在清华則可看到他到处奔跑。例如：常常深夜还拿手电筒看大字报、写大字报、在別人大字报上註小字；参加座談会、学生班会、找同学談話談到十二点以后等。但与此同时，徐一方面在同学中宣揚“党沒有决心整風”，“整風中报复一定会有的”；一方面在会上、大字报上对党进攻及对党员进行人身毒辣的攻击，說：×××党员是太上皇，×××党员是慈禧太后，×××像是国民党軍官太太。不难看出徐芻的言行是毫無帮助党整風的誠意，而是有意識的到处放火，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現將其反动言行整理如下：

### 一、具体活动

1. 在家里會經常收听“美国之音”。在波匈事件后，反苏亲美思想發展的更为严重，並常以“美国之音”傳来的謠言进行煽动欺騙。

2. 在清华右派分子污蔑团思想工作的思想分类是“黑名單”，並当煽动同学向党进攻最猖狂时，徐竟挺身在一班会上对同学說，“黑名單肯定是有的。自己做过团支書做了很多錯事……”。这样使同学更加信以为真。並在駁斥“黑名單”大字报上去註上小字說：“你們不要扣黑名單这个詞了，要真正帮助同学进步，为什么不把总结公开做？事实上，由於水平不够，分不清楚。真正独立思考的爱国者，会被認為立場不稳，歌德坦丁党派会被認為进步，难道斯大林的秘密警察的害处还不知道嗎”？

3. 5月26日徐芻写了一張大字报，題为“本校一校友給阮銘同志的公开信”（阮系清华团委書記），內容非常惡毒反动，在所內还洋洋得意地吹噓这是清华教員中貼的第一張大字报，現將全文抄录如下：

阮銘同志：

毛主席昨天說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行动是完全錯誤的，我深以为然。但我担心某些害怕羣众的宗派主义者，听了这句话，会从另一个立場来“欢迎”这句话，——他們有借口向批評者报复了。有些官僚主义者，也



“欢迎”这句话，因为这顶帽子是推动“工作”（应为官僚主义者的意图）的好、快、省的法宝。我想不去谈前者，只举出一些实例去证实后者。

教学改革初期，有反对把清华的理工拆开，理由是：理工合家是美国MIT的多年经验，理工合家这样一种培养工程及科学人材的组织形式比起理工分家（而文理合家）更能适应社会的经济生活的要求。当时他们的主张被宣布为“脱离社会主义”的，其实，天哪，社会主义的国家（苏联）没有理工合家的大学这一事实，怎能做这样判断的根据呢？

三年前，领导上要我们教员订各种各样的计划——长远，具体到荒谬程度的计划。有人反对，校长却在礼堂得意的宣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分界限就在于有计划还是没有计划。天哪！校长怎么就知道美国大学没有教学计划，没有培养目标？（答：因为整个社会无计划，所以高等学校也无计划）。然，校长怎么就知道，计划愈多就是社会主义？（答：那是想当然）。为什么工作量制度又不搞了，那么说来，现在是不需要社会主义啦？

我还可以举不少例子，说明官僚主义者，如何利用“脱离社会主义”这一本法宝来“好”、“快”、“省”的贯彻其不符合实际规律的意图。官僚主义者一声号令，害得群众好苦！给工作带来了深远的有害影响（如肃反中的错误），至于对于官僚主义者本人，害处倒不大——一句“成绩基本，错误难免”了事。

由于以上原因，我担心在这大家起来鸣放的初期，也有人用“离开社会主义”来作为法宝，变相的压抑大家的爱国爱党赤诚。我这一顾虑不是没有根据的，根据我长期的观察，团委会、党委会，对批评者，总是往坏处想（对钱副校长即其一例）。

因此我请求您，向大家保证，除非有科学根据，除非有使群众心服的根据，不要宣传谁，谁，谁是别有用心者，免蹈肃反之覆辙。

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毛主席的话，不然又是官僚主义了。

徐芻 5月26日

4. 在清华整风开始，全校师生听校长动员报告时，徐偷偷的潜入清华二教、明斋、善斋厕所及在图书馆看书时又潜入图书馆厕所，写匿名煽动性的反动标语：“不让官僚主义者出卖烈士的鲜血”（官僚主义者意指现在领导同志），“不让三害分子沾污祖国——我们的母亲”，“不让烈士的鲜血白流”，“打倒它”（意指共产党不民主，像法西斯那样）。

反对出卖烈士的鲜血。（明斋）

不让宗派主义者沾污党——我们的母亲。（二教室楼）

不让官僚主义者出卖方志敏烈士的鲜血。（二教室楼）

5. 清华一同学章訓华自杀后(事前学校行政和党团对她做过很多工作,章家中也認為她自杀早料到的),徐特別表示关心,私自去章訓华家訪問,挑撥家長与学校关系,以引起对我党不滿。並在同学中造謠生非說:“章的死是对教学制度的控訴”。另,水产部一神經病患者跳樓,徐又特表关心地問同室一同志:“这个人为什么跳樓?”(答:那个人有神經病),又問:“为什么得神經病?”(答:得神經病的原因很多),最后說:“为什么得神經病的人这样多?”可見徐是到处找叉子,来攻击我們的社会制度。

## 二、反动言論

### (一)反党、丑化党及党的領袖和高级幹部

(1) 現在我們国家有很多党员都变质了,有很多像是当了官老爷,威风凛凛。这次整風,我看 1200 万党员中可以整掉 200 万。

(2) 过去共产党是用信換威,現在是用威換信。因为不給知識分子和青年学生一些威,信是挽不回来了。

(3) 党利用抗日的民族情緒,抗美援朝也如此,現在这股情緒慢慢低落,訴苦会不灵了。另一方面靠濫許諾言,說以后如何好,現諾言不能兌現,农民埋怨,矛盾慢慢大了,工农建設情緒愈来愈低,中国以后的發展,必然愈来愈慢了。

(4) 污蔑党的領袖造謠說:刘少奇写的“論共产党员修养”是騙人的。有的党员(指曾彥修的爱人周瑕齡)說:“現在还有几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下層还有好的,上層就腐化了”。又說:彭德怀沒小孩,很着急。

(5) 如果苏联批判莫、卡、馬反党集团那陣風吹到中国,我看有不少人要下台。

(6) 共产党錯誤的想利用斗争,来維持人民的战斗情緒。所以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找些人来斗一番。

(7) 整風时整了一阵是很好的,但現在反了回去,我对党要通过整風,来除三害的信心实在不足。

(8) 現在学校里有些制度确实不好,如清华的政治輔導員,大字报說他是太上皇,操生杀之大权,什么问题都要經過他批示,政治鑑定也要他签字,我看說得很有道理。

(9) 入党的人都是迎合領導,正直的人不能入党,我就是因为愛說“正直話”,常提意見不能入党。

(10) 蔣南翔缺点很多,驕傲自滿,配不上中央候補委員。蔣校長不行,要靠錢先生(指科学方面靠錢偉長)。

(11) 从上課,答問各方面都不够黨員,勢利得就像国民党軍官太太,缺点

很多,如果自己是黨員,自己一定不選她當組長,如果自己是團員,一定不批准她入團(此系在清華房九班給黨員周復秋提意見座談會上徐提的意見)。

(12) 清華黨員你不能光聽他說的,清華的一個黨員到東北去,表現很不好。

(13) 蘇共二十次大會以後,情況改變了,我國國內主要是生產力矛盾,政治就顯得不很重要了(徐平時在同學中經常散佈不問政治傾向,宣傳“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 (二)反社會主義

(1) 如第三次大戰爆發,肯定社會主義陣營崩潰。

(2) 根據統計,社會上的財富被資本家消耗掉的很少,所謂所有權就是指財產支配權,使用權,現在不過這些權歸了黨,由黨支配。

(3) 公有制與民主是否有根本矛盾還在研究,如果有,那麼社會主義陣營就會日漸萎縮。

(4) 艾登埃失敗就要下台,我國人民就不能影響政府,美國人民能迫使美國政府在朝鮮停戰,中國人民就不能影響政府政策。

(5) 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優越,社會主義浪費大,如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為了自己的利益,西苑大旅館的老板就會接辦數學所的伙食,莫斯科餐廳的主人就會設法招來生意。

(6) 西藏人民要求獨立,如從藏族利益應讓它獨立,只是由於漢族利益不讓它獨立。

(7) 像蘇、中、越三國革命是因以前無民主傳統,所以才爆發革命,以後是沒有的了。像英、美、法這些民主國家是不會爆發革命的。在美國如果人民真的擁護共產黨,他完全可以選舉共產黨。

(8) 徐說:感到懷疑,計劃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美國許多方面也有計劃,有了計劃,怎麼就是社會主義方向呢?

### (三)反蘇

(1) 蘇聯是用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來建設的,現在美國工人的生活比蘇聯水平高。

(2) 難道蘇聯沒有侵略嗎? 它對東歐國家進行經濟剝削,賤價收買波蘭的煤,中國輸出給蘇聯的罐頭,規格要求很高,很多被退回來。

(3) 斯大林死後,有人看出蘇共中央有問題,但當說出後就被認為破壞黨的團結而處理了,不久果然發生貝利亞事件。共產黨可以為了利益而抹殺真理。

(4) 蘇聯的教科書是典型的教條主義,美國的書有唯物主義,蘇聯就是由於馬列主義指導,樣樣都貼標籤,因此科學不發達。

(5) 馬克思主义已經过时了, 巴甫洛夫学說已經是幼稚学說。美国已大大發展了。

(6) 苏联今年不举行航空节, 可見苏空軍力量不足, 怕現“丑”。

(7) 一个留苏学生說: 苏联的公債是攤派的, 大家也不敢說話。

(8) 苏联就不敢整風, 因为他們官僚主义較中国严重。

(9) 苏联对中国整風不支持, 赫魯曉夫对此就很冷淡。

(10) 苏联專家的撤回, 就是对中国整風的威胁。

(11) 苏联民族性粗野爱酗酒。

#### (四) 崇美

(1) 美国較民主, 选举制度就比較好, 言論自由, 人民可以暢所欲言, 在美国資产階級報紙和無产階級報紙都可以同时發行。

(2) 对資本主义經濟制度的根本矛盾徐認为是: “前途就是人民資本主义, 工人买股票, 工人当資本家”。

(3) 英美厉害, 不單水平高, 發展也很快, 苏联在計算机方面就落后於美国。中国派代表团到苏联去想要一个回来 (如計算机) 結果不成, 因苏联根本就很少, 抽不出来給我們。

(4) 苏联有不少东西可能落后於美国, 而且資料保密, 不容易搞到; 英美的技术不坏, 而且公开。

此外徐經常从外国書籍雜誌上搬来点滴材料, 如: 在計算机方面, 苏联大大地落后於美国。电视台美国有几十个, 苏联只有八个。来宣揚美国, 攻击苏联。

#### (五) 挑撥党与知識分子的关系

(1) 党对知識分子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拉攏(收买)。

(2) 共产党最伤透腦筋的就是知識分子的腦袋最不好管, 知識分子以为社会主义有較大的自由, 可是現在發現並不如此, 入了党以后, 这种自由更受到約制, 不入党則有些工作並不能作。所以知識分子的苦悶是很多的。

这回一搞, 以后在資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恐怕不敢回来了。

(3) 我国官僚主义实在严重, 宗派主义也很严重, 知識分子悶在肚里的抑郁很多, 應該趁这次机会好好的鳴一下。

(4) 知識分子易过民主与民族一关, 社会主义意識則是解放以后才接受的, 既陌生又不穩固。

#### (六) 攻击肃反与历次政治运动

(1) 在肃反时, 毛主席随便說一个 5% 各处就湊 5%, 清华是 4.9%。

(2) 同意林希翎的看法, 像胡風問題, 今天衡量怕不應該算作反革命, 肃反我看是在攤派数字, 清华大学报說搞了 4.8%, 就与中央 5% 的控制数字很

接近。

(3) 这样看来肃反是很大錯誤，因为攤派数字，像清华是4.8%。胡風問題今天看来，只能算是个文艺思想問題，若在今天处理，不至於关起来。今天所以不釋放胡風是因为有許多高級干部不同意怕伤害了階級感情，而且捉胡風是中央决定的，这次若审不出个名堂就釋放，党中央不好交代。

(4) 在数学教研組(指清华)斗争过一个人，根本没有什麼道理，只不过当时找不到合适的人，而那个人恰恰是“刚从外校調来不久”，又是“小助教”所以就随便拿来斗了。

(5) 三反搞的有問題，伤了不少人，羣众运动一起来，如控制不好，当然会过火些，但我看当时的政策就是把学校里的老教授当作資產階級来斗。

(6) 学校領導上(指清华)很严重的偏佣观点，領導上知道被斗的人，有意见，心中苦，但反正象一张信紙写坏了一扔一样。

(7) 肃反也出在这个地方(指党不能容忍敌人)，对少数人不容忍，放去極大力量，結果花了大力量得不偿失。共产党不容忍敌人，不能同敌人一道建設社会主义。

#### (七)对鳴放“形势”的估計

(1) 問徐威(徐獨弟弟，在清华讀書)，“清华鬧得那么兇，你看党委如何下場？这次鳴放如何結束？”“党委是沒决心改正錯誤的，他們不知羣众的意見那么大，他們欠下了那么多帳，一旦鳴放起来，压力消除，大家起来，党委將难以收拾，而收場总是要的”。他認為有二个可能“其一为不了了之……，但以后学校就会“多事”了，另一收場办法是：整一下，但要像肃反那么“兇”是不会了。因为“阿斗”不多了，通过这次事件，大家看的問題多了，会“独立思考”了，这样是“覺悟”，積極分子不少是“阿斗”，会独立思考才是覺悟。但是党委收也是可以的，因为党还掌握大权。並且說：清华党委是乐於走后一条。我長期观察知清华是善於报复的，我当学生时就身受其害了(指人家对他的批評)，現在毛主席提出这个(指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行都是完全錯誤的)就是党委会收的借口。並且說：你們做学生的別鳴太多，我看清华就很可能收。我這張大字报很厉害，他們收，我就說中了，就難於下手。毛主席以前估計“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現在会知道了，情况並不是这样乐观，我看他对大鳴大放也动搖了，不得不同意“收”的意見，發表文章好給下級收場。又說：(時間是在工人說話后)毛主席這句話果真有用了。又說：(清华反右后)我点中了他們的下一步棋(指反右派)，我得当心，他們当然很恨我。

(2) 中央恐怕这事前沒有估計到学生和知識分子中出这样大的乱子，現在是进退兩难，要收怕失人心，繼續放，据说西安和武汉也在鬧事(林希翎說的)，如果一旦联合起来，事情就鬧大了。

(3) 陆定一在团代会上說青年應該在革命的風浪中站穩立場和毛主席說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言論都是錯誤的,都是有收的傾向了。

(4) 北大大字报出后向罗征求談:看样子局面不好收拾,不收鬧大了更不好,收則易失人心,給人以出尔反尔的感觉。

(5) 我校(指清华)整風中报复事件一定会有的。錢偉長已是全国聞名的科学家,大噴囉了,敢說敢放,誰(指党和政府)也奈何不了他。我自己是小噴囉,只是不想往上爬所以也不怕。

(6) 据说清华現在准备搞錢偉長,我看共产党这一着真笨,会影响到知識分子的团結,据说蔣南翔前些日子,对学生講过教授乱給党提意見,就不想想他們是吃誰的飯,很多教授听了很有反感,現在分成了兩派,一派拥护錢,一派反对他。

#### (八)对反右派斗争的污蔑

(1) 鳴放,党内高幹有80%不同意,有些當場退席,后来硬放了,学生大搞,这一下是共产党最痛心的,它想靠青年来代替老知識分子,沒想到青年問題最多,於是党内有人要求毛主席下台,因此不得不召开緊急會議决定收。这一下共产党在知識分子中威还有,信就沒有了。估計几年以內学生一定要鬧学潮,現在反右是党逼着所謂右派分子的朋友和亲人来斗他,人人自危,不得不搞。

(2) 很多官僚主义者是混水摸魚,像阮銘在整風时,羣众給他提的意見,事实确切,他不得不接受,这下子反右,他又把从前承認下来的全推翻了,还指責以前貼大字报揭發他的缺点的人是跟着右派走。

(3) 蔣南翔很毒,故意要学生訪問錢,請錢对鳴放及反右發表意見,錢一發表意見馬上就記下来,然后将錢的話断章取义出大字报,等大家来批判。对孟昭英的發言前不要后不要,从中間取出有問題的一段来登,並歪曲事实。

(4) 我看他(指毛主席)对大鳴大放也动搖了,不得不同意“收”的意見,他發表文章(指毛主席發表一切离开社会主义都是錯誤的一文)好給下級收場。

(5) 在报上發表的右派都沒有什么罪証,一个人平常隨便說話現在湊在一起就是一盤好菜。

(6) 心胸狹窄(指党),对錢先生(指錢偉長)的圍剿,就是集中表現不容朋友,同志。

(7) 按照目前掌握材料(指报上登載的)就認為章伯鈞是一个陰謀篡夺党的領導权的政治野心家似不可能。

(8) 清华党委会是沒有决心改正錯誤的,他們不知羣众意見那么大,他們欠下了那么多帳!

#### (九)对我国科学事業的看法

(1) 我們拟制的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將是一紙空文,不能实现。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不堪設想。

(2) 十二年赶上世界科学水平是不可能的,因“民族文化水平低”,“沒有工业基础”,“人太多”。十二年赶上世界水平到时只是“定义”最多是各部門有小数“寡头”可达世界水平。如果十二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把我头砍下来。

(3) 要赶上去(指科学)靠党委,靠蔣校長不行,要靠錢先生(指錢偉長),党委对科学沒远見,对世界科学不知天高地厚。

(4) 十二年赶上世界水平不太可能,就从电子计算机來說,美国1954年就出4000多架,我国要1959年才出第一架。

(5) 我国科学院的缺点是行政人員与研究人員的比例1:1,而美国某大学大概四个系只有一个管理人員。

#### (十) 其他造謠、污蔑

(1) 朝鮮战争是北朝鮮挑起的,报上宣傳說南朝鮮挑起是極其可笑的,因此美国出兵,美国人民是同意的,到美军过三八線以后,美国人民就反对了,由於他們的制度民主,所以政府不得不停战。

(2) 在第二次大战时,斯大林因怀疑波共中央,就把它整个中央委员会誘至莫斯科杀掉。

(3) 学生負担过重,毛主席說減少学时一半,楊部長說太少了,毛主席說減少1/3,於是現在高教部就湊1/3。

(4) 科学院(多指数学所)簡直是一团糟,漆黑一团,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严重到極点,揭發出来的事情簡直惊人,你們(指学生)沒有到过社会,想像不出这种情况。

(5) 清华園許多党员甚至党委会全存在宗派主义,我認为这是对世界形势估計不科学,自己进入科学院后才深深感到这一点。

(6) 数学所在搞华罗庚,华与錢差不多,說話一套,行动一套。

(7) 技术与行政工作不同,后者怕掉飯碗,前者不怕。

徐的家庭出身及个人经历。徐芻,男,1930年生,广东中山县人。家庭出身高級取員,其父为大学教授,其母在广州人民救济分会嬰兒院工作(1952年曾任院長),三反中为貪污分子,曾受机关管制处分。徐芻自幼生長在广州,高中时在基督教会所办的学校培正中学、嶺南大学讀書。解放后在燕京、清华讀書,至1952年畢業后留清华任助教,1958年底調至数学所工作。1949年在燕京大学入团,到清华后曾任过团支委。

## 夏永年的右派言論

(一)認為馬列主義是一門純科學，沒有階級性，而無產階級拿來硬說有階級性。他認為在社會上根本就不存在着什麼階級，“階級是人為的”，社會上人人都為自己，那麼大家加起來的總和反正也是為自己。

(二)反對工人階級的領導。他公開的說：“我不明白今天為什麼偏要工人階級領導革命，我想不通，因為我可以替農民和知識分子找出很多優點，同時也可以給工人階級找出很多缺點。”並且說：“推動社會前進的是科學和文化，而知識分子是科學和文化的代表者，因此，實際上是知識分子領導革命，歷次的革命運動都是學生最勇敢，沒有看到過工人有什麼貢獻”(在鳴放會上)。

(三)不相信共產黨是代表人民利益的。說：“黨和人民利益一致是胡扯”，他在過去就認為：(1)黨的利益和人民利益一致，是假借人民名義，本質上就是一黨專政，當他看到“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一書中第五條：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後，認為黨只說自己好，而故意找一個好階級給自己套上去，同時他又認為黨的領袖大部分不是工人階級出身，而為什麼偏說是工人階級政黨呢？(2)說共產主義社會是最好的，難道沒有更好的嗎？共產主義發展下去是什麼樣總是含含糊糊的，既然社會發展是歷史必然的，為什麼就不能知道呢？黨既然是為共產主義社會而奮鬥是最終目標，那麼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會不會出現比黨更好的呢！像現在反對資產階級一樣反對黨？黨會不會成為歷史上的東西呢！(3)高饒事件發生後，他認為是派別之爭，爭權奪位，懷疑目前我們黨的高級幹部領袖中是否真正團結。他說：只有做大領袖的人才有榮譽，實際黨總是由幾個領導者獨佔的，製造出的理論，是用以維護自己的統治。並說決定中央政策問題，只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幾個委員決定一切，中央委員會也不起作用，只是走走形式通過而已，因此，懷疑黨“獨裁”。(4)黨的選舉，民主是假的，其實都是由黨所決定的，等額選舉只要提名一定能選上，還說可以選別人有什麼用！又說憲法雖採取法律形式固定下來，但政權掌握在共產黨手還不是想怎樣做就怎樣？

(四)他把黨員忠實的遵守黨的紀律服從黨的決議硬說成是盲從，說：“有些黨員只是在那舉手(意即盲從)”，因此他“建議”在黨章中應增加一條“獨立思考”作為入黨條件(在鳴放會上)。對於在歷次運動中的積極分子，他認為都是為了獲得自己的政治資本，打擊別人。他說：“我最恨像馬春義(他系班上的積極分子)這樣人了”(在鳴放會上)。



(五)對於在整風以來鳴放期間社會上一些極端反動的右派分子的言論極為贊揚。他非常同意在報紙上右派分子污蔑黨員是便衣警察的說法。他說：“有部分黨員就是這樣”(與鄭明智談的)。他看了葛佩琦的發言覺得很痛快，並且也極力贊成儲安平的“黨天下”，他說黨中央就是官僚機構，要反對就得反對黨中央。

(六)他聽到其他同志說“過去和現在黨在制定重大科學規劃時都是請科學家來商討，夏說那是因為共產黨對科學沒辦法領導”。

當談到黨在科學院領導薄弱時，夏卻說：“共產黨對科學就是沒辦法領導，當然顯不出領導作用來。”

(七)他認為我們人民代表大會不民主，因為會上沒有爭論。美國國會無論怎樣，他們有爭論，就是民主些(在鳴放會上)。他說：“我們國家就不像西方國家那樣民主，自由”，他也極力攻擊我們的新聞報紙，他說“我們新聞不自由，只有一個通訊社，報上沒反面消息，不能辨明真理。美國無論怎樣共產黨還可以出報紙”(在鳴放會上)。因此，他主張“一個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絕對自由”，應該“給人民以權力罷免不好的領導人”，他要求改變我們國家的選舉制度，應該採取“競選”。

他認為我們國家的憲法就是一種形式，什麼都是共產黨說了算。他說：“什麼憲法不憲法的，我對這就不感興趣，慶祝通過憲法時我就一點興趣也沒有”(在鳴放會上)。

(八)對社會主義公有制大肆加以攻擊，認為“社會主義企業有政府撐腰，企業經營的好壞與工作人員無關，幹好幹壞反正也不能垮台”，他說以前資本主義較發達的上海的私人企業，對“人民”就方便。他認為這是由於資本主義有自由競爭的刺激。使他們必須把企業經營好，“無論資本家的目的如何，總是对人方便”。

(九)他認為在現在的社會上“人與人沒有真正的感情、友誼，處處冷冰冰的”，把人与人之间關係說成互不信任，有“互相提防的心理”，社會只有“盲從和會拍馬屁的人才吃香”。

(十)他從根本上否定我們肅反的必要性，他認為我們的肅反是人為的緊張，是胡搞，和“國民黨的宁可錯殺一千，不可錯放一個毫無區別”(鳴放會上)。他惡毒地攻擊肅反成績，並顛倒黑白地說：“肅反估價應該是錯誤主要的，成績是難免的”，“我們歷次運動的偏差，都是自上而下的，我就不同意說成是局部的缺點”(鳴放會上)，在一次鳴放會上他甚至狂妄地說：“共產黨你不要以為赤手空拳的人們不會反對你們！”

他還明目張膽地為胡風辯護。他說：“根據公佈的材料還不能算作反革命分子，如果胡風是在今天(指鳴放時)說那些話就沒有關係了。”

他認為“肅反中所謂羣眾積極參加，實際上是迫不得已，在那硬給人提意見，怕自己也被斗，因而表面上假積極。”

(十一)苏联專家幫助我國進行經濟建設他認為“是刺探經濟情報”，苏联在新疆幫助我國開採資源，他認為是“帝國主義的掠奪”（與林柱談）。他認為苏联干涉其他國家內政，像美國一樣，“苏联在国外也有軍事基地”。並說我國提出的一邊倒政策是“掩蓋苏联的侵略行為”，他認為苏联根據華沙條約駐匈牙利軍隊，保衛社會主義陣營和匈牙利安全是不應該。

他又說“苏联就是盜走了東北的機器”；苏联科學大都是抄襲英美的，而硬說是自己的成就；苏联電影沒有什么看的，是公式化，當他看完“走向新岸”之後，說電影中的“讓到沙漠就到沙漠，到北極就到北極”這種教育是癱瘓人，“使人麻木不仁”。

(十二)他極力讚揚美國的所謂民主、自由和所謂物質文明，認為美國的一切都是好的，“有民主、有自由、科學進步、技術發達”，他對美帝國主義極其信任，甚至信任到這種程度，當美帝進行侵略戰爭時，他認為是北朝鮮先出兵，對於轟動全世界的，由美國政府一手捏造出來的盧森堡事件，當美國政府把無辜的盧森堡夫婦陷害之後，全世界正義的人們都抗議美國政府這種卑鄙無恥的陷害行為時，他却認為美國政府決不會冤枉他們。

(十三)對政治經濟學的客觀規律性懷疑

1. 對客觀存在，歷史發展規律懷疑，認為這不過是維護自己統治的一種說法而編出來的，因為他無法證明，不過是為了這樣做才說的，究竟是否正確還不相信。

2. 不相信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科學，為什麼到社會主義以後的部分，以苏联代替，是否為苏联服務，反而說是客觀法則。

3. 對政治經濟學所提到：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勞動強度，他認為是一樣的。只是名詞不同，還不都是增加人的工作量。同時也認為剩餘價值和在社會主義部分工人為集體創造的那部分價值是一樣的。

(十四)反對反右派鬥爭。鳴放時他極為活躍，除了自己大放毒藥之外，並把報紙上的右派言論大力的傳播，並說：“這是壓久了的東西，自然要放出來”，他認為文匯報最“民主”，最大膽替“人民”說話。

當人民日報登出第一篇反對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的文章之後，他叫囂“人民日報太不像話了”，“人民日報的總編輯應當下台”。並說那些反擊右派的文章是“共產黨搞出來的”，當人民日報批判章伯鈞等右派分子時，他說這是“收了”，“這像話嗎!!! 其實章伯鈞並沒說什麼呀!” 當看到報上載史良揭露章伯鈞的反動言行時，他說：“史良這樣人是最卑鄙的人，我最恨這種人”，並且認為凡是積極反右派的人都是為了“明哲保身”。



## 徐志国的右派言行

### 一、利用整風，向党进攻

1. 他在五七年五月三日日記中写道：

“昨天的人民日报提出要整風，这是跟着形势發展而提出的，我應該考虑一些問題，是否就这个时节来‘决口’，我也悶得太久了。要冲破那些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堤，我要放开喉嚨大叫几声。”

2. 他在五七年五月十日日記中写道：

“现在还在整風，要不要趁此开砲哩？什么时候决口哩！應該向那些坏作风开砲，但應該开得把握，要击中要害。”

3. 他在五七年五月十四日日記中写道：

“最近是‘广开言路’，我應該部署自己的做法了。我痛苦得很，我强烈地感到需要鼓舞和支持，應該打砲了，要准，要轟掉‘三害’。”

4. 他在五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日記中写道：

“一只雄鹰当他久久不飞的話，他的翅膀慢慢会退化的，如果說我把自己比拟成一只鷹，那么我應該警惕这句话。世界是这样的辽阔，我为什么不振翅飞翔呢？我为什么在自己的四周打上了圍牆偏促在一个地方呢，我相信自己的才智，但是要获得成功必須付出劳动，世界这样大，拆掉自己打在自己周圍的牆吧！有抱負，有理想，帶着自己的抱負和理想埋入黃土，那么，没有什么再比这个可恥的。为了要謀一个官职，有汽車，有洋房，那並不难，至多十年、二十年的時間，但是要使人們永远的怀念着你，給人們帶來幸福和微笑，要使理想变成现实，这才是难的，而要克服这个‘难’，就要看自己这样战斗，怎样去征服一切。”

5. 他在五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日記中写道：

“下午是‘整風’學習，因为开学部大会的緣故，院部还是‘鴉雀無声’。我正在抽時間准备和收集一些材料，准备在理論上充实自己；开砲决不能开空砲，那么現在就要准备更多的彈藥。我想能够通过‘整’来提高自己的。”

6. 他在五七年六月一日日記中写道：

“上午是整風學習，大家总算談出了一些，可以看出有好些人还是顧慮重重，他們不敢直接的，尖銳的提出××(專家工作处副处長)的缺点，揭露她丑惡的一面，只是不痛不痒的給那些院長、秘書長提一些，道理很簡單，他們怕，

因为直接整××，怕整風完后××会报复，而給那些秘書長等提意見反正他們也不知道我姓張还是姓李。我在会上当據就提出了这一点，我今天也談了一些。我說，我是有很多話要說的，如果說我的意見像黃河的水，那么总有一天会洶湧澎湃的決口的。讓××去知道吧！她总会知道我是这样对待像她这样寄生式的廢物的。根据××的态度，我将考虑我的做法，我会貼大字报揭她的底。”

7. 他在五七年六月四日日記中写道：

“办公厅已經打砲了，这是好現象，大字报貼出去了，不过还没有深入，我的砲彈也到成熟的时期会放出去的。

下午去参加了××召开的會議，關於整風中成立宣傳組的事，其实羣众發勁得好，今天的大字报不是沒有經過什么動員，組織嗎？我本来想反对有黨員参加宣傳組，可是我沒有提出来，我有自己一套做法的。××（办公厅党支部副書記）心里大概有些害怕，做賊一定心虛。我的砲面不准备打××和××，打掉这种骯髒的官气，特別是××。”

8. 他在五七年六月五日日記中写道：

“整風，下午給××集中地提了四小时意見，我沒有發言，但是我却告訴了××和大家，應該認為这仅仅是开端，別以為已經是結束，打倒官僚主义决不是一朝一夕，而要找它的根源，挖它的根，还需要深入。我講这几句話的用意××是不难理解的。”

9. 他在五七年六月六日日記中写道：

“打××的砲爆炸了，事先沒有考虑到这件事的性質与整風目的关連並不太大。我發表了我的看法，我承認我这里面包含着对××一些情緒。……事情出来了，有些人不知下情，瞎起哄，不过我非常高兴，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多么好的鍛煉机会，應該爭取这种机会，甚至制造这种机会，善於去發現問題，暴露問題，爭論問題，只有在这种实际的活动中才能有所提高，我可以說我在爭論中現在已初步学会了冷靜。我对象×××那样的处长，那种失去理智的态度，只觉得好笑了。这样的态度已引起專家工作处一羣小伙子的憤怒。以后当然还別有下文，不过我經得起考驗。

办公厅虽然勁起来了，可是火力不猛，猛火只对中厅外單位，显然羣众还有顧慮，現在在运动中有这样几种人：

一种是战士，积极的提意見，拆牆填溝。

一种是旁觀者，不發表意見，就怕惹火燒身。

一种是假的战士，他們看来虽也忙忙碌碌，似乎也在活动，但是对領導有利的（如表揚×××退还二十元的事）或是不痛不痒的意見，不触及領導的意見，他們就簽上个名，显然，初看来这样的人是‘聪明’的，但是这样的人永远是

違背着真理在做事情，英明的領導者還應該不要那些阿諛奉迎的人。

晚寫了‘一則聲明’，說明幾個問題，說實在的參加整風已經影響了，而且嚴重影響了我的本身工作的開展，我應該提醒自己，火力要集中，不宜分散。要取得羣眾支持。”

10. 他在五七年六月七日日記中寫道：

“對××的意見，經我同意，宣傳小組等已決定建議不再繼續討論，事實上這樣做也對的，問題本身不完全符合黨的整風精神，今天的中心已轉移到批評那些起哄，壓制民主，壓制提意見的人上面去了。這當然也是一種正常現象，專家工作處在給我說話了，文書處一部分，也在聲援……。這樣做不是庇護我，確確實實是在衛護真理。不過我提出自己看法前確實也沒有考慮成熟。……有意思極了，不過也累極了。

今天一天什麼工作也沒有幹，似乎這已經不是整風、工作兩不誤了，下午專家處和資料室，通報室合併開座談會，晚上團內莫明其妙又開支部大會，我當時提出了反對，很多人同意結果就宣告散會。”

11. 他在五七年六月十三日日記中寫道：

“至於整風的事，雖然重要但可以較緩，前一個禮拜，把這事看得太急，就容易出偏差。”

12. 他在五七年六月十四日日記中寫道：

“下午舉行討論會，就是談最近報上登的東西，我最近不打算發表任何意見，寧可成熟一些，討論會只參加了一小時，據說沒有多大爭論。這次會是工會主辦按道理我應該下手抓，可是我自己實在也忙得不可開交，每晚趕到深夜十二點。另一方面，他們對我大概有些看法，我也有些賭氣，不過我不想放在臉上，也許是我敏感。”

13. 他在五七年六月二十日日記中寫道：

“如果說我已經失去了理想和雄心，那麼，我現在就會沒有痛苦，我會理安心得，糊糊塗塗像個可憐蟲似地在浪費自己的生命，可是，事實上並不如此，我的理想和目前我所處的境況卻有着距離，我還做得不夠。現實，就像是一條皮鞭似的狠狠的抽打在我的心上，我只要腳一軟，神智一迷糊，我就會失去方向，我會倒下來。可是有時候我確是會軟，會迷糊。我只能自己鼓勵自己，我一點也不想把這種痛苦給別人察覺。”

14. 他在五七年七月四日日記中寫道：

“一年快過去了，在學校里是對事業的雄心和對將來的憧憬支持我，賦予了我生活戰鬥的力量。可是我現在在質變。如果說我的精神死掉了的話，那麼我的軀體留着也是沒用的。世界這樣大，人這樣多，我似乎沒有找到一個知心。我也不想對任何人訴說我心中的苦煩，甚至不願意讓他流露出來。”

## 二、煽动点火，挑撥黨羣关系

1. 办公厅整風刚开始时徐志国对情报所某同志說：

“我要对领导好好提些意見，提的好我就幹下去，提不好就走，反正科学院也沒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办公厅整風搞的很熱鬧，出了不少大字报，你們可来看看……”。

2. 整風刚开始徐志国打电话問印刷所同志，为什么沒出大字报，並計劃以稿报小組名义到印刷所去召开座談会，收集对党不滿的意見，会后想对外写报道，因为他發現印刷所有几个“大砲”。

3. 整風刚开始徐志国要建議由他来搞个油印刊物，專門收集对党的意見。

4. 学部大会期間徐志国要向报社写文章“文津街三号科学院是衙門，为什么鴉雀無声”？並想和文匯报北京办事处联系，請記者到科学院来採訪。

5. 在一次整風小組会上徐志国說：“我的意見像黄河里的水一样，总有一天会决口”，可是他一直不談，反而煽动党员把党內的‘丑事’講出来，他說：“整風就好像党是病人，羣众是医生，病人不說那里有病，医生無法治病”。

6. 徐志国在会上說：“党內的毛病是关着門整，应放到羣众中来整，否則党员沒有架子也搭起架子来了。”

7. ××党员在会上發表了意見，徐志国立即斥責說：“××在整風中还没消除自己的顧慮，不敢給××（專家工作处副处长）提意見，是不是怕以后还在她的管轄下一輩子不得翻身……”。

8. 徐志国說：“整風就是要提缺点，提优点就是奉承领导，掩蓋矛盾，提意見愈多的人应評为整風中的積極分子。”

9. 有一次在整風小組会上組長說，我們考虑的面不要仅限于处內，还可以寬一些……，於是徐志国就駁斥說：“大家剛开了个头，我一肚子話还没講，这样一說，使我有顧慮，好像組織上要轉移目标了……”。

10. 有一次徐志国趁別人写有关工会主席的(党员)大字报机会，就对×××說：“她的选票比你少，为什么她当主席，你当副主席”，並亲自备好笔墨紙張煽动他写大字报去質問，为什么党一定要“派”党员作工会领导？（事实上，工会委員是大家选举的，委員之間的分工是全体委員会上共同商定的，徐志国亦作为委員之一参加了这次会）。

11. 徐志国在整風小組会上說：“1954年黨羣关系还好，現在不好，原因是党对羣众和团员防一手，好像防盜一样，幸亏我还是个团员，如果是羣众情况就更不可想像了”，又說：“如对羣众不相信，总有一天羣众要拿起棍子一棍子打死”。

12. ×××同志在整風会上提了一些意見，反右派斗争开始时表現不够积

極，於是徐志國就對別人說：“我以前認為×××愛向組織彙報，對她印象很不好，現在我對她的看法有了轉變”。

13. 有一次×××在整風會上提了意見之後，徐志國對他說：“我改變了以前對你的看法，你很勇敢”，並且主動提出要把自己的表妹介紹給他。

14. 當徐志國貼出大字報攻擊×××同志（辦公廳黨支部副書記）時，有的同志貼出了大字報反對這種謾罵，於是徐志國在他的‘我的看法’一文中質問這些同志說：“你們是怕入不了黨，還是怕得罪你們的領導”？

15. 當羣眾羣起憤怒質問徐志國時，他怕暴露自己的丑惡面貌。於是徐志國一方面貼出了‘一則聲明’大字報，聲明撤回自己的大字報‘我的看法’一文，另一方面又在羣眾中散布說：“羣眾幫助黨整風有三種類型：

（1）真心真意幫助黨整風，（2）看熱鬧的，（3）表面上很積極、實際上光說好話，不說壞話，尤其是不敢說本部門領導的壞話。”

### 三、攻擊黨的領導

1. 徐志國是整風牆報小組一員，有一次要他工作，他說：“我現在正在考慮重大問題”，又說：“既然黨進行整風，黨支部就應退出牆報小組，讓工會和團搞就行了，否則大家提意見就有顧慮。”他還私下張貼匿名大字報。

2. 徐志國說：“我過去有大民主思想，從外專時就認為組織性、紀律性是一種束縛，強調個性自由，大胆潑辣，彙報很受拘束對有人不管大小事總要向領導請示表示不滿，主張可先斬後奏……”。

3. 徐志國說：“看了‘國產片為什麼這樣少’討論文章後認為‘解放以來的國產片是公式化、概念化，這是由於行政領導代替了藝術創作’，‘黨對電影界管的太緊’，是‘教條主義統治着文藝界，是共產黨怕思想自由了，人民起來反對黨’”。

4. 整風開始時徐志國張貼匿名大字報“醜陋的靈魂，丑惡的面目，揭下××的假面具！”對辦公廳黨支部副書記進行了無中生有的惡意污蔑和攻擊。

5. 徐志國說：“對張副院長和裴秘書長我是十分敬佩的，他們對於我像父親般的，無微不至的關懷使我深為感動……”，可是，在整風開始時徐志國就貼出了匿名大字報‘是已經沾上了官氣還是怕失掉首長們的歡心’！大字報里寫道：“院領導同志的秘書是那些‘長’們的左右手，他們對自己首長的情況最了解，只要他們還有一点对黨的事業的責任感，他們就應該揭露那些官僚主義者丑惡的面目，可是黨員領導同志的秘書似乎還顧慮重重，不敢大放厥詞，是你們也已經沾上了官氣？還是怕失掉你們首長的歡心??”

6. 向人民日報寫小品文“從脫下官服所想到的”，其中寫道：“黨員副院長（指張副院長）跨下了汽車，穿了一身灰不溜溜的舊衣服。接着秘書長、局長也



悄悄地脫下了料子官服，穿上了藍衣百姓裝，這是好現象。遺憾的是他們仍是使人畏而遠之。有些科學家說：庸俗！一般幹部說：裝作！好現象成了壞現象！

顯然，主要問題不僅在脫官服，而是要拆掉官架，排出官氣。”

7. 徐志國在會上說：“我只是對個別黨員有意見”，可是對核心組領導說：“我對辦公室領導幹部誰賢不相信，都是壓制民主，打擊報復……”。

他還說：“我的問題是思想問題，是右傾思想，你們這樣搞是個偏差。”

並且，他還在日記中寫道：“……誰也不會明目張胆地承認自己在壓制批評，因為誰都知道，壓制批評是違法亂紀的，是會陷於孤立和失去同情的，為了‘壓’的妙，就產生了許多新的方法和技巧。”

#### 四、支持右派言論，反對反右派

1. 在整風會上有一人提出“黨員分四類”的謬論（即把黨員分成聖人、賢人、常人、小人四類，後二類比前二類多），徐志國發言表示贊同，並在第三類黨員中提出所謂“算盤式”黨員。

2. 反右派鬥爭開始以後，徐志國說：“大家剛開始大放火鳴，現在又收了”，“這是黨為了挽回自己的威信”。

3. 當人民日報第一篇批評文匯報的社論發表後，徐志國說：“人民日報為什麼不提文匯報的優點呢？文匯報編排技巧很好，具有獨特風格，連毛主席還表揚過文匯報”，又說：“文匯報把毛主席對團大代表的講話作為普通新聞登出，是各報編排技術的不同，或者編輯人員的疏忽大意而已”。當同志們問他對文匯報變質的看法時，他說：“當一個人的愛人受了批評，心裡總會覺得難過的”。

他在五七年六月十四日日記中寫道：

“人民日報今天在第一版上登出了編輯部對文匯、光明兩報的批評文章說這兩個報有資產階級方向的傾向，我基本上同意，因為作為報紙來講它就是上層建築，服務於一定階級，不過批評中應該肯定這兩個報的優點，文匯報編排，內容的新穎，多彩，這一點是不能抹煞的。文匯和光明兩報我都愛看，而且是每天必讀的，文匯報特別使我喜愛。……對文匯報我具有一種特別深切的感情。爸爸好些朋友在文匯報工作，副社長嚴望禮，社長兼總編輯徐鑄成都是爸爸的朋友，爸爸自己也擔任文匯報副經理。經營過這張報紙。估計人民日報的批評會在一定時期內影響文匯報銷路的，我想就這件事情寫些東西，從讀者角度給文匯報寫些自己的感受應該指出這報對的一方面，肯定他們的成績，一個多月以前，徐鑄成剛從蘇聯回來，他用總編輯名義寫了一篇文章，提出了黨員副總編輯的缺點和在文匯報社內黨羣之間的牆溝問題，我看後很同情，我不知道人民日報的批評是否與這篇文章有關。”

4. 他在五七年八月二日日記中写道：

“反右派运动在繼續深入，从大头目斗到中小头目，層層深入，我一些也不想隱瞞自己的心情，對於那些抹煞成績企圖推翻共产党領導的人我是反對的，但另一種惻隱之心，惜才之念總會若隱若現地產生，戲劇界在整吳祖光了。……我總有些可惜，好好一個作家為什麼又要這樣呢？或許我的想法是幼稚的，或許正像人所指出的那樣是溫情主義，但是吳祖光的筆下確實寫出過好的作品。鍾羣在中國青年上寫的文章說右派的人為了謀取信任一定會先寫出一定的看來是好的作品，可是這又將怎樣來理解作為一個作家在產生好的作品前必須正確地認識世界然後才能正確地反映世界這句話呢！如果一個作家不具有無產階級的恨和愛，他的作品又怎能看到恨、愛呢？從作家協會揭露孔厥以後，我的腦里就產生過這樣問題，作家是否具有雙重人格的？”

5. 他在五七年八月十四日日記中写道：

“看到了詩人臧克家五月三日寫的雜文‘六親不認’。……我是同意他這一段話的。克家是現代詩壇的一顆巨星了，現在當然沒有人在批判他，或許為了這批文章可能他正在作自我檢查。但是這確實寫出了知識分子的心情。黨決不能把人与人之间搞成‘見人只說三分話’或是搞得沒有人情味，只是那些並不理解黨的政策的人，才導致如此。人是有感情的，我永遠相信極大多數的人是善良的，可愛的。但是猜忌、排擠，給人們又帶來了什麼呢？”

6. 徐志國對流沙河寫的草木篇非常欣賞，當報上批判這篇作品後，徐志國認為是對流沙河的“政治迫害”，曾向文匯報寫了題為“反對政治迫害”一文。

7. 有一次辦公廳召開了第一次批判右派分子的大會後，徐志國問×××，大會開的如何？×說：“今天發言的主要是那幾個秘書，羣眾發言的很少”，接着徐志國大罵說：“他媽的，整風時，他們不提意見，現在他們都積極起來了”。

8. 徐志國說：“整風時黨員不講話，拿出一副挨整的架子，反右派是整別人，反正不是割自己的肉，就積極起來了。”

9. 在批判右派分子的團支部大會上徐志國說：“我們在反右派鬥爭中，對右派分子的言論就應‘有一駁一、有二駁二’，不要夸大”，並舉了一個人丟了斧子懷疑鄰人偷去，越看越像，但以後在自己家裡找到的寓言，來污蔑辦公廳是在無根據的主觀主義的反右派。

10. 他在五七年七月三日日記中写道：

辦公廳在集中火力批判×××，現在反右派已經成為一種全國性的運動，作為一種運動它就具有運動的特點。

文匯報今天發表了“向人民請罪”的社論。事物總是這樣複雜，在這複雜的事物中能學到很多東西。

11. 他在五七年七月十七日日記中写道：

“办公厅在这次运动中接下来对办公室的×××要进行批判，大帽子已經帶在×的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从我懂事起运动已經不少了，我希望自己能在每次运动中吸取教訓，不仅要吸取，而且要时时刻刻想起这些教訓。这样，我才会有出息的。”

12. 徐志国非常不满对他的批判，他說：“运动本身总是具有运动的特色”，“在斗争中大家把小問題都提到原則上来看，我若是搞別人，也会是这样，現在整自己，有什么可說的呢？”，又說：“我同意开会，大会小会沒关系，願意作槍靶子，讓大家練習練習”，“真金不怕火煉”。

13. 有一次，团內听許立羣“談立場問題”报告后，情报所一同志問他，你們那反右派进行如何？你的問題如何了？他說：“沒有什麼”，又說：“在斗争中要学会冷靜”，並說：“現在做人难做，你積極了，說你想过关，不太積極，說你对运动不严肃，不積極，又說你想抗拒”。

14. 他在五七年七月五日日記中写道：

“下午，支部召开大会，我在会上發了言，我最后提出对右派言論要有一駁一的意见，好多人不同意。当然我想了一下以后是提錯了，因为現在是运动，‘运动’兩字我應該作更深刻的了解。”

15. 他在五七年七月六日日記中写道：

“我沒有料到昨天出於好意的，但确不利於运动的發言，会引起这么多惡意的猜測。有些人态度簡直惡劣至極，想不到×××作为办公厅主任在会上也作了猜測，不过，我不怕，是說錯的承認，我應該承認对运动認識不清。應該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来鍛鍊自己，提高自己，同时也來檢查自己的缺点。

晚下了一場大雨，或許下个礼拜在我身上会有一場大風暴的，我会高高兴兴的迎接它，我是作了最坏的打算，只多他們認為我在支部大会上的發言是別有用心，是什麼动机？思想？观点？立場？这都不要緊。我檢查了自己前一阶段的發言，我並沒有什麼反社会主义言行，而且我思想感情上也不存在这种思想。所以，我不怕。但是，我确实受到了教育，至少我應該学到一点东西，不仅要學習，而且要隨時提高，警惕自己。”

16. 他在五七年七月七日日記中写道：

“虽然我在昨天的日記上說，我要高高兴兴地來迎接暴風雨，但心里总有說不出的味，一种自己的話沒有被人理解，反而曲解，猜疑所引起的味，可是实际情况是这样，怎么办呢？‘接受考慮，吸收教訓’就是这样。”

17. 他在五七年七月十日日記中写道：

“看样子要搞到我头上來了，我不怕，真金不怕火燒的。出了大字报，当然，还会有下文。一切不負責任的言行，或对我个人的侮辱我决不允許。”

18. 他在五七年七月十一日日記中写道：

“整理了昨天會議的配录，對於我，除了一些惡毒的字句的堆积外，再也沒有什麼具體的內容。我不怕，因為沒有這樣的事，我看看，看他們怎樣做。這裏是黨中央所在地，办公厅支部總不能代表整個黨吧！我也知道我的身上會沾上些污水的，這不要緊，問題是沾上污水後不要慌慌失措。”

19. 他在五七年七月十三日日記中寫道：

“顯然，對待我他們是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的，不過，我不怕，一點也不怕……”

現在有不少惡毒的字眼在我面前飛舞着，污水在向我濺來，可是古今中外真正的英雄、天才，他們何嘗不是挨過人家罵，得到過那些比用在我身上的更惡毒字眼的青睞呢？真理永遠只有一個。”

20. 他在五七年七月十九日日記中寫道：

“全國反右派運動正在深入，×××問我，他和我是不是都有些右的思想，我並不想否定，確實，我過分強調大民主，自由，今天團內向我提出了批評，作為一種運動，我難免會受到運動所具有的特色的影響。”

21. 他在五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日記中寫道：

“這次運動涉及的面很廣，政治經濟、文化部門里都有右的人或右的思想……青年學生，當全國解放時，好些人才剛懂事，可是八年來為什麼他們對黨，對社會主義有這麼多看法呢？”

22. 他在五七年八月六日日記中寫道：

“下午，處里開會和我提意見了，還是文匯報，由他們去搞吧，我是不怕的，黨中央在北京，我永遠相信黨中央是正確的，當然，××是恨我的，我也確實得罪了不少人，自己一些缺點寧可讓自己毫不留情地來消除他，但我決不允許任何一個人來大聲、粗野，甚至擺起一付架子來和我談任何什麼。”

23. 徐志國在大会上作了兩次所謂檢查，表面上說自己是在老老實實作交代，可是背後却寫了一篇日記，現摘錄如下：“我現在是先給自己扣上一頂帽子，然後再去找尋、拼湊，甚至創造些事實，顯然，這些事實意欲人聽聞，意欲反動，似乎表示交代得愈徹底、愈忠誠，我現在不是根據事實來給自己帶帽子了……”。

徐志國，男，21歲，家庭出身資產階級，本人成分學生。1956年9月畢業於哈爾濱外國語學院，現為办公厅專家工作處俄文翻譯人員。共青團員。

